



## 目 录

### 专 论

- 3 冯绍雷 / 俄罗斯：2013 年的多重含义

### 能源与交通

- 12 张昕 / “能源帝国”、“能源超级大国”  
和“能源外交”的迷思
- 32 I·欧拉兰德 / 全球化视角下俄罗斯  
远东地区油气业发展：挪威国家  
石油公司合作战略个案研究
- 51 昆都 / 丝绸之路的连通和地区运输走廊

### 宗教与哲学

- 66 徐凤林 / 东正教灵修传统与俄国文化史  
——霍鲁日的俄国文化史观
- 79 赵小华 / 俄罗斯东正教会封圣史发展概  
述
- III B·谢尔比年科 郭小丽 / 19 世纪俄国哲学  
中的中国形象
- 130 安启念 / 从奥伊泽尔曼看后苏联时期  
俄罗斯哲学
- 147 洪亮 / 凡登布鲁克与俄国

### 俄苏问题

- 167 于滨 / 西方苏联学的内核与外延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杨 成

刘 军

本期执编：刘 军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3 年 12 月 28 日

#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3 年第 6 期 ( 双月刊 )

## Оглавление

**Фэн Шаолэй**

Россия: многозначность 2013 года ..... (3)

**Чжан Синь**

Мифы об «энергитиче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энергитической сверхдержаве» и «энергитиче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 (12)

**Индра Оверланд**

Нефтегазов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изучени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норвежскими и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и компаниями ..... (32)

**Н.Д.Кунду**

Транспорт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коридоры ..... (51)

**Сюй Фэнлинь**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традиция духовности и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згляд Хоружего на культуру России ..... (66)

**Чжао Сяохуа**

История канонизации святых в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 (79)

**В. Сербиненко, Го Сяоли**

Образ Китая в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XIX в. .... (111)

**Ань Цинянь**

Взгляд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ую русскую философию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Ойзермана ..... (130)

**Хун Лян**

Артур Мёллер ван ден Брук и «Русский миф» ..... (147)

**Юй Бинь**

Суть и диапазон совет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а Западе ..... (167)

#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3 年第 6 期 ( 双月刊 )

## Contents

### *Feng Shaolei*

Russia: Multiple Significance of 2013..... (3)

### *Zhang Xin*

Myths of “Energy Empire”, “Energy Superpower” and “Energy Diplomacy” ..... (12)

### *Indra Overland*

Russia’s Far East Petroleum Province in a Globalization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an NOC Partnership ..... (32)

### *Nivedita Das Kundu*

The Silk Road and Corridor of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51)

### *Xu Fenglin*

The Orthodox Meditation Traditions and Russian Cultural History: From Horujy’s Perspective..... (66)

### *Zhao Xiaohua*

Review on History of Canonization of Saints within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79)

### *V.Serbinnenko, Guo Xiaoli*

China’s Image in Russian Philosophy in the 19th Century..... (111)

### *An Qi’nian*

Russian Philosophy in Post-Soviet Era: A Perspective from Oizerman..... (130)

### *Hong Liang*

Van den Bruck and the «Russian myth»..... (147)

### *Yu Bin*

Essence and Extension of Western Sovietology..... (167)

## 专 论

## 俄罗斯：2013年的多重含义

冯绍雷\*

**【内容提要】**精彩纷呈的“多重性”的表现，乃是2013年俄罗斯内政、社会、经济与外交各个领域的难得业绩记录。尽管面临诸多尖锐挑战，普京仍执著引领俄罗斯政治走向开放，与前一阶段“有弹性的威权政治阶段”相比，政治格局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俄罗斯社会在大力反腐的同时，坚决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力保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相对低迷的情势成鲜明对照，俄外交表现出强劲的活力与光彩。俄罗斯全力推动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方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新概念，成为今后的中俄关系长远部署中有待互相深化理解、共同努力营建的合作新空间。

**【关键词】**俄罗斯内政 社会 经济 外交 中俄关系

**【中图分类号】**D73/7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3)06-0003-(9)

未来历史学家在书写2013年的俄罗斯历史时，大概会发现这一年俄罗斯内政外交以及社会生活所经历的多重特性。

首先，2013年的俄罗斯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似乎表现出了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发展和对外战略两个方面如此明显的反差：一方面，其国内经济不断传来低迷信息，但是，俄罗斯的外交却反其道而行之，表现出强劲的活力。无论是在全球事务、区域发展、还是各种双边关系中，都表现出一个昔日超

\* 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级大国的深厚潜能和影响力。同时，根据权威民调的评估，俄罗斯社会舆论似乎正在从原来的对于恐怖主义的担忧，日益转向对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的密切关注<sup>①</sup>。但是，恐怖分子却从来没有忘却破坏社会政治生活的暗中盘算。就在 2013 年年末，伏尔加格勒传来一天连续两次遭遇重大恐怖袭击的噩耗。除此之外，2013 年俄罗斯政治的发展也显示出扑朔迷离的态势。颇有影响力的评论家达吉扬娜·斯塔诺瓦娅撰文认为，2013 年是悲观情绪远大于希望的一年，也是“政治镇压和向反对派施压的一年”<sup>②</sup>。但是，事实表明，正是在这一年，普京不仅重新大规模推动了地区领导人直选的承诺；而且，对于尤科斯前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的大赦，表明了普京不仅敢于直面反对派的挑战，也敢于引领俄罗斯政治走向更为开放的局面。

## 一、寻求转机的俄罗斯经济

自从 2013 年 9 月，各大国际经济组织陆续修正原先对俄罗斯经济发展指标的预测时，舆论就开始表现出悲观情绪。直至年底之前，在每年举行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普京总统公开承认，今年俄罗斯经济发展指标，大约为 1.4%—1.5%。

但与此同时，其他一系列数据表明，身处困境之中的俄罗斯经济，也有不少进步：2013 年的通胀率为 6.1%，比 2012 年稍有降低，2012 年为 6.8%；农业生产增长为 6.8%，也比 2012 年 5% 的增长率稍好，至少在工业生产陷于困境时，拉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国民所关心的住宅建设，2012 年增长 5.6%，2011 年增长 6.6%，而 2013 年的增长率为 12.1%。排除了通胀因素的实际工资、而不是名义工资的增长为 5.5%。而收入的增长，2011 年为 0.5%，2012 年为 4.6%，2013 年则为 3.6%。在整个俄罗斯经济处于低迷的背景之下，这还是一个过得去的成绩单。特别令普京高兴的是，根据 2013 年 1—10 月的最

---

① Уильям Циммерман, Рональд Инглхарт и др.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лита---2020.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грантополучателе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Москва, июль 2013.

② Татьяна Становая. «ОСОБЫЙ ПУТЬ» РОССИИ. 31.12.2013 <http://www.politcom.ru/16989.html>

新统计，俄罗斯人口出现自然增长，这是 1991 年以来首次出现的一个变化。

但是从总体上说，诚如普京自己所坦言的，虽然俄罗斯的GDP总量进入了世界五强，但是，劳动生产率等关键性指标还落后于主要国家 2-3 倍；知识产权买卖所产生的附加值对俄罗斯GDP的贡献不到 1%，而美国为 12%，德国为 7%-8%，芬兰为 20%。俄罗斯经济的“离岸化”，是当前被政府关注的重大问题。2012 年通过离岸公司和半离岸公司交易的商品总额大约为 1110 亿美元，相当于整个出口的五分之一。俄罗斯对他国投资的 500 亿美元中，有一半也是通过离岸公司进行的，这表明资金流失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sup>①</sup>。关键的问题在于，改变俄罗斯经济依赖能源资源产业的努力仍未见成效，经济的多样化发展还受到很大的掣肘。

从外部条件来看，固然欧洲经济尚未摆脱深陷危机的状况，对于一半出口市场依赖于欧洲的俄罗斯来说，是很大的制约。但是，俄罗斯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从 2013 年的情况来看，上半年俄罗斯出口和服务业都呈增长态势，而下半年欧洲对于俄罗斯天然气的需求上升更为明显。鉴于 2013 年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因此这一指标尤其重要。这表明，俄罗斯经济急剧下降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于内需不振，国内市场依然得不到迅速的发展，包括普京非常关注的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和开放进展缓慢，牵制着整个俄罗斯经济的前行。<sup>②</sup>

按估计，由于实际工资水平增长速度的下降，2014 年居民需求依然呈下行趋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将从 3.8%下降到 3.4%。但由于 2013 年的发展水平较低，2014 年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将会增加。因此，这一年的经济增速有望达到 1.7%-1.8%，虽略高于 2013 年，但仍差强人意。总之，俄罗斯经济的全面发展还有待于一个较长时期的努力。

---

①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12 декабря 2013 года. Москва. Кремль. <http://www.kremlin.ru/news/19825>

② Николай Кондрашов. Стагнация. Год Первый. 25.12.2013. <http://www.politcom.ru/2002/16965.html>

## 二、俄罗斯的政治与社会发展

俄罗斯权威研究机构曾经提供数据表明：俄罗斯社会关注的焦点，正在从传统对于恐怖主义威胁的关切，逐步转向对于社会差距增大的担心。这也是近年来俄罗斯把反腐败工作提到前所未有高度的一个重要背景。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已经带头公布个人收入和财产状况。笔者在所参加的国际论坛上，曾亲眼见到反对派领导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公开质询高官的收入情况，而主管高级干部廉政问题的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伊万诺夫也当着几百名国内国际学术与政治精英的面，从容不迫地介绍俄罗斯管理高官收入和治理腐败的工作现状。2012年底，俄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因经济问题被撤职。2013年年末，与普京总统有密切交往的前议员也被抓捕审查，人们感觉得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反腐败进程正在深入推进。

同时，社会问题正在成为俄罗斯领导层关注的重点。在2013年的年度国情咨文中，普京总统前所未有地用最大的篇幅来谈论社会领域的工作。他从地方治理问题谈起，谈到了人口、家庭、医疗、教育、文化、体育、住房、生态、就业等各项工作，真可谓事无巨细。普京提出的新概念不仅包括要成为“社会国家”、要加强“社会院”建设、而且还要建立“社会监督评估保障系统”等等。看来普京不仅意在巩固政权的民意基础，而且着意在为未来公民社会的建设进行铺垫。

从地方政治的角度来看，普京重新恢复了地方长官的民选。在莫斯科，在第三大城市叶卡德琳堡以及一大批中心城市，已经通过市民公开选举产生了新的地方行政长官。而且，除莫斯科外，包括叶卡德琳堡等地，也的确有一批真正来自基层的各式“非体制内人士”当选上台。笔者亲眼见到这样一代新人正在令人耳目一新地登上俄罗斯的地方政坛。可以预料的是，2014年将会是地方选举具有更大规模、并且具有更大政治挑战性的一年。

在2013年9月19日的瓦尔代会议上，普京公开邀请反对派的著名领袖人物雷日科夫向自己提问，这在当时被称为是总统与反对派之间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公开对话”。到2013年年底，一件更加轰动世界舆论的大事，发生在普京总统和被认为是他的最大政敌——前尤科斯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

之间：普京接受了霍多尔科夫斯基由于母亲的健康原因而请求赦免的要求，同意其前往德国。后续的信息表明，普京也并不打算把这位最大的反对派人物拒斥于国门之外。俄罗斯有关专家透露，早在一年以前，普京就开始和同事们商议赦免霍多尔科夫斯基的问题。可见，这并非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普京的深思熟虑之举。从最初的国际国内舆论反响来看，人们欢迎普京的这一举措；也有更多的评论认为，这是普京政治自信心进一步提高的体现。从2003年霍多尔科夫斯基锒铛入狱，一直到2013年12月被赦免，普京经历了差不多整整十年与反对派关系紧张的阶段。人们正拭目以待，无论普京此举是否能够引领俄罗斯国内政治走向和谐，但是，与前一阶段“有弹性的威权政治阶段”相比，俄罗斯政治格局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在国情咨文中，还是在年底记者招待会上与公众的互动中，普京都不回避俄罗斯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特性。在他看来：强调尊重国家、尊重传统价值标准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倒退。相反，在一场历史大变动之后，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被指望能够遏制混乱和抵制倒退。<sup>①</sup>

### 三、光彩夺目的俄罗斯外交

2013年的俄罗斯外交无疑受到了全世界舆论相当广泛的首肯。

正当延续了两年之久的叙利亚危机几乎将延烧成一场多国间的地区战争、乃至更大规模动乱的关键时刻，俄罗斯以四两拨千斤的巧劲，提出了通过阿萨德政权交出并销毁化学武器以换取和平的方案，迅速扭转了中东地区的战乱局面，避免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动乱。笔者2013年4月在摩洛哥参加有关国际会议期间得知，当时，美俄双方实际上已经接近于就叙利亚和平达成协议，其原因是：美俄双方都不能承受恐怖主义势力在当地泛滥所造成的祸患。虽然，目前叙利亚局势依然迷雾重重，但是，人们有充分理由期待，在2014年初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阿萨德政权和反对派在国际力量的斡

---

<sup>①</sup>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12 декабря 2013 года. Москва. Кремль. <http://www.kremlin.ru/news/19825>

旋之下能够达成和平协议。

2013 年夏秋之交发生的斯诺登事件，曾经引起国际媒体的一片喧哗。显然，这一事件激起世界舆论对过度使用电子监听手段，包括对盟友政要实行监听，进行谴责，认为这样做将破坏正常的国际秩序。俄罗斯通过一系列巧妙的安排，接受了斯诺登在俄罗斯避难居留。同时，普京又宣布不愿意看到由于斯诺登事件而损害美国利益，避免了过度刺激美国。这使得各国舆论见识了普京处理敏感危机事务的高超手腕。不久之前，美英一些大报社论也公开呼吁美国从宽处理斯诺登一案，进一步反映出国际社会的人心所向。这足以证明，普京在这一突发事件中早已拔得头筹。

迄今尘埃尚未落定的乌克兰局势，也是俄罗斯通过先手采取果断行动，获得了左右事态发展的主动地位。长期以来，处于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乌克兰，一直对于未来的“选边”举棋不定。对于乌克兰来说，2006 年以后就能能源过境问题多次与俄罗斯发生的争端、加入欧盟这一高水平市场的巨大吸引力，以及国内强劲的亲西方势力的存在，都使得它非常有可能被裹挟进一个继续“被欧盟东扩”的进程之中。然而，俄罗斯看准了欧盟正在就东扩问题进行反思、当下又难以满足乌克兰巨大的财政亏空的时机。乌克兰方面也担忧欧盟提出的一系列有关修改法律和赦免政治人物季莫申科的要求可能带来的后患。而乌克兰现任总统亚努科维奇更加在意是否能够在 2015 年的大选中获胜，因而，更加希望能够在短期内获得外来经济援助以摆脱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果断地向乌克兰送出以 150 亿美元购买其国债，以及把天然气价格削减三分之一的大礼单，使乌克兰断然拒绝了签署加入欧盟伙伴联系国的协议。这样，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主导的欧亚联盟不至于受到来自西方的过大的冲击；也使得俄罗斯的安全边界不至于被迅速地向东推移。这一事件又使得人们不得不对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实力和影响力刮目相看。

也许，普京在处理这一系列事件中的精于计算和敢作敢为还不是最重要的。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对心中一直掂量着的大局的筹划。用俄罗斯国防与外交委员会名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的话来说，当今俄罗斯实际上处于并没有任何外敌威胁的有利国际地位。因此，既要在外交上有所进取，

又要维护和拓展上述这一不易获得的有利格局，换言之，维护在东西方两端的平衡和发展空间，这才是俄罗斯外交的远大目标之所在。

#### 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未来中俄关系

2013 年是中俄关系得到实质性提升的重要一年，不仅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均宣布把与对方的关系视为外交之首位，而且，中俄之间在叙利亚、伊朗核、朝鲜半岛事务等重大问题上的合作与默契，以及中俄在双边事务中一系列关系的升格和重大协议的达成，为今后中俄关系的拓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2013 年中俄关系中的一个新局面，一方面，俄罗斯坚决而有力地推动欧亚经济联盟的建设，另一方面，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新概念。这两个方面的重要谋划为今后中俄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新空间，也提出了有待共同解决的一些新问题。

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希望通过发展区域（主要是前苏联地区国家间）合作，发掘前苏联共同经济基础的潜能，提升相互间的贸易和投资水平，并努力实现经济多样化发展长期目标的一项战略安排。欧亚经济联盟一旦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提升了自己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水平，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从长远看，这意味着中国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发展合作。因此，应该在尊重俄罗斯和中亚等前苏联国家的传统利益、主权关切，以及既定格局的前提下，努力在既有的各类组织、机制的基础上，发展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特别是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合作，然后，逐步地谋求通过欧亚大陆核心地带寻求与欧洲方面的沟通与合作。这是需要花很大精力和很长时间进行悉心研究，很可能是需要几代人的筹划才能成功的一件大事。

习近平主席关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合作精神。首先，旨在通过互联互通，发展与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和中亚各方之间的互利合作，发掘欧亚大陆内部的合作潜能，以推动和提升欧亚大陆现有各类区域合作机制的效益和水平。这一概念力求体现与现有各种区域合作机制的互补、包容、共存和共赢。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念并不是凭空而来的。首先，它立足于欧亚各国间已经出现的以交通运输和能源管道所构成的一个广大空间，这是已有的合作所形成的结果。这一空间不仅横贯东西，而且，有可能在南北方向上形成各国之间更大规模的利益互补和交换。无论是既有的欧亚大陆桥，还是新建的一系列现代交通运输设施，都是这一理念的物质基础和前提。

此外，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思路的提出，还来源于中国和中亚国家数千年历史文化的共同积淀，特别是来源于和欧亚大陆纵深地带的人民和国家长期交往的积累；自然也立足于我国新疆地区建设和安定的需要，目的是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来促进当地各民族的和谐发展。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个需要通过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各地区人民很长时期真心诚意的共同努力才能够逐步加以实施的构想，而不是一个短期内就能够轻易获得成功的选项。同时，这一构想也需要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需要通过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智慧的汇集和共同努力，才能把欧亚大陆真正营建成一个造福于各方的福地。

对于中俄两国而言，非常有可能通过这样一个广大空间的共同建设和默契合作，来深化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认知，提升和巩固两国合作的水平。中俄两国也非常可能通过在这样一个广大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来提升自己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

---

**【Abstract】** The splendid “multiplicity” could be found in rare records of Russia in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its domestic affairs, social,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aspects in 2013. Despite many severe challenges, Putin still persisted in leading Russian politics towards openness. Russian politics, obviously,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stage of “flexible authoritarianism”. Besides, Russian society firmly responded to threats of terrorism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stability while fighting resolutely against corruption. In addition, in sharp contrast with relatively sluggish economic situation, Russian diplomacy showed strong vitality and luster.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greatly promoted by Russia, and the new concept of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proposed by China, will provide new cooperation space to be further understood and co-constructed for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Russian Domestic Affairs, Society, Economy, Diplomacy, Sino-Russian Relations

**【Аннотация】** Блестящее проявление «многозначности» — редкий опыт во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в сфере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 России в 2013 г. Несмотря на многие острые проблемы, Путин по-прежнему ведёт российскую политику по пути к открытости, и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предыдущей стадией «упругой авторитар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России начался новый этап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семи силами борясь с коррупцией, решительно реагирует на угрозы со стороны терроризма, обеспечивая социальную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В резком контрасте с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вял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ей дипломатия России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а жизненную силу и блеск. Решительное с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развитию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новой, предложенной Китаем концепц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яса Ше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нов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щихся углублением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я и совместными усилиями по укреплению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Внутрен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общество, экономика, дипломат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

(责任编辑 陈大维)

---

**能源与交通**

## “能源帝国”、“能源超级大国” 和“能源外交”的迷思

张 昕\*

---

**【内容提要】** 自2003年以来，“能源帝国”、“能源超级大国”和“能源外交”这三个互为一体的命题，成为刻画俄罗斯能源地位和能源政策的流行关键词。可以从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行为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企业行为两个层面出发，从概念和实证两个角度，揭示上述命题中概念和假定的局限性。“能源帝国”和“能源超级大国”的命题都忽略了俄罗斯在控制国际能源市场方面的重大局限。而实证证据初步显示，“能源外交”的命题也仅得到部分的支持。尤其是能源企业作为能源外交的执行者，与俄罗斯国家之间存在着多重利益冲突。而俄不同能源产业之间、俄能源部门对外投资的地域分布，也都存在明显差别。跨国比较的结果也显示，俄罗斯国家能源企业和其他国家的同类企业相比，其海外扩张有效性仅属于中游。这些证据都对俄“能源外交”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 能源超级大国 能源外交 国家资本主义 双层博弈 国家能源公司

**【中图分类号】**D83/8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3)06-0012-(20)

---

---

\* 张昕，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师资博士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 引言

本世纪初以来，许多俄罗斯观察家都认为，不断强大的俄罗斯国家正在利用自己的能源优势，将其作为国家的外交工具来建设一个“俄罗斯能源帝国”。建设一个“能源超级大国”也被认为是普京时代俄罗斯重建自己大国地位宏观战略的一部分。而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俄罗斯主要的能源企业又成为俄罗斯政府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对其他国家日益频繁地使用“强制性能源外交”（coercive energy diplomacy）手段，以获取用其他手段无法达到的政治目的。上述三个命题逻辑上互相照应，成为刻画俄罗斯能源地位、能源战略和对外能源政策三位一体的命题。这一组命题也得到近期经济领域一些事实的进一步佐证，比如，俄罗斯产业中国家所有权上升最快的产业，也恰恰是俄罗斯对外投资的最大来源。<sup>①</sup>

本文拟对上述这组三位一体的命题从概念到实证提出一个批评性的回应。对于“能源帝国”和“能源超级大国”的命题，我们认为其在概念和理论上存在缺陷。而对于“能源外交”命题，我们不同意将能源企业简单地视为国家实现地缘野心的政治工具，而应该将俄罗斯的全球能源扩张视为俄罗斯国内不断变化的国家—资本关系对外延伸的结果。我们通过俄罗斯能源产业内部的跨部门和跨企业比较，以及俄罗斯与其他国家能源企业之间的跨国比较，显示“强制性能源外交”也仅能得到实证上的部分支持。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能源帝国”迷思产生的背景和其核心内涵与假定；第二部分指出上述命题的逻辑漏洞和理论假定的缺陷；第三部分从实证角度回应“能源帝国”和“能源超级大国”命题；第四部分引入能源企业，分析能源企业作为能源外交的执行者和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破解企业在上述迷思中的地位；并借助不同来源的实证材料评估俄罗斯“能源外交”命题的效用。最后部分为总结。

---

<sup>①</sup> Peeter Vahtra, “Expansion or Exodus? The new leaders among the Russian TNCs.” *Electronic Publications of Pan-European Institute*, 2007, No.13.

## 一、迷思的产生

围绕着俄罗斯“能源超级大国”和“能源外交”的命题虽然有诸多不同的叙述，但是其核心内容可以总结如下。1998 年金融危机结束以后，得益于卢布贬值和国际能源价格的迅速上升，俄罗斯经济开始经历持续复苏。借助不断改善的财政资源，普京作为强人领袖，怀着重塑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梦想，迅速地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重建了个人和联邦政府的权威，成功打击和赎买了对政治权威和经济资源的主要竞争对手——地方精英、大资本、外国势力、恐怖主义集团等。结果是俄罗斯联邦中央领导层对于政治精英实现了强有力的控制，此后又开始重新控制国民经济中的重要部门。以普京为核心的精英集团进一步利用经济资源来推进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缘政治目标，尤其是通过各种国家公司（包括国家能源公司），广泛采用“强制性的经济外交”手段以达到国家的对外的地缘政治目的，试图最终建立一个“俄罗斯能源帝国”或者“俄罗斯能源超级大国”。“因此，俄罗斯外交实践者们议事日程上最顶端的，是重塑伟大的俄罗斯。如果俄罗斯的伟大不再能以帝国的规模来界定，那她至少可以以俄罗斯在海外施加的影响力来衡量。这种世界观加上各种国家公司几乎保证了俄罗斯国家将利用重新国有化了的产业，推行完全依赖权力计算的外交政策。”<sup>①</sup>这样的叙述还经常引用以下一系列现象作为佐证：俄罗斯经济自 2003 年以来不断上升的国有化程度、俄罗斯联邦级别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日趋高度一体化、俄罗斯对外日趋强硬的外交政策和经济领域里（包括能源产业）主要企业的高调进攻性投资行为。<sup>②</sup>

进入具体语境，我们也大致可以勾勒出上述命题出现的时间线索。关于

---

① Richard J. Anderson, “A History of President Putin’s Campaign to Re-nationalize Industry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Russian Reform and Foreign Policy”, USAWC Civilian Research Project, U.S. Army War College, 2008, p.65.

② 这方面英文文献里的主要研究包括 Fiona Hill, “Energy Empire: oil, gas and Russia’s revival”,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er, 2004; Steve LeVine, *The Oil and the Glory: The pursuit of empire and fortune on the Caspian Se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Marshall I. Goldman, *Petrostate: Putin, power, and the new Russia*,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Martha Brill Olcott, “The Energy Dimension in Russian Global Strategy: Vladimir Putin and The Geopolitics of Oil”, The Jame A. Baker II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of Rice University, 2004.

俄罗斯使用能源作为国际政治工具的集中讨论开始于 2003-2004 年间。<sup>①</sup>2003 年，俄罗斯政府在自己的能源战略纲领《俄罗斯到 2020 年的能源战略》中宣布，“国家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作用主要决定了国家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此后在调整的《俄罗斯到 2030 年的能源战略》虽然语气有所缓和，更加强调了能源全球扩张的纯商业性质，但是仍然称“俄罗斯的能源政策是强化俄罗斯的全球经济地位的保证。”<sup>②</sup>而“能源超级大国”的概念虽然在上世纪 90 年代已经出现，但是直到 2005 年末、2006 年初这个概念才得到全面使用，成为媒体和部分政策圈子内的流行名词。在 2005 年 12 月 25 日的一次演讲中，普京第一次明确提出，俄罗斯要建设成为一个“全球能源超级大国”。<sup>③</sup>此后，俄罗斯在 2006 年 1 月切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迅速强化了“能源超级大国”和能源外交给外界留下的“强制”印象。<sup>④</sup>

在上述概念成为热门话题之前，1998-2003 年间俄罗斯政府的主要能源政策曾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政策取向：进一步私有化能源企业、自由化能源价格和促进俄罗斯能源产业融入国际市场。而从 2003 年开始，俄罗斯政府拒绝进一步私有化当时最后一家国有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Rosneft）、对北方石油公司（Severnaya Neft）有争议的收购案、俄罗斯政府拒绝接受几家私有石油企业提出的从西西伯利亚到摩尔曼斯克的石油出口管道项目、俄罗斯

---

① 俄语世界里“能源外交”作为专业术语是由能源外交问题权威专家斯塔尼斯拉夫·日兹宁（Станислав Жизнин）在自己 1976 年的博士论文中第一次使用（<http://www.unn.ru/pages/disser/429.pdf>）。关于近期能源外交话语在俄罗斯的兴起，可参考前俄罗斯能源部前副部长弗拉基米尔·米洛夫（Vladimir Milov）的介绍 Vladimir Milov, “The Use of Energy as a Political Tool”, *The EU-Russia Review*, 2006, No.1.

②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http://www.energystrategy.ru/projects/ES-28\\_08\\_2003.pdf](http://www.energystrategy.ru/projects/ES-28_08_2003.pdf) ;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0 года. [http://www.energystrategy.ru/projects/docs/ES-2030\\_\(utv.\\_N1715-p\\_13.11.09\).doc](http://www.energystrategy.ru/projects/docs/ES-2030_(utv._N1715-p_13.11.09).doc)

③ 尽管后来普京本人曾经试图把自己和这个概念疏远开来，在 2006 年和瓦尔代俱乐部代表的见面会上，他曾经说，“你们可能注意到了，我从来没有说俄罗斯是任何意义上的能源超级大国”。但是他马上又强调：“但是我们比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有更多的机会……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这（能源）是我们的国家资源，应该停止用贪婪的眼光把它们看成是自己的。”转引自 Andrei Denisov and Alexei Grivach, “The Gains and Failures of the Energy Superpower”,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 2, April-June, 2008.

④ 关于普京为俄罗斯设定的“能源超级大国”战略的详细讨论，可参考 Pavel Baev, *Russian Energy Policy and Military Power: Putin's Quest for Greatnes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8, Chapter 4.

政府放弃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Gazprom，以下简称为“俄气”）的改造、尤科斯事件、俄政府宣布俄气和俄罗斯石油的合并案等等，一系列事件象征着俄罗斯联邦政府对于能源产业规制的大方向上的改变，国家希望重新确立对能源产业直接控制的意图表露无遗。<sup>①</sup>而国家对内控制能力的上升，也意味着国家有可能将政治控制力进一步延伸到能源部门在国际领域的表现。此后，2005-2007年间，俄罗斯和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围绕着能源价格和切断能源供应的争议，则被视为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正在全面实施“强制性能源外交”。这些政策的出现和俄罗斯能源政策表面上的政治化，都强化了人们的一种担心，即普京正在实践自己早年对于利用俄能源资源强化俄大国地位的构想。<sup>②</sup>而普京当年完成博士论文的冶金研究所的主任、目前普京在能源事务上的顾问弗拉基米尔·利特维年科（Владимир С. Литвиненко）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当今世界的特定环境里，最重要的资源是油气……它们是我们手里——尤其是普京手里——的主要政策工具，也是我们在地缘政治中最强有力的论据。”<sup>③</sup>类似的表达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于俄罗斯正在全面利用能源工具实现大国政治目的的印象。

## 二、迷思的概念缺陷和理论漏洞

关于“能源帝国”、“能源超级大国”和“强制性能源外交”的叙述或多或少都基于以下三个假设：1）俄罗斯拥有足够丰富的能源资源来影响全球能源市场乃至全球能源政治；2）俄罗斯能够借助这些能源资源保证自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霸权地位；3）俄罗斯政府对于能源产业内的其他利益攸关方（尤其是主要能源企业）有足够的控制力，从而后者都能够为俄罗斯国家对外的能源外交、实现政治目标合作助力。在第三点中，尤其重要的是能源企业在能源外交中的地位：能源企业被认为是在国家所设定的政治环境中

---

① 这个过程的更多细节可参考张昕：“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化与精英斗争：近期俄罗斯‘国家—资本’关系的两重逻辑”，《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6期，第85-105页。

② 关于普京早年博士论文中对于未来俄罗斯能源战略的构想，可参考 Harley Balzer, “Vladimir Putin’s Academic Writings and Russian Natural Resource Policy”,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2006, Vol.53, No.1, pp.48-54.

③ Stephen Boykewich, “The Man with the Plan for Russia Inc”, *Moscow Times*, June 6, 2006.

运行，而企业的选择高度受制于国家的选择。这一类叙述中的进一步假定或者认为能源企业是国家地缘政治目标的被动执行者，或者认为国家和能源企业在对外经济活动上的利益高度一致。这些叙述在所谓外交的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中基本只注重其中的一层，即国家在国际谈判和冲突中的作用，而最高领导人的个人世界观和政治偏好也往往成为分析的焦点。<sup>①</sup>

此外，现有三个命题背后都预设了一个能源大国对外一致的外交行为，忽视了俄罗斯不同能源企业不同部门、地区和政策领域表现出的不同能量，也很少对“能源外交”对于不同对象、不同地区的作用差别表现给出系统解释。现实中，俄罗斯通过“能源外交”来实现自己“能源帝国”目标可能体现在以下五个领域：

1) 利用他国对于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来实现针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目的；

2) 利用未来能源供应的扩张（尤其是新的能源管线项目）来推进在与管线相关国家关系中的俄罗斯政治利益；

3) 和来自能源输入国的投资者合作，共同开发俄罗斯的上游油气项目，以此来推进和这些能源输入国的特定关系；

4) 控制能源输入国的下游能源资产（包括分销和最终零售端），从而实现对于这些国家的政治目的；

5) 和其他能源输出国的上游资产的联系。

第一种情况主要适用前苏联国家（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第二、第三

---

<sup>①</sup> 关于外交政策作为和国内政治互动的“双层博弈”的经典论述见 Putnam, Robert D,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8, Vol.42, No.3, pp.427-460; Evans, Peter B., Harold Karan Jacobson, and Robert D. Putnam,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在俄语文献中，即便是在斯塔尼斯拉夫·日兹宁的一系列关于能源外交的著作中，有关能源企业的外交行为部分主要还是关注能源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冲突，仍然缺少对于国家和能源企业之间利益互动的关注。比如在他的被称为俄罗斯“能源外交圣经”的著作中有关俄罗斯能源公司“外交政策”的形成部分，完全是在讨论俄能源公司和国际能源公司间的关系（Станислав Жизнин.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России: экономика, политика, практика. М.: Ист Брук, 2006）。这一点也可参考他著作的中译本：斯·日兹宁：《国际能源政治与外交》，强晓云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十章“跨国公司的‘外交’”。

种情况则适用于特定的欧洲国家，这些国家因为在欧盟成立之前就已经与苏联有稳定的能源关系，所以倾向于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关系之外，以更实用的手段保持和发展与俄罗斯的双边能源关系，这些国家包括德国、意大利、法国，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荷兰与奥地利等。第四种情况适用于俄罗斯在前苏联空间内与具有“战略利益”的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第五种情况则适用于前苏联和欧亚空间之外、俄罗斯正在发展新能源合作的能源输出国（比如中东的伊拉克、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加纳和埃及、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东南亚的越南等）。因此，能源外交在促进俄罗斯完成自己的能源帝国目标方面有明显的产业和区域差别，不能预设一个全面一致的“能源帝国”的形象。

### 三、俄罗斯实现“能源外交”和“能源帝国”的政策局限性

首先，通过能源主导的国家复兴计划背后存在着重大的经济理性上的缺陷。就能源市场的现状而言，尽管俄罗斯能源储量丰富，既是能源生产大国也是能源出口大国，但是在全世界能源市场上的总份额大约也只在 10% 左右，远不足以达到具备垄断地位的超级大国的水平。即便是在俄罗斯占有相对优势的天然气部门，虽然俄罗斯 2012 年的产量大约占全球总产量的 19%，但是其中 80% 必须供应国内市场。就国际能源市场中的市场权力而言，俄罗斯在石油、核能和传统电能部门所占的份额更小。<sup>①</sup>从未来能源新增流量来看，同目前俄罗斯主要依赖的油气田（西西伯利亚）相比，俄罗斯未来可能需要依靠的油气田绝大部分都处在条件恶劣、开采难度更大的地区，比如处在永冻层的油气田和多处离岸油田（萨哈林和巴伦支海北极圈内的什托克曼 Shtokman 油田）。面对未来的世界能源市场，哪怕不考虑进展中的页岩油气等新资源，即便是在传统的石油天然气领域，俄罗斯未来进一步提升自己在国际市场地位的可能性极小。综合而言，俄罗斯在天然气领域的确拥有更多的可能用于外交的资源，但在石油部门和核能部门可供使用的外交资源非常

---

<sup>①</sup> 本段落中的数据来自美国国家能源署 <http://www.eia.gov/countries/country-data.cfm?fips=rs>

有限。

从俄罗斯国家对于国内能源产业的控制来看，俄罗斯政府对于能源产业正式产权意义上的控制虽然自 2003 年以来全面上升，但仍不完全。尤其是俄罗斯国内的石油市场仍然有相当的竞争性。俄罗斯政府在法定产权意义上控制了俄罗斯国内大约 50% 的原油产量和约 45% 的炼油产量，<sup>①</sup>所以俄联邦政府对于石油产业的政治控制更多地只能通过间接手段——税收、出口限制、对于管线进入的限制等等。此外，由于石油市场的高度全球化性质，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俄罗斯石油企业必须在一个全球化的石油市场上交易。除非俄罗斯出产的原油中的绝大部分基于和另一个国家的双边合同，否则俄罗斯石油企业对于最终消费者没有很大的控制余地。俄罗斯对于石油消费国的任何供应限制（比如禁运），消费国都可以迅速地在现货市场上寻找替代，除非俄罗斯能够协调其他主要石油供应方一起实行禁运。对于少数现在依赖石油管道、从而短期内无法完全替代来自俄罗斯原油进口的国家（比如斯洛伐克），它们仍可以通过替代性的进口途径（比如铁路）来减少管道运输上禁运的冲击。因此，无论是能源帝国目标的实现还是具体的强制性能源外交的推行，在原油领域，俄罗斯政府控制的资源总量以及在国际市场的结构权力都不足以支撑一个“帝国”的地位。

在天然气领域，俄罗斯在世界市场上的结构性优势要明显一些：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储备，欧洲部分国家对于俄罗斯天然气进口的依赖度接近 100%。但是，欧洲对于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有足够的力量使用这个“能源武器”。给定现有的技术条件，天然气开采和运输涉及极其高昂的沉没成本（sunk cost）。目前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天然气供应仍然是沿用长期的所谓“照付不议”（take-or-pay）合同，作为双方稳定能源关系的基石；加上天然气主要依靠管道输送，故而和石油不同，天然气仍然是一个地区性商品。因此，供应方和需求方，任何一方希望单方面脱离现有的合同，都涉及很高的成本。由于欧洲和俄罗斯在天然气资源上的相互依赖程度很高，俄罗斯如果不愿意大幅度影响自己的财政收入，那么，使用天然气作为能源外交工具只有有限的空间。

---

<sup>①</sup> “Russian State Control to Limit Oil Sector Competition”, Fitch Ratings, August 23, 2013.

对若干小国而言（比如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他们和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关系的确具有更强的不对称性：俄罗斯如果中断天然气供应，对于前者的影响超过自己相对意义上的利益损失。因此对于这些国家，俄罗斯使用天然气工具具有一定的空间。然而，这些国家中有多个国家是俄罗斯天然气通向主要出口市场（欧洲）的过境国家，因此任何俄罗斯对这些国家的供气中止都会影响到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而后者是俄罗斯最主要的能源收入来源。

另外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纯依靠富足的能源或者自然资源来实现超级大国（帝国）的政治目标。相反，在殖民时代，通常是能源枯竭的国家通过武力和强制来迫使能源丰富的国家成为自己的殖民地。美国作为一个自身能源储备丰富的国家，在 1940 年代末开始进口石油，此后对于海外石油资源的追逐恰恰成为美国愿意承担超级大国职责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上石油生产方之间成功合谋、利用经济合作来谋取政治地位的情况的确出现过。在 1920-1970 年代之间，当时的所谓“七姐妹”七大国际石油公司联合行动，达到了足以对整个国际石油市场形成严重威胁的经济实力，但是这样的实力恰恰基于这些企业背后主导国家的军事和政治权威（主要是英国、法国和美国）。此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功地通过限产提价，证明了能源生产国之间联合的可能性。但是，欧佩克中的石油出口大国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仍然倚重美国提供的安全保证，这些国家对于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还是通过他们作为生产国联盟的一部分，任何阿拉伯国家并没有能够依靠石油财富单独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因此，从历史经验看，接近于成功使用能源武器的国家并没有独立达到“霸权”或者“超级大国”的地位，而恰恰需要依赖其他的霸权或者非能源超级大国的军事和政治保护。此外，现有关于经济制裁的研究也显示，战后只有约一半的经济制裁能达到制裁者初始设定的效果，而达到效果的制裁基本上都是多国参与的联合制裁。<sup>①</sup>俄罗斯目前的能源外交完全是单边的，没有和任何其他主要能源生产国或者生产者联盟（比如欧佩克）有联合的努力；在中期，至少在石油和核能部门也没有

---

<sup>①</sup> Drezner, Daniel W, *The sanctions paradox: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任何国际协调的动力和可能。在天然气方面，俄罗斯尽管提出了建立天然气欧佩克的动议，但是还没有得到其他天然气生产大国的积极响应，现有的天然气出口国家论坛（Gas Exporting Countries Forum）仅仅是一个论坛，其章程甚至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支持控制天然气价格的内容。<sup>①</sup>因此，历史经验也不支持俄罗斯“能源超级大国”和“能源帝国”的命题。

#### 四、能源外交中的能源企业与国家的复杂互动关系

##### （一）能源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

以上我们主要批评了三个迷思背后的前两条假定，下面我们集中关注第三条假定，即俄罗斯政府对于能源产业内的其他利益攸关方有足够的控制力，从而后者都能够为俄罗斯国家对外使用能源外交工具、实现政治目标合作助力。和上述这第三条假设不同，我们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在能源领域，国家的经济外交或者经济治理术（economic statecraft）通常是能源企业在高度不确定的市场条件下、面对多重利益相关主体的可能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结果。因为能源资源具有特殊的物理性质，能源市场不论何时何地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市场，能源企业——不管是所有权意义上的国家能源企业还是私营能源企业——从来就不是国家对内对外能源战略的单纯工具。在很多例子里，即便是股权意义上完全独立的国家石油公司也可以成为国家经济外交的重要参与者。<sup>②</sup>即便像俄气公司和俄罗斯石油这样的国有能源巨头，他们作为公司主体的利益和俄罗斯国家作为主权单位的利益经常可能是背离的。因此，对于“能源帝国”和“能源外

---

① Eldar O. Kasayev, “The Myth of a Natural Gas OPEC”, *The National Interest*, February 11, 2013

② Rawi Abdelal, “The profits of power: Commerce and realpolitik in Euras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12, Vol.20, No.3, pp.421-456.

交”命题的考察不能脱离企业。<sup>①</sup>

国家和能源企业都必须面对多重利益相关方和可能不相容的多重诉求，其中最常见的可能冲突就是利润最大化和地缘政治利益之间的冲突。但是跟传统的分析相反，这两个目标不仅仅只是国家或者能源企业一方关心的对象：国家有可能追求非常单纯的利润目标，而企业——甚至是非国有企业——也有可能对地缘政治因素表现出高度敏感，从而直接参与地缘政治决策，或者作出具有重大地缘政治意义的商业决策。而且，能源领域的“国家利益”也可以被企业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所塑造，一国国内的政企关系也部分决定了能源企业在国内外行为的最后结果。因此，追问企业的决定在多大程度上“政治化”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在具体的情境下，企业和国家围绕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互相界定，如何共同影响了企业和国家的经济外交结果。

当国家和国家能源公司之间就海外业务发生冲突的时候，任何一方都可以以多种方式阻挠对方的目标成为现实。国家可以阻挠能源公司的融资渠道，或者不给企业提供外交支持，甚至可以直接改变企业的管理层或者直接要求企业退出特定的海外项目。而国家能源公司则可以威胁退出本国国内必需的与能源产业有关的改革，拒绝与国家在其他政策领域的合作（比如保证对于国内能源市场的低价供应），或者在自己无意参与的国际项目上有意拖延。在俄罗斯语境中两者利益重合或者冲突的情况总结在表 1 里。<sup>②</sup>

---

① 在这一点上，我们研究的基本取向和以下研究一致：比如 Khripunov and Matthews 强调了 90 年代能源企业作为利益集团如何在俄罗斯外交过程中发挥独立作用；Wenger 等人比较了不同产业部门内部不同政企关系对于俄罗斯对外经济和安全政策的影响；Abdelal 则描述了由于能源产业本质上的寡占特性，大型能源企业（不仅仅是俄罗斯）经常成为国家能源政策的主要推动者。Igor Khripunov, and Mary M. Matthews, “Russia’s oil and gas interest group and its foreign policy agend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1998, Vol.43, No.3, pp.38-48; Andreas Wenger, Jeronim Perovic, and Robert W. Orttung, eds., *Russian business power: the role of Russian business in foreign and security relations*, London; New York, 2006.

② 以俄气为例，俄气管理层与俄罗斯政府作为企业股东之间可能的利益分歧见 Валерий Ненахов. Удел стратегии «Газпрома»//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13/5. <http://svom.info/entry/345-udel-strategii-gazproma/>

表 1 俄罗斯国家与能源企业之间目标的重合与分歧

	国家	能源企业
重合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扩展市场</li> <li>•增加其他国家和终端消费者对于俄罗斯能源和俄罗斯企业的依赖</li> <li>•保障能源输送（尤其是过境运输）的安全和稳定</li> </ul>	
分歧	国家保持对于国内能源基础设施（尤其是管线）的全面控制	由企业本身控制整个生产流程中最重要的资产
	更加重视对于海外上游能源资产的开发	优先开发本土和“近海外”（ближнее зарубежье）的资源
	将俄罗斯能源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销售海外以换取政治利益	在海外寻找安全港以减少国家面临的不确定性
	对国内家庭消费和企业消费能源给予补贴，以换取政治支持和社会稳定	尽可能减少隐形补贴、市场化价格以谋取更高利润
模糊不定	是否支持特定国外政权	

## （二）俄罗斯能源企业“走出去”战略缘起

作为对于“能源外交”命题的回应，在这个部分我们将论证：俄罗斯能源企业 90 年代末期出现的加速国际化趋势更多是这些企业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而主要不是俄罗斯政府“能源外交”的结果。

上世纪 90 年代，在非常残酷的商业环境中，面对资金严重短缺、国际能源价格低迷、内部技术能力急剧下降等不利条件，俄罗斯能源企业基本上只能采用“生存战略”，不可能将国际化作为自己的首要商业目标。<sup>①</sup>90 年代初，当时俄罗斯最大、也是最具影响力的石油公司卢克石油率先实践“走出去”战略。卢克石油的领导人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Вагит Ю. Алекперов）曾是里海石油钻井工人，后来成为前苏联石油工业部副部长，与后来的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私人关系密切，后者也曾大力帮助推动卢克石油的海外投资活动。在 90 年代，由于国内低成本原油的来源逐渐出现限制，卢克石油需要向海外寻找低成本的石油储备。同时由于俄罗斯国内产业普遍面临非常严重的资金短缺和三角债问题，卢克石油也希望和海外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重建联系。卢克石油因此有动力直接进入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尤其是

<sup>①</sup> Nina Poussenkova,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Russia's Energy Gia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0, Vol.63, No.2, p.103.

里海地区。因为里海地区和俄罗斯传统的能源腹地西西伯利亚地区相比，石油的开采成本远低而日产量远高。同一时期，当时的俄罗斯国家也需要尽快稳定自己在里海地区由来已久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地位。由此，卢克石油在这段时间一直到 2004、2005 年间，在许多领域扮演了俄罗斯在境外的“能源大使”的角色，俄罗斯国家和里海地区国家之间的能源对话主要通过卢克石油展开。这也是俄罗斯能源外交和私人能源公司之间合作比较成功和谐的一段时间。<sup>①</sup>

而在同一时间段，俄罗斯另一个重要的能源企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简称“俄气”）主要依赖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维持生存。和欧洲其他的天然气供应商相比，俄气对欧洲的出口价格最低，也一直处于非常稳定的状态，是欧洲天然气俱乐部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员”。<sup>②</sup>和卢克石油相比，俄气对于里海地区上游资产的兴趣不大，但是在中亚地区的管线项目上，公司的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目标完美地结合起来了。尤其是到 90 年代末，俄气已经确定自己在俄罗斯内部已无法开采足够的天然气来同时满足国内需求和出口要求，所以决定在苏联解体后中亚能源管线一度中断的背景之下，重新开启土库曼斯坦天然气通往其他前苏联国家的通道，以大大缓解俄气自身的天然气供求缺口。

进入新世纪以后，90 年代私有化产生的正面影响和国际能源价格的上升都帮助俄罗斯能源企业开始进行自我转化。当时的西伯利亚公司（Sibneft）和尤科斯公司（Yukos）都在 2001 年以后逐渐开始采用国际认可的会计和管理体系，改善与股东的关系，引入外部股东和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积极寻求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和与国际能源公司的合作。由此，由此俄罗斯能源

---

<sup>①</sup> Isabel Gorst and Nina Poussenkova, *Petroleum ambassadors of Russia: state versus corporate policy in the Caspian Region*, James, A. Baker I. I. 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ice University, 1998.

<sup>②</sup> 普京曾经称，在 1991 年以前，包括在冷战对峙最恶劣的时期和苏联解体前后，苏联和俄罗斯对于欧洲的天然气出口“没有有过一天的中断”。（普京与八国集团新闻部门负责人会面谈话记录，2006 年 6 月 2 日，<http://archive.kremlin.ru/text/appears/2006/06/106430.shtml>）。更多细节可参考 Zhang Xin, “Asymmetrical Partnership: the Impact of Sino-Russian Energy Cooperation on EU-Russia relations”, In *Divided States: Strategic Divisions in EU-Russia Relations*, ed. S. N. Romaniuk and M. Marlin. Hamberg: Disserta-Verl, 2012, pp.264-302.

企业开始了从“国家石油公司”向“国际石油公司”的转型。从美国《财富》杂志年度世界 500 强企业的排名也可以看出上述变化的结果：自 2000 年开始，俄罗斯能源企业出现在这个榜单上的数量开始有所上升。<sup>①</sup>

无论是卢克石油还是俄气，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苏联解体的废墟上决定重启“走出去”战略，首先都是应对俄罗斯国内能源供求缺口或者是支付能力不足的选择。而从中长期看，由于俄罗斯国内低成本、易于开采的能源逐渐耗尽，俄罗斯国内新的能源源头将集中在开采成本和运输成本都大大上升的东西伯利亚，以及远未开发的远东地区和北极地区，类似寻求海外能源源头的念头还会是俄罗斯能源企业重要的商业动因。因此，从 90 年代开始的俄罗斯能源企业在生产链各个环节主动追求国际化，首先是针对国内外市场环境和管制措施作出的反应，与俄罗斯国家的能源战略关系并不密切。

### （三）能源企业与俄罗斯的外交议程

俄罗斯能源企业参与俄罗斯经济外交议程的最重要案例是俄气公司，后者和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在能源过境问题上的争议实际上是促发“强制性能源外交”出现的最主要导因。作为天然气产业的准垄断厂商，俄气生产占俄罗斯国内市场大约 86% 的天然气，并且控制着国内全部的天然气管线。但同时，它也肩负着向国内消费者和企业提供廉价天然气的责任。长期以来，俄罗斯对天然气的双重定价政策意味着俄气向国内家庭和企业提供了巨额的补贴：俄罗斯国内天然气价格仅为出口西欧价格的约 17%，即便是把输往欧洲的额外运输成本考虑进去，国内价格也仅仅是西欧价格的 29%。为了维持自己的收入，俄气必须在国际市场保持自己的出口。西欧市场由于持续稳定的供求关系和业已建立的输送管道，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俄气对外出口利润最高的市场：尽管对西欧的出口只占到俄气总产量的约 25%，俄气的利润几乎全部来自对西欧的出口。进入 21 世纪以后，在对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提供价格补贴十多年之后，俄气开始逐渐提高对于这些国家的出口价格，

---

<sup>①</sup> 俄罗斯能源企业的“走出去”战略也是全球能源企业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的国际化大趋势的一个部分，见 Pauline Jones Luong and Fiorella Jazmin Sierra, “Crude Ambition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merging Country NOCs”,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13.

并且试图均一化针对不同出口市场的天然气价格(扣除过境输送费用之后)。这样的政策直接引发了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的一系列天然气争端,包括乌克兰、格鲁吉亚这样在苏联解体之后和俄罗斯关系紧张的国家,也包括俄罗斯的长期盟友白俄罗斯。如果受新价格影响的国家不能支付,俄气可以接受其他支付方式获取战略性资产,比如交换所在国国家或者地方天然气公司的股份或者地方管线的股份。

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在能源供应上的波动尤其敏感。俄罗斯和乌克兰、白俄罗斯之间的价格争议在 2006、2007 年导致了俄罗斯对欧洲的油气供应暂时中断。尽管中断持续的时间很短,也没有对最终的消费端产生影响,但这一事件还是让欧洲国家对于过于依赖俄罗斯一家的能源供应产生了深深的担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俄气的反应更多的是面对国内市场收益损失上升而作出的维持利润的决定,或者说,更多的是俄气的商业行为在驱动俄罗斯政府对于欧洲和欧亚地区的天然气外交。

同时,俄罗斯能源企业的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撞也可能影响到传统外交中国家交往的层面。比较显著的两个例子都涉及俄罗斯能源企业 21 世纪以来进入欧盟国家下游市场的努力,希望借此提高自己对于欧洲最终消费者的销售利润,主要采取的策略是把对于新近加入欧盟国家的投资作为一块敲门砖。<sup>①</sup>在第一个案例里,欧盟希望在对俄能源关系上建立一个统一的管制框架,并利用俄罗斯正在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作为谈判的筹码。俄罗斯能源企业通过俄气和政府的特殊关系,成功游说俄罗斯政府,有效保护了俄能源企业面对欧盟能源管制新政策可能带来的利益损失。在这个案例中,俄罗斯政府将欧盟的要求视为对自己国内事务的干涉而加以拒绝,并认可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能源企业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从而实现了国家和能源企业利益上的有效整合,并且在国家间关系中巩固了自己的立场。第二个案例则是有关俄罗斯能源企业试图投资欧盟的新成员国。在这个案例中,俄罗斯政府对于俄罗斯企业的支持起到了负面作用,欧盟的新成员国将俄罗斯政府的努力

---

① 关于这两个例子的具体研究,见 Heiko Pleine, “Russian energy companies and the enlarged European Union”, in Wenger, Andreas, Jeronim Perovic, and Robert W. Orttung, eds., *Russian business power: the role of Russian business in foreign and security relation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47-66.

解读为通过政企合谋来控制前苏东国家，从而导致俄罗斯企业进入这些国家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

综合来看，在俄罗斯的“近海外”，国家利益和能源企业利益的重合度最高：俄罗斯商业力量和企业为俄罗斯国家提供了通过非政府间机制来重整前苏联空间的机会。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在这个整合这个空间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支持在俄罗斯主导下重新实现前苏联空间的经济整合甚至一体化，是这些能源企业国际化和能源产业扩张的自然趋势的结果，这些能源企业的建立本来就早于后苏联空间内国家边界的形成。因此，这些经济利益驱动的行为和俄罗斯国家日趋看重的地区一体化目标日益重合。但是这种功能的执行更多的是在新国家边界建立之前已经建立起来的能源产业走向国际化和扩张的自然趋势，而不是出于压制邻国的恶意和政治驱动的努力。俄罗斯国家也并没有能力全面操控能源企业来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

相比之下，在中东、拉美等能源丰富的地区，俄罗斯政企关系的对外反应则很不一样。由于这些地区处于俄罗斯有效势力范围以外，又缺少苏联时期建立的基础设施和与俄罗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俄罗斯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政策相对模糊和缺少统一性，掩盖了政府目标和企业利益之间可能的冲突本质。类似的，在近期俄罗斯政府日益重视的亚太市场，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也受到俄罗斯国家和能源公司利益重合不同组合的影响。虽然两国政府都一直把能源合作作为全面提升双边关系的重头，但是双方在天然气和石油两个部门合作的进展却有明显的差别。中俄天然气合作进展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俄气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帮助俄罗斯政府推进通向太平洋沿岸和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而相比之下，俄罗斯石油对于中俄石油合作的积极性更高，从而成为中俄在石油领域合作进展更快的重要推动力。<sup>①</sup>

#### （四）俄罗斯能源企业海外扩张的跨国比较

我们还可以通过合理的跨国比较，来考察俄罗斯能源企业海外扩张的绩效与政府外交之间的关系。如果“能源超级大国”、“能源帝国”的逻辑成立，

---

<sup>①</sup> Nina Poussenkova, “Russia’s Eastern Energy Policy: a Chinese puzzle for Rosneft”, *Russie.Nei.Vision*, April 2013, p.7.

我们应该可以观察到俄罗斯的能源企业（尤其是国家能源企业）比其他国家的同类企业更加活跃地参与国际化和海外扩张。但是现有的证据并不支持这个预期。比如，西拉等两位学者开发了一个衡量国家能源公司国际化程度的综合指数。根据这个指数，在她们研究的 34 家主要国家能源公司中，俄气和俄罗斯石油的国际化程度仅仅处于中游。<sup>①</sup>笔者用 1995 年到 2010 年间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各三家主要国家能源公司的海外上游项目投资作比较，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俄罗斯的三大能源企业（俄气、俄罗斯石油和卢克石油）海外扩张的速度和地域覆盖都居于中国和印度公司之间。<sup>②</sup>

近期俄罗斯语境下，俄罗斯国家和主要能源企业之间在国际化的必要性和价值上多有分歧。总体上看，俄能源企业高层认为开发利用俄罗斯国内和“近海外”的优质能源储备应该是首要任务，而在“远海外”（*дальнее зарубежье*）从事勘探、生产甚至精炼都是对这个目标的干扰，纯粹是为了达到某些政治目的。企业对在海外条件差、必须和不够资格的伙伴合作已经表达了不满情绪。<sup>③</sup>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家石油公司在国际化方面通常是比较积极的一方，他们或者是主动开启国际化战略和海外扩张（比如巴西的 Petrobras 和中国的中石油），或者是积极跟进、参与政府主导的全球项目（比如马来西亚的 Petronas）。在这些国家里，对于能源公司国际化的阻力往往来自政府（比如印度政府对于三大能源公司的纵向一体化和国际化战略一直持消极态度）<sup>④</sup>。相比之下，近期俄罗斯国家能源公司对于海外项目的兴趣是最低的。

政府和能源企业间在国际化问题上类似的立场差别其实不仅仅存在于能源部门。如果国家外交政策主导俄罗斯对外直接投资，那么俄罗斯对外投资应该更多地投向那些俄罗斯有战略利益的地区——主要是独联体国家和

---

① Pauline Jones Luong and Fiorella Jazmin Sierra, “Crude Ambition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merging Country NOCs.”

② 见作者的未刊工作论文 Zhang Xin, “Governing National Oil Compani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13.

③ Pauline Jones Luong, “The Domestic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Russian national oil companies and global markets”, *PONARS Eurasia Policy Memo*, No.238, September 2012.

④ 见作者的未刊工作论文 Zhang Xin, “Governing National Oil Compani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中亚、东欧。但是至少现有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就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比例而言，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俄罗斯企业并没有明显不同，对于独联体国家投资的相对高的投资比例则完全可以用非外交政策的因素来解释。<sup>①</sup>另有证据显示，俄罗斯对外投资中的一部分（包括来自能源领域的对外投资）是出于对俄国内投资低效或者对俄国内制度不满的“体制性规避投资”（system escape investment），这一部分对外投资和俄政府的经济外交也没有直接关系。<sup>②</sup>

## 结 论

俄罗斯“能源帝国”和“能源超级大国”的命题高估了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市场的市场权力和俄罗斯政府对于能源产业的控制力，现有的证据也不足以支持一个全面的“能源外交”命题。尤其是，能源企业作为能源外交的执行者，与俄罗斯国家之间存在着多重利益不重合的现实——虽然这种不重合未必是完全相互排斥的。即便是在俄罗斯能源产业内部，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互动也存在着重大差别。俄罗斯天然气部门在对外扩张中，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吻合程度较高，石油部门则较弱。从地域上看，在俄罗斯的“近海外”，国家利益和能源企业利益的重合度最高，尤其是围绕苏联时期建立的能源管道展开的项目其政治色彩相对较强。但是在其他地区 and 能源项目上，俄罗斯政府的意图通常没有得到能源企业的全面支持，反之亦然。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面对“是否应该担心俄罗斯成为一个能源超级大国？”的问题时给出了否定回答，他的回答也可以很好地总结我们对于俄罗斯能源外交迷思的评价：“简单的回答是‘不’……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行为经常被误解为某些政治策略的工具。现实恰恰相

---

① Philip Hanson, “Russia’s Inward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sights into the Economy”,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0, Vol.51, No.5, pp.632-652.

② Kalman Kalotay,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Russia in a Global Context”, *Journal of East-West Business*, 2005, Vol.11, No.3-4, pp.9-22.

反：能源是政治性的商业行为，但是首先和最终是商业行为。”<sup>①</sup>

---

**【Abstract】** Since 2003, the three closely-intertwined themes of “energy empire”, “energy superpower” and “coercive energy diplomacy” have become popular key words in characterizing Russian energy status and its energy policies as well. This article aims to examine limitations of concepts and assumptions in the above propositions from two levels of national ac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rporate behaviors with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ctivities both conceptually and empirically. Both notions of “energy empire” and “energy superpower” have ignored significant limitations of Russia in controlling international energy markets. Meanwhile, empirical evidences also preliminarily show that “coercive energy diplomacy” could only be partially supported. Especially when there exist multiple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energy companies, as executants of energy diplomacy, and Russian state as well 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oth among different Russian energy industries and regarding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of Russian energy sectors. The results of transnational comparison also indicate that, compared with corresponding ones in other countries, Russian state energy companies just belongs to midstream in its overseas expansion, which also raises question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coercive energy diplomacy”.

**【Key Words】** Energy Super Power, Coercive Diplomacy, National Capitalism, Double Game, National Energy Company

**【Аннотация】** С 2003 г.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импери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верхдержава» и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а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эти три взаимосвязанные понятия стали популярными ключевыми словами,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щим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статус 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ую политику

---

<sup>①</sup> Dmitri Trenin, “Energy geopolitics in Russia-EU relations”, In *Pipelines, Politics and Power: the future of EU-Russia energy relations*, ed. K. Barysh. London: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2008, pp.23-24.

России.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действ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поведения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в мероприятия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демонстрируются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концепций выше указанных понятий. Поняти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игнорируют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России по управлени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ми рынками. А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эмпирические данные показывают, что концепция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й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получила лишь частичную поддержку. В частности, существуют множественн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интересов между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ми предприятиями, как акторам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и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ми компаниями, в различных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отраслях Росс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м секторе также существуют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различия в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инвестиций. Результаты межстрановых сравнений также показывают, что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зарубежного расшир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компаний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такими же компаниями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относится к среднему уровню, что также ставит под сомнение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й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верхдержава,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апитализм, двухуровневая игр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

(责任编辑 阎德学)

## 全球化视角下俄罗斯远东地区油气业发展：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合作战略个案研究\*

I·欧拉兰德\*\*

**【内容提要】**2012年5月，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将参与鄂霍次克海域内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而同月，挪威国家石油公司退出了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等合作的巴伦支海的天然气及凝析气开发项目。这种舍近求远的看似矛盾的选择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作为受到挪威、俄罗斯国家控股的两大石油公司，他们在市场上的战略选择本身就是经济和政治等多个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分析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的此次合作项目，可以清晰地展示俄罗斯远东地区在全球油气行业和在挪威与俄罗斯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可以展现出全球化对于该地区产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全球化视角 俄罗斯远东地区油气业发展 挪威与俄罗斯关系

**【中图分类号】**D83/87(512.5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3)06-0032-(19)

2012年5月，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一份全面合作协议，涉及俄罗斯太平洋沿岸鄂霍次克海域内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同月，有报道称，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将退出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

\* 本文是作者于2013年12月提交给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和全球化中心组织召开的首届“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国际会议的论文，文章中文版授权本刊独家发表，中文版略有删节。本文的研究受到挪威研究理事会的“Petrosam”项目的资助，特此致谢。本文观点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或挪威政府的意见。

\*\* I·欧拉兰德（Indra Overland），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NUPI）研究员。

道达尔合作的俄罗斯部分巴伦支海海域的什托克曼天然气及凝析气田开发项目<sup>①</sup>。

在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的全球投资项目中，什托克曼气田备受瞩目，也是该公司历经多年努力才达成的一个项目。什托克曼气田离挪威—俄罗斯海上边界仅 200 公里，靠近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许多其他项目以及正在高速发展的产业基础设施。而鄂霍次克海位于挪威以东十个时区，在地球的另一端，且在挪威鲜为人知。有必要通过分析和解读来理解该公司此次看似矛盾的转向，这次转向也显示了全球化的强大力量。

安东尼·吉登斯将全球化定义为“全世界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社会关系能把相距遥远的客观存在用这样一种方式联系起来，即局部事件由远方事件造成，反之亦然”。<sup>②</sup>本文重点分析全球化对能源的影响，包括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耗，换言之，即分析世界上不同的能源资源是如何互相联系的，以及其与俄罗斯远东油气资源丰富地区的发展有何关系。

能源全球化包括了经济（市场）和政治（能源安全）两个层面的内容。由于有些国家依赖并易受邻国甚至更远国家的影响，所以能源全球化给国家的统治和主权带来巨大的挑战<sup>③</sup>。因此，本文中的两大国家石油公司，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之间的合作特别引人关注。虽然两家公司都已部分私有化，但挪、俄两国政府都控制各自公司的绝对多数股份（超过三分之二）。

本文将分析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这一次的合作，并且从该公司在俄罗斯和亚太地区其他项目的整体视角，评估该公司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地位。本文还将阐述俄罗斯远东地区在全球油气行业以及挪威—

---

① Lorentzen, Marius, “Statoil kan forlate Shtokman”, 2012, <http://e24.no/energi/statoil-kan-forlate-shtokman/20234416>, accessed 20 Nov. 2013.

② Giddens, Antony,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③ Harris, Martha Caldwell, “The Globalization of Energy Markets”, in Stephen Flanagan, Ellen Frost and Richard Kugler (eds), *Challenges of the Global Centur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01, pp.271-282; Leys, Colin, *Market-Driven Politics: Neo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London: Verso Books, 2001; Hirst, Paul and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俄罗斯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俄罗斯远东地区国际石油公司的现状、全球化对该地区的影响以及其与世界其他各地的联系。

##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

为了解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此次鄂霍次克海合作的意义，我们首先要了解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及其早先在俄罗斯的重大项目——什托克曼天然气和凝析气田项目。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经挪威议会批准于 1972 年创立，目的在于确保当时由美国石油公司在北海挪威部分开发的油田能对挪威有益，并能带动其国内石油业的发展。

2001 年，挪威国家石油公司部分私有化，公司约 18% 的股份被售出。该举措是受了盎格鲁撒克逊新自由主义潮流对国际经济的影响。盎格鲁撒克逊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制能让公司管理更负责，减少由国家控股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从而使公司运作更高效。由于当时公司只是部分私有化，新政策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逻辑、挪威社会民主传统和国家参与经济活动三者之间妥协的结果。这种自由市场因素的引进有助于监督公司的市场运作，同时政府仍然拥有公司的绝对多数股份和利润。

从员工人数、产值和公司市值等方面来看，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一直以来都是挪威最大的公司，也是挪威大陆架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公司。而挪威大陆架是联合国承认的大陆架中向北极延伸最长的一个。

## 什托克曼项目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的项目范围沿挪威大陆架向北渐渐拓展，目前已到达巴伦支海西南部白雪公主和歌利亚项目区域。巴伦支海由挪威和俄罗斯共同拥有，两国间的一条长达 1680 公里的海上边界线将该海域及其含油区划分为两部分<sup>①</sup>。由此看来，参与什托克曼项目似乎是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北上发

---

① “Nordområdene Visjon og virkemidler”, 2011, MFA, White Paper No.7. Oslo.

展十分合理的一部分，而且该公司把这一项目视为其“在北极新发展的火车头”<sup>①</sup>。什托克曼天然气田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田之一，预计含有 38,000 亿立方米天然气和 3,100 万吨凝析油<sup>②</sup>。这些天然气足够欧盟国家消耗七年<sup>③</sup>。什托克曼的开发费用估计为 340 亿美元<sup>④</sup>。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和挪威第二大石油公司——海德鲁水电公司，在什托克曼项目上展开过激烈的竞争。同时其他三家入围公司也参与了竞争，即美国雪佛龙公司、美国康菲公司和道达尔公司。2006 年，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与海德鲁水电公司的石油部门合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挪威希望在什托克曼和其他国际项目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他们希望通过力量的整合获得更大的成功，也希望避免挪威国内企业间的竞争。该合并于 2007 年完成，成为挪威工业史上的合并之最。

两家公司合并前后，通过赞助学校、购买俄罗斯供应商的服务、帮助俄罗斯小型企业，努力在俄罗斯油气业建立自己的业务基础。这些努力和积累，最终使他们赢得了什托克曼项目。2007 年 9 月 25 日，就在合并最终完成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致电挪威首相斯托尔滕贝格，告诉他合并后的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已成功被选中参与什托克曼项目。显然挪威两大石油公司的合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什托克曼项目不仅是两国经济上的一项重大商业合作，更获得了挪威与俄罗斯两国领导人的肯定和支持。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积极参与俄罗斯什托克曼项目，影响了其自身的发展轨迹。通过获得更多的油气资源，其作为国家石油公司的角色更加明显。然而，与国家对其控股相矛盾的是，此次合并使得国家对该公司的控股降低到三分之二以下。之后，政府继续购买股份，重新将国有股权调升至三分之二

---

① Lie Hansen, Bengt, “Statoil in Russia”, 2010, [http://core.theenergyexchange.co.uk/agile\\_assets/941/BENGT\\_LIE\\_HANSEN\\_STATOIL.pdf](http://core.theenergyexchange.co.uk/agile_assets/941/BENGT_LIE_HANSEN_STATOIL.pdf), accessed 16 Nov. 2013.

② Moe, Arild and Petter Johan Schei, “Le Grand Nord – Défis et Potentiels”, *Nordiques*, 2006, Vol.9, pp.2-40; Offerdal, Kristine, “The European Arctic in US Foreign Energy Policy: The Case of the Norwegian High North”, *Polar Record*, 2009, Vol.45, No.232, pp.59-71.

③ Overland, Indra, “Russia’s Arctic Energy Polic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0, Vol.64, No.4, pp.865-878.

④ Goldthau, Andreas, “Rhetoric Versus Reality: Russian Threats to European Energy Supply”, *Energy Policy*, 2008, Vol.36, pp.686-692; Heinrich, Andreas, “Under the Kremlin’s Thumb: Does Increased State Control in the Russian Gas Sector Endanger European Energy Security?”, *Europe-Asia Studies*, 2008, Vol.60, No.9, pp.1539-1574.

以上。总之，此次合并不仅使得政府继续拥有国家石油公司的绝对多数股份，也让该公司获得了原本挪威水电公司旗下的大量油气资源。

## 是什么冲击了什托克曼？能源领域的全球化新风潮

什托克曼项目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和凝析气田项目之一，数个测试井已经钻好，且其距离挪威边界仅 200 公里。是什么使得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搁置此项目，并转而开始投资前途未卜的俄罗斯太平洋沿岸勘探活动？

此次转变的主要原因是日益变化的天然气市场<sup>①</sup>。此项目最初的目的，是建造一条管道以及一个液化天然气工厂，并将大部分液化天然气运往美国市场。后来，虽然项目内容在液化天然气、管道和终端市场方面历经调整，但美国市场一直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尤其这样认为。根据该项目，天然气管道将向南延伸，绕过燃气中转方面问题重重的中间国家如乌克兰，连接北溪天然气管道。将天然气市场延伸至美国，将使俄罗斯出口市场更加多样化。此外，俄罗斯国内越来越多地使用液化天然气技术，本身就对其能源公司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些能源公司已经拥有陆上管道基础设施经验，如今需要更好地掌握液化天然气技术，以提升俄罗斯作为天然气出口大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2005 年后期，美国天然气价格达到了 14 美元/百万英热单位的高位，这使得什托克曼项目自然转向美国市场。许多公司都认为天然气价格会保持高企或持续走高。同年，美国能源信息署发布报告，表达了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天然气供给严重不足的担忧<sup>②</sup>。然而，由于页岩气的产销迅猛发展，美国天然气价格被迫下降，暴跌至 2009 年的 3 美元/百万英热单位<sup>③</sup>。

此时，什托克曼项目本可调整战略，将市场重心转向欧洲。但此时的欧洲市场上非常规天然气份额日趋增加。卡塔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原先计划

---

① Lunden, Lars Petter, Fjaertoft, Daniel, Overland, Indra and Prachakova, Alesia, “Gazprom vs. other Gas Producers: Friends or Foes?”, *Energy Policy*, 2013, Vol.61, pp.663-670.

② EIA, “Restricted Natural Gas Supply Case”, *Issues in Focus*, 2005, [http://www.eia.gov/oiaf/aeo/otheranalysis/aeo\\_2005analysispapers/rngsc.html](http://www.eia.gov/oiaf/aeo/otheranalysis/aeo_2005analysispapers/rngsc.html), accessed 20 Nov. 2013.

③ EIA, “Henry Hub Gulf Coast Natural Gas Spot Price”, 2013, <http://www.eia.gov/dnav/ng/hist/rngwhhdd.htm>, accessed 20 Nov. 2013.

输往美国的液化天然气转而售往欧洲；另外，美国天然气价格的下跌拉低了美国的煤价，与美国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不同的是，美国煤炭生产商不受国家对煤炭出口的控制，也不需要复杂的液化天然气技术来运输煤炭，因此，他们加大了对欧洲的出口。

金融危机的肆虐也减少了天然气的需求，进一步导致美国和欧洲天然气价格的下跌。与此同时，什托克曼项目开发成本却持续攀高，再加上不利的税收制度和可预见的索取高利风险——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为从合作伙伴那里分得更多的利益，后期可能会抬高天然气的出口关税，这一切意味着把什托克曼项目的目标市场更多地转向欧洲是行不通的。最终这个项目被搁置了，至少暂时无法继续。股东协议到期后，虽然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以及道达尔公司在不同的场合声明，他们对此项目仍有兴趣，但最后他们还是放弃了在此项目中的股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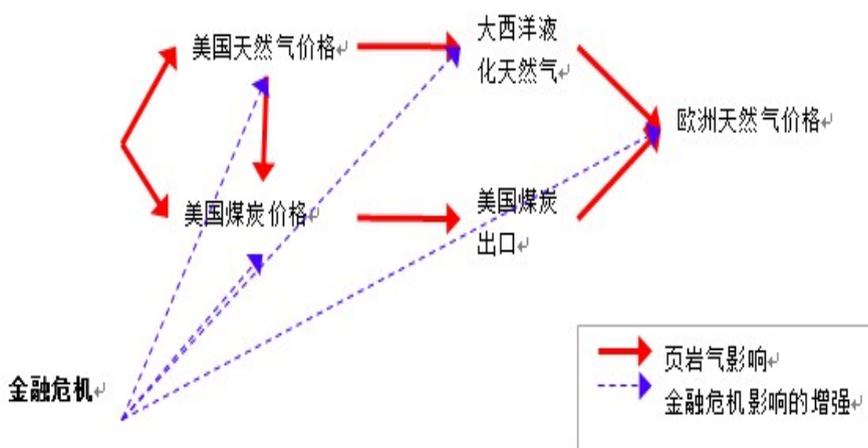


图 1 美国页岩气和金融危机对欧洲天然气价格的共同作用

图 1 揭示了美国页岩气产业发展、金融危机和欧洲天然气价格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实际上反映了更大范围的能源全球化的一部分。原油作为全球化的军用商品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汽车拥有量的迅猛增长，原油继而成为了全球化的消费

品。这些国家从中东进口的石油数量日益增加，使得欧美国家对中东更加依赖。但是西方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当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时，他们震惊了。基欧汉和奈曾在他们的经典作品《权利与相互依赖》<sup>①</sup>中试图解释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怎样不断加强的。在能源领域，这种依赖主要是指原油。

表 1 能源全球化的驱动力与结果

驱动力	结果
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耗	使全球能源消费版图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西方和中东地区的作用较前有所减弱。
新石油产地的出现	使得全球石油生产构成愈趋复杂化和多元化(新增石油产地包括西非、东非、东地中海地区、北极地区和澳大利亚等)。
新增天然气管道和彼此间联网	使得全球天然气区域市场扩大，彼此间进一步融合。
液化天然气产量的不断增加	将之前缺少联系的各区域天然气市场日益在全球层面整合到一体。
非常规油气产业的发展	将使更多国家拥有资源，从而降低全球能源生产的集中度，改变国家间关系和相互依赖。
能源密集型商品贸易的自由化	铝和钢等能源密集型商品贸易的自由化趋势，导致世界范围内煤炭、水电和天然气市场之间更加激烈的竞争，因为厂家会自由选择其冶炼厂的建造地址。
电力、煤炭和木材市场的扩大	虽然电力不能在全球范围内交易，但其交易的地域范围日趋扩大；煤炭和木材的交易范围也比以前更广。欧盟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正有效地推动这一趋势。
电动汽车的推广使用	我们使用的电能产自诸多不同的基础能源资源，包括核能、天然气、煤炭、风能和太阳能等，这迫使这些基础能源资源为交通领域的电力市场展开竞争。
天然气汽车使用的增多	天然气汽车使用的增多导致石油和天然气在交通领域竞争的加剧。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因素	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旨在建立一个促进一些类型能源的使用，同时减少另一些类型能源的使用的统一的全球性框架。
全球核电业发展起伏因素	这使核电成为全球能源结构中的复杂因素。福岛核泄漏事故，德国分阶段终止核电的计划，芬兰、法国和俄罗斯对新一代核电的投资，加上前景不明朗的全球气候政策，都使得核电的未来不可预知。

直到最近，传统观点依然认为，不同于原油，天然气和其他能源产品只是在独立的区域性市场上进行交易。但实际上区域性市场正在全球化的推动

<sup>①</sup> Keohane, Robert and Nye, Joseph,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下日趋相连，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天然气上，因为液化天然气交易和长距离管道输气使得不同的区域市场日益关联。此外，全球化趋势一定程度上在煤炭、电力和木材市场也有体现。全球化在以下两因素驱动下得到进一步加强：(1) 地区能源市场内不同能源产品间更加紧密的联系，如欧洲和美国市场的煤炭和天然气之间的相互作用；(2) 地区能源市场本身的发展，如欧盟吸收新成员国使得欧盟市场得以扩大，此外，世界其他地区也在努力建立类似欧盟的贸易集团（比如东盟、欧亚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表 1 列出了能源全球化的一些驱动因素。

因此，能源行业的愈益全球化，是导致什托克曼合作项目搁浅的主要原因。此外，政府税制也不利于这个巴伦支海气候条件下技术上极具挑战性的项目。然而，能源全球化对不同地区的影响远非均等，这使得不同市场间联系的紧密程度相异。比如，美国东海岸和欧洲天然气市场的联系日趋紧密，致使北美页岩气产业的蓬勃发展阻碍了巴伦支海海域什托克曼项目的推进，但这两个市场与亚太市场的联系却不甚密切。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鄂霍次克海域勘探油气就变得具有吸引力了。尽管卡塔尔同时向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输出液化天然气，以及土库曼斯坦的管道已延伸到中国和欧洲，使得大西洋和太平洋盆地之间建立了一些新的联系，但这些联系迄今尚不足以拉平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巨大的价格差异（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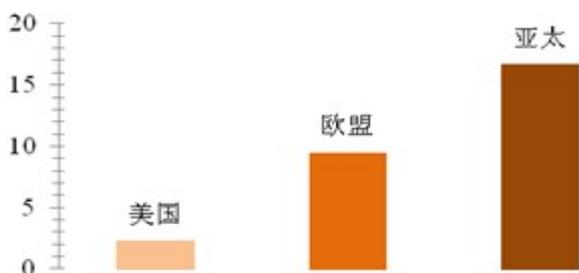


图 2 2012 年不同市场的天然气价格（美元/百万英热单位）

数据来源：Statista, “Price of U.S. and European natural gas from 1980 to 2020”, 2013, <http://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52791/natural-gas-prices/>, accessed 1 Jan. 2013; «Золотая эра газа» не за горами, но еще и не в Европе. 2013. <http://news.finance.ua/~2/0/all/2013/06/19/304018>, accessed 30 Dec. 2013.

## 合作新启示

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合作的初步协议签署于 2012 年 5 月 5 日，勘探许可的股东协议及实施协议签署于 2012 年 8 月 30 日<sup>①</sup>。这些协议涵盖了巴伦支海海域珀斯维斯基勘探区块和鄂霍次克海海域卡什如夫斯基、利相斯基和马加丹—1 的勘探许可。协议还包括了对俄罗斯南部靠近斯塔夫罗波尔和西伯利亚西北部的北塔米尔斯基地区的油气田展开技术研究<sup>②</sup>。尽管斯塔夫罗波尔和北塔米尔斯基两地的勘探工作持续展开，但两地不久便淡出了公众的视野。斯塔夫罗波尔的勘探项目后来被转换成勘探俄罗斯南部东北方位萨马拉附近的页岩油项目。此项目中，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将在获得的 12 项许可的基础上，研究提取页岩油，其中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拥有 49% 的权益<sup>③</sup>。在勘探方面，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承担勘探阶段的费用，并将因此获得公司 33.3% 的股份<sup>④</sup>。据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爱德华·库达诺托夫透露<sup>⑤</sup>，取得所有四个勘探许可的费用可能在 25 亿美元左右。这笔交易体现了双方在挪威大陆架区域合作的意愿。2013 年，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对挪威大陆架勘探许可的联合申请取得成功，获得了第 713 区块的勘探权。

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在挪威大陆架的合作似乎与它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合作关系不大——但也许事实并非如此。外国公司往往未能意识到给他们的俄罗斯合作伙伴提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机遇的重

---

① «Роснефть» и Statoil подписали соглашения по созданию совместны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для проведения геологоразведочных работ на шельфе. Пресс-релизы. 30 августа 2012. <http://www.rosneft.ru/news/pressrelease/30082012.html>, accessed 15 Nov. 2013.

② “Strategic Cooperation between Statoil and Rosneft: Step Change in Russian Footprint”, 2012, <http://www.statoil.com/no/NewsAndMedia/News/2012/Downloads/Strategic%20cooperation%20between%20Statoil%20and%20Rosneft%20May20012.pdf>, accessed 15 Nov. 2013.

③ “Роснефть” подписала соглашения по проектам на шельфе с Eni и Statoil. 21.06.2013. <http://ria.ru/economy/20130621/944901566.html>, accessed 15 Nov. 2013.

④ «Роснефть» и Statoil подписали соглашения по созданию совместны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для проведения геологоразведочных работ на шельфе. Пресс-релизы. 30 августа 2012.

⑤ Khudainatov, Eduard. Роснефть и Statoil потратят на разведку шельфа 2,5 млрд долларов// Торгово - промышленные ведомости.. 6 Май 2012, cited in [http://www.rosneft.ru/attach/0/02/05/statoil\\_100512\\_1300.pdf](http://www.rosneft.ru/attach/0/02/05/statoil_100512_1300.pdf), accessed 15 Nov. 2013.

要性。相反，他们更愿意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把俄罗斯当作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的新兴市场——一个高风险投资可能带来高回报的新兴市场，而非一个以平等伙伴身份进行合作的新兴市场。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石油行业，在电信行业也屡见不鲜，例如挪威电信公司和阿尔法集团已经竞争多年，前者一贯反对后者试图将发展范围扩展到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外<sup>①</sup>。

因此，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能够获得参与鄂霍茨克海和俄罗斯其他地区资源的勘探权，其原因可能是该公司在挪威境内给予国外公司较为平等的待遇，并帮助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实现参与勘探挪威大陆架项目。这种平等相待在近期另一些重大交易上也有所体现，2011年1月，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获得英国石油公司5%的股份，在随后与埃克森美孚的合作中，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获得得克萨斯州或墨西哥湾的至少六个项目中的股权。

这些合作对那些有意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自然资源勘探和开发的国际石油公司提供了下述启示和经验：将资本和技术之外更多的要素带入合作谈判，以及扩大开放以建立更为多元和互利的合作关系，有助于促成交易。对一些资源不太丰富、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迅猛的亚洲国家而言，他们在合作中则可提供市场准入及包括港口、炼油厂和加油（气）站等的一些下游产业的机会。

##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与俄罗斯合作剖析

三个鄂霍次克海的勘探许可只是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之间合作协议的一部分。为了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和实质，我们还需要了解协议中的其他内容。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参与的珀斯维斯基勘探区块位于巴伦支海的最北部。若在该地进行钻探，那将是世界石油和天然气钻探历史上最北端的地方。此地以南沿挪威和俄罗斯间曾有争议的海上边界地区更具吸引力，且更靠近那些巴伦支海挪威海域已发现的油田，但该区域的勘探许可权已归属意大利埃

---

<sup>①</sup> Curwen, Peter and Jason Whalley, “Merging incumbent European mobile operators: veni, vidi, non vic”, *Info*, 2009, Vol.11, No.4, pp.34-52.

尼石油公司。目前，在巴伦支海挪威海域已发现油田区，勘探钻井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是最大的参与者。因此，对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而言，获取已被意大利埃尼石油公司获得的勘探许可权或许更具意义，因为那里距巴伦支海挪威海域已发现的油田更近。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为何未能获得该地区勘探许可的原因尚不甚明了。

西西伯利亚的南塔米尔斯科耶油田储藏有重油，而靠近萨马拉的勘探许可是为了勘探页岩油。非常规石油是目前石油领域内人们趋之若鹜的行业，显然，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急于提升自己在非常规石油领域的资产和竞争力。正如挪威国家石油公司首席勘探师蒂姆·多德森所言，贝肯页岩层——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成功的非常规石油区，“与俄罗斯的页岩油潜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sup>①</sup>。另一方面，相较其他公司，特别是参与萨马拉项目的一些美国公司，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能给这些合作项目带来什么，目前尚不清楚。但对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来说，与俄罗斯石油公司合作的最大吸引力可能是萨马拉和南塔米尔斯项目。而对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和俄罗斯方面而言，该合作的吸引力可能是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勘探鄂霍次克海区域的财力和能力。

关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针对俄罗斯的新投资战略最需要指出的是，除巴伦支海北部海域的勘探项目外，其他项目都与什托克曼项目背道而驰，这些项目包括开发北极天然气供应北大西洋盆地市场、非常规石油勘探及瞄准远东的开发项目。但是，要使位于巴伦支海的珀斯维斯基勘探区块获得成功，当地必须发现石油；若什托克曼天然气田的勘探开发都不可行，那么该地区距大陆更远更北的天然气田的开发更无从谈起。

## 鄂霍次克海在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亚洲战略中的作用

亚太市场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市场（见图 3），对于任何一家国际石油公司来说，能够在亚太地区有所作为，是极为重要的。

---

<sup>①</sup> Golubkova, Katya, “Russian tax breaks now, tight oil boom later”, 2013,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8/30/russia-energy-tax-idUSL6N0GS39J20130830>, accessed 15 Nov.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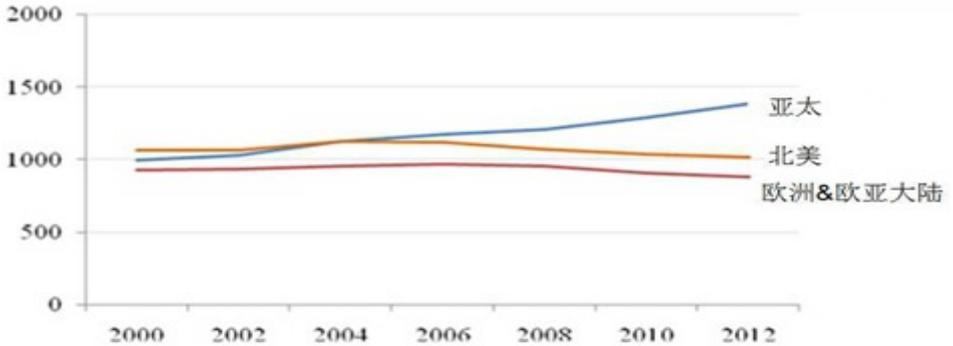


图 3 各区域石油消费情况 (百万吨/年)

数据来源：“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3, <http://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about-bp/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2013.html>, accessed 28 Dec. 2013.

亚太地区油气进口商的担忧之一是，其对距离遥远并且局势不稳定的中东地区的油气资源愈益依赖（见图 4），而中东地区局势稳定和航海线路的安全，很大程度上却要依靠作为第三方的美国。这也就意味着那些靠近亚太地区的上游油气资源极具吸引力，这些资源无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或者马六甲海峡就可直接输往迅猛扩张的亚太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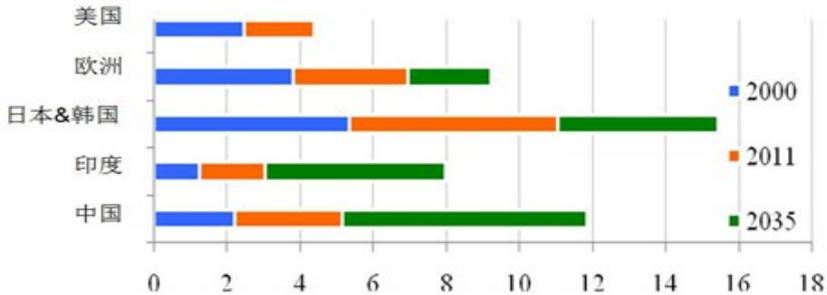


图 4 中东出口各地石油量 (千桶/日)

数据来源：Escribano, Goncalo, “Shifting Towards What? Europe and the Rise of Unconventional Energy”, 2012, [http://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wps/portal/rielcano\\_eng/Content?WCM\\_GLOBAL\\_CONTEXT=/elcano/elcano\\_in/zonas\\_in/ari82-2012\\_escribano\\_europe\\_unconventional\\_energy](http://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wps/portal/rielcano_eng/Content?WCM_GLOBAL_CONTEXT=/elcano/elcano_in/zonas_in/ari82-2012_escribano_europe_unconventional_energy), accessed 12 Dec. 2013; 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3*, 2013, <http://www.worldenergyoutlook.org/pressmedia/recentpresentations/LondonNovember12.pdf>, accessed 10 Dec. 2013.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涉足，是该公司拓展亚太战略的

补充，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在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均有合作项目。尽管该公司在亚太地区有一些在建项目，但缺乏处于生产阶段的项目，因此对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来说，继续在亚太地区扩展业务范围，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下面我们简述一下该公司在一些亚太国家拓展业务的情况。

在澳大利亚，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是近岸南乔治娜盆地四个勘探项目的作业者；在英国石油公司为作业者的南部沿海三个勘探项目中拥 30% 的股份。表面上看，这两个项目的前景都相当乐观，但在地理条件和开发成本方面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自 20 世纪八十年代起，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就开始涉足中国的油气产业。1997 年，该公司负责中国南海的陆丰 22—1 油田项目，直至 2009 年该油田关闭。事实上，该项目也是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承担作业的第一个国际项目，它标志着该公司发展方向的转变——从一个只投资国内油气田的典型国家石油公司，转变成一个半数勘探活动都在国外进行的国际石油公司<sup>①</sup>。2005 年后，其与中国石油公司的合作发展迅速。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是其在墨西哥湾投资战略的合作伙伴；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是其在巴西佩雷格利诺油田项目的合作伙伴，而佩雷格利诺项目是世界石油产业界最重要的项目之一。2007 年，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与中国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综合性的合作协议，内容涉及石油勘探和生产、天然气、新能源以及中国国内外的油气下游产业。2010 年 2 月，该公司又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签署协议，规定该公司将参与中国南海琼东南深水作业区项目。显然，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势头看好。然而，诺贝尔和平奖事件引发的中挪关系的恶化，使得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在华业务受到影响，它在中国的发展势头受到了削弱<sup>②</sup>。

在印度尼西亚的东部，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已经投资了数个项目。印度尼西亚的石油产量呈下降走势已长达数十年。印尼有大量未勘探的油气田，但这些油气田大部分位于印尼偏僻的东部深水地区，并含有大量二氧化碳。不

---

① Statoil, “Internasjonal leting og utvikling”, 2013, [http://www.statoil.com/no/Our Operations/ ExplorationProd/internationalFields/Pages/default.aspx](http://www.statoil.com/no/Our%20Operations/ExplorationProd/internationalFields/Pages/default.aspx), accessed 16 Nov. 2013.

② Kaspersen, Line, “Statoil i Kina-skvis”, 2011, <http://www.dn.no/energi/article2112710.ece>, accessed 16 Nov. 2013.

过对拥有深海钻探技术的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而言，印尼的这些油气田是具有潜力的。自 2007 年起，该公司已经参加了几轮勘探，并获得了联合生产合同。但这项充满挑战的开拓性工程才刚启动，迄今只钻了些排水井。

2011 年，在哈萨克斯坦，为勘探里海海域的阿拜区块，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签订了一项无约束力的协议，后又退出该项目，但在阿斯塔纳保留了一个办事处，以寻求合适的发展机会。

在土库曼斯坦，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只有一个规模很小的办事处（仅有一两个当地雇员），并一直努力争取与土库曼当局以及土库曼石油产业展开有益的协作。在新加坡，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也有一个办事处，进行原油、炼油产品和天然气的贸易，并开展一些下游油气产业业务。然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只有在当地建立自己的上游油气产业并进行生产销售，这样一个办事处的意义才能得到最大化的体现。

总而言之，挪威国家石油公司面向亚太市场的项目越来越增加，但一些项目存在不确定因素和突出问题。如果其想在本地区油气供应领域举足轻重，那么它需要在该地区扩展业务领域和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参与鄂霍次克海项目，使其在博弈中增加了一线胜算，提升了其在该地区发挥作用的几率。与该公司在亚太地区的其他项目不同，在鄂霍次克海项目中，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能应用到其最先进的技术：在极其寒冷的环境下开采海上石油。而且，因为鄂霍次克海靠近中国，该公司还可以借此间接瞄准中国市场。

然而，对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来说，投资鄂霍次克海并不一定能明确表示其转向东方市场的态势。或许是因为该公司只是把这些非常规的石油资源看作是一种额外的奖励，甚至是一项不得不解决的负担，因而才对其感兴趣。从长远看，鄂霍次克海或许会成为非常重要的地区，但这取决于当地项目的勘探和开发进展情况。

## 鄂霍次克海的石油与天然气之争

什托克曼项目，几年前曾被称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天然气和凝析气项目之一，其被搁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西洋盆地区域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差

距不断扩大（见图 5）。这使得石油公司更热衷于勘探石油，而非天然气。油气勘探和开发所需的设备和人力资源一大半都用于油田的勘探和开发，这加剧了两者的价格差距。对石油的高需求带动了更多上游产业的发展，进而抬高了钻机和船运的价格等。尽管天然气的价格通常低于石油（以英热单位为准），但是其开采投入成本的增长速度却与石油旗鼓相当。因此，石油公司更愿意勘探石油，而非天然气，尤其是在偏远地区，天然气生产和贸易会给运输带来更多的挑战。<sup>①</sup>

鄂霍次克海域的天然气和石油之争的结果尚难预料。有一些利好的因素，包括该区域比邻亚太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液化天然气价格是世界上最高的；并且，中国和俄罗斯如能达成在两国之间建设期盼已久的管道的协议，那么天然气在该地区的销售前景将更为广阔。也有不利因素，如未来几年，全球一些较大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将在澳大利亚投产，这将会加大天然气在大亚太地区的供应量；此外非洲东部海岸的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也有天然气资源的重大发现，这些国家的天然气内需不大，他们生产的天然气会像许多卡塔尔产天然气那样，最终以液化天然气的形式销往亚太市场。<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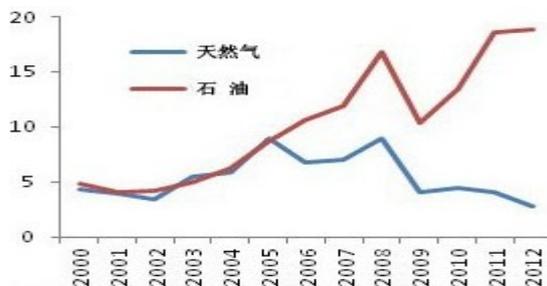


图 5 石油与天然气的价格差异（美元/每英热单位）

① 经合组织平均油价和亨利交易中心的天然气价格， Index Mundi，“Natural Gas Monthly Price”，2013，<http://www.indexmundi.com/commodities/?commodity=natural-gas&months=180>，accessed 31 Dec. 2013；“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2013，<http://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about-bp/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2013.html>，accessed 28 Dec. 2013。

② Chambers, Matt, “Stepping on the LNG gas profit pedal”, *The Australian*, 2012,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business/in-depth/stepping-on-the-lng-gas-profit-pedal/story-fnfwwgy3-1226501626925#>, accessed 31 Dec.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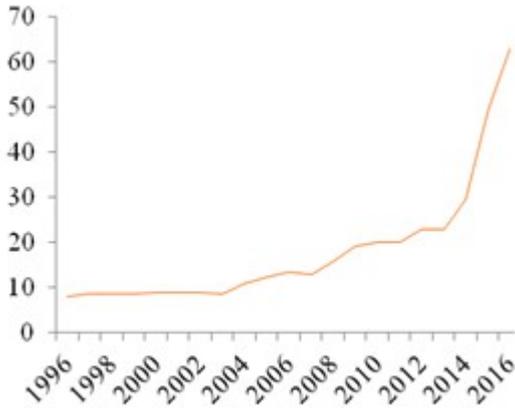


图 6 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百万吨）

### 挪威石油公司可以给鄂霍次克海域带来什么？

竞标什托克曼项目时，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介绍了本公司能促进俄罗斯油气行业发展的七大优势：（一）尖端海岸勘探技术；（二）大型综合项目的管理技术；（三）北极严酷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四）天然气价值链准入和专业技术；（五）油气行业最严格的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体系标准；（六）临近挪威先进基础设施；（七）区域发展和资产分派<sup>①</sup>。

当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开始勘探鄂霍次克海域时，这些优势哪些会比较有用呢？显然，第 6 点——临近挪威先进基础设施——不再存在了。然而第 1 至第 5 点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尤其在鄂霍次克海域的气候条件下，第 3 和第 5 点的作用更为明显，即北极严酷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和油气行业最严格的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体系标准。

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联合开发项目设在鄂霍次克海的北部海域，位于北纬 55°和 60°之间——换句话说，远低于北极圈的纬度（北纬 66°）。尽管如此，它却是远东海域最寒冷的区域，其气候条件明显

<sup>①</sup> Lie Hansen, Bengt, “Statoil in Russia”, 2010, [http://core.theenergyexchange.co.uk/agile\\_assets/941/BENGT\\_LIE\\_HANSEN\\_STATOIL.pdf](http://core.theenergyexchange.co.uk/agile_assets/941/BENGT_LIE_HANSEN_STATOIL.pdf), accessed 16 Nov. 2013.

比鄂霍次克海南部海域更为恶劣，而在该海域南部的萨哈林岛已经有多年的油气开采活动。鄂霍次克海北部海域通常每年1月到6月被冰雪覆盖，冰雪期也可能长达260天<sup>①</sup>。在夏天，它经常被浓雾笼罩<sup>②</sup>。这儿的工作环境和条件非常艰难，因此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在挪威北极地区的经验和能力可能是有用的。

2011年12月，在鄂霍次克海南部海域的中部地区被暴风雪倾覆的克拉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更证明了在该地区开采作业的难度。当时作业平台上有67名工人，其中53人遇难。基于该事故的发生，加之鄂霍次克海北部海域更加恶劣的气候条件，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要想在该海域有所成功，其列举的第3和第5点优势就更加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巴伦支海的挪威部分纬度更北一些，由于受湾流的影响，那里终年无冰；同样，巴伦支海的俄罗斯部分，也就是什托克曼项目所在地，虽然偶尔会有些海冰，但基本也是全年无冰。

## 结 论

鄂霍次克海既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也是亚太地区的一部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俄挪两国石油公司合作，是理解为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的俄罗斯战略的一部分，还是其亚洲战略的一部分？可能两者兼有。最初可能主要是其俄罗斯战略，是该公司试图在俄罗斯比较靠近欧洲市场的地方获取极具吸引力的非常规油气资源。但从长远看，如果三个作业区块均有重大发现的话，鄂霍次克海将变得愈加重要：它将有助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立足俄罗斯，以该公司在恶劣气候条件下近海油气开采的经验和能力作为跳板，进军快速发展的亚太市场。

对挪威和俄罗斯而言，多国公司参与开发的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前景是积极的。对俄罗斯来说，这意味着它可以获得更多财力、人力和技术输入

---

① Lapko, V.V. and Radchenko, V.I., "Sea of Okhotsk", in C. Sheppard (ed.), *Seas at the Millennium*,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2000, pp.436-472.

② Alekseev, A.V., Baklanov, P.J., Arzamastsev, I.S., Blinov, Yu.G., Fedorovskii, A.S., Kachur, A.N., Khrapchenkov, F.F., Medvedeva, I.A., Minakir, P.A., Titova, G.D., Vlasov, A.V., Voronov, B.A. and Ishitobi, H., *Sea of Okhotsk: GIWA Regional Assessment 30*, Arendal, Norway: UNEP, 2006.

来推动该地区低利用率资源的开发。在这个意义上，像挪威这样的国家可能会特别受欢迎。因为挪威的介入，有助于俄罗斯人降低对本国远东地区遭亚洲人蚕食的担忧。

显然，来自挪威的劳工不会成为俄罗斯对其远东地区人口构成的忧虑，但对挪威来说，却获得了与俄罗斯公司发展紧密合作的机会，并无需掺和到巴伦支海区域两国间的双边政治关系之中。当然，在巴伦支海，两国间存在着其他的问题，比如渔业、核事故和军事问题等，这些都可能导致复杂的纠纷。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项目，表明全球化正在改变全球油气行业。能源市场和能源资源间日益增长的关联使得欧洲天然气价格下降，也导致什托克曼项目暂时中止，许多相关企业不得不寻找新的发展机会。与此同时，大西洋和远东地区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差异也表明了全球化的局限性。因此，与其他公司一样，挪威国家石油公司通过取其利益、避其所限的方法，充分利用全球化的益处，建立自身优势。这样做也有助于全球化的发展。随着能源公司转向亚洲市场，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不断发展，远东地区和其他地区的价格会逐渐趋同。

（黄丽 译，侯敏跃 校）

---

**【 Abstract 】** In May 2012, the Norwegian and Russian national oil companies (NOCs) Statoil and Rosneft signed a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agreement that included exploration for oil and gas in the Sea of Okhotsk, off the Pacific coast of Russia. The same month, it was reported that Statoil would withdraw from its joint project with Gazprom and Total to develop the Shtokman gas and condensate field in the Russian part of the Barents Sea. This inconsistent choice is an outcome of the globalization era. As two national oil companies, their strategic choices in the market are results of different factors includ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nes. In analyzing this cooperation project by Norwegian and Russian national oil companies, we can clearly demonstrate the role of Russia's Far East Petroleum Province in the global oil industry, in addition to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rway and Russia. Besides, influences of globalization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is region will also be shown.

**【Key Words】** A Globalization Perspective, Russia's Far East Petroleum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Norway and Russia

**【Аннотация】** В мае 2012 г. норвеж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нефтяная компания Statoil и Роснефть подписали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совместной разведке нефти и газа в Охотском море, но в том же месяце Statoil приостановил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российским Газпромом и другими компаниями по проекту разработки природного газа и газового конденсата в Баренцевом море. Такой противоречивый выбор является продуктом эпохи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выбор на рынке двух крупных нефтяных компаний, находящихся под контролем Норвегии и России, является следствием целого ряда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ующ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факторов. Анализ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норвеж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нефтяной компанией Statoil и Роснефтью в данном проекте наглядно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рол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 мировой нефтегазовой отрасли и в норвеж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а также можно увидеть влияние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на развитие индустрии в данном регион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развитие нефтегазовой индустри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норвеж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

(责任编辑 封 帅)

## 丝绸之路的连通和地区运输走廊

昆都\*

**【内容提要】**近年来,关于新丝绸之路的讨论日益升温,涉及各个方面,但主要的落实领域是交通运输,因为这是贸易与交往的重要基础,也是丝绸之路上的薄弱环节。复兴丝绸之路的连通,在相关国家内有着一定的政治意愿和考量,主要是为发展经济和贸易创造条件。印度与欧亚地区交通的联接,对于印度非常重要。印方为此提出了完善丝绸之路的建议和方案,并投入资金建设交通项目,以弥补自身与欧亚地区连通的不足。印度方面特别积极介入和推动的,是国际北南交通走廊项目。

**【关键词】**新丝绸之路 地区交通运输 印度 中亚 国际北南走廊

**【中图分类号】**D73/77(351.36)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3)06-0051-(15)

古丝绸之路是人类史话中最伟大的成果之一,在当今快速变化的国际背景之下,它再次得到新生。复兴丝绸之路的连通,是一项跨越国界的浩大工程,其中也将面临诸多挑战。克服这些挑战并完成这项工程,需要有密切的合作、强大的政治意愿和经济能力。该地区许多国家都参与了复兴丝绸之路的进程,出于方便,他们将其称为“新丝绸之路”。<sup>①</sup>

\* 昆都(Nivedita Das Kundu),博士,外交政策评论员,目前就职于印度国家社会科学委员会(the Indian Council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w Delhi, India),同时参与加拿大约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the York Center for Asian Research, York University, Toronto, Canada)。

<sup>①</sup> Alan Lee Boyer, "Recreating the Silk Road: The Challenges of over-coming transaction costs", *China and Eurasia*, Vol.IV, No.4,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Silk Route Studies Programme, 2006, pp.72-74.

自 1990 年开始，关于复兴丝绸之路的讨论热烈且广泛，得到了诸多群体的关切，其中不乏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国家、国际组织、知识分子以及文化界和商业圈的人。199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发起一个为期十年的项目，题为“丝绸之路的整合性研究”。在这个项目的带动下，举行了大量的学术会议和讨论会，电影、图书、宣传册及各种文章纷纷面世；修复了一些在考古学和建筑学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纪念碑；建立了民族学研究中心和博物馆；复兴了当地民族经济，发展了手工制品行业；强化了教育活动。一些专门研究机构还发起了对丝绸之路连通印度、中国、日本和斯里兰卡的研究。1993 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一次由联合国召集的会议上，决定把复兴丝绸之路作为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渠道。1998 年 9 月 7-8 日，在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巴库举行了一次会议，意在创设国际运输走廊，连接欧洲—高加索—亚洲地区。会上，32 个国家，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签署了一项协定。这项协定提议，建设一条 14000 余公里、横跨亚洲的公路，连通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国家；以及提议修建从日本到土耳其、从中国到保加利亚的线路。此外，协定还提到将要修建一条高速公路，连接圣彼得堡与东京，沟通赫尔辛基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在亚洲发展银行关于复兴丝绸之路的项目中，提到了修复公路交通干线，连通中国与中亚和伊朗。<sup>①</sup>2001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丝绸之路地区的分支机构，甚至还提出过通过新丝绸之路促进沿途宗教之间的合作和发展。

复兴丝绸之路的连通和交通网络，必然会对当地的经济和市场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在为当地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带去益处的同时，这种交通上的连通也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丝绸之路上不同国家的国内情况不同，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程度上的安全隐患。事实已经证明，复兴丝绸之路的连通对当地是大有益处的，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业已存在的潜力。<sup>②</sup>随着交通路线、贸易网、贸易联系的发展，在地区交通运输的重建方面一度达到“高涨期”。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开始重视新的贸易联系，以及提高现有的国内、国际

---

① *Zhemmin Zhibao*, 17 May, 2002.

② “The Megalithic Portal and Megalith Map. ‘Silk Road, North China’”, C.M. Hogan, the Megalithic Portal, ed. A. Burnham". *Megalithic.co.uk*. <http://www.megalithic.co.uk/article.php?sid=18006>. 13.07.2011.

基础设施的水平。而今，当地的大部分国家在政治上更趋于稳定，他们都希望整合当地碎片化的贸易网，建立和发展当地地区性和次地区性的交通运输系统。<sup>①</sup>因此，复兴丝绸之路的连通，发展运输网络和交通联络，对于地区各国甚至全世界都是一项要优先考量的事情。

本文试图突出丝绸之路及其连通的重大意义，聚焦于印度和欧亚地区交通连接的可能性。文章将综述一些地区性的观点，以说明这种连通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印度来说格外重要；本文认为应该更加关注一些在运输网络方面的倡议，以发展该地区的国际商贸、能源运输，维护和平与繁荣。

## 一、地区性交通与丝绸之路网络

当今世界，互相依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sup>②</sup>，不同社群、国家、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尤为突出。当下，横跨大陆的运输联系强化了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增强了信任 and 安全性，降低了风险和冲突。全新的运输干线将会增进人们之间的联系和文化之间的互动。然而，我们必须平衡好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缩小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交通运输走廊（包括公路和铁路），使得一个宏大且繁荣的市场得以发展起来。此外，在大量投资的支撑下，横跨大陆的基础设施得以建立起来，就业岗位得以增多，经济也会获得长足的发展。在 20 世纪早期，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干线对沿线城市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城市包括鄂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赤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等。新的交通运输走廊还试图将欧亚空间整合到世界经济体系当中，促进当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sup>③</sup>从实用主义角度来看，这种交通运输通道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这也是货物派送、保持人与人之间直接联系的最便利快捷的方式。同时，还要在海关和税务方面制定习惯法，打破商

---

① Boulnois, Luce, *Silk Road: Monks, Warriors & Merchants*, Hong Kong: Odyssey Books, 2005, p.66.

② K.Jaspers, *Sense and Purpose of History*, Moscow, 1994, p.141.

③ *The Silk Roads: Highways of Culture and Commerce*, UNESCO Publishing/Berghahn Book, 2001.

品流通的壁垒，使商贸活动便利化。

复兴丝绸之路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发展沿线各国的旅游业。丝绸之路是世界上最长（约 12,800 公里）、最吸引人的旅游线路。从这点来看，世界旅游组织正在丝绸之路的发展上起到关键作用。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到 2020 年，丝绸之路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线路。在绵延不断的山地脚下，生长着很多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如药草、小茴香等，有望藉此形成当地的特色医疗（regional homeopathy）和阿育吠陀（Ayurvedic，传自印度的医学）医药体系。复兴丝绸之路也有助于团聚离散的家庭、降低边境地区的紧张，从而可以减少国防支出，提高在福利和社会方面的投入。<sup>①</sup>丝绸之路沿途是缤纷秀丽的景色：壮丽的沙丘、冷热交替的泉涌、五颜六色的植被、彩色的山顶、恢宏的冰川消融景象、连绵不绝的山脉，还有沿途流淌的河流。丝绸之路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交通—贸易方面的一体化，增进不同文化间的联系，关注当地各个国家的共同利益。今天，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丝绸之路沿途各国有望进行高度整合，把这条古代道路的伟大辉煌带向未来。

## 二、印度与新丝绸之路

对于拓宽横跨欧亚的陆路贸易的数量和方向，促进沿途各地经济的复苏而言，印度具有极佳的地理位置。事实上，印度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大背景下，曾经提出过重新完善丝绸之路的建议。印度已经开始与一些“古老的友邻”恢复关系，这些“古老的友邻”是印度延伸到欧亚大陆的邻国，它们是丝绸之路上的分支，<sup>②</sup>这对于沿途地区的发展是很必要的。但是一些其他分支还没有恢复，因此区域化的合作和整体的发展还难以实现。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将印度和两个极重要的战略邻国——巴基斯坦和中国，连接在一起。

---

<sup>①</sup> G.M. Mir, “Resource management,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ates”, New Delhi, 2003.

<sup>②</sup> “Approaches Old and New to the Silk Roads”, Vadime Eliseeff, in: *The Silk Roads: Highways of Culture and Commerce*, Paris, 1998, UNESCO, Reprint: Berghahn Books, 2009, pp.1-2.

由于新疆和锡卡都（现在巴基斯坦管辖下的克什米尔地区）对于相关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和地缘经济作用，克什米尔和拉达克（Ladakh）让印度与中国和巴基斯坦重新交好。<sup>①</sup>

地处拉达克的努布拉山谷（Nubra Valley）是通往欧亚大陆的入口，它有两个丝绸之路的分支，连通起印度与巴基斯坦和中国。这两条贸易要道作为一种对话机制，沿用了几个世纪。通向克什米尔的路，在穿过卡敦拉山口（Kahrdung La）后，在哈尔萨（Khalsar）附近分叉。一条线路穿过提尔斯（Tirth）附近的什约克河（Shyok），向北蜿蜒直到乌兰帕蒂娜拉（Ullan Pati Nallah），几乎与锡亚琴河（Siachen）平行。这条河流在帕纳米克（Panamik）温泉区的几公里处经过，那里离锡亚琴冰川也不远。然后又转向西北方向，穿越莎瑟隘口（Saser La），到达莎车（Yarkand，中国新疆）和中国境内其他市场，再通过德普桑平原（Dipsang Plain），到达中亚地区和喀喇昆仑山口。

另一条向西连接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路线是与什约克河平行的，途经迪斯科特（Diskit gonpa）—图尔库特（Turkut）—卡帕路（Kapalu）—锡卡都（Skardu）。这条路线一直沿用到 20 世纪中叶。由于印巴、中印的复杂政治关系，该路线被迫废止。这影响到了双方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双方边境的民众，大量的民众被迫离开熟悉的居所，许多家庭分离，人民之间的关系破碎不堪，这些导致了全面的萧条。需要提及的是，一些非法贸易仍在这些线路。这些非法活动诸如毒品走私、间谍活动、跨境恐怖活动，都增加了安全隐患，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尽管这些线路的分支有些消失了，有些失去了往日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利益相关者来说，恢复一些特定的分支线路是有深远意义的。

### 三、复兴与地区的发展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是自公元前 2 世纪以来最古老的运输网络，它对地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历史演化的过程中，各方竞相以不同的方式连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网络系统，和“对话之路”。

---

<sup>①</sup> David Gosset, “Xinjiang and the revival of Silk Route”, *Asia Times*, Jan.26, 2006.

遗憾的是，这个“对话之路”很快就消亡了，以至于所有辉煌的过往也被淹没了。现在人们基于新的利益，用新的样式来重建丝绸之路，这将在地区合作中起到重要作用。这条线路将有助于该地区的和平共处，降低地区的安全威胁。

### （一）一些重要的线路

列城—帕纳米克—莎车线，该线跨越喀喇昆仑山，连通拉达克与莎车和中国及中亚地区其他城市。这条线路有两条分支，使车队有更多的选择。当多格拉人（Dogra）管理克什米尔地区的时候（1846—1947年），当地政府每年有专门预算，用于这条线路的维护。因此，赛瑞思（旅店）以及其他的设施在沿途发展起来，为商队的车马提供服务。公路的纵深方向出现了很多村子，其中有很多佛教徒定居在那里，人口和商队的数量基本上取决于附近是否有充足的水源。时至今日，在公路沿途还依稀能看到莎车人的墓地，还有一些是葬身于此的商人和游客。感情的纽带在这里仍有很大影响。现在我们还看到，在这里人们仍在种植庄稼，商队注意保护野果，喂牲畜的饲料也依稀可见，这些都是人们想要保存这种情感纽带的表现。因此，重新开放这些线路，既可以发展当地的经济，也能沟通当地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人们之间的情感。

另一条重要的线路是列城—图尔库特—斯卡杜。这条西线，经过什约克河与锡亚琴河交汇处后，沿着锡亚琴河，向西延伸到唐（Thang）。在这里还有另一条贸易要道，它始于列城，穿过斯基里比虔（Skiribichan）、考巴特（Chorbat），穿过卡帕卢（Khapalu），到达约克河。这条路沿着山麓蜿蜒，是全沙石的路面，能双向行驶，很多早期的定居者沿着这条线路居住。在贸易的黄金年代，这些曾是重要的公路纽带。许多周边的村民，在夏天的时候迁到线路附近，到了冬天搬到山脚下，躲避高处的天气寒冷和风雪。众所周知，复兴丝绸之路对所有沿线国家的经济和贸易都是很有裨益的。然而，这些潜力需要被挖掘。三个基本的元素：地理上的亲近性、技术上的可能性、

经济上的可行性，都有助于其复兴。<sup>①</sup>尽管如此，相关国家间的经济整合和地区合作还需要可行性方案。对于一些内陆发展中国家来说，出口自己的产品依旧困难重重，导致他们的贸易量越来越少，与其沿海邻国相比，发展缓慢。内陆国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繁琐的通关流程、安全问题、海关行政效率低下以及腐败问题。这些都是“人为”带来的运输成本。<sup>②</sup>因此，地区合作在促进彼此联系方面意义深远，同时，还能促进经济一体化。<sup>③</sup>现在，该地区的大部分国家的政治环境越来越稳定，正在把建立和发展区域、次区域的运输系统提上日程。<sup>④</sup>

## （二）重要的地区运输走廊

目前在欧亚大陆，已经有了大量的交通运输走廊，连接着该地区的各个国家。横贯欧亚国家（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能源和交通运输路线，在连通东方—西方（即欧亚各国与东亚和南亚国家以及欧洲的连接）方面的作用，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现在，地区运输网络系统也存在重叠的现象，比如黑海泛欧运输区（Black Sea Pan-European transport Area）、欧洲合作计划（the European cooperation initiative）、黑海经济合作组织（Black Sea Economic Co-operation (BSEAC)）、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项目等等。

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Transport Corridor Europe-Caucasus-Asia，简称TRACECA）是众多运输走廊之一，被誉为伟大丝绸之路上的文艺复兴。TRACECA是穿越黑海、连接欧亚交通走廊的一个技术援助项目。南高加索、里海还有中亚各国都参与到这个走廊的开发中。TRACECA项目于1993年发起，从那以后，欧盟已经为62个技术援助和14个投资项目提

---

① Hussain Moazzen, Lyan lur Islam, Reza kibra, *South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Routledge, London, New York, 1999.

② World Bank, “from Disintegration to Reintegratio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in International Trade”,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worldbank.org/>

③ S. Polanchek, “Conflict and Trad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4, No.1, 1980, pp.55-78.

④ Wilfred J.Ethier, “Regionalism in a multilateral Worl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06, No.6, December, 1998, pp.1214-1215.

供资金支持。<sup>①</sup>



图 1 TRACECA 线路图

1998 年 9 月，12 个国家（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保加利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塔吉克斯坦、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签署了“促进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发展国际运输的多边基础协定”（Basic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port Corridor Europe-Caucasus-Asia），还包含铁路运输、公路运输、商业海运等方面的补充技术附录。

TRACECA 致力于支持各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性，加强它们通过其他运输线路进入欧洲和世界市场的能力，鼓励伙伴国之间进一步加强地区合作。TRACECA 有助于在欧洲和黑海地区发展经济关系，以及贸易和运输方面的交流。TRACECA 确保了相关国家可以通过公路、铁路、海运等方式进入世界市场，也保障着交通安全和货物安全，以及环境。TRACECA 还协调着运输政策和法律，为运输合作创造了良好环境。TRACECA 正尽力取得国

<sup>①</sup> “Silk Road”, [http://www.livius.org/sh-si/silk\\_road/silk\\_road.html](http://www.livius.org/sh-si/silk_road/silk_road.html), LIVIUS Articles of Ancient History, 28 October 2010.

际金融机构以及私人投资者的支持。TRACECA希望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具有高效率的、整合多元模式的运输系统。<sup>①</sup>

### （三）地区的运输网络组织

由于地区性的商贸往来大幅增加，还有很多其他的线路正在修建中，即将投入使用。BTC（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油气管线（是前苏联第二长的输油管线），它的运营主要是为了连通西方和高加索地区。尽管如此，还是有可能接通BTC管线与TAPI（即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管线。



图2 规划中的TAPI管线

TAPI有望将能源经过道拉达巴德—赫拉特—坎大哈—奎塔—木尔坦（Daulatabad-Heart-Kandahar-Quetta-Multan），运到旁遮普（Punjab）的法则卡（Fazilka）。这条1700公里长的管线预计耗资90亿美元，可使用30年，

<sup>①</sup> [http://ec.europa.eu/europeaid/where/asia/regional-cooperation-central\\_asia/transport/traceca\\_en.htm](http://ec.europa.eu/europeaid/where/asia/regional-cooperation-central_asia/transport/traceca_en.htm)

能每天运输九千万标准立方米天然气。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在运输费用上达成一致。巴基斯坦也表示接受印度和阿富汗协议的结果。印度最近还通过了 TAPI “特殊目的实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 SPV）的可行性方案。印度的 GAIL（印度最大的国有天然气公司）已率先向该项目投资 500 万美元。最近，孟加拉国也对参与 TAPI 项目充满兴趣。该项目最快预计 4 年完成，也就是说，TAPI 油气管道将在 2017 年开通运营。该管道将使欧亚大陆上的运输系统更加复杂，更加丰富。然而，复兴经济和贸易还要依赖地区间的合作。这条线路的建立，将会更紧密地使欧亚大陆各国与印度连接在一起，同时也会起到促进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

跨西伯利亚铁路（The Trans-Siberian Railway）是主要的横穿俄罗斯大陆的干线，这条干线连通了欧亚大陆的许多城市。该铁路还被称为沟通莫斯科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俄罗斯之脊”，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铁路跨越了 7 个时区，走完全程需要 8 天。这条世界上历史第三长的铁路，自 1916 年开通运营以来，至今仍在不断扩建和改进。该铁路始于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途径车里雅宾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乌兰乌德、赤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最后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跨西伯利亚铁路始建于 1891 年，1916 年竣工。数十年间，它一直是一条重要的铁路纽带，连通了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与俄罗斯在东方的工业区，例如乌拉尔地区（大部分位于俄罗斯，也有部分在哈萨克斯坦西北部）—巴尔瑙尔—阿尔泰—哈卡斯—图瓦—伊尔库茨克—布里亚特—赤塔。<sup>①</sup>这条铁路总长 9288 公里，从 2002 年开始全线电力化。俄罗斯远东部分的几条铁路与中国、朝鲜以及蒙古相连。俄罗斯也有铁路与中亚、西欧（经过白俄罗斯）连通。现在，跨西伯利亚铁路理论上每年可运载 25-30 万标准箱的国际转运货物。然而，人们预计，一旦该铁路完成了现代化，如果贝阿铁路（Baikal-Amur Mainline）铁路也开始运营，那么这个数字每年将再增加 100 万标准箱。俄罗斯铁路部门计划投资 500 亿卢布，其中 15 亿卢布用于在 2015 年前完成对西伯利亚铁路的现代化更新，使其能够容纳特殊的集装箱。

---

<sup>①</sup> World Bank, “from Disintegration to re-integratio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in International Trade”,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worldbank.org>

该地区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哈萨克斯坦—中国输油管道工程。这是中国第一个从中亚直接进口石油的管道（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之间，有大规模的卡车运输）。最近，印度也在同阿富汗就哈吉加克（Hajigak）铁矿的开采问题进行商讨，该铁矿估计价值为 1 万亿到 3 万亿美元，因此印度积极地推动与阿富汗的沟通和联系。印度已经对阿富汗投了约 1 亿 3600 万美元，用于连通该国的公路和伊朗的恰巴哈尔（Chabahar）港。印度在阿富汗还建造了迪拉腊姆（Zaranj-Delaram）高速公路。印度打算参加连通伊朗里海沿岸的安札利港（Banzar-Anzali）与俄罗斯的项目。<sup>①</sup>由于投入如此之多，印度很明显是要通过这些运输走廊发展其连通性，以弥补自身缺乏连通性的巨大不足。

#### （四）亚洲高速公路网络（Asian Highway Network）

亚洲高速公路网络由全长 14.1 万公里的标准化高速公路构成，纵横 32 个亚洲国家，并与欧洲相连。该网络始建于 1959 年，旨在发展该地区的国际公路运输。第一阶段（1960—1970 年），成就显著，但是由于 1975 年资金不到位，工程停滞。<sup>②</sup>到 20 世纪 80—90 年代，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变化为这一项目带来了新的契机。该网络的建设成了“亚洲陆上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发展”（Asian Land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项目的三大支柱之一，该项目是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UNESCAP）在 1992 年的第 48 次会议上通过的。<sup>③</sup>

2003 年 11 月 18 日，在曼谷举行了跨国会议。会上，亚洲高速公路网络的跨国协定正式达成。随后，2004 年 4 月在上海，各方签字通过，并于 2005 年 7 月 4 日开始执行。总计投资 260 亿美元，用于发展和更新该网络。现在，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的秘书处与成员国一同努力，为该网络建设寻找资金支持，以提高公路运输的能力和效率。<sup>④</sup>

---

① Ash Narain Roy, “A corridor of Prosperity”, available at [www.hardnewsmedia.com](http://www.hardnewsmedia.com)

② Ulric Killion, *A Modern Chinese Journey to the Wes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Dualism*,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06, p.66.

③ United N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994: Cultural library in today’s diverse world”, UNDP, New York, 2004.

④ <http://www.unescap.org/ttdw/index.asp?menuname=asianhighway>

### (五) 国际北南走廊 (International North South Corridor)

国际北南走廊,是指从南亚,经由中亚、高加索地区、俄罗斯,到达欧洲的水路、铁路和公路线路。借助南北走廊,货物从印度经由水路运向伊朗。从伊朗通过水运穿过里海或者通过公路、铁路运到俄罗斯南部。再从那里出发,用卡车或铁路运载货物,沿着伏尔加河运行,经过莫斯科到达北欧。<sup>①</sup>2001年,俄罗斯、伊朗和印度三国在推进该线路方面签订一项合约。印度组织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与会国包括伊朗、俄罗斯、保加利亚还有中亚各国。现在,这个项目不仅包括上述国家,还吸收了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阿曼。伊朗是该项目的核心国家之一。<sup>②</sup>虽然各国之间存在着许多政治上的差异,但是印度及其他利益相关的伙伴都积极参与到项目的推进之中。

印度对这个项目的积极态度有多方面的考虑。印度的货物通过苏伊士运河,运送到俄罗斯和中亚,是很长的路线。这个项目有望建成一个多元模式的运输网络,沟通印度西海岸的港口与伊朗的班达尔阿巴斯港口 (Abbas),然后通过陆路运输到里海的班达尔安匝里港口 (Anzali),再从拉什特 (Rasht) 和阿塞拜疆边境的阿斯塔拉 (Astara),到哈萨克斯坦以及俄罗斯;或者是从地中海,经过乌克兰的敖德萨 (Odessa) 和基辅 (Kiev),再到俄罗斯和中亚。该网络还将扩展到欧洲和东南亚。<sup>③</sup>新线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运输成本和旅行时间。比如,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需要 45-60 天,而通过伊朗的线路仅需 25-30 天。印度、俄罗斯、伊朗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将帮助这个项目的落实。此外,印度积极参与建设这条通过伊朗的线路,还因为印度与巴基斯坦不算是友好国家,阿富汗的局势也不稳定。

---

① Waugh, Daniel, "Richthofen's Silk Roads: Toward the Archaeology of a Concept", *The Silk Road*, Vol.5, No.1, Summer 2007, p.4.

② "World Bank: trade and transport facilitation in Central Asia: Reducing the economic distance to markets", Final draft Report, 2005.

③ *Times of India*, 13 March 2012.



图 3 国际北南走廊

国际北南走廊还有其他的分支线路，有连通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的线路，有连通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线路，这些都对地区发展有深远意义。这将有助于打开印度、俄罗斯、中亚以及亚欧其他地区的市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的关税联盟将纳入更多成员，加大与包括印度在内的欧亚地区其他国家的联系，建成更大的经济实体，将更充分地利用这条交通运输走廊。<sup>①</sup>该地区土地广袤，能源丰富，有望在后苏联时代的欧亚空间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全球权力中心的转移，这条线路的政治经济意义日益显著。

国际北南走廊将促进基础设施网的建设，促进货物和人员的流动；反之，如果缺少双边和多边的协定，边界的障碍将大大增加。这项建设将使得运输成本随之下降；反之，由于技术上和法律上的不同标准，比如车辆重量限制、操作许可证、文件要求和检查标尺等，将给货物和人员流动带来很多障碍。铁路走廊连通了北欧（始于赫尔辛基）与波斯湾的港口（终点为伊朗的阿巴斯），它比现有的长距离水运更具有独特的优势。从赫尔辛基到阿巴斯的海上距离大概是 7,217 海里，也就是 13,366 公里。<sup>②</sup>也就是说，这条走廊将可

① *Russia-India Report Publication*, Moscow, 2012.

②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Transit Transport Issue in Landlocked and transit Developing Countries”, Report No.ST/ESCAP/2270, 2003.

以把运输路程缩短将近一半。

相关国家需要制定一系列统一的技术标准，并获得必要的资金来执行，才能加快建设的速度。需要有充足的资源来消除障碍、保证过境运输的顺畅。目前，现有的一条最长的全程为铁路的运输线，是一条从赫尔辛基到阿巴斯的线路，途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经由塔希亚塔什Taxiatash的路线长 7549 公里；经由努库斯Nukuss的路线长 7885 公里）。里海线路是这条走廊中最短的线路。<sup>①</sup>

欧亚各国对于建立地区交通线路网，都表现出极大兴趣。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哈萨克斯坦的总统在访问印度的时候，都强调要促进地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连通。这些网络和连通项目给当地各国带来了共同利益，还能降低各国之间潜在的竞争与对抗。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良好的连通性和密切的经济关系都至关重要。国际北南走廊的建设与开放，势必促进这种连通性和经济关系，凝聚沿途地区的各国，增进相互合作与理解。

## 结 语

复兴丝绸之路的连通性，发展交通运输走廊，促进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些都将增进地区合作，有利于交通运输建设和贸易的发展。通过这些线路，欧亚内陆国可以更容易地与周边的巨大市场相连接。地区合作协定将有助于扫除建设过程中的潜在障碍。建设交通运输走廊意义重大，可以有效地发展地区各国的贸易和运输。更重要的是，可以提供一个发展合作交流、降低壁垒的平台，既让各国经济各自增长，又能兼顾地区的整体利益。

（孟文婷 译，孟维瞻 校）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ew Silk Road has been under heated discussion, covering all aspects. However, in practice, it is transportation that has been mainly implemented, because it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rade and exchanges, as well as an area to be strengthened. Within related countries, they

---

<sup>①</sup> Jean Francois Arvis, “Transit and the Special Case of landlocked Countries”, in Luc De Wulf and Jose B.Sokol edited, *Customs Modernization Hand Book*,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05.

have, to certain degree, political willingness and considerations to revive the Silk Road, primarily in order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de exchanges.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India in its connection with Eurasian regions in transportation. In view of this, India have proposed suggestions and solutions to improve the Silk Road and invested in constructing transportation projects, aiming at make up for its weakness in connection with Eurasian regions. It is the international North-South corridor that India has been particularly active in involvement and pushing it forward.

**【Key Words】**New Silk Road,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India,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North-South Corridor

**【Аннотация】**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много говорится о новом Шёлковом пути, таково рода дискуссии охватывают много аспектов, но основным направлением реализации дан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являются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перевозки, т.к. это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ой основой торговли и обмена, а также слабым звеном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Возрождение связей вдоль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в некоторых странах связано 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соображениями,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создаёт условия дл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торговли. Транспорт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между Индией и Евразией обладает важным значением для Индии.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Индия выступила с предложением способов улучшения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и вступила в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транспорт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вложила средства, с целью компенсировать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сть сообщения с евразийским регионом. Индия принимает особо активное участие в проекте 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 коридора север-юг.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Новый Шёлковый путь,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перевозки, Инди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оридор север-юг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宗教与哲学****东正教灵修传统与俄国文化史****——霍鲁日的俄国文化史观**

徐凤林\*

**【内容提要】**俄国在接受拜占庭东正教的同时，既接受和延续了东方基督教以“内在神化”为宗旨的灵修传统，也接受和发展了“外在圣化”的教会功能，这就造成了俄国东正教两种宗教范式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贯穿于全部俄国文化发展过程，而且对这一过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现代俄罗斯精神文化出现了回归灵修传统的倾向。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批有影响的俄国哲学家转向神学主题。

**【关键词】** 东方基督教 静修主义 内在神化 外在圣化

**【中图分类号】** B9(51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3)06-0066-(13)

东正教是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中国学界都有所了解和研究者都基本认同的一般观点。但作为俄罗斯文化组成部分的东正教与西方基督教有什么不同特点？这些不同特点如何形成俄罗斯精神文化的特质？东正教内部的不同成分对俄国历史发展具有怎样的不同作用？这些具体问题和方面是许多人不很清楚，史学界和哲学界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也有很大分歧。当代俄罗斯哲学家霍鲁日从东正教静修主义这一本质特点出发，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新解释。

\* 徐凤林，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宗教学系及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霍鲁日（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вич Хоружий，1941-）——当代俄罗斯哲学家，俄国宗教哲学研究专家。物理-数学科学博士。1964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学系，1967年毕业于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生院。现任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国立大学“神人合作人学研究中心”主任（2005年成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誉教授（宗教传统比较研究教研室）。主要著作有《中断之后：俄罗斯哲学之路》（1994），《苦修现象学》（1998），《论旧与新》（2000），《神人合作人学概论》（2005）等。在这些著作中，霍鲁日对东正教灵修实践进行了深入分析，包括阶梯式上升、皈依与悔过、属灵争战、凝神与祷告等，从这些宗教实践经验中汲取了对人的现象的一般观念和对人的存在的新观点，在此基础上，又结合现代西方存在哲学、现象学、心理分析学的某些思想，包括雅斯贝尔斯的“临界境遇”，海德格尔的“敞开”，胡塞尔的“意向性”，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等观念，提出和制定了具有一般哲学意义的“神人合作人学”（Синергийн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学说，这一学说被研究者称为当代俄罗斯哲学人学的三大流派之一<sup>①</sup>。在神人合作人学中，人不再具有固定不变的本质，而是“能量”的形成物，人的改变不是本质的改变，而是在自己的“临界表现”中改变自身，塑造自己。这种改变是通过人在临界表现中的自我“敞开”来实现的，敞开有三种类型或范式：向存在边界敞开，向无意识边界敞开，向虚拟实在边界敞开。这种新的人学模型可以运用于死亡和身体问题、艺术创作问题、当代危机现象及全球化过程等方面。

霍鲁日的俄国文化史观之所以与众不同，来自于这位哲学家对东正教的独特认识。霍鲁日在对东正教本质特点的研究中提出了三个基本观点，然后从这三个基本观点出发，对东正教在俄国文化史上的表现和作用加以具体解释。三个基本观点是，第一、东方基督教与西方基督教的不同特点；第二、东正教内部的两种精神取向：内在的神化与外在的圣化；第三、灵修传统与文化传统在俄国历史上的冲突。

霍鲁日用“东方基督教话语”这一概念来说明东正教不同于西方基督教

---

<sup>①</sup> Кто сегодня делает философию в России. Т. 1. Составитель А. С. Нилюгов. М.: Поколение, 2007. С.255.

的一般特点。“话语”(дискурс)是一个宽泛的学术概念,“它是一个符号过程,是表达实在的方式,是理解实在的一种语言。具体而言,东方基督教话语是由东正教,即东方基督教创立的,它包括塑造东方基督教(拜占庭东正教,然后是俄罗斯东正教)的心态和文化有机体所需要的精神的、观念的和认识论的资源”<sup>①</sup>。东方基督教话语大致是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创立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其主要特点也形成了。这个主要特点是:东方基督教话语的基础是一定的基督教的宗教经验。它的主要任务是使人通过某种方式获得自己个人的灵性经验,即追求神,与神合一的经验。“东方基督教思想所力图达到的不是‘正确的思想’,而是正确地、直接地表达与神交流、与基督结合的真正经验”<sup>②</sup>。就像最初的基督徒,即基督的门徒所获得的那种经验。他们曾经直接与基督发生过个人的交往,在这个交往过程中,他们达到了与基督的结合。这就是内在的“神化”(成神, Theosis, обожение)的终极目标。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发展一种特殊的实践,以便培养和获得这样的经验。这就是东正教的“静修主义”(исихазм)道路。

另一方面,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也形成了另外一种立场,另外一套话语。西方基督教是在西罗马帝国领土上产生的,它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完整的、完善的教会组织,发展出完善的无所不包的教义体系。

霍鲁日认为,东方基督教话语从拜占庭向罗斯传入,就成为俄国文化过程的开端。在俄罗斯意识的历史上,东方基督教话语的作用是主导的和决定性的。正是东方基督教话语塑造了俄罗斯意识,决定了它的结构,成为其内容的基础。

以追求内在的“神化”经验为基础的“静修主义”,是东方基督教话语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东方基督教是个复杂的现象,静修主义表达了基督教实质自身所规定的部分。但是,罗马帝国的遗产,罗马多神教也进入到东方基督教里。在自己道路的开端,从四世纪开始,在东方基督教里出现了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它已经具有了罗马多神教的特征。基督

---

① С·С·霍鲁日:“俄国哲学的产生”,张百春译,《俄罗斯文艺》,2010年第1期,第58页。

② Хоружий С.С. К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ой модели третьего тысячелетия. <http://iph.ras.ru/page51136777.htm>.

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这是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在罗马帝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宗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这就是对政权的圣化，使国家制度合法化。国家赋予宗教的任务是，在所有臣民、所有公民的意识里，确立世俗政权本质上的神圣性。不但是政权的神圣性，而且还包括政权的体现者的神圣性，即确立政权及政权领袖的神圣性。罗马官方宗教、古代罗马多神教的礼仪，就履行了这个功能，即使政权及其体现者圣化。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宗教时，皇帝必然要把这个功能交给基督教。早期基督徒所创立的那个基督教没有担当这个功能，当时的基督教对待政权的态度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根本不把政权圣化。当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其内部发生了改变，新的组成部分进入其中。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组成部分，这就是外在的圣化（祝圣，*сакрализация, освящение*）。所谓外在的圣化，就是肯定某些现象、对象、制度和一般人间存在的秩序与神的联系，确认它们根源于神，具有神的本质。这样，在东方基督教话语里就出现了两个组成部分：内在的神化（静修主义）和外在的圣化，它们拥有不同的本质。因此，基督教的组成部分里包含了两种宗教立场，一种认为追求个人的灵性提升，与神发生联系，这是人与神之间的全部关系；另一种立场认为，在外部世界有某些神圣的东西，如神圣的礼仪，神圣的制度等。

这样，在东方基督教里就有了两个不同的宗教立场。霍鲁日认为，考察内在神化范式 and 外在圣化范式在不同时代的特殊关系，可以作为研究俄国文化史的方法。在每个时代，这两种立场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就一般特点而言，在俄国东正教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通常是外在圣化范式。但基督宗教性最实质的方面是另外一个部分，即静修主义和内在神化。在这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少数时代，都是非常重要的时代，是基督教文化繁荣的时代，它们为基督教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还会有自己的未来。

在俄国文化—文明的历史过程中，除了这两种宗教立场的冲突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冲突——灵修传统与世俗文化传统的冲突。这是霍鲁日研究俄国文化史得出的另一个基本观点。“我制定了自己的俄国文化—文明过程观，以灵修传统与文化传统的划分和两者之间的冲突为基础，认为这一冲突在俄国文化史上起主导作用。俄国文化—文明过程的主要的、具有推动作用的冲

突，是灵修传统（核心是苦修经验和静修实践）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sup>①</sup>。所谓灵修传统（духовная традиция），是指在灵修实践活动（静修主义）的历史积淀中逐渐形成的精神传统。世俗文化传统是指在西方世俗文化影响下产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传统。灵修传统所传承的是一种非常确定的东西，一种独特的经验：存在性上升的人学经验。而世俗文化传统所传承的则是多种多样的文化经验、文化材料、文化形式。世俗文化传统所传递的是本质性的、实体性的材料（价值、规范、制度），灵修传统所传递的则是非本质性的纯粹能量、纯粹经验。这两种传统之间可能有不同的关系。世俗文化传统可以在灵修传统周围创造出一种同情的环境，使人们可以关注、赞同、对话性地参与灵修实践和传统，尽管不能完全投入其中。这是世俗文化传统与灵修传统的和谐关系。但也可能不是这样，世俗文化传统可以认为自己是与灵修传统格格不入的，甚至是敌对关系。

从上述三个基本观点出发，霍鲁日对俄国文化史的诸多事件和过程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解释。

首先是对拜占庭东正教传入古罗斯的初期，即基辅时期的评价。19世纪到20世纪初，许多俄苏学者对基辅罗斯时期俄罗斯东正教的评价比较低——认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真正繁荣时期是莫斯科公国时期，相对而言，基辅时期只是一个准备阶段，好比一部著作的导言。认为这个时期没有什么宗教成就和文化成就。但在20世纪40-50年代，这种旧的评价被认为是不正确的。基辅时期得到了高度评价，许多学者认为基辅时期是俄罗斯东正教史上最纯洁的时期，也是取得多方面成就的时期。例如，俄国文化史家费多托夫（Г.Федотов，1886-1951）写道：“基辅罗斯正如金色的童年时光，从来没有在俄罗斯民族的记忆中消失。每一个人如果愿意，都能够在它的文献的纯洁源泉中满足精神渴求，在它的作家们中间找到穿越现代世界之艰难的同路人。基辅时期的基督教对于俄罗斯宗教意识的意义，就像普希金对俄罗斯艺术的意义一样”<sup>②</sup>。

---

① 21 декабря 2007 г. - доклад Сергея Сергеевича Хоружего «Синергийн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русской религиоз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 [http://www.rchgi.spb.ru/about\\_us](http://www.rchgi.spb.ru/about_us)

② Федотов Г. Русское религиозное сознание: Киевско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X-XIII в. <http://www.granik.org/1917/1/17>

霍鲁日从自己的角度赞同这样的评价。他认为，这一时期虽然拜占庭东正教中的两个方面即内在的神化和外在的圣化都获得了积极发展，但是可以说，这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本真的基督教立场，即静修主义和内在神化。因此才有历史学家们对基辅时期的理想化，将其视为俄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历史学家们的这些意见有些夸张，但是他们正确地指出，在这个时期，在基辅罗斯确实存在着正确的基督教、理想的基督教，它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基督教的基本方针，比如东正教会与政权的和谐关系。基辅大公们承认教会中良知的权威性，经常接受建议和教导；国王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而施行仁政。编年史作者记载了弗拉基米尔大公在接受基督教之前和之后的巨大变化。在受洗之后，他成为一个温顺仁慈的大公，他下令禁止死刑，同时进行社会改革，使弱者和穷人成为社会救济的对象。再比如苦修、顺从的圣徒精神和慈善、公正的社会道德。基辅大公莫诺马赫（Мономах，1053-1125）在其著名的《训蒙篇》（Поучение）中写道：“如果上帝使你们的心变软，你们当为自己的罪过流泪。……你们不要忘记那些最贫穷的人，要尽你们所能给他们食物，要给残疾人以施舍，要替寡妇辩护，不要让强者伤害人。无论是无辜的人，还是有罪的人，都不要处死，也不要吩咐别人处死他。如果有人犯罪当杀，那么，也不要伤害任何一颗基督教的灵魂”<sup>①</sup>。

14-15 世纪的莫斯科时期，东方基督教的静修主义传统对整个俄国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这是圣三一修道院创始人拉多涅日的圣谢尔基（Серги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1314-1392）和修士圣像画家安德烈·卢布廖夫（Андрей Рублев，1340/1350-1428）的时代。静修主义的传播和影响——不仅限于修道生活界，而且达到了艺术、甚至国家政治生活中。但俄罗斯对静修主义的掌握是不完整、片面化的，静修主义的内在精神没有生长出相应的文化范式。当俄罗斯从拜占庭接受静修主义精神时，实际上丢掉了静修主义的一个重要成分，就是拜占庭神学家格里高利·帕拉马（Григорий Палама，1296-1359）对静修主义的概念论表达和神学巩固。灵修传统在俄罗斯没有成熟到和达到晚期拜占庭的高度，那时苦修话语中有机地包含着神学，神学成为苦修的顶

---

<sup>①</sup> Памятник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Начал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начало XII вв. М., 1978. С.399.

峰。结果是，拜占庭东正教的神圣传统在俄罗斯没有被原本地接受和传播，而是部分被歪曲、简化了。静修主义传统在俄罗斯没有生长成为这样一种“完全的文化史现象”<sup>①</sup>。这不仅具有社会政治的外部原因，也有俄罗斯思维自身状况的原因，因为俄罗斯东正教神秘主义传统几乎把全部思维理性和认知理性领域都置于自己的范围之外，而这一理性领域在人的世界观定位上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必然利用另外的思想源泉，最终产生了俄罗斯文明与东正教之间的断裂。

在静修主义范式没有得到完全表达的情况下，外在圣化范式很快取得了非凡成就。14-15 世纪之交，俄国发生了两个事件——“莫斯科—第三罗马”观念的产生和禁欲派（Нестяжатели）与约瑟夫派（Иосифляне）之间的争论。第三罗马学说实际上是照搬了拜占庭帝国意识形态。虽然有自己的特点，但对国家的神圣性解释上是相同的。这一学说确立了对政权和国家的圣化，这是外在圣化范式的体现形式之一。教会领域里发生的过程要更为复杂。无疑，禁欲派跟随的导师索拉的圣尼尔（Нил Сорский，1433-1508），是静修意识的纯粹代表；但作为宗教意识类型的约瑟夫派大部分不是禁欲派的反对者，正如约瑟夫·沃洛茨基（Иосиф Волоцкий，1439-1515）不是圣尼尔的反对者一样。这两派都坚持拉多涅日的圣谢尔基所开创的“以俄罗斯苦修主义与拜占庭静修主义的相遇为标志”的路线。但约瑟夫派的某些特点走上了与静修精神风格相决裂的道路，约瑟夫派的胜利导致了东正教神圣传统的逐渐衰落。

在东正教神圣传统的衰落中，对精神自由原则的忽视起了重要作用。这个原则虽然完全没有被宣布（苦修者宣讲顺从，而不是争取自由），但它属于苦修的基础和源头。静修的“工作对象”——安置人的能量、人的全部动机和意念，在这些东西上下功夫，灵修——完全是建立在苦修者本人的决定和责任基础之上的。作为这一工作的一部分的“弃绝自己的意志”，要求服从和相信的不是外部权威或形式上的政权，而只是神的意志，包括听从一服从以长老为代表的传统。禁欲派由于完全赞同这一苦修原则而漠视外部纪

---

<sup>①</sup> Хоружий С.С.:Исихазм в Византии и России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вяз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http://www.хра-spb.ru/libr/Xorugij/isihazm.html>

律，便使得服从成为他们的基本诫命和任务。但约瑟夫·沃洛茨基为了有效组织教会，使教会在世界上取得成功，则坚决地选择了外部规则和形式纪律的道路。这已不是静修主义，而更接近于天主教。随着约瑟夫派的胜利和禁欲派的受压制，外部权威的优先性越来越成为教会生活的规范和原则。“禁欲派的失败意味着古代俄罗斯长老制的衰落”<sup>①</sup>。

16世纪中期，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百章会议”（1551年）无疑具有阶段性意义。其意义甚至不在于它彻底推翻了禁欲派，而在于“礼仪的教条化”，不仅把神职等级、圣像绘画规则、虔敬生活及教会生活的其他制度变成法典，而且使它们接近于信条和教会圣礼，有时达到了无差别的程度。这次会议把俄罗斯教会生活的整个风格和全部氛围都从属于外在圣化范式，礼仪化信仰被固定下来和被合法化。

如果说基辅罗斯时期（“第一次南部斯拉夫影响”时期）和14-15世纪的莫斯科公国时期（“第二次南部斯拉夫影响”时期）的俄罗斯宗教意识和精神生活是在苦修主义的内在神化范式下建立起来的，而16世纪则是内在神化范式和外在圣化范式两种因素的动态混合，那么，“百章会议”和动乱时代之后，外在圣化范式的统治地位就成为完全无可争议的了。除了国家政治意识领域和教会礼拜意识领域，这种范式还影响到了俄罗斯文化的许多其他方面。

霍鲁日认为，内在神化与外在圣化两种范式的对立，类似于魔法意识和历史意识两种意识类型的对立。内在神化和外在圣化两种立场的关系，是动态世界观和静态世界观的关系，是直线式的时代模式与循环式的时代模式的关系，是时间话语优先的思维类型与空间话语优先的思维类型的关系，等等。与外部圣化相符合的全部特点都可以轻易地在俄罗斯文化结构中找到。精神的动态性被精神的保守化所取代，确立了外在圣化的宇宙和神圣国家的静态模式。外在圣化取得胜利的病态后果，便是17世纪俄国教会的分裂，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是无疑的：“百章会议”把仪式教条化、圣化之后，就使得所有未来的熟读《圣经》者有权宣布任何改变礼仪者为异端。显然，在静修

---

<sup>①</sup> Криволапов В.Н.. Оптина пустынь: ее герои и тысячелетние традиции// Писатель и время. М., 1991.С.404.

主义的精神道路上，这样的过程是不可能发生的。

17 世纪，由于西方的影响，在俄国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里出现了另外一个冲突。礼仪化的社会没有资源发展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化传统。因此，社会意识的文化需求的满足只能靠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通常情况下，在发达的社会里，必然要产生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但是，在俄国有哪些可能性来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呢？显然，只有在真正的基督教本有的宗教性基础上，才可能发展出文化，比如哲学、神学、思想领域。在拜占庭，这些资源的确曾经被用来发展自己的文化，尽管不是被充分地利用。莫斯科时期的俄国压制了静修主义，这使得自己的东方基督教文化的发展成为不可能。因此，发展文化的唯一可能性就是转向西方，借用西方文化，这就是所谓的西方化。西方化是俄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时期开始，俄国文化（物质文化）的主要内容都是从西方拿来的。俄国文化成了西方化的文化，于是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冲突，这是俄国思想领域的内在矛盾。灵修传统是东方基督教的，但文化却是西方的，西方化的。于是出现了灵修传统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

这样，在俄国历史上，灵修传统与文化传统之间没有形成同情—接受的关系，而是形成了分裂—冲突的关系。灵修传统在俄罗斯就是东正教所制定的静修主义传统，它本身是一种范围狭窄的、内在的、深层的精神现象。灵修传统在俄国存在的几百年间都是与文化传统相割裂的。文化学家把灵修传统称作下层文化现象。而近 200 年或 250 年所创造的伟大俄罗斯文化是与灵修传统毫无关系的。在拜占庭的 14 世纪曾经有过灵修传统与文化传统的和谐关系，那时在灵修实践和神秘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发达的灵修传统，而且在这个传统中包含着文化维度。在俄罗斯则不是这样，在俄国土地上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神秘经验，但没有制定出自己的文化维度。文化传统是与灵修经验毫不相干的，不关注任何灵修经验，就像其根本不存在一样<sup>①</sup>。

到了 18 世纪的彼得改革时期。按照霍鲁日的观点，彼得大帝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技术政治家，他的观念就实质而言是技术性的。这个观念就是，国家需要变成可以由一个人来统治的高效机构。他发展了一个清楚的

---

<sup>①</sup> Хоружий С.С. Духовная и культурная традиции России в их конфликтном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2004 年 9 月 23 日在 Bilingua 文学俱乐部的讲座。

模式来完成自己的任务。彼得大帝的第一个观念是，要扩大和强化国家政权，把国家变成绝对的专制制度。这样做不需要任何新东西，因为西方的国家在当时已经是这样的制度了。彼得大帝的第二个观念是，教会应该绝对地、彻底地服从国家，必须把教会纳入到国家机器中来，形成统一的国家机器。

彼得大帝的改革从西方拿来了许多东西，比如管理体制、日常生活文化、技术文化，从西方拿来的还有新教式的教会组织形式，即把教会看做是世俗机构。但同时，在俄国东正教里也保留了拜占庭帝国的神秘主义，与皇权和皇帝自身相关的拜占庭圣化的礼仪。彼得大帝通过技术手段终止了俄国的僵化和礼仪化的存在，使之成为动态的和历史的机体，使之回归历史过程。但这只是外部成就，而且是与内部的结构缺陷结合在一起的。内部缺陷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俄罗斯意识的灵修传统遭到压制和排挤；另一个缺陷是，彼得大帝所接受的文化，他所建立的普遍机制都具有非有机的形式，是折中的大杂烩文化，其中包含各种不同质的部分，相互之间没有一致性：管理体制是德国的，世俗文化是法国的，技术是荷兰的，部分还有英国的，思想文化是从西方各国借用的，西方各国的思想都被拿到俄国来，并且成为权威的东西，其中大部分为偶然拿来的。这种非有机的文化无法自我再生产，这不是创造性的文化传统。因此，这里也有自己的危险。

力图克服这些缺陷和危险，是俄国文化历史发展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这就是 19 世纪的俄国古典文化，霍鲁日称之为“俄罗斯综合”。它的实质是对彼得改革之后所产生的两大文化缺陷的克服，首先是静修主义路线在俄国宗教和俄国文化里的恢复。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一条是内部途径，即自发的复兴。由于俄国社会自身的内在需求，灵修传统、静修主义传统在俄国自发地复兴了。静修主义在俄国的复兴的另外一条途径是外部的，因为这个传统保留在俄国之外的东正教国家里，首先是在阿索斯山（Афон），那是静修主义传统的重要发源地。几百年来，这是东正教和静修主义的中心。18 世纪下半叶，阿索斯山的俄国修士帕伊西·韦利奇科夫斯基（Паисий Величковский，1722-1794）就搜集了大量的灵修实践方面的文献，其中有对静修主义实践的描述。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修道小团体。他们一面复兴静修主义的灵修实践，一面把静修主义文献翻译成俄文。在圣帕

伊西及其学生们的努力下，完成了《爱善集》(Philokalia, Добротолюбие)的翻译、编辑和出版<sup>①</sup>。其中包括静修主义传统的大量文献。在这部著作的基础上，19世纪中期，甚至更早些时候，大约在19世纪20年代，可以说，静修主义开始在俄国复兴，出现了静修主义的庞大中心，即位于俄国中部地区的奥普金那荒野修道院。有人公正地认为，静修主义返回俄国的过程的象征性标志，是萨罗夫的色拉芬(Серафим Саровский, 1759-1833)，他与拉多涅日的圣谢尔基一起被俄罗斯教会封为俄罗斯的庇护者，“全俄罗斯的神迹创造者”。色拉芬的神秘直觉无疑属于静修主义路线，他集中于关于光与恩典的传统观念，提出了神秘主义座右铭：精神生活的目的是“博取神的圣灵”。这条路线在20世纪也有继承者，就是阿索斯山的圣西拉(西鲁安, Силуан Афонский, 1866-1938)和他的徒弟、修道院长索弗罗尼(Софроний, 1896-1993)<sup>②</sup>。这样，静修主义传统在俄国的不足和衰落的趋势就被克服了。

“俄罗斯综合”的另一个方面是对18世纪文化的加工，即对彼得大帝留下的西方化文化的加工，形成了另外一种类型的文化，这是个创造的和有机的文化类型。这个文化过程也有自己的象征表达，那就是普希金。这样，在19世纪初，发生了两大创造过程，一个是在精神领域，即静修主义传统的复兴，以萨罗夫的色拉芬为代表，另一个是文化创造领域，以普希金为代表。这是俄国历史的两大成就。在俄国以后的历史上，这两大成就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普希金之后到20世纪初，俄国思想家在西方近代启蒙文化的激发下，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俄罗斯文化。另一方面，以内在神化为目标的正教精神，也孕育了俄国20世纪的“新宗教意识”以及后来的“新教父综合学派”的出现，这也是俄国精神文化的一个领域。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文化创造领域没有关联，完全是相互独立的，相互之间没有联

---

① 《爱善集》，希腊语书名 *Philokalia* 意为“对善、美、崇高之物的爱”，是公元4-15世纪希腊教父和拜占庭神学家的灵修著作集，由阿索斯山苦修士圣山的尼哥底姆和哥林多都主教圣马卡里·诺塔拉斯编辑，1782年出版。帕伊西·韦利奇科夫斯基的第一个俄文译本出版于1793年。

② 参见索弗罗尼著：《俄罗斯精神巨匠：长老西拉》，戴桂菊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系。正如历史学家早就指出的那样，他们（普希金与色拉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相互之间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接下来是白银时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复兴。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哲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由于白银时代的哲学家用来表达俄罗斯宗教意识的手段，他们所使用的哲学语言和方法，都是从西方哲学传统那里拿来的，因此无法表达东方基督教话语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静修主义，也就是东正教的灵修经验，东正教修行实践的经验，追求神并与神合一的经验。因此，俄国宗教思想发展的下一个阶段的目的就是由哲学返回（转向）神学。

20世纪30年代中期，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下一个阶段逐渐展开。其主要特点在于，它不是在哲学形式下，而是在神学形式下展开的。其代表人物是弗洛罗夫斯基（Г. Флоровский，1893-1979）、弗·洛斯基（Вл. Лосский，1903-1958）和梅延多夫（Мейендорф，1926-1992）。他们主要完成了两个方面的任务，第一是制定了主张以创新精神回归教父传统的“新教父综合”（Неопатристический синтез）的方法论；第二是对静修主义思想遗产和灵修经验的系统研究，挖掘其一般人学意义。在后一方面发展出了当代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一个新流派——神人合作人学（Синергийн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霍鲁日从东正教灵修传统的角度对俄国文化史的解释，对我们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史学方法论的启发意义。历史研究可以利用不同方法，概念论的分析考察也是历史认识的一种工具；第二，有利于我们对俄国斯拉夫主义的进一步认识。俄罗斯民族传统与西方因素的矛盾和冲突在几个世纪里一直是俄罗斯文化的尖锐问题，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依然存在。霍鲁日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深深扎根于东方基督教的内在特点之中，这一特点不仅是在俄罗斯历史上形成的，而且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的拜占庭东正教。

当然，我们认为，霍鲁日的观点也有不足之处。他把东正教静修主义传统看作是一般基督教的最真实本质，这种观点具有把基督教观念化、理想化的倾向。事实上，无论是东方基督教还是西方基督教，都是在具体历史文化环境中存在和发展的，东正教的仪式和制度也是其维持自身的必要因素，基

道教本身就是在与世俗社会的相互作用中不断演化和发展的。此外，在俄国文化历史进程中，不仅是灵修传统与文化传统的冲突起决定作用，而且存在着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尤其是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不应只从灵修传统中寻求文化发展的出路，而应当看到俄罗斯文化的多元发展。

---

**【Abstract】**When Russia followed the Byzantine Orthodox, it, on one hand, accepted and continued the meditation tradition based on principle of “internal deifi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accepted and developed the church functions in “external sanctification”. This has resulted in conflicts between both religions paradigms throughout the whole evolution of Russian culture. Moreover, these conflicts have impacted in many aspects. For modern Russian spiritual culture, there appeared a tendency to return to meditation traditions. In the mid-1930s, a batch of influential Russian philosophers shifted towards theological themes.

**【Key Words】** The Orthodox, Meditation, Inherent Deification, External Sanctifica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принятием Византийского православия Россия также приняла и продолжила духовные традиции восточн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целью которого является «внутреннее обожествление», а также приняла и развила церковные функции «внешней канонизации»,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конфликту между этими двумя формами религий в русском православии, этот конфликт пронизал и во многом повлиял на весь процесс развития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В духовной культур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наблюдается тенденция возвращения к традициям духовности, в середине 1930-х гг. многие значимые в России философские темы превратились в богословски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Восточн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сихазм, внутреннее обожествление, внешняя канонизация

---

(责任编辑 黄翔)

## 俄罗斯东正教会封圣史发展概述\*

赵小华\*\*

**【内容提要】** 圣徒崇拜是俄罗斯东正教信仰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崇拜已有的古代圣徒外，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基辅受洗后的整个发展历史中，都在不断地册封新的圣徒。整体来看，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封圣史可以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基辅罗斯受洗到1547年马卡里宗教会议前。由于罗斯国家处于分封割据的状态，教会所册封的圣徒主要为地方圣徒。第二阶段为1547和1549年马卡里宗教会议召开期间。马卡里会议册封了大量的全教会圣徒，并对教会封圣的具体程序，以及纪念圣徒的方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第三阶段是1549年马卡里宗教会议之后到1721年主教公会成立。该阶段中，俄罗斯东正教会册封活动成果丰厚，并表现出了一系列新特点。第四阶段为主教公会时期，即1721年至1917年。国家对教会的压制使得俄罗斯东正教会封圣活动的积极性大大减弱，所册封圣徒的数量也随之急剧减少。只是在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教会的册封积极性才逐渐恢复。第五阶段是从1917到1987年的苏联时期。苏联成立初期，封圣活动一度停止。后随着政教关系的缓和，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始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来进行册封；第六阶段为封圣史发展的当代阶段，从1988年罗斯受洗1000周年至今。这一时期，教会主要是进行20世纪“俄罗斯新殉难者和忏悔者”的册封。其中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关键词】** 俄罗斯东正教会 圣徒崇拜 封圣 罗斯受洗 拜占庭

**【中图分类号】** B89(51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3)06-0079-(32)

\* 感谢《俄罗斯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文中可能的错漏由笔者负责。

\*\* 赵小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圣徒崇拜是俄罗斯东正教信仰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体现和反映了广大东正教徒的宗教意识。尽管如此，它并不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原创，而是从拜占庭引入的舶来品。在基辅罗斯接受基督教洗礼之时，拜占庭帝国已经平安地渡过了圣像破坏运动的风暴，并将圣徒和圣像崇拜作为东正教学说的重要基础之一重新确立下来。公元 988 年，随着基辅罗斯接受拜占庭基督教会洗礼，拜占庭教会的圣徒和圣像崇拜传统也为俄罗斯教会所全盘接受。《往年纪事》中讲道：“988 年，在广大臣民跳入第聂伯河进行洗礼时，弗拉基米尔大公将罗马主教克雷芒及其弟子圣菲弗（Св. Климент и Фив）的干尸从赫尔松带到了基辅<sup>①</sup>。除了崇拜已有的古代圣徒外，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基辅受洗后的整个发展历史中，都在不断地册封新的圣徒。本土圣徒逐渐取代早期的基督教圣徒而成为俄罗斯广大东正教徒所崇拜的对象。他们的名字不断地丰富着东正教教历的每一页，而干尸则给众多的教堂与修道院罩上了神圣的光环，构造出一个个神圣的空间。

## 一、俄罗斯东正教圣徒及封圣概念的界定

根据东正教会学说，圣徒是依靠自己的有效信仰和有效的爱的修道，在自身中实现了似神性，也依靠这种修行，他们就有权显现神的形象，并得到神的更多恩典<sup>②</sup>。他们是上帝的朋友，是生者与死者在上帝面前的代求者和“上帝成就自己事业的手”<sup>③</sup>。根据所受崇拜的地域范围的大小，俄罗斯东正教圣徒可以被分为全教会圣徒和地方圣徒。全教会圣徒是指整个俄罗斯教会都要举行活动来对其进行纪念和崇拜的圣徒，而地方圣徒则是指只在某一个单独的主教区或是修道院，亦或是教堂，受到纪念和崇拜的圣徒。将圣徒分为全教会圣徒与地方圣徒的做法，也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从希腊教会那里沿袭而来的。而根据圣徒本身的神圣性特点，俄罗斯东正教圣徒又可以被划分为王公圣徒、主教圣徒、圣修士、圣愚、神圣的平信徒等。然而正如美国历

① 王钺：《往年纪事译注》，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 年，第 215 页。

② [俄]С·Н·布尔加科夫：《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徐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 149 页。

③ 同上，第 150 页。

史学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所言，圣徒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sup>①</sup>。他们基本上都是经过教会的正式封圣程序，而后才为广大教徒所接受和崇拜。

在俄罗斯东正教会中，封圣（Канонизация）一词，是指教会将已逝的教徒列入圣徒的行列之中。“Канонизация”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从西方神学语言中借用的词汇，它与俄罗斯本土化词组“причисление к лику святых”（将某人列入圣徒的行列）的意思相同，可以互换使用<sup>②</sup>。尽管“封圣”一词通常是用来描述官方教会承认教徒的神圣性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封圣概念，与罗马天主教会已经发展了数个世纪的较为严密的封圣体系有所不同。罗马教会在谈到“圣徒的册封”时，是指确定某一位教徒的神圣性，确定其为圣徒。而对于东正教会而言，该过程的目标正如其在封圣一词定义中所说的那样，是“将某一位候选人列入圣徒的行列”<sup>③</sup>。换句话说，就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宣称，它不是在制造圣徒，而只是承认圣徒，允许尘世的善男信女们对上帝已经给予天国荣耀的圣徒进行崇拜。用东正教会官方的话说就是，是上帝自己制造了圣徒，而教会和教徒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只不过是重申和确证圣徒的存在。关于教会对圣徒的神圣性进行“重申”和“确证”时所依据的原则，俄罗斯文化史学家、宗教思想家格奥尔吉·费多托夫（Георгий Федотов）<sup>④</sup>曾写道：“一直以来，教会册封圣徒的依据都是：（1）圣徒的生活与功绩；（2）奇迹；（3）在个别情况下是其干尸不腐。……其中，是否能够显灵，也就是是否能够创造奇迹，是教会

---

① Peter Burke, “How to be a counter-reformation saint”, i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Kaspar von Greyerz ed., London, 1984, pp.44-45. 转引自 Robert H. Greene, *Bodies Like Bright Stars: Saints and Relics in Orthodox Russia*,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0, p.5.

② Голубинский Е.Е. История канонизации святых в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1903. С.10.

③ Там же. С.10.

④ 格奥尔吉·费多托夫（1886-1951）——俄罗斯文化史学家、哲学家、宗教思想家、文化神学的奠基人。在《宗教诗歌 俄罗斯人民对宗教诗歌的信仰》（《Стих духовный.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вера по духовным стихам》）、《古罗斯圣徒（10-17世纪）》（《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X-XII вв.)》）、《俄罗斯宗教思想》（《Русская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мысль》）等作品中，费多托夫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俄罗斯在东西方之间的位置以及俄罗斯人的历史文化类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册封圣徒时所依据的最为主要的原则。”<sup>①</sup>的确是这样的，在俄罗斯东正教一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这些主要原则始终没有改变过，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教会在册封不同类型的圣徒时，所依据的具体原则会有所侧重。

## 二、俄罗斯东正教册封实践的历史发展阶段

根据所处历史环境的不同以及东正教封圣实践的特点，俄罗斯东正教会封圣史整体上可以被划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基辅罗斯受洗到 1547 年马卡里宗教会议前；第二阶段为 1547 和 1549 年马卡里宗教会议（Макарьевские соборы）召开期间；第三阶段是 1549 年马卡里宗教会议之后到 1721 年主教公会成立；第四阶段为主教公会时期，即 1721 年至 1917 年；第五阶段是从 1917 到 1987 年的苏联时期；第六阶段为封圣史发展的当代阶段，从 1988 年罗斯受洗 1000 周年至今。下面分别对这六个阶段进行详细论述。

### 第一阶段：基辅受洗到马卡里宗教会议召开之前（公元 988 年至 1547 年）

公元 988 年基辅罗斯受洗后，俄罗斯东正教会所册封的第一批本土圣徒，是弗拉基米尔大公的两个儿子鲍里斯与格列布（Борис и Глеб）<sup>②</sup>。虽身为王公，鲍里斯与格列布并不是作为“专制者”，而是作为不以暴力抗恶的“殉难者”而被册封为圣徒的。这主要是因为，1015 年，在大公王位的争夺斗争中，他们被自己的哥哥斯维亚托波尔克（Святополк）所残酷杀害。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这一册封行为最初并没有马上为拜占庭教会所接受。在拜占庭方面看来，一方面，鲍里斯与格列布既不是苦修者，也不是为信仰而牺牲的殉难者，而其不以暴力抗恶的功绩根本就不能构成将其册封为圣徒的依据。

---

① Федотов Г.П. Введение// 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http://www.vehi.net/fedotov/svyaty/00.html>

② 鲍里斯与格列布被册封为全教会圣徒的时间不详，可能是智者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1019-1054 年），也可能是在 1072 年。

另一方面，基辅罗斯刚刚加入基督教大家庭不久，因此它还不可能这么快就获得上帝的青睐和恩惠。而俄罗斯东正教会则认为，为了俄罗斯国家的统一，鲍里斯与格列布自愿放弃权力和牺牲自我的行为，对于广大王公和教徒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并且其棺木所在之地也显示了奇迹。因此，他们是有资格被册封为圣徒的。鲍里斯与格列布开创了俄罗斯历史上王公圣徒的先例。在他们之后，为拯救臣民而进行自我牺牲的行为，成了基督徒王公的宗教职责和所有俄罗斯王公学习的榜样。在古罗斯人看来，以牺牲自己换来公国安宁的王公圣徒更值得崇拜，而他的公国相对于其他公国而言则更具有优势，因为埋葬在城里的王公会用其祈祷来保佑城市抵御敌人的进攻<sup>①</sup>。

这一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所册封圣徒的主要类型为：深受百姓尊重和喜爱的修士圣徒、主教—传教士圣徒、王公圣徒，尤其是那些为了捍卫人民的利益和宗教信仰而牺牲的王公。其中比较著名的圣徒有：洞穴的圣安东尼和费奥多西（Антоний и Феодосий Печерские），俄罗斯使徒——奥莉嘉公爵夫人（Княгиня Ольга）和弗拉基米尔大公（Князь Владимир）、拉多涅日的圣谢尔吉（Серги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以及白湖的基里尔（Кирилл Белозерский）等等。在册封圣徒时，首先考虑的是候选人是否能够创造奇迹，也就是具备显灵的能力。在进行册封准备时，教会通常的做法是：先将受封候选人的干尸挖掘出来，并将其转移至专门的场所，希望在东正教徒的祈祷下，上帝能够赐予其显灵的能力<sup>②</sup>。正是因为如此，圣奥莉嘉、洞穴的圣费奥多西、雅罗斯拉夫的费多尔王公（Князь Феодор Ярославский）及其儿子们的干尸都被挖了出来。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尽管有很多其他王公也被册封为圣徒，但他们所凭借的并不是自己的民族解放或是政治军事功绩，而是因为具备了显灵的能力。因此，在该阶段所册封的圣徒行列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像智者雅罗斯拉夫（Ярослав Мудрый）<sup>③</sup>或是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Владимир Мономах）、钱袋伊凡（Иван Калита）等曾对俄

---

① Русские святые.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Кругосвет. [http://www.krugosvet.ru/enc/kultura\\_i\\_obrazovanie/religiya/RUSSKIE\\_SVYATIE.html?page=0,0](http://www.krugosvet.ru/enc/kultura_i_obrazovanie/religiya/RUSSKIE_SVYATIE.html?page=0,0)

② Русские святые.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Кругосвет. [http://www.krugosvet.ru/enc/kultura\\_i\\_obrazovanie/religiya/russkie\\_svyatie.html](http://www.krugosvet.ru/enc/kultura_i_obrazovanie/religiya/russkie_svyatie.html)

③ 2004年被教会册封为地方圣徒。

罗斯国家的历史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的身影。关于这一点，格奥尔吉·费多托夫也坚持认为：“在这一时期，教会没有册封任何的政治家——无论是莫斯科的，还是诺夫哥罗德的，亦或是鞑靼汗国的；无论是统一公国的，还是分封公国的”<sup>①</sup>。

整体来看，从 11 世纪到 16 世纪中叶，俄罗斯东正教会所册封的圣徒大部分为地方圣徒。根据俄罗斯著名教会历史学家叶甫盖尼·戈卢宾斯基（Евгений Голубинский）的统计，在该时期内，俄罗斯东正教会一共册封了 68 位圣徒，其中有 7 位是全教会圣徒，而其他 61 位则是广义或狭义的地方圣徒<sup>②</sup>。这主要是因为基辅罗斯公国在 12 世纪逐渐分裂为各个独立的分封公国，而各个公国都争先恐后地希望册封自己本公国境内的圣徒，这既可以团结广大教徒，又可以增加公国的荣耀。分散于各个公国的主教区，也因此而相互竞争起来，不断地册封新圣徒。如罗斯托夫主教约翰（Иоанн Ростовский）在任时，曾下令将 1077 年去世的罗斯托夫主教列昂季（Леонтий Ростовский）册封为圣徒<sup>③</sup>。1439 年，诺夫哥罗德叶夫菲米（Евфимий Новгородский）大主教，将前诺夫哥罗德大主教约翰（Иоанн Новгородский），以及对索菲亚教堂建设进行过资助的王公们册封为圣徒<sup>④</sup>。类似的地方圣徒册封事件，在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与此同时，从上文戈卢宾斯基的统计结果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尽管数量有限，只有 7 位，但俄罗斯东正教会并没有终止全教会圣徒的册封活动，只不过是在从基辅受洗到 1448 年俄罗斯教会成为事实上的自主教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在册封全教会圣徒时，都需提前与其上级领导——拜占庭牧首区大牧首进行商议。到 1448 年

---

① Федотов Г. П. Святые князья// 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http://www.vehi.net/fedotov/svyatye/05.html>

② Голубинский Е.Е. История канонизации святых в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1903. С.294. 这 7 位全俄罗斯圣徒，包括罗斯接受基督教起至俄罗斯东正教会都主教驻地迁至莫斯科之前的三个世纪里俄罗斯东正教会所册封的三位圣徒：王公鲍里斯和格列布、洞穴的圣费奥多西（Феодосий Печерский），以及马卡里担任俄罗斯东正教会都主教之前莫斯科罗斯时期教会所册封的四位全教会圣徒：都主教彼得（Пётр）和阿列克西（Алексий），拉多涅日的谢尔吉和白湖的基里尔。

③ Мельник (Ростов). А.Г. Почитание святого Леонтия Ростовского в домонгольскую эпоху. <http://www.booksite.ru/cherch/vologda/leont4.htm>

④ Мусин А.Е. Соборы св. митрополита Макария 1547-1549 гг.: Факт истории или факт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http://www.rostmuseum.ru/publication/srm/013/musin01.html>

以后，它才开始独立册封自己的全教会圣徒。

## 第二阶段：马卡里宗教会议时期（1547-1549 年，Макарьевские Соборы）

16 世纪，在俄罗斯统一国家和东正教民族教会形成的背景下，分封公国各自崇拜自己地方圣徒的情况，已经无法适应新时期俄罗斯国家历史发展的需求——地方圣徒只是在自己所在的地方范围内受到崇拜，而其他地区则不承认甚至抵制他们，因此需要创造为所有俄罗斯人提供庇护和供其进行崇拜的圣徒。关于人们对非本公国圣徒和圣物排斥和抵制的态度，瓦西里·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sup>①</sup>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俄罗斯圣徒册封史》（《История канонизации русских святых》）中曾写道，在蒙古鞑靼桎梏时期，诺夫哥罗德城的人民拒绝对拉多涅日的谢尔吉进行崇拜，因为他是莫斯科的圣徒。在那一时期，莫斯科是在蒙古人手中，而诺夫哥罗德则不是，这一情况使得诺夫哥罗德人对源于莫斯科的一切习惯和信仰都持怀疑态度<sup>②</sup>。因此，莫斯科王公在将某一分封公国征服后，通常都会把该公国的重要圣物转移到自己的首都。例如，诺夫哥罗德的救世主圣像、乌斯秋格的报喜圣像、斯摩棱斯克的圣母圣像等，都陆续出现在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升天教堂里。而将这些圣物搜集到莫斯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剥夺被征服地区的地方圣物，获得他们对自己的好感，而是为了将这些地方圣物提升为全教会圣物，并借此建立统一的民族信仰崇拜的宝库<sup>③</sup>。此外，大规模的圣徒册封活动还与“莫斯科——第三罗马”这一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俄罗斯国家和教会统治者看来，莫斯科国家作为拜占庭东正教帝国的新继承者，其领土上“上帝的侍者”——圣徒的数量也绝不应该落后<sup>④</sup>。正是基于上述原因，1547 年，伊凡四世

---

① 作家，莫斯科神学院毕业生，1893 年，凭借论文《俄罗斯圣徒册封史》而获得神学硕士学位。

② [美]汤普逊（Ewa M.Thompson）：《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杨德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09 页。

③ Миллюков Л.Н.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Часть вторая. Церковь и школа(вера, творчество,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Петербург:Типография И.Н. Скорожодова. 1897. С.28-29.

④ Гжегож Пшебинда. Святые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К выходу пол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да книги Георгия Федотова "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http://www.nowpol.ru/index.php?id=368>

(Иван IV) 在正式加冕之后,便开始督促马卡里(Макарий)都主教积极开展册封新圣徒、纪念老圣徒的活动。

1547 和 1549 年,在伊凡四世的大力支持和马卡里都主教的主持下,俄罗斯东正教会先后召开了两次宗教会议,专门商议册封圣徒事宜,历史上将这两次会议统称为马卡里宗教会议。马卡里宗教会议在俄罗斯东正教会封圣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首先,与先前一样,以是否具备显灵能力为依据,这两次会议先后共将 39 位候选人册封为全教会圣徒<sup>①</sup>。在短短三年里,便册封了如此众多的全教会圣徒,在俄罗斯东正教会历史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马卡里宗教会议召开的时期,因此也被称为“新显灵者的时代”<sup>②</sup>。其次,马卡里会议对教会封圣的具体程序以及纪念圣徒的方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正是从这时起,俄罗斯东正教会册封圣徒的程序最终形成,那就是,册封圣徒决议的采纳,必须经由整个教会的商讨和都主教的批准<sup>③</sup>。此外,会议还决定,教会必须为每一位新圣徒制定出相应的礼拜仪式,撰写行传、颂词和祈祷词以及画圣像等。马卡里宗教会议后,新显灵者的礼拜词和行传集也开始传播开来。

虽然伊凡四世与马卡里都主教最初是希望通过大量册封全教会圣徒来促进国家的统一和提高教会的威望,但他们的这些愿望最终却没有完全实现。这两次会议的决议,并没有为广大教徒所广泛接受。当代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叶甫盖尼耶维奇·穆辛(Александр Евгеньевич Мусин)在对新俄罗斯显灵者的形象进入俄罗斯圣像画的程度进行分析后指出,大多数被马卡里都主教确定为全教会圣徒的圣像,如果说是进入了 16 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文

---

① 更准确地说,在这 39 位新册封的全教会圣徒中,有很多本身原来就已经是地方圣徒,此次是从地方圣徒提升为全教会圣徒。

② “马卡里宗教会议召开的目的是为了册封圣徒”的观点,是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瓦·奥·克柳切夫斯基首先提出的。当代研究者更倾向于将这两次会议看作是礼拜式的,而非封圣会议——也就是会议的目的不在于册封新的圣徒(因为教徒们对他们的崇拜在马卡里会议之前就存在),而是为了使这些圣徒的传记系统化和规范化。具体请参看 Мусин А. Е. Соборы св. митрополита Макария 1547-1549 гг.: Факт истории или факт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http://www.rostmuseum.ru/publication/srm/013/musin01.html>

③ Макарий (Веретеников), архим. Макарьевские соборы. С.5 转引自 Мусин А. Е. Соборы св. митрополита Макария 1547-1549 гг.: Факт истории или факт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http://www.rostmuseum.ru/publication/srm/013/musin01.html>

化领域的话，也只是与其地方崇拜中心相联系的一些个例。可能只有索洛维茨修道院的佐西玛和萨瓦季（Зосима и Савватий Соловецкие），以及斯维里的亚历山大（Александр Свирский）是个例外。也就是说，1545 和 1547 年马卡里宗教会议所作出的对 39 位圣徒进行全教会崇拜的决议，在 16 世纪中下半叶并没有引发俄罗斯艺术领域的革命。先前就已受到某些地方特别崇拜的圣徒的形象，在艺术作品的情节中仍旧占据着主要地位<sup>①</sup>。

### 第三阶段：马卡里宗教会议召开之后到主教公会成立（1549–1721 年）

马卡里宗教会议以后，从 1549 年到 1589 年俄罗斯牧首区成立前，封圣事宜都是由都主教领导的宗教会议来商议和裁决的。1589 年，随着俄罗斯东正教独立牧首区的成立，这一事务也随之转交由牧首所领导的宗教会议负责了。1700 年，在对改革持保守态度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阿德里昂（Адриан）去世后，彼得一世禁止重新选举新的牧首，只是任命不反对其改革的梁赞地区主教司提反·雅沃尔斯基（Стефан Яворский）为代理大主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721 年主教公会正式成立。

从被册封圣徒的总数来看，该阶段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封圣成果，可以说是十分丰厚的，一共册封了 150 位全教会和地方新圣徒。但是如果单独从全教会圣徒的数量来看，教会的封圣活动似乎又回到了马卡里宗教会议之前的状态。在这 150 位新册封的圣徒中，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候选人被册封为全教会圣徒，大部分仍旧只是地方圣徒。根据叶甫盖尼·戈卢宾斯基的统计，在这 150 位新圣徒中，只有 15 人在俄罗斯教会章程中是被记录为全教会圣徒的。而且其中的斯摩棱斯克的梅尔库里（Меркурий Смоленский）和费多尔·亚罗斯拉夫维奇王公（Князь Феодор Ярославич），很可能还有斯托罗布内岛的尼尔（Нил Столобенский）和基里洛夫—新泽尔斯基修道院的基里尔（Кирилов-новозерский Кирилл）等四位，是在晚些时候——主教公会时期被册封为全教会圣徒的<sup>②</sup>。

---

① Мусин А.Е. Соборы св. митрополита Макария 1547-1549 гг.: Факт истории или факт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http://www.rostmuseum.ru/publication/srm/013/musin01.html>

② Голубинский Е.Е. История канонизации святых в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1903. С.294.

这一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册封实践，表现出了如下新特点。

首先，在该阶段被新册封的圣徒中，几乎有一半是修道院的建立者或是其追随者。他们为俄罗斯东正教会地位的巩固和东正教信仰在俄罗斯偏远地区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如白湖的费拉蓬特（Ферапонт Белозерский）<sup>①</sup>、乌斯秋格的基普里昂（Киприан Устюжский）<sup>②</sup>、加利奇的阿夫拉米（Аврамий Галичский）<sup>③</sup>等等。这类圣徒的册封程序一般是：修道院的修士们通过不断地唱祭祷歌曲来崇拜和纪念已故的修道院创始人，而这一祭祷歌曲随后逐渐演变成为向这位“上帝的侍者”进行祈祷的祈祷词。此后修道院院长会向教会当局提出对“上帝的侍者”进行祈祷崇拜的问题，而教会当局则会对这一要求表示同意和祝福。此外，教会当局还会对修道院所提交的圣徒传和祈祷词进行考察<sup>④</sup>。在这种封圣秩序下，教会在作出封圣决议时，更看重的是被册封的候选人为教会所立下的功勋，以及个人的修行功绩，而对一直以来都是封圣必要条件的显灵能力的要求则有所弱化。此外，如同古代拜占庭教会一样，在该阶段中，还有很多新圣徒是凭借其教职而被册封的主教。

其次，1653-1656年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尼康所进行的教会仪式改革，对教会的封圣实践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尼康的改革导致俄罗斯东正教会分裂为官方教会和旧礼仪派。而在旧礼仪派的宗教团体中，从18世纪初开始对那些因虔诚信仰古代教会礼仪而殉难的殉难者和旧礼仪派神圣修士及其干尸进行崇拜。另一方面，教会的分裂还导致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取消已册封圣徒名号（Деканонизация）情况的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特维尔公国米哈伊尔大公的夫人安娜·卡申斯卡娅（Анна Кашинская）被取消圣徒名号事件。安娜·卡申斯卡娅曾于1650年被教会册封为圣徒。1677年，在俄罗斯东正教会发生分裂后，她的圣徒名号被取消。这主要是因为官方东

---

① 白湖的费拉蓬特（1331-1426），白湖的费拉蓬特修道院和卢热茨基的费拉蓬特修道院的创始人。其在俄罗斯东正教会中的纪念日为旧历5月27日和12月27日。

② 基普里昂（?-1276年9月29日），圣修士，米哈伊尔-阿尔汉格尔斯克修道院的创立者。其在俄罗斯东正教会中的纪念日为旧历9月29日。

③ 加利奇的阿夫拉米（?-1395年7月20日），圣修士，拉多涅日的圣谢尔吉的弟子。其在俄罗斯东正教会中的纪念日为旧历7月20日。

④ Комиссия РПЦ по канонизации святых. Канонизация святых в XX веке.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регенского монастыря. 1999. С.50-51.

正教会看来，安娜是旧礼仪派分子，因为她在划十字时，使用的是两个手指，而不是官方教会所规定的三指。在被取消圣徒资格后，安娜的棺木被查封，对她的祈祷也被禁止，而先前献给她的教堂则成为对所有圣徒进行纪念的场所。除了安娜公爵夫人外，因同样原因而被革除圣徒名号的，还有圣叶夫罗辛（прп. Евфросин）和马克西姆·格雷克（Максим Грек）。然而，最为致命的并不是上述几位被取消了圣徒名号，而是这种因为教会政策发生改变而革除已封圣徒名号的实践，最终成了一种教会的生活规范。到 18 世纪，也有数位圣徒因为种种原因而被革除了圣徒的名号<sup>①</sup>。

再次，在 1654 年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后，基辅都主教区也于 1686 年正式加入莫斯科牧首区<sup>②</sup>。先前不为莫斯科所熟知的乌克兰都主教区圣徒的纪念和崇拜活动，也随之逐渐进入俄罗斯东正教的教会生活之中。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基辅洞穴修道院圣徒进行集体崇拜。但是在官方层面上，只是在主教公会于 1762、1775、1784 年相继三次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后，基辅洞穴修道院修士们的名字才被正式写入莫斯科牧首区的教历中，对基辅洞穴修道院修士圣徒的集体崇拜才得以在俄罗斯东正教全教会确立<sup>③</sup>。

#### 第四阶段：主教公会时期（1721-1917 年）

在彼得西化改革的背景下，俄罗斯国家试图最大限度地控制教会的活动。作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圣徒册封及其崇拜活动，因此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1721 年，彼得大帝颁布《宗教章程》（Духовный регламент）废除了牧首一职，建立了主教公会。主教公会的成立，彻底改变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地位，使其完全成了俄罗斯国家的附庸。一直到 1917 年，在宗教会议和大牧首一职被取消的条件下，主教公会都是唯一具有封圣资质的机构。国家借助主教公会来对教会的封圣事务进行监督和控制，减少

---

① Игумен Андроник Трубачев. Канонизация святых в 1550-1721 гг. // Канонизация святых в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http://azbyka.ru/tserkov/svyatyje/trubachev\\_kanonizatsiya\\_svyatyh\\_05-all.shtml](http://azbyka.ru/tserkov/svyatyje/trubachev_kanonizatsiya_svyatyh_05-all.shtml)

② Бурег В.В.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Киевской Митрополии к Московскому Патриархату: Как это было. <http://www.bogoslov.ru/persons/261580/index.html>

③ Игумен Андроник Трубачев. Канонизация святых в 1721-1894 гг. // Канонизация святых в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http://azbyka.ru/tserkov/svyatyje/trubachev\\_kanonizatsiya\\_svyatyh\\_06-all.shtml](http://azbyka.ru/tserkov/svyatyje/trubachev_kanonizatsiya_svyatyh_06-all.shtml)

册封圣徒的数量。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封圣史由此也迎来了主教公会时期。

这一时期，圣徒的册封程序变得更为复杂和程式化。所有封圣问题，无论是全教会的，还是地方的，都由主教公会全权决定，而且主教公会的决议必须经由沙皇批准。关于这一过程的具体经过，俄罗斯著名教会法研究者叶甫盖尼·捷姆尼科夫（Евгений Темниковский）曾这样描述：“已经查明圣徒册封依据的主教公会，向沙皇提交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主教公会会对封圣事宜进行详细的阐述，并表明自己对该问题的意见。报告最终经由沙皇的决议予以通过。有时在册封决议通过后，教会还会确定一个特别的日子，来举行庆祝活动和被册封者干尸的开启仪式……而且由主教公会所颁布的册封法令只是在庆祝活动举行之后才开始生效<sup>①</sup>。”

主教公会并没有提出新的圣徒册封标准，全教会与地方圣徒的封圣程序，只是随着教会管理机构的改革而发生变化。其中最为实质性的内容——册封的依据并没有发生变化，是否能够显灵依旧是进行册封的必要条件<sup>②</sup>。然而，在国家的严格监督和压制的大背景下，俄罗斯东正教会封圣活动的积极性开始减弱，所册封的全教会圣徒的数量急剧减少，而地方圣徒的册封和崇拜活动则曾一度停止<sup>③</sup>。此外，取消已册封圣徒名号的做法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18世纪，包括佩列亚斯拉夫的圣科尔尼利（Корнилий Переяславский）、特维尔的圣萨瓦季（Савватий Тверской）、圣愚西蒙（Юродивый Симон）等在内的八位地方圣徒，被取消了圣徒的名号，到19世纪教会才恢复对他们的崇拜。教会的这些做法对

---

① Темниковский Е. К вопросу о канонизации святых. Ярославль, 1903. С.4.转引自 Цыпин Владислав протоиерей. Глава 48. Канонизация и почитание святых// Церковное право <http://www.klikovo.ru/db/msg/4203>

② 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在马卡里宗教会议召开之后到主教公会成立的历史时期里，由于所册封圣徒的类型的特点，教会在进行册封时，更看重被封候选人在教会面前所立下的功绩以及其个人的修行功绩，而对其是否具备显灵能力并不特别强调。但这种情况只存在于个别圣徒，尤其是在主教圣徒的册封实践中。

③ 地方圣徒册封和崇拜活动的终止有着多方面的原因：（1）整个18世纪，俄罗斯沙皇政府对修道院基本上采取了压制的政策。这使得中、小修道院被大规模关闭，而人们对其创建者的纪念和崇拜活动也随之逐渐停止和被忘却；（2）地方圣徒崇拜活动的终止还与官方的错误认识有关。官方认为，在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内，不应该存在任何“地方性”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是共有的；（3）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与新教当时在俄罗斯帝国的迅速传播有关。

广大东正教徒宗教意识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作为回应，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崇拜未经教会正式册封的“圣徒”及其干尸，也就是所谓的“民间封圣”（Народная канонизация）。然而在世俗国家政权看来，这是纯粹的愚昧和迷信，与国家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对其进行严厉的打击和迫害，其中最为严重的迫害发生在 1837—1840 年间<sup>①</sup>。

经历了 18-19 世纪的册封危机，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册封实践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统治时期逐渐得到了复兴，新册封的圣徒数量大大增加。这其中既有政治、文化等外因的影响，也有尼古拉二世个人虔诚笃信品质这一内因的作用。首先，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沙皇政府已经感觉到了来自社会下层民众的起义威胁。因此，统治地位岌岌可危的尼古拉二世，希望借助宗教手段来巩固其专制统治在广大民众眼中的合法性，复兴彼得改革前的东正教会与国家之间的联盟。册封新的圣徒、获取干尸和举行大规模的十字架游行，都是该政治计划的一部分。其次，20 世纪初，伴随着民众生活、传统俄罗斯风俗以及古老的宗教信仰方式的“新发现”，俄罗斯社会经历着文化高涨期。与此同时，人们的爱国热情，尤其是在宗教领域的爱国热情也空前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圣徒好像又重新回归到了已经相当世俗化的社会中，成为东正教罗斯和传统宗教笃信的概括性形象<sup>②</sup>。最后，尼古拉二世夫妇本身的宗教虔诚品质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些新圣徒的册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尼古拉二世个人宗教热情膨胀的结果。

这一时期，在尼古拉二世的积极参与和干涉下，主教公会相继确立或者恢复了对契尔尼戈夫的圣费奥多西大主教（Феодосий Черниговский）、萨罗夫的谢拉菲姆（Серафим Саровский）、托波里斯克的约安都主教（Иоанн Табольский）<sup>③</sup>等七位圣徒的崇拜。此外，如同先前一样，有几位地方圣徒被提升为全教会圣徒。如波恰耶夫的圣约夫（Иов Почаевский）、梅登的圣

---

① Лавров А.С. Колдовство и религия в России. 1700-1740 гг. М.: Изд-во. Древлехранилище, 2000. С.211-215.

② Семенов-Басин И.В. Канонизация святых в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эволюции советской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17-2000 гг. Автореф. дисс...канд.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2002. <http://www.dslib.net/teorja-kultury/kanonizacija-svjatuh-v-russkoj-pravoslavnoj-cerkvi-v-kontekste-jevoljucii-sovetskoj-i.html>

③ 托波里斯克的约安都主教，是主教公会时期被册封的最后一位圣徒。

吉洪（Тихон Медынский）等等。除了册封新圣徒外，在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就已恢复的地方圣徒崇拜，在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897 年，主教公会下达命令，恢复了对尤里耶夫的高级司祭伊西多尔（Исидор Юрьевский），以及与其一起殉难的 72 位教徒的崇拜。此外，教会还通过其他间接的形式恢复了对一些地方圣徒的崇拜。例如，在莫斯科主教公会印刷厂出版的俄语版《圣徒行传》（1903-1916）中，将维索茨基的阿法纳西（Афанасий Высоцкий）、普斯科夫的隐居者约安（Иоанн Псковский）等先前已经停止对其进行崇拜的几位圣徒的行传纳入了其中<sup>①</sup>。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古老的圣徒崇拜传统更为忠诚和热心的旧礼仪派，对于这一时期许多地方圣徒崇拜的恢复，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905 年，在尼古拉二世宣布信仰自由后，旧礼仪派便开始在其所创办的期刊上定期发表关于俄罗斯古代圣徒、未册封的苦修者，以及那些曾为旧信仰而殉难献身的人的崇拜问题的文章。

1903 年由尼古拉二世亲自发起的对萨罗夫的谢拉菲姆（Серафим Саровский）长老的册封，可以说是将这一时期教会的封圣活动推向了高潮。1903 年 1 月 27 日，俄罗斯东正教会将萨罗夫的谢拉菲姆长老册封为全教会圣徒<sup>②</sup>。尼古拉二世本人、一些大公和高级神职人员，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徒都参加了长老的册封仪式。“有 15 万朝圣者从俄罗斯四面八方来到萨罗夫”<sup>③</sup>。而根据 1903 年 7 月教会公报的报道，从西伯利亚、高加索等俄罗斯各地来到萨罗夫荒野进行朝拜的朝圣者的数量，每天都在激增<sup>④</sup>。这在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发展历史上尚不多见。对谢拉菲姆长老的崇拜，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首先是因为谢拉菲姆长老凭借其自身的苦修功绩而在

---

① Игумен Андроник Трубачев. Канонизация святых в 1894-1917 гг.// Канонизация святых в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http://azbyka.ru/tserkov/svyaty/trubachev\\_kanonizatsiya\\_svyatyh\\_07-all.shtml](http://azbyka.ru/tserkov/svyaty/trubachev_kanonizatsiya_svyatyh_07-all.shtml)

② Деяние Святейшего Синода 29 января 1903 г. во имя Отца и Сына и Святого Духа. <http://www.pravoslavie.ru/archiv/serafim-deyanie.htm>

③ Фирсов С. Л. Император Николай II как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государь. [http://pravmisl.r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56](http://pravmisl.r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56)

④ Поселянин Е.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изображении преп. Серафима Саровского// Церковные ведомости. 1903. № 26. Разные вести и заметки// Пастырский собеседник. 1903. № 22. С.234.转引自 Фриз Г. Церковь, религия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на закате старой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91. No.2. С.10.

广大教徒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但其中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沙皇尼古拉二世个人在整个册封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尼古拉二世曾认为，将谢拉菲姆长老册封为圣徒，是其生命中最为闪耀和最为令人动容的时刻之一<sup>①</sup>。

### 第五阶段：苏联时期（1917-1987年）

1917-1918年召开的俄罗斯地方主教会议是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事件。它开启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封圣史的现代阶段。这次地方主教会议的召开，恰逢沙俄帝国的覆灭和社会的革命性变迁。1917年3月2日，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俄罗斯东正教会也随之失去了靠山和最高领导。此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为唯一的合法政权。临时政府的活动，使得主教们相信政府会同教会建立可靠的联盟。因此，俄罗斯东正教会积极支持和拥护临时政府，而对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和合法性进行严厉的批评和谴责<sup>②</sup>。然而，十月革命很快就爆发了，布尔什维克将临时政府推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与此同时，英美日等于1918年3月展开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持续长达三年之久的苏俄国内战争也随之开始。这些事件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地位和命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布尔什维克持敌对态度，但当时尚未掌权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阻止这次会议的举行。1917年8月15日，俄罗斯东正教会地方主教会议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升天教堂正式召开。此次会议一共包含三个会期。到1918年9月7日，由于形势所迫，被迫提前终止

---

① ЦГАОР СССР. ф.601. оп.1. д.246. л.44-45. См.: ЦГИА СССР. ф.797. оп.74. отд.3. с.4. д.2. л.4; Volkonskii V. M., "Prince. The Canonization of Saint Seraphim of Sarov", Hoover Archives. Collection of V. M. Volkonskii, 1903.转引自 Фирсов С.Л. Император Николай II как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государь. [http://pravmisl.r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56](http://pravmisl.r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56)

② 1917年3月6日，主教公会发表致教徒群众书，号召他们支持新政权。第二天，下令所属神职人员为临时政府祈祷。接着建立了政教之间的互利联盟。临时政府捍卫了教会和国家相互密切联系的思想，答应东正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享有特权的地位，批准召开地方主教会议，并资助会议的召开。而俄罗斯东正教会则全面拥护和支持临时政府的政策。详见乐峰主编：《俄国宗教史》（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24页。

会期，前后历时 13 个月<sup>①</sup>。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法律规范文件来安排新时期条件下教会的生活，确定了教会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这次会议所作出的最为重要的决议是，决定于 1917 年 10 月 28 日取消主教公会，恢复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制，任命吉洪为新的牧首。此外，会议对地方圣徒的册封程序以及新殉难者崇拜等问题也进行了讨论：阿斯特拉罕的约瑟夫（Иосиф Астраханский）都主教和伊尔库茨克的索夫罗尼（Сафроний Иркутский）主教，被册封为全教会圣徒。会议还决定重新恢复庆祝俄罗斯所有圣徒的纪念日（День всех святых）<sup>②</sup>。

然而，布尔什维克在掌权后，由于面临着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其对于任何可能威胁到苏维埃政权的对象都抱有高度的警惕。先前曾对其革命持敌对态度的俄罗斯东正教会自然也在其中。此外，新的苏联精英还将培养新无产阶级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意识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所有与“旧世界”和“旧生活”有关的一切价值观和象征都应该被边缘化，甚至是消灭。而作为旧俄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东正教会因此便也成为最先被边缘化和消灭的对象。于是早在 1917 年末、1918 年初的冬天，布尔什维克就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来破坏和动摇教会存在的法律和经济基础。在这些法令中，1918 年 1 月 23 日苏维埃政权所颁布的《关于信仰自由、教会和宗教团体》的法令（Декрет о свободе совести, церковных 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бществах）最为重要<sup>③</sup>。以该法令为基础，苏维埃政权开始了积极的反宗教宣传，并于 1918 年秋发起了大规模的干尸检验运动（Кампания по вскрытию мощей）<sup>④</sup>。此次干尸检验运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揭发东正教会的“骗局”，向广大东正教徒

---

① Михаил Шкаровский. Влияние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оместного Собора 1917-1918 гг. в советскую эпоху. <http://www.krotov.info/history/20/1910/1917shkarovsk.htm>

② 该节日是在五旬节之后的第二个星期日，是在 16 世纪马卡里担任俄罗斯教会都主教时期出现的，后由于尼康改革而被终止。

③ 该法令更为著名的名称是《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

④ Бардилова Ю.П. Кампания по вскрытию святых мощей и закрытие монастырей на Европейском Севере России в 1918-1929 годах//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2009. No.3. С.135.

证明圣徒的干尸并不是如其所宣扬的那样，是完整不腐的<sup>①</sup>，而最终目的则是为了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土上终止圣徒崇拜以及任何一种形式的宗教崇拜实践。

从 1918 年到 1929 年，在俄罗斯的十四个省份，先后一共有 63 个干尸匣被强行开封<sup>②</sup>。为了扩大宣传效果和影响力，官方通常还会对干尸的检验场面进行拍照和录像，并在报纸上对干尸检验的结果进行报道。毫无疑问，苏维埃政权的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教徒们的抵制。为了避免圣徒的干尸被官方夺去，他们有时会直接将圣徒的干尸从教会取走，并偷偷地藏起来。例如，1920 年春，由于担心圣徒拉多涅日的谢尔吉的干尸被苏维埃官方从已经关闭的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运走，东正教神甫、俄罗斯宗教哲学思想家帕维尔·弗洛连斯基（Павел Флоренский, 1882-1937）与尤里·奥尔苏菲耶夫（Юрий Олсуфьев, 1878-1938）伯爵则一起把圣徒的颅骨从其棺木中偷了出来，取而代之的是将一个假的头颅置于其中<sup>③</sup>。作为对教徒们这些行为的反应，然苏维埃政权对那些被控有“伪造干尸”罪名的神职人员和教徒展开了一系列的审判<sup>④</sup>。而这场轰轰烈烈的干尸检验运动，最终却遭遇了失败的命运，没有实现其动摇旧的社会信仰根基的目的。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是其设计者没有考虑到神学家与普通教徒对干尸的品质所关注的重点是不同的。对于神学家而言，干尸的完整与不腐是最为重要的；而在普通教

---

① 俄罗斯东正教徒对圣徒的崇拜主要就是围绕其干尸（мощи）进行的。作为崇拜之物，干尸被认为具有神力，能够创造奇迹，提供庇佑和保护。俄罗斯东正教会宣称，圣徒完整不腐的干尸是上帝的特殊恩惠。然而，在数个世纪的发展历史中，俄罗斯东正教会却始终没有对怎样的干尸才算是不腐的和完整的进行过明确的定义，只是宣称说当他们看到不腐的干尸时是能够认出来的。在教会作家的作品和布道文中，干尸不腐还是俄罗斯东正教区别于其他教会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东正教作为一个正确的基督教会隐喻。Archpriest Petr Smirnov, *Chudesa v prezhnee i nashe vremia*, 2nd ed. Moscow, 1895, pp.27-28. 转引自 Robert H. Greene, *Bodies Like Bright Stars: Saints and Relics in Orthodox Russia*,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3.

② Вскрытие святых мощей и изъятие церковных ценностей. Лекции по истории Тамбовской епархии. [http://azbyka.ru/parkhomenko/knizhnaya\\_polka/rumiancev/rumiancev\\_istoriya\\_russkayapravoslavnaya\\_cerkov\\_1-all.shtml](http://azbyka.ru/parkhomenko/knizhnaya_polka/rumiancev/rumiancev_istoriya_russkayapravoslavnaya_cerkov_1-all.shtml)

③ Крылов А.Н. Судьба Главы Преподобного Сергия. <http://www.sthiproza.ru/content/view/16663/>

④ Семененко-Басин И.В. Символ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и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религ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08(4):127.

徒看来，干尸是否能够显灵，是否能够在其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才是最重要的。而布尔什维克却只是简单地认为，干尸只是教会“愚弄和欺骗劳动群众”的一种手段。因此这些“群众”自己需要“亲眼看看和亲手摸摸干尸”，只要他们看到干尸并不是真的如官方教会所宣称的那样是不腐和完整的，那么其对干尸的崇拜便会自然而然地消失。新政府虽然能够将宗教供给关闭，却无法消灭广大教徒的宗教需求。尽管采用了各种办法，布尔什维克最终不得不承认，圣徒及其干尸崇拜在俄罗斯东正教徒的心目中早已根深蒂固，已经渗透到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sup>①</sup>。尽管如此，在苏维埃政权实行政教分离，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的背景下，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里，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圣徒崇拜传统，其中既包括对历史上的圣徒，还包括对因苏维埃政权迫害而受难，但是尚未经过教会正式册封的“新受难者”的崇拜，逐渐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并被排挤到苏联人表层心理意识的边缘。传统宗教文化只是孤立地存在于相对不大的群体中的情况成为了俄罗斯教会新社会经验的典型特征<sup>②</sup>。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圣徒及其干尸崇拜都仍旧是被官方所明令禁止的。就是在二战结束后的政教关系解冻时期，教会都无法谈论册封新圣徒的事宜。斯大林去世以后，教会开始寻找和利用各种方式来开展新的册封活动。第一种方式是将其他地方教会所册封的圣徒的名字，写入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教历中，供广大教徒进行崇拜。如 1962 年 7 月 19 日，主教公会作出决议，将先前被君士坦丁堡牧首和希腊教会册封为殉难者的俄罗斯的约安(Иоанн Русский)，列为自己的圣徒进行崇拜<sup>③</sup>。1970 年 12 月 1 日，俄罗斯东正教会又将 1969 年被美国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公会册封为圣徒的阿拉斯加的圣盖尔曼(Герман Аляскинский)的名字，写入了自己的教历。

第二种方式也是利用外部因素。20 世纪 70 年代，俄罗斯东正教会利用与苏联当局关系缓和的时机，同意了日本和美国东正教会所提出的册封要

---

① Robert H. Greene, *Bodies Like Bright Stars: Saints and Relics in Orthodox Russia*,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3.

② Семенов-Басин И.В. Персонификация святости в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культуры 20 века. Докторская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Москва. 2011. С.218.

③ 约安曾是彼得大帝的一名士兵，1711 年在远征普鲁士时被俘虏，后被卖为奴隶，因不愿意放弃东正教信仰接受伊斯兰教而惨遭土耳其人的杀害。

求。分别于1970年4月1日和1977年10月6日，将积极在日本进行传教的启蒙者尼古拉·卡萨特金（Николай Касаткин），与在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阿留申群岛、阿拉斯加等地进行传教的莫斯科都主教因诺肯季·韦尼阿米诺夫（Иннокентий Вениаминов）册封为圣徒。尼古拉·卡萨特金的册封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苏联时期所开展的第一起册封事件。

第三种方式是所谓的“寂静地”封圣。为了不引起苏联当局的敏感，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册封新圣徒时不得不玩起了文字游戏。1978年2月21日，主教公会作出决议，“确立和祝福在莫斯科牧首区所有教会里使用对哈尔科夫的梅列季（Мелетий Харьковский）的祈祷词和赞美歌”<sup>①</sup>。虽然该决议中并没有提到“封圣”这一术语，但是其所表达的却是封圣的含义。尽管这种方式较为隐蔽，有时还是会引起苏联当局的注意。于是他们又创造出了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将某一候选人册封为地方圣徒，也就是某一单独教区内的圣徒。由于这种册封方式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并不是很大，苏联当局便也就眼开眼闭，装作没看见。

这一时期，在苏维埃政权的高压下，俄罗斯东正教会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被剥夺了册封新圣徒的权利，但是她却能够挖掘一切机会，利用上述三种“变相的”方式来开展新圣徒的册封活动，以此来向社会证明自己的存在。

如果说俄罗斯东正教会60-70年代的圣徒册封活动表明，东正教会本身及其所具有的宗教传统实践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尽管已经变得十分微弱，但仍旧是苏联社会文化的一种现实的话，那么1988年基辅罗斯受洗一千周年以后，俄罗斯东正教会所进行一系列册封活动则可以说是对俄罗斯基督教生活存在的有利证明。此外，在代际更替，具有旧俄历史记忆和文化思维的最后一代人也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的背景下，册封圣徒便成为俄罗斯东正教会重新在社会上获得影响力以及更新人们有关民族圣徒的记忆的重要手段。也正是从那时起，东正教禁欲苦修和最高道德理想的载体——圣徒成为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名片，成为其与国家和社会进行沟通的工具。

---

①Святитель Мелетий (Леонтович), архиепископ Харьковский.  
[http:// days.pravoslavie.ru/Life/life6737.htm](http://days.pravoslavie.ru/Life/life6737.htm)

## 第六阶段：当代时期(1988年罗斯受洗一千周年至今)

虽然俄罗斯东正教封圣史的当代阶段，是以1988年罗斯受洗一千周年庆祝活动框架下的册封事件为标志的，然而实际上，这一阶段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可以说就已经开始了。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提出了“新思维”和“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主张在各个领域进行反思，实行公开而多元化的政治开放政策。宗教领域也不例外，要对苏联过去实行的宗教政策重新进行审查和评价，实行宽容、开放和民主化的宗教政策<sup>①</sup>。长期受到压制和限制的东正教会因此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86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会上宣布：国家将致力于改善同教会的关系，使教会的合法地位得到改善。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接见以皮缅（Пимен）牧首为代表的六位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时表示，政府支持基辅罗斯受洗一千周年的庆祝活动；赞扬东正教在历史上起过的积极作用，称东正教是俄罗斯发展的动力；改革、公开性、民主性对一切都适用，包括教徒在内<sup>②</sup>。1988年，俄罗斯东正教会隆重地庆祝了基辅罗斯受洗1000周年。对于教会人士和广大教徒而言，这是个巨大的胜利，他们向信仰自由更进了一步。而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将该事件作为向西方宣传自己政治活动的手段。苏联中央电台对很多庆祝活动和仪式都进行了转播。

在罗斯受洗1000周年纪念活动的框架下，1988年6月召开的地方主教会议，将象征俄罗斯东正教主要神圣类型的九位历史人物册封为全教会圣徒。他们分别是顿河王德米特里（Дмитрий Донской）、圣像画家安德烈·卢布廖夫（Андрей Рублёв）、修士—思想家马克西姆·格雷克（Максим Грек）、都主教—作家莫斯科的 Мака里（Митрополит Макарий），东正教长老—思想家帕伊西·韦利奇科夫斯基（Паисий Величковский）、圣彼得堡的圣愚克谢尼娅（Ксения 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神学家伊格那季·布良恰尼诺夫（Игнатий Брянчанинов）和隐修士、宗教作家费奥凡·扎特沃尔尼克（Феофан Затворник）。此外，该次会议还认为，有必要在会议结束后继续研究那些深

<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87年，俄文版。转引自乐峰主编《俄国宗教史》（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73页。

<sup>②</sup> 席博：“试析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宗教政策”，《西伯利亚研究》，2010年第4期，第82页。

受百姓崇拜的苦修者的册封问题……<sup>①</sup>。如此规模的册封活动在近百年来俄罗斯东正教会史上尚属首例，它掀开了新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圣徒册封历史的新篇章<sup>②</sup>。苏联媒体对此次东正教会的册封行为进行了广泛的报道，而这在苏联历史上尚属首次<sup>③</sup>。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圣徒的册封及其崇拜，乃至个人的宗教信仰——这些曾经令人讳莫如深的话题已经变成了苏联社会文化生活的合法现实。

尽管国家放松了对宗教的严格控制，1988 年的政治形势仍旧不允许俄罗斯东正教会对 20 世纪初遭受了苏维埃政权迫害的那些神职人员和教徒进行册封<sup>④</sup>。不过形势很快就又发生了变化。1989 年 4 月 11 日，在 1981 年所组建的罗斯受洗 1000 周年活动准备委员会“历史—封圣工作小组”<sup>⑤</sup>的基础上，成立了以都主教尤维纳利（Митрополит Ювеналий）为首的主教公会册封委员会<sup>⑥</sup>。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与高级神职人员、教士和平信徒进行合作，协调研究和准备候选人册封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册封委员会本身并不参与新的册封事宜的发起，但是拥有否决权。也是在这一年，俄罗斯东正教会高级主教会议将 1925 年去世的吉洪牧首（Тихон, 1865–1925）<sup>⑦</sup>册封为圣徒。这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苏联时期所册封的第一位新殉难者。俄罗斯东正教会也以此迈出了册封 20 世纪“俄罗斯新殉难者和忏悔者”

---

① Митрополит Крутицкий и Коломенский Ювеналий (Поярков). Канонизация святых в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Доклад на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лужение Церкв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http://seminaria.bel.ru/pages/mo/2003/mo10\\_st\\_2.htm](http://seminaria.bel.ru/pages/mo/2003/mo10_st_2.htm)

② Митрополит Крутицкий и Коломенский Ювеналий (Поярков). Канонизация святых в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Доклад на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лужение Церкв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③ Семенов-Басин И.В. Персонификация святости в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культуре 20 века. Докторская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Москва. 2011.С.245.

④ 俄罗斯东正教会之所以没有马上广泛展开新殉难者的册封活动，主要是因为基辅受洗 1000 周年之际，教会领导人认为表达教会对国家的忠心更为重要，而不是对其进行批评，提及其对教会所进行过的迫害。

⑤ 该封圣小组负责 1988 年所册封的 9 位圣徒的册封准备工作。

⑥ В апреле 1989 г. Синод РПЦ МП постановил в послесоборный период продолжать работу по изучению дальнейших канонизаций для прославления других почитаемых в народе подвижников веры и благочестия, попечение о чём имеет Священному Синоду

⑦ 吉洪牧首于 1925 年 3 月 25 日去世，享年 60 岁。1981 年 11 月 1 日，俄罗斯东正教海外教会率先将其册封为俄罗斯新殉难者和忏悔者。

(Новомученники и Исповедники Российские) 的第一步<sup>①</sup>。俄罗斯东正教会将 1917 年十月革命以后因坚持基督教信仰而被苏维埃当局迫害或是被镇压的主教、教士和平信徒集体称为“俄罗斯新殉难者和忏悔者”。苏维埃当局对教会的迫害开始于 1917 年秋，1918 年进一步扩大化，1937-1938 年达到了顶峰。根据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统计数据，1937 年，有 136,900 名神职人员或是与教会有关的人士被捕，其中有 85,300 人最终被枪决。1938 年，被捕人数为 28,300 人，其中有 21,500 人最终被枪决<sup>②</sup>。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苏联的倾塌，俄罗斯社会上出现了价值真空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俄罗斯人便转向了曾被共产主义体制所压制的传统宗教制度，尤其是东正教。俄罗斯社会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宗教信仰热潮。而为了重新恢复和提高自己对社会的影响力，使用东正教象征逐渐取代苏联时代的英雄形象，俄罗斯东正教会将 20 世纪“俄罗斯新殉难者和忏悔者”的册封作为自己与社会和国家进行交流与互动的有效工具之一<sup>③</sup>。这一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公会册封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开展 80 年代末刚刚开始“俄罗斯新殉难者和忏悔者”的册封工作。通过对为教会服务和教徒行为等相关材料进行仔细研究，主教公会册封委员会最终决定：“只有那些纯洁地做出受难和忏悔功绩，也就是没有诬陷自己和他人犯有虚构罪行的人，才有资格被册封为俄罗斯新殉难者和忏悔者<sup>④</sup>。1992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5 日，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会议在莫斯科丹尼洛夫修道院（Московский данилов монастырь）召开。根据主教公会册封委员会主席克鲁季茨和科洛缅克的都主教尤维纳利（波雅尔科夫）的报告，会上将俄罗斯圣徒拉多涅日的谢尔吉的父母——基里尔和玛利亚（Кирилл и Мария）册封为圣苦行修士，将包括基辅的弗拉基米尔都主教（Владимир Киевский）、彼得格勒的韦尼阿

---

① Архиерейский собор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9-11 октября 1989 г. <http://www.pravenc.ru/text/76506.html>

② Игумен Дамаскин (Орловский). Гонения на Русскую Православную Церковь в 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http://klise.ru/2011-01-14-07-41-40/39/967-2013-03-14-19-45-08.html>

③ 因为，册封圣徒不仅可以使已经存在的民间崇拜合法化，使其在一个主教区的所有堂区或是整个地方教会都得到传播。俄罗斯东正教会也可以通过该种方式向那些不愿意接受教会神职人员其他说辞方式的人传达一定的信息。

④ Случай повторной канонизации святых РПЦ и РПЦЗ. Справка. 俄新网 2007 年 5 月 17 日。 <http://ria.ru/spravka/20070517/65641878.html>

明（Вениамин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谢尔吉·舍伊恩（Сергий Шеин）等在内的七位候选人册封为殉难者。会议决定将每年的1月25日定为20世纪“俄罗斯新殉难者和忏悔者”的纪念日；此外，为了将所有东正教徒团结起来，此次会议还决定在教会所有主教区，成立地方圣徒册封委员会来搜集和研究该主教区范围内的笃信苦修者，尤其是20世纪殉难者和忏悔者的封圣材料<sup>①</sup>。

与此同时，根据上述高级主教会议的决议和1991年3月25日主教公会的决议<sup>②</sup>，各地方主教区的册封委员会开始陆续建立起来，这使得制定统一的地方圣徒册封实践标准成为主教公会册封委员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在1993年10月1日召开的会议上，主教公会听取了册封委员会主席尤维纳利（波雅尔科夫）“关于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区册封地方圣徒的程序问题”（“К вопросу о порядке канонизации местночтимых святых в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на епархи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的报告。根据该报告，此次会议最终作出如下决议：“主教区册封委员会负责搜集有关苦修者生平、功绩、所创造奇迹以及在民间所受崇拜的信息，为其撰写行传和画圣像。委员会还负责为册封候选人撰写祈祷文，并将其提交给主教公会祈祷文委员会进行审查。在主教公会委员会对地方主教区所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后，在有可靠依据的情况下，至圣的牧首祝福将候选人册封为该主教区的地方圣徒。此后，主教区高级神职人员根据教会的既定程序来完成具体的册封仪式。地方圣徒的名字不写入全教会教历中，而对他的祈祷词也不会印刷在全教会祈祷书中，只是在地方独立进行出版……如果地方圣徒的崇拜已经超出该主教区的范围，那么将其册封为全教会圣徒的问题在主教公会册封委员会进行相关研究后，将由至圣的牧首或是主教公会来决议……上述这些原则应该成为主教区册封委员会在解决地方圣徒册封问题时所依据的主要原则。”<sup>③</sup>此后，在教会大牧首的祝福下，地

---

①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священного Архиерейского Собора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2-5 февраля 2013 года).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2777929.html>

② 1991年3月25日主教公会决定，在各主教区开展20世纪殉难者和忏悔者生平与功绩材料的搜集工作。

③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вященного Синода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от 1-2 октября 1993 года. <http://commission.meglance.ru/docs/postanovlenie-svyashchennogo-sinoda-russkoy-pravoslavnoy-cerkvi-ot-1-2-oktyabrya-1993-goda.html>

方主教区开展了一系列地方圣徒的册封活动。

这一时期，主教公会圣徒册封委员会还制定了“与 20 世纪教会分裂相关的俄罗斯教会新殉难者封圣问题的教规—历史标准”（《Историко-канонические критерии в вопросе о канонизации новомучеников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в связи с церковными разделениями XX века》）<sup>①</sup>。1995 年 12 月，主教公会批准了这些标准。该文件此后成为主教公会和地方圣徒册封委员会开展新殉难者册封工作的指导性文件。2000 年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会议册封 20 世纪“俄罗斯新殉难者和忏悔者”时，所依据的也正是这一文件。在 2000 年 8 月 13-16 日召开的高级主教会议上，包括高级主教、神甫、修士、平信徒在内，持有各种不同政治立场和观点的 1,154 位候选人被册封为全教会圣徒。这 1,154 人中，有 1,097 人是 20 世纪初俄罗斯的新殉难者和忏悔者，其余 57 人则是生活在其他历史时代的苦行者<sup>②</sup>。俄罗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也在此次受封的行列之中。从整个俄罗斯东正教会封圣史来看，此次会议的册封行动具有重要的意义。教会人士认为，这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封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次所册封的新俄罗斯圣徒的总数，至少是俄罗斯东正教会过去整个发展历史中所册封圣徒总数的三倍。俄罗斯新殉难者和忏悔者的集体册封，见证了圣灵在基督教会中的影响是无休止的，它表明生活在现世的东正教徒与其神圣的先辈们在基督那里实现了统一<sup>③</sup>。这次宗教会议之后，主教公会册封委员会一共又召开了 12 次册封会议。根据会议的结果，另有 396 位俄罗斯新殉难者和忏悔者经由大牧首和主教公会的祝福被册封为圣徒<sup>④</sup>。

在此之后，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公会又陆续颁布了几次封圣决议。但是

---

① Доклад Митрополита Крутицкого и Коломенского Ювенали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инодаль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канонизации святых на архиерейском юбилейном соборе. [http://www.st-nikolas.orthodoxy.ru/newmartyres/sobor\\_05.html](http://www.st-nikolas.orthodoxy.ru/newmartyres/sobor_05.html)

② Митрополит Крутицкий и Коломенский Ювеналий (Полярков). О Синодальной комисс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по канонизации святых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00 г. №.9-10. [http://www.intercon.ru/~vle/public/istor\\_vest/2000/9-10/1\\_23.htm](http://www.intercon.ru/~vle/public/istor_vest/2000/9-10/1_23.htm)

③ Митрополит Крутицкий и Коломенский Ювеналий (Полярков). Канонизация святых в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Доклад на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лужение Церкв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http://seminaria.bel.ru/pages/mo/2003/mo10\\_st\\_2.htm](http://seminaria.bel.ru/pages/mo/2003/mo10_st_2.htm)

④ Там же.

在后苏联时期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复兴的条件下，在大规模册封新圣徒的同时，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圣徒册封问题上所惯有的谨慎性却在逐渐减少，因此便也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些争议或是产生错误。例如，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的册封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论。教会在 2000 年 8 月 14 日关于册封沙皇一家的法令中说：“在俄罗斯最后一位东正教沙皇及其家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其力求在自己的生活中贯彻福音书训诫的真诚愿望。在沙皇一家以谦卑、顺从和忍耐来对待囚禁的苦难的态度里，在他们 1918 年 7 月 4 日的痛苦死亡中，可以战胜邪恶的基督教信仰之光得到了显现。这一信仰之光也曾照亮过 20 世纪数以万计的因基督教信仰而受迫害的东正教徒的生命与死亡。”<sup>①</sup> 俄罗斯社会对教会的这一册封行为褒贬不一。事实上，早在 90 年代中下半叶，在俄罗斯社会上，关于是否应该册封尼古拉二世一家为圣徒的问题就已经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而此次论战在 1996 年尼古拉二世加冕 100 周年之际则达到了高潮。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提出了各自的论据<sup>②</sup>。支持者普遍具有民族保守主义倾向，他们认为，将被杀害的尼古拉二世一家册封为圣徒将会把俄罗斯历史上被撕裂的链条重新连接起来，这一行为也将表明俄罗斯东正教会已经从共产主义的俘虏中解放了出来。与此同时，它也会促进俄罗斯人为自己的弑君行为和共产主义幻想而忏悔。此外，支持者们还把将沙皇的封圣看作是一种对当时不断涌向俄国社会的西方影响的对抗。而反对者则认为册封尼古拉二世为圣徒的行为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质，坚决反对将沙皇专制制度理想化和对其进行颂扬。以神学教义为根本依据，辅之以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的论据，反对者们指出，尼古拉二世夫妇所信奉的病态的神秘主义与东正教的精神守则是格格不入的；是尼古拉二世的政治无作为才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尼古拉二世一家是作为政治囚犯而非因为信仰才被布尔什维克所杀害的。从本质上讲，经过这场激烈的论战，尼古拉二世是否应该册封的问题早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问题。它揭示了相互对立的不同派别对待国家的不同态度，以及各方在苏联时期所获得的不同的社会经验。封圣的支持者通

---

① Император Николай Второй и его семья причислены к лику святых. 14.08.2000. <http://www.pravoslavie.ru/news/sobor/glav.htm>

② Собрание характерных суждений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Канонизация царской семьи: за и против // Церковь и время. 1998. № 4 (7):192 – 219.

常都曾经历过 1917 年革命和 1991 年苏联解体所带来的经济与道德崩溃。对于他们而言，俄罗斯帝国或是苏联所代表的国家是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价值，如果国家宣称自己为东正教王国则就更好了。而反对派当中的很多人对以东正教为国教的政教关系体制持否定态度。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错封的案例。在一些情况下，教会只是默默地将其纠正，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是对质疑者提出的问题置之不理，不予回应，而这也对教会的威望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根据研究者掌握的材料，一直说是在 1918 年被枪决的雅罗斯拉夫的神甫亚历山大·斯米尔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мирнов），其实早在 1915 年就已正常死亡<sup>①</sup>。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基涅什马的瓦西里（Василий Кинешемский）主教身上。2003 年，著名的教会历史学家帕维尔·普罗岑科（Павел Проценко）指出，正是根据瓦西里的口供，雅罗斯拉夫州乌格利奇区科托沃乡村教堂的女教师和合唱指挥者伊赖达·吉霍娃（Ираида Титова，1896–1967）<sup>②</sup>被苏联当局逮捕。关于这一错封问题，帕维尔·普罗岑科说道：“如果伪圣徒的‘圣像’出现在社会上，那么社会将陷入绝境。而最让人感到走投无路的则是精神上的绝境。只有开诚布公、同心同德，才能够避免这一点。而如果犯了错误的话，那就应该坦率地承认并将其更正”<sup>③</sup>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层对这一评论并没有作出相应的回应。然而在 2012 年，教会却将包括亚历山大·斯米尔诺夫和瓦西里主教在内的 36 名“圣徒”的名字，从东正教教历中删除。此外，2012 年 6 月，主教公会册封委员会秘书大马士革（阿尔洛夫斯基）（Дамаскин Орловский）院长将瓦西里主教的干尸从其受到广泛崇拜的伊凡诺夫州运走<sup>④</sup>。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出身于伊凡诺夫州、在索洛韦茨基群岛上去世的神

---

① Новомученики, исповедники, за Христа пострадавшие в годы гонений на Русскую Православную Церковь в XXв. база данных авторитетного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Свято-Тихонов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http://213.171.53.29/bin/code.exe/frames/m/ind\\_oem.html?charset=ans?note](http://213.171.53.29/bin/code.exe/frames/m/ind_oem.html?charset=ans?note)

② 俄罗斯东正教主教公会于 2001 年将其册封为圣徒。

③ Проценко П.Г. Посмертная судьба новых мучеников//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6.04.2003. [http://religion.ng.ru/history/2003-04-16/6\\_destiny.html](http://religion.ng.ru/history/2003-04-16/6_destiny.html)

④ Мощи святителя Василия Кинешемского увезли из Ивановской митрополии «в то место, которое будет для них определено». Из Twitter игумена Виталия (Уткина). [www.1000inf.ru/news.aspx?id=11610](http://www.1000inf.ru/news.aspx?id=11610)

甫的干尸。与此同时，官方也没有对这一做法作出明确的解释。只是说，干尸将被运往莫斯科及全罗斯牧首基里尔所指定的地点<sup>①</sup>。

此外，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册封新圣徒满满热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民众对新受难者的冷漠态度。尽管有一些新受难者已经受到教徒们的崇拜，如尼古拉二世获得了全俄罗斯范围内的崇拜，近年来市场上也出现了的大量新受难者传记，但是大多数新的受封者对于教徒而言仍旧是十分陌生的。关于这一点，俄罗斯东正教会册封委员会委员格奥尔吉·米特罗凡诺夫（Георгий Митрофанов）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曾讲道：“就连给予新受难者以简单的敬意，唉，都还没有成为我们教会生活的规范。”<sup>②</sup>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由于存在着上文中所讲到的错封、乱封的情况，以及近十几年来新册封圣徒的数量巨大，简直让人眼花缭乱，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奇迹问题。俄罗斯东正教圣徒崇拜现象的典型特点之一便是教徒对待圣徒态度的实用主义性。大多数教徒对某一圣徒进行崇拜，并不是将其看做是自己学习的崇高榜样，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创造奇迹，能够帮助其“解决”具体的生活问题。因此，圣彼得堡的克谢尼娅以及马特罗娜·尼科诺娃（Матрона Никонова）早在东正教会对其进行官方册封之前就已受到了教徒们的崇拜。而且马特罗娜也因其所创造的众多奇迹而成为近年来新册封新圣徒中最受欢迎的一个。

总的来说，从1988年基辅罗斯受洗1000周年至今，在苏联解体、当代俄罗斯宗教复兴的背景下，为了重新获得社会影响力，俄罗斯东正教会将圣徒作为自己的名片，不断册封新的民族圣徒，以此来向社会彰显其在俄罗斯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根基和获得俄罗斯人的认同。为此，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教会逐渐完成了规模浩大的20世纪“俄罗斯新殉难者和忏悔者”的集体册封工作。这使得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历史记忆中，不仅是充满危机和改革的年代，也是俄罗斯东正教圣徒重新获得自己在社会文化中的生

---

① Алексей Макаркин. Чудеса и политика: практика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канониз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http://www.intelros.ru/readroom/nz/n6-2012/17350-chudesa-i-politika-praktika-pravoslavnoy-kanonizacii-v-rossii.html>

② Интервью с протоиереем Георгием Митрофановым. Страна нераскаянных Каинов вряд ли может войти в Царство Небесное// Кифа. 2009. 30 мая. <http://gazetakifa.ru/content/view/2706>.

存之地的时代。尽管如此，俄罗斯东正教的这些努力并没有完全得到俄罗斯社会的认可。大多数新受封的圣徒对于俄罗斯教徒而言仍旧是陌生的，因此也就更谈不上他们在俄罗斯社会上的影响力了。

### 三、结语

纵观俄罗斯东正教会千余年来封圣的历史，可以看出，圣徒的册封和崇拜虽然是随着基督教一起从拜占庭引入的舶来品，却早已成为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在政教关系和谐的基辅罗斯时期，还是在其备受压制的主教公会和苏联时期，亦或是在宗教信仰自由化的 21 世纪，俄罗斯东正教会都在不断地册封新的地方圣徒或是全教会圣徒<sup>①</sup>。从这一意义上讲，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发展历史可以说是其“神圣性”的发展史。俄罗斯东正教会以不断册封新圣徒的方式来彰显其所具有的永恒的“神圣性”，提高自己在广大东正教徒心目中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东正教会面前的威望与影响力。与此同时，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东正教会封圣的历史也是来自拜占庭的基督教（东正教）在俄罗斯逐渐实现本土化的过程，是一个文化的传播和变异的过程。在罗斯受洗之初，罗斯人主要是崇拜随基督教而来的古代圣徒，而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俄罗斯东正教会不断册封新的本土圣徒。本土圣徒的形象因此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东正教的教历上，并成为广大俄罗斯东正教徒所崇拜的对象。

俄罗斯东正教会封圣史的不断发展可以说是教会与教徒共同推动的结果。正如法国学者皮埃尔·德·卢斯（Pierre De looz）曾对圣徒所做过的定义：一位圣徒就是一位“被构造”的人物，他的“神圣性取决于他人的看法……只有对于他人而言他才是圣徒。”<sup>②</sup>俄罗斯东正教圣徒与所有其他宗教圣徒一样都是教会精英与普通教徒之间进行协商、互动的产物。一方面，

---

① 虽然有时受时势和环境压力，不得不采取较为隐蔽的方式。

② Pierre De looz, "Toward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anonized sainthood i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Stephen Wilson, ed., *Saints and their Cults: Studies in Religious Sociology, Folklore and History* (Cambridge, 1983), 194, 196, 199 转引自: Robert H. Greene . *Bodies Like Bright Stars: Saints and Relics in Orthodox Russia*.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0, p.9.

对圣徒的崇拜是经过俄罗斯东正教官方教会正式批准，理论论证，并由宗教精英所积极推进的宗教信仰实践。另一方面，广大教徒们也在根据自己的宗教需求和生活需求，不断地对他们所崇拜的圣徒进行塑造，赋予其以各种品质和能力。

从表面上看，圣徒的册封与崇拜是单纯的宗教领域的问题，从提名圣徒候选人到最终作出册封的决议，都是由东正教高级神职人员或是专门的机构来完成的，而对圣徒的崇拜也是教会和广大教徒自己的事情。然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教会册封圣徒的实践不仅仅是教会内部的事务，它与世俗国家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教会圣徒册封与崇拜实践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由世俗政权所决定的。世俗政权的态度，决定着教会是否可以大张旗鼓地公开地开展册封活动，是否可以光明正大地进行圣徒崇拜。尤其是在苏联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圣徒册封与崇拜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正常进行，甚至一度停止。另一方面，很多时候，教会的册封行为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诉求，而新册封的圣徒也负有一定的政治使命。这一点在俄罗斯东正教会将鲍里斯与格列布王公册封为圣徒的古罗斯第一起册封事件中就已经表现出来，并且在俄罗斯东正教会此后的发展历史中不断地重演，如 1547、1549 年的马卡里宗教会议，和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尼古拉二世册封大量新圣徒，都带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目的。

尽管如此，俄罗斯东正教会这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册封行为并没有改变其进行圣徒册封以及广大东正教徒崇拜圣徒的初衷。从俄罗斯东正教会本身来看，册封圣徒是其对广大教徒进行教育和施加影响的一种重要方式。教会希望其所册封的圣徒能够成为教徒尘世行为的榜样。而对于广大东正教徒来说，对圣徒及其干尸的崇拜可以说是其宗教需求与宗教意识的直接体现。圣徒之所以为圣徒，并不在于其负有何种政治使命，而是因为他们圣洁的生活功绩和崇高的道德品质，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和尘世生活所追求的目标；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圣徒凭借自己的修行功绩获得了上帝的青睐，并因此而具有够治愈疾病、扶助羸弱、给饥者以饱食、赐庄稼以丰收和预测未来的神奇能力。关于这一点，格奥尔吉·费多托夫在其所著的《古罗斯圣徒》（《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一书中写道：“在俄罗斯东正教圣徒身上，我们所崇拜的不

只是罪恶的和神圣罗斯的庇护者。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寻找着自己心灵之路的启示……数个世纪以来，他们的理想在不断地滋润和哺育着人民的生活；整个罗斯用他们的圣火点燃了自己的明灯<sup>①</sup>。这一点，或许就是为什么在科技高度发达的 21 世纪，俄罗斯东正教的圣徒崇拜实践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俄罗斯东正教会仍旧继续书写着自己圣徒册封史的原因所在。

---

**【Abstract】** Worship for sain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practice. In addition to worshipping ancient saints, during the whole history of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fter the baptism in Kiev, there have been constantly new saints canonized. Overall, the history of canonization of saints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six stages. The first stage is from the baptism of Kievan Rus till before Makary religious meeting in 1547. Since Rus was separated into feudal states, the canonized saints by church were mainly locals. The second phase is between 1547 and 1549 during the Makary religious meeting, in which a lot of church saints were canonized, in addition to clearly defined specific procedures, as well as ways to commemorate saints. The third stage is from 1549 till the founding of Ecclesiastical Collegium in 1721. At this stage, there were great achievements of canonization for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showing a series of new features. The fourth stage is from 1721 to 1917. State repression of the church greatly reduced enthusiasm of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n canonization activities, accordingly resulting in drastically reduced canonized saints. It was only in the reign of Nicholas II, the church gradually restored its enthusiasm in canonizing saints. The fifth stage refers to the Soviet period from 1917 till 1987.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Soviet Union, canonization activities were stopped. Later, with the easing church-state relations,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began canonization through a variety of subtle ways. The sixth stage of canonization is the contemporary stage, namely from 1988 till now.

---

① Федотов Г.П. Введение// 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http://www.vehi.net/fedotov/svyatyae/00.html>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hurch mainly canonizes “new Russian martyrs and confessors” in the 20<sup>th</sup> century. There coexist both great success and certain problems.

**【Key Words】** Rus Orthodox Church, Saint Worship, Canonization of Saints, Baptism of Rus, Byzantine

**【Аннотация】** Поклонение святым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ой частью практики вероисповедания в русском православии. В дополнение к поклонению древним святым, после крещения Киева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к лику святых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ичислялись новые святые. В целом, историю канонизации святых в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можно разделить на шесть этапов: первый этап начался крещением Киевской Руси и продолжался до собора 1547 г. Вследствие того, что в тот момент Русь представляла собой сепаратистское феодаль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церковь к лику святых причисляла в основном местных святых. Второй этап приходится на период с 1547 г. по 1549 г., т.е. на период проведения соборов. На соборах по инициативе Макария было канонизировано множество святых в качестве святых всей церкви, а также были чётко определены конкретные процедуры канонизации святых в церкви и способы почитания святых. Третий этап —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соборов в 1549 г. по 1721 г., когда была основана Духовная коллегия. В этот период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по канонизации святых в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принесли множество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а также появился ряд новых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Четвертый период — период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Духовной коллегии, а именно с 1721 г. по 1917 г.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репрессии против церкви привели к значительному снижению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канонизации святых в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и к значительному сокращению количества канонизированных святых в этот период. Только в период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Николая II активность церковных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канонизаци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восстановилась. Пятый этап — 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с 1917 г. по 1987 г. В первые годы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Церкви, связанная с канонизацией, полностью приостановилась. Вслед за улучшением церков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начала тайными способами заниматься канонизацио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шестой этап истории канонизации приходится на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этап, с 1988 г. — 1000-летнего юбилея крещения Руси — по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В течение этого периода церковь в основном проводит канонизацию «новых мучеников и кающихся России» 20-го века. Церковь в этом достигла немал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однако существуют и 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поклонение святым, канонизация, крещение Руси, Византия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19世纪俄国哲学中的中国形象\*

B·谢尔比年科 郭小丽\*\*

**【内容提要】**19世纪上半期，俄国哲学思想随着民族意识的高涨而勃发，俄国思想镜像中的中国形象普遍是落后而又停滞的。霍米亚科夫首次深入到中国文化精神内部，在《塞米拉米达》中指出，中国属于综合性文化，它把人类世界的库希特原则和伊朗原则的成分融合于自身，具有某种通用性，这是中国稳定性和有能力对抗外部作用的原因。索洛维约夫在《中国与欧洲》中分析了《孟子》、《道德经》等中国经典，认为儒家尊古，道家无为，二者都拒绝创造，两种力量交互形成了中国保守主义的本质。另一方面，以父权制为根基的等级制度通过礼仪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这是国家稳定的根基。这种以父权制为基础的保守主义，是一种与欧洲的“进步”相对立的“秩序”。

**【关键词】**俄国哲学 中国形象 伊朗原则 库希特原则 父权制

**【中图分类号】**B5(512.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3)06-0111-(19)

对自身与西方文化传统的相互关系的反思——这是19世纪俄国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特点。这一特点与19世纪俄国文化之独特性的形成直接相关。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本我与他者——中俄关系中的形象与认知问题”(项目批准号:11JJDGJW005)的阶段性成果。

\*\* B·谢尔比年科，莫斯科人文大学教授；郭小丽，河北师范大学教授。谢尔比年科教授写作的内容，原文是俄文，由徐凤林老师翻译，共6000余汉字。谢尔比年科教授委托郭小丽教授做为第二作者，又补充了7000多字汉字，郭小丽教授补充的内容包括三部分：(1)加入了19世纪上半页俄罗斯思想史中俄罗斯哲学的中国形象；(2)加入了对伊朗原则和库希特原则的大量解释；(3)加入了索洛维约夫的《中国与欧洲》的相关内容。

1812 年卫国战争之后，一批有知识的青年贵族军官来到欧洲，痛心疾首地感到俄罗斯的落后，恰达耶夫（П.Я.Чаадаев）主张走西方的道路振兴国家，而霍米亚科夫则提倡斯拉夫理念。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这场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大争论，既是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高涨的表现，又是在比较哲学视域下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深刻反思。但是，这一时期在俄国文化自我意识领域，关于自身与东方文化领域的深刻历史关系问题，却很少被关注。特别是作为俄国地理上的老邻居的远东，实际上在整个 19 世纪的俄国文化界，都被认为是一个真正“遥远”和异己的世界，很少将它与俄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内部问题联系起来。在这期间，尽管某些东方学家（例如瓦西里耶夫，П.В.Васильев）<sup>①</sup>指出了明治维新（1867-1868）之后日本社会的根本变革，但直到 1894-1895 年的中日战争之前，这些研究者都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评价，而且后来的历史表明，在这场战争之后，有关的研究也没有得到俄国社会的完全理解。

## 一、十九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思想镜像中的中国

在俄国汉学的比丘林（Н.Я.Бичурин）时期（19 世纪 30-40 年代），许多俄国文化活动家表现出对中国的兴趣。这一社会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位俄国中国学奠基人的卓越人格有关。比丘林是一位杰出学者，他在俄国社会积极宣传关于中国文化的科学知识，经常为多家杂志（《莫斯科公报》、《莫斯科电讯》、《莫斯科维亚人》等）撰稿。他还撰写过 16 卷本的中国史（从古代至 17 世纪）。遗憾的是，他的百余部作品在他有生之年只发表过 14 篇，如《中国的民情和风尚》、《中国，其居民、风俗、习惯和教育》、《北京记述》、《儒教及其礼仪》等。他的观点对普希金<sup>②</sup>（А.С. Пушкин）、奥多耶夫斯基（В.Ф.Одоевский）、波果金（М.П.Погодин）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有直接的影响。

---

<sup>①</sup> См.: Восто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883. № 10.

<sup>②</sup> 有史料表明，比丘林曾约普希金到中国边境考察，普希金也曾在诗歌中回应说：“我做好了准备，一同出发；朋友们，无论你们去哪里，想去哪里，我都会跟随，寸步不离，无论是去遥远的中国长城的脚下，还是去人声鼎沸的巴黎……”普希金曾打算写一篇关于中国的论文，思考关于东方与西方的问题，但最终没有成文。

可以说，“比丘林现象”的出现不仅是因为这位杰出学者的人格特点，也不是因为人们对外国信息的新奇：中国形象对 19 世纪 30-40 年代的俄国而言已经不是什么新奇之物了，俄国人从西欧的“中国风格”（Chinoiserie）榜样那里已对此非常熟知，俄国社会对比丘林的活动感兴趣，首先是对这样一种科学方法的冷静性和具体性的反作用（这一反作用远非总是具有单一的积极意义），这种方法使研究者突然看到了远东传统文化内容的全部实在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比丘林改变了俄国认知中国的方法——以前是通过“道听途说”的方法从欧洲“听说”中国，而他对中国的描述则来自第一手资料。从这一点来看，比丘林的活动不仅仅具有“启蒙性”，同时还具有争议性（这一点很重要）。比丘林不得不反对当时在欧洲和俄国流行的关于中国的观点，即认为中国是社会停滞的象征。当时欧洲普遍低估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例如，可以在赫尔德（И. Гердер）以及黑格尔（В.Ф. Гегель）<sup>①</sup>的著作中找到明确的理论证明，而他们在俄国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因为俄国哲学本身就是西方特别是德国哲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自然，西方的欧洲中心论标准的影响在根本上促成了俄国社会对中国文化史的怀疑态度<sup>②</sup>。还必须考虑到，在 19 世纪 30-40 年代的俄国，有关“中国”的各种符号都被自由派的政论作品用来批评俄国的保守主义。例如，加加林（И. С. Гагарин）（俄国的保守派代表，后来成为耶稣会成员和天主教神学家）在 1842 年致伊万·基列耶夫斯基（И. Кириевский）的信中，把“文明的”希腊与僵化的民族主义的中国对立起来<sup>③</sup>（首次发表于天主教杂志《Simvol》）。类似的论据在多次被指责为“中国主义”的斯拉夫派圈子里是受到严肃批判的。

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在肯定比丘林作品的同时也指出，他把中国社会理想化了，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停滞、黑暗的反面榜样。他以中

---

① 指德国思想家们的历史哲学思想所普遍具有的欧洲中心论的方法论，例如，按照这一方法论，黑格尔不把中国包括在“世界历史范围”内，赫尔德则把中国文化描写为“千年原地踏步”。黑格尔历史哲学对 19 世纪俄国社会思想的影响是公认的。至于赫尔德历史观在俄国的权威性，例如，可以在别林斯基维护“伟大的赫尔德”的有力讲话中得到证明。См.: Белинский В.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М., 1953. Т.2. С.67.

② 参见伊万·基列耶夫斯基与科舍廖夫的通信（Кириевский И.В.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М., 1911. Т.2. С.273）。

③ *Simvol*, 1980, No.4, p.177.

国为例，论述俄国走西方道路的必要性甚至俄国对欧洲的意义。别林斯基在谈到保守派观点时说道：“我们无需同这些老爷们进行任何争论，也无需引用任何证明和论据，我们只要说他们是中国人就够了……这个称谓比任何研究和长篇大论都能更好地解决问题”<sup>①</sup>。在别林斯基那里，中国人一词意味着“虚伪、狡猾、装疯卖傻、奴颜婢膝”，他还在《致友人书简》中批评果戈理道：“成为某种抽象的完人，以自己的谦恭温顺高踞于其他人之上，这种想法不是骄傲就是痴呆的产物。无论哪种情况，都必然导致两面三刀、假仁假义、中国习气。”<sup>②</sup>别林斯基更多地从民族性格方面对中国人作出评价。而赫尔岑则以中国为案例来分析欧洲的出路以及俄国的使命。他在评论穆勒的《论自由》时说，如果欧洲继续这样下去，“那么‘欧洲尽管有自己光辉的历史和自己的基督教，它还是会变成中国的。’”<sup>③</sup>在他看来，“政治或社会的动物不仅以群居为特色，而且像蚂蚁和蜜蜂一样有一定的组织方式，但是谁能说它们一开始就会建造自己的蚁穴或蜂窝呢？我完全不这么想。那是经过无数代的演变和死亡之后，中国式的蚁穴才终于形成和巩固的。”<sup>④</sup>在赫尔岑看来，中国以某种自然规律，已经经过代代演化，变成最稳定的、最能够适应环境的动物一样的物种，而欧洲若想摆脱“中国式的颓废和腐化”，就需要俄国思想的推动。

当然，也有车尔尼雪夫斯基（Н.Г.Чернышевский）和舍尔古诺夫（Н.В.Шергунов）这样的革命者，把当时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一种革命运动加以关注。他们对太平天国运动，亦即对民众的革命，寄予了莫大的希望。车尔尼雪夫斯基驳斥了那种认为白种人和黄种人是不同人种的观点，认为中国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并不是特有的品质，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状况下人们所具有的普遍品质<sup>⑤</sup>。舍尔古诺夫在《中国文明》一文中谴责欧洲支持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行为，认为中国未来的复兴靠的是洪秀全们。他认为中国在道德和哲学上是高度发达的国家，但是，宗法制的国家管理准则

---

① В.Г.Белинский. См. об этом: Скачков П. Е. Указ. соч. С.122; Запоев Т. Ю. Указ. соч.

② В.Г.Белинский. «Письмо к Н.В.Гоголю».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Т. 8. С.287.

③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下），项星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63页。

④ 同上，第64页。

⑤ Н.Г.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Т.10. часть 2.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06. С.94.

压制了个性和自由，使得“这个有天赋的民族”在走向幸福的道路上遭遇到重重阻碍<sup>①</sup>。太平天国是对这种制度的反抗，是值得肯定和颂扬的运动。

## 二、霍米亚科夫对中国文化的思考

在 19 世纪 40-50 年代的俄国，中国文化较少成为专门哲学—文化学分析的对象。对远东研究的新的科学经验进行哲学概括，这种尝试也不常有。在这方面具有特别意义的是霍米亚科夫（А.С.Хомяков）在其《世界史札记》中所做的最系统和最独特的尝试，这部著作后来以《塞米拉米达》这一名字而著称<sup>②</sup>。这是一部从反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研究世界历史的著作。这部斯拉夫派的精神领袖写作多年但仍未完成的著作（他死后才出版），按照作者的意图，应该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奠定基础，这种新方法是俄罗斯民族文化发展所必需的。霍米亚科夫对德国理性主义（首先是黑格尔）中对历史发展的总体解释持批评态度，但同时他又认为，回到传统的非哲学的历史编纂学是无意义的。在《塞米拉米达》中，根本上失去了恒定的历史、地理或文化中心的历史生活方式，要么符合黑格尔的历史发展模式，要么符合公认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模式。

霍米亚科夫把整个人类的精神原则分为两种，即“伊朗”原则和“库希特—雅利安”原则<sup>③</sup>。这并不是从人种学角度对人类精神原则的划分，而是从现实及其表现形式的角度进行的形而上学的思考。历史的联系依靠两种极端的精神原则的紧张斗争来维持，这两种原则一部分在现实的民族文化领域中，一部分在象征形式的民族文化领域中发挥作用。按照霍米亚科夫的观点，

---

① Шергунов Н.В. Кита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избр. Т.2.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71. С.62-63.

② “塞米拉米达”是公元前 9 世纪末的亚述女王。起初为《世界史札记》第一章的名称。讲述的是史前的远古时代，第一章也是第二章的引言，为第二章作了内容丰富的铺垫。有学者分析称，霍米亚科夫用果戈里赞赏的“塞米拉米达”为全书（书稿并未全部完成）的名称的原因是，由于考古等实证资料缺乏，带有神话传说性质的历史反倒有利于进行哲学思辨并提出新的概念。

③ “伊朗原则”在 20 世纪又被称为“雅利安原则”。在 1904 年出版的《霍米亚科夫全集》的序言中就用“雅利安原则”一词代替“伊朗原则”。因此，霍米亚科夫又被称为俄罗斯的“雅利安理论”第一人。

伊朗原则与库希特原则是现实的两种表达：隐性的和显性的。“自由不是显性的，因为显现的事物的规律是必要性。”<sup>①</sup>也就是说，有必要性作为基础，事物才能显现。库希特原则象征着在诞生之初就表现出来的必要性原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存在。“逻辑是显现的科学，而自由（一神之源）并不显现，或者显现之后失去其特性。”<sup>②</sup>伊朗原则（雅利安原则）是自由的象征，是通过最高的创造原则表现出来的，它不被显现的事物的规律性所限定：“创造不是物质世界所能看到的进程，它自身包含的规律与物质世界的规律完全不同。”<sup>③</sup>也就是说，显现的现实通过世界的物质性或者库希特原则表现出来。隐性存在的现实是伊朗原则的纯粹的精神信仰。各个不同民族都成为世界历史的参与者，这些民族要么在“伊朗原则”的标志下，要么在“库希特原则”的标志下发展自己的文化，“伊朗原则”是精神自由的象征，“库希特原则”则象征着物质必然性的“优先”，也就是“不否定精神，但否定精神的自由表现”<sup>④</sup>。按照霍米亚科夫的观点，这实际上是人类世界观的两种基本类型，更确切地说，是人类世界观的普遍范型，因为人类在原初是统一的观念是《塞米拉米达》的基本观点。这种对人类世界的划分原则很明显受到德国浪漫主义传统的影响，尼采在古希腊文化中就发现了狄奥尼斯和阿波罗两种精神文化源头。尼采之前的德国文史学家希勒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hilegel）将人类分为两个人种：“卡伊尼特（希腊语kainos新的）——代表人的肉体”以及“谢菲特——代表上帝的意志”。黑格尔则提出“伊朗的光明原则”和“埃及的神秘原则”的说法。这些思想家试图将人类按心理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但霍米亚科夫的创意则在于，将伊朗原则和库希特原则视为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轴心，将地域文化在世界背景中体现出来。

别尔嘉耶夫高度赞扬霍米亚科夫的观点，他说：“霍米亚科夫最令人瞩目的、最富有天赋的思想就在《世界史札记》之中，这便是他对历史起作用

---

① Хомяков А.С. «Семирамид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истины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дей// Соч.в 2-х тт. Том.1.Вст. ст., сост., подг. Текста и прим. Кошелев В.А., Серебрянников Н.В., Чернов А.В. М., 1994. С.271.

② Там же.С.203.

③ Там же.С.223.

④ Хомяков А.С.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2-е изд. М., 1892. Т.3. С.368.

的两种原则的划分——伊朗原则和库希特原则。”<sup>①</sup>他进一步用索洛维约夫的“永恒的索菲亚”理论来解释伊朗原则和库希特原则，认为库希特原则代表着女性，而伊朗原则代表着男性。<sup>②</sup>这样的理解也能够在霍米亚科夫的话语中得到印证：“创造精神的最高意义表现在很多事务上，特别表现在‘诸神’那里，但几乎从未在‘诸女神’那里显现出来，因为她们那里的优势是库希特原则（她们与伊朗原则格格不入。）”<sup>③</sup>无论是别尔嘉耶夫关于“男性与女性”的阐释，还是霍米亚科夫关于“显性和隐性”的说法，都会使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中关于“阴与阳”的划分，阴阳相合才能充满现实的整体。

在霍米亚科夫的历史哲学中，划分了历史上的“伊朗原则”和“库希特原则”。霍米亚科夫认为，埃塞俄比亚是库希特原则的发源地，然后从那里一直延伸到埃及、印度和中国：“遥远的亚洲东方在史前时代就获得了库希特原则的神秘学说和逻辑的抽象性，后来以‘佛学’闻名于世。在远古时代，尽管这种逻辑性没有被命名，但给埃塞俄比亚带来‘虔诚’的声誉，也使得埃及祭司以其‘智慧’闻名于世。”中国文化中也具有库希特原则的因素，这一点特别在其文字和象征中表现出来<sup>④</sup>。伊朗原则的故乡是西部伊朗。伊朗原则的国家包括：“伊朗、亚速海国家、具有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信仰的国家、迦勒底人、巴比伦宗教、曾德部落等等。”<sup>⑤</sup>但霍米亚科夫又指出，二者之间的界限不具有绝对性，这是一个事实，表现在他对中国文化源泉的解释不具有根本意义上的统一性。他认为，宗教是人类思维的最高表达方式，这里既有意识，又有无意识，既显性又隐性地蕴含着精神生活的最终结论：“在所有的神话、传说、幻想和民间故事中，都反映出宗教的精神发展环节，把其无意识的辩证法的严格规则包裹在秘密的形象之中。”<sup>⑥</sup>他描述了“库希特原则的有力影响”，并认为它在确定中国文化的类型特点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霍米亚科夫同时又在中国文化中发现了“古代伊朗原则的回声”。他论述了中国起初的一神论，在这一体系中包含着“伊朗”类型的世界观的

---

① Бердяев Н.А. А.С.Хомяков.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2005. С.240.

② Там же.

③ Хомяков А.С. «Семирамид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истины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дей. С.198.

④ Там же.С.238-239.

⑤ Там же.С.193.

⑥ Там же.С.194.

特征：伊朗原则的人虔信上帝，他不追问世界是如何创建的，而库希特原则的人则会追问世界创建的技术过程。这样的一神论后来在中国也没有完全失去意义，他还论述了中国文化的“高度伦理主义”，认为这也是“伊朗原则”的特征。

中国文化在《塞米拉米达》中被视为综合性的文化，它把人类世界观的两种可能类型的成分融合于自身。两种原则在此交织在一起，形成某种辐射体系，这个体系存在于库希特原则的物质源头和伊朗原则的精神源头之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是通用性的，这正是它具有惊人的稳定性和有能力对抗任何外部作用的奥秘。其中，霍米亚科夫认为，中国对基督教的布道（在《塞米拉米达》中，历史上的基督教是“伊朗”意识的最高类型）相对缺少悟性，其基本原因在于，“关于人（至少是在人的外部表现和对他人的关系方面）的高度道德意义的全部概念，已成为中国思想家的综合哲学的组成部分”<sup>①</sup>。

在定义中国世界观的本质的时候，霍米亚科夫力图在构成文化传统之基础的语言层面来说明这一世界观的起初特点。他认为，库希特原则的物质显现性可以通过符号和象征表达出来，这与伊朗原则不同，后者为纯粹的精神性：“库希特们需要我们去猜测，而伊朗们擅长自我表达。”<sup>②</sup>他认为中国的象形文字就符合库希特原则的诸多特征之一。中国象形字的特点及其与字母文字的根本区别，成为《塞米拉米达》的研究对象。在霍米亚科夫看来，中国文化经验的一般特性，一方面与原始中国文字的图画性有关，另一方面与字母文字和象形文字在与语言的相互关系方面的根本区别有关系。字母文字具有硬性的决定性，象形文字则具有高度的独立性。霍米亚科夫从这一语言学情境出发，确定了中国文化的一般“通用性”与其文字的一般通用性之间的联系。

当然，霍米亚科夫在语言的通用性中也力图揭露其“片面性”：“字母在奴性地依赖于语言的同时，保持着思维精神的自由……一切外在之物和可见之物都活灵活现地呈现为象形文字；一切内在之物和抽象之物都是这些文字

---

① Хомяков А.С.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2-е изд. М., 1892. Т.3. С.136.

② Хомяков А.С. «Семирамид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истины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дей. С.199.

所无法表达的……我们说的是原始的简单的象形文字，而不是其晚近的改变……中国作家用来自象形文字的符号表达最抽象的概念”<sup>①</sup>。在他看来，用形象的文字表达抽象的理念是中国文化的特性之一。

发达的中国文字以其假定性仿佛把文化世界与一切不属于文化范围的东西对立起来。同时，正如霍米亚科夫所认为的，在中国传统中也辩证地表现出相反的意向：在那里，文化与非文化世界原则上被理解为同一类别的量，其差别只在于组织程度。文化完全被看做是一种物质力量，它能够培养现实、（不是最后）培养人本身及其内在世界。霍米亚科夫把这一切描述为“库希特原则与自然界的无言斗争”的中国版本。类似的描述还包含着对中国文化经验之意义的非常肯定的总体评价：“这个东方大国的摇篮周围所笼罩的不是战斗的荣耀，不是千百年的野心和勇猛精神，而是和平发明的荣耀，是战胜桀骜不驯的自然力量的荣耀，是不断贴近国家生活的道德思想的荣耀”<sup>②</sup>。

按照霍米亚科夫的观点，由于中国文化的非单一性（综合性），因此，即便“库希特”类型的自然主义也没有穷尽其精神意义，这导致了中国历史上能够提出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建立一个从道德原则发展出来的和谐国家”<sup>③</sup>。中国“从事农耕，可是建立在高度独特的国家和逻辑基础之上，改造了自己的征服者，赋予野蛮的蒙古人以精神和纯中国式的方向……国家机构是严谨的，已经有了教育，而且是崇高的教育：它要消除任何一个好战的汗国的不协调的行为。”霍米亚科夫相信，清帝国的满洲人将面临同蒙古人同样的命运：“蒙古人被赶走了，被战胜了，满洲人也将被赶走，或者被消灭。”这是因为，尽管中国文化中国家强大的理想（物质力量的形象）使道德理想服从于自身，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使中国道德哲学首先是儒家失去文化意义。霍米亚科夫在中国的三大“生活原则：儒家，佛教和道教”<sup>④</sup>中特别强调儒家。儒家伦理学的传统主义特别令这位具有保守情绪的俄国哲学家敬仰，他认为，在这方面儒家伦理学的创始人“比整个世界的所有哲学家都

---

① Хомяков А.С.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М., 1892. Т.3. С.365.

② Там же.С.89.

③ Там же.С.93.

④ Там же.С.185.

高明”<sup>①</sup>。所以在他看来，尽管中国国家的物质力量过于强大，但精神力量也不可小觑：“严谨的国家机构是一种荣誉，无愧于人的本性的荣誉：它要给予战败者精神斗争的坚定性，使他获得最后的胜利。”<sup>②</sup>霍米亚科夫在对中国的态度方面的立场远不是辩护性的，而且，他总体上是赞同公认的（无论在俄国还是在欧洲）关于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观点的。但重要的是，在俄国哲学思想史上，霍米亚科夫是最早清楚地意识到并提出远东文化类型特点问题的哲学家之一，在这方面他占有重要的独特地位。

### 三、第一个有哲学体系的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对中国文化的诠释

尽管在后来的 19 世纪下半期，俄国中国学对俄国社会远东文化观的形成的影响不具有决定性，但这一影响是经常不断的和深刻的，并取得了成果。1888 年出版了俄国杰出的中国学家 С·М·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的著作《中国的生活原则》。19 世纪俄国最大的哲学家一形而上学家弗·索洛维约夫对这部著作的总体评价是肯定的，他的《中国与欧洲》（1890 年）一文正是以这部著作作为依据。索洛维约夫确信，必须专门研究远东文化。对这一信念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与“文化历史类型”论的创造者 Н·Я·丹尼列夫斯基、后来是与丹尼列夫斯基的追随者 Н·斯特拉霍夫和 К.列昂季耶夫等人展开的争论。但争论是丹尼列夫斯基首先发起的，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1885 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索洛维约夫论东正教和天主教》，批评索洛维约夫在其著作《大争论与基督教政治》（1883 年）中以东西方对立来证明世界历史的普适性。在这种情况下，积极作用被索洛维约夫赋予了形成人的“主动性”原则的西方文化，而东方的意义则被确定为对超自然之物的特定的消极直观。

丹尼列夫斯基反对索洛维约夫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划分，认为这种区分过于笼统，对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毫无帮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住在中国的人类的三分之一那样更不关心超自然力量，这人类的三分之一正

---

① Хомяков А.С.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М., 1892. Т.3. С.299-300.

② Там же. С.185.

是在真正的东方。因此，必须把这难以归入公式的人类的三分之一抛到历史之外……把中国排除在历史之外的理由是，中国因其封闭性和停滞性而是过于东方的。但它的封闭性乃出于纯粹外部的地理原因，而在精神和趋向上它并不比印度和埃及更封闭。至于停滞性，显然，一个做出了大部分具有产生文化作用的（культурородный）基本发明的民族，不可能是停滞的”<sup>①</sup>。

丹尼列夫斯基在《俄国与欧洲》一书中就多次讲到中国，这是他早年的成名之作。他首先对黑格尔的欧洲中心论，特别是日耳曼中心论提出质疑。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并不能体现在所有民族那里，只体现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民族身上。丹尼列夫斯基在《俄罗斯与欧洲》中提出的观点是，没有全人类共同的文明，而且也不会有，只存在不同文明的历史文化类型。他列举了多种历史文化类型，并将中国排在仅次于埃及的第二位。他认为中国同罗曼—日耳曼等其他八种文明具有同样的价值，“为共同的宝库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他还指出，中国对欧洲历史学来说是“停滞与僵化”的象征，欧洲人说中国不存在“进步”的概念，其实是为了强调：“凡是……公民性好文化能够发展的地方，它们都具有像在欧洲那样的进步性”<sup>②</sup>。丹尼列夫斯基也承认中国发展停滞了，但认为停滞的原因是不与别人交往：“不与人交往的文化历史类型却发展了他们较为幸运的竞争者不曾发展的某些方面，从而促成了人类精神表现的多面性，其实这也是发展。”<sup>③</sup>中国不为欧洲文化所理解是因为它属于另外一种文化历史类型，但这一点不能成为“贬低”中国文化成就的根据：“中国有伟大的文学、独特的哲学，还有，当然，在宇宙论方面是不完善的，但十分有代表性的……合理的和高尚的伦理体系……科学和知识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中国那样得到高度尊重和产生影响”<sup>④</sup>。

在丹尼列夫斯基去世后，索洛维约夫在一系列文章中（1888—1890年）尖锐地批评他的理论。这位“万物统一哲学”的创造者确信，关于文化历史类型的学说总体上不符合历史的现实性质。索洛维约夫只是提出这样一些主

---

①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 Сборни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татей. СПб. 1890. С. 275-276.

②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Взгляд н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лавянского мира к германо-романскому. СПб., 1871. С.73.

③ Там же.

④ Там же. С.74-75.

要的证据，在他看来，这些证据能够证明这种不符合：基督教的历史普遍性、佛教在亚洲的传播、犹太教与基督教在起源上的联系，等等。他承认，对进化论历史观来说，唯一“成问题”的就是中国。他甚至得出结论：只有中国才能成为丹尼列夫斯基力量正确性的证据，因为中国确实是完全独有的历史现象。

索洛维约夫在《中国与欧洲》（1890年）中，首先依据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的具体研究，还依据国外的汉学著作和翻译，力图规定中国文化的本质。他从中国的家庭因素、精神基础、宗教信仰、传统思想等方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索洛维约夫在宗教和哲学领域寻找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性的根据。在他看来，宗教和哲学在具有该民族特点的理想（“中国理想”）的形成中起了决定作用。索洛维约夫分析了中国人礼仪实践的各个方面（拜祖、婚姻、祭祀的性质等），也遵循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的观点，划分出一条最重要的维系生活关系秩序的原则，该原则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从家庭到国家制度）都起作用——这就是父权原则：“中国人的个人生活、国家体制、宗教、道德世界观都是由一个共同的根基发展起来的，即家庭因素，或者确切地说，是由绝对的父权原则发展起来的。”<sup>①</sup>“当前中国整个复杂的政治结构只是父权原则的集中扩大：村长是整个村落的父亲，县长是整个县郡的父亲，省长是省市的父亲，最终，皇帝是整个中国、无数‘百姓’后裔的父亲”<sup>②</sup>。索洛维约夫把父权制原则看做是既决定着社会机体的共时性统一，也决定着（这是最主要的）社会机体在历史传统范围内的统一的普遍手段：“可以断定，这个迄今仍然是中国生活制度的因素，是中国作为一个特殊民族出现的基本原因。”<sup>③</sup>

这样的评价成为概括中国文化之本质的前提。按照索洛维约夫的观点，中国文化的决定性特点是：“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绝对权力”<sup>④</sup>。索洛维约夫从中国“绝对的父权制”原则追溯到中国文化中的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曾是所有民族的宗教和生活的主要基础，但只有在中国，至今还保留着其主要

---

① Соловьев. Вл. «Китай и Европа», <http://www.rodon.org/svs/kie.htm>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④ Соловьев В.С. Собр. соч. 2-е изд. СПб, 1912. Т.5. С.337.

的宗教和日常生活意义。”<sup>①</sup>祖先崇拜表明了“死者对生者的统治”<sup>②</sup>。也就是说，生活可以不用“创造”，而是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换言之，中国依赖的是过去而非未来。在索洛维约夫看来，就家庭而言，绝对的父权制和祖先崇拜维持着一个家族的团结和稳固；就国家而言，它们又是中国社会制度的全部基础，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因素，这也是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原因之一。

这位俄国哲学家分析了中国两个最大的哲学体系——道家和儒家的一般原理，与前人的研究结论相比，这一分析已有着本质的不同。比如，根据中国儒家和道家的说法，索洛维约夫对“天”作了这样的阐释：“天与地的本质是两种主要力量最初的相对存在。”<sup>③</sup>他认为，“道”就是大自然，其中有两种力量：积极的男性力量，即阳；消极的女性力量，即阴。天为阳，地为阴。因此在他看来，中国宗教中的“天”并不能与西方宗教中的“上帝”的概念完全等同起来。与此同时，他又引用了《孟子》中孟子与万章的讨论，并通过分析说明，“天”与“百神”是两个含义等同的概念。中国古代有死后封神使之成为“百神”之一的传统，因此，百神与天都是中国人对祖先崇拜的另一种形式。而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天子（帝王），不仅是最高祭祀仪式的主持人和国家的统治者，也是百姓的导师。各级地方官员以此类推，是地方人民的导师，他们有责任定期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诲，并询问百姓的要求，如同家庭里的父亲对子孙所表现出来的关怀一样。从皇帝到一村之长，都对所辖范围的百姓掌握着不可分割的“父权”。

在分析了中国人的信仰和孔孟思想之后，索洛维约夫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的理想完全属于过去，他们往后看，而不是向前看”<sup>④</sup>，即便是孔子这样“为寻求改革而漫游”的人物，其目的也是要“消除致命的新措施，最完整地恢复古代的秩序（即周礼）”<sup>⑤</sup>。索洛维约夫指出，这正是中国保守主义痼疾之所在，“这种对于传统生活基础的特殊偏爱，本质上是完全中国

---

① Соловьев. Вл. «Китай и Европа», <http://www.rodon.org/svs/kie.htm>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④ Там же.

⑤ Там же.

式的抽象思维的发展基础”，并逐渐作为一种民族精神而得到自我强化，但是，这最终使人民丧失了一切实际生活的目的。

关于道家创始人，他写道：“作为思辨哲学家，老子寻求绝对本原，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他只在过去之物中寻找，因此，他寻找绝对的过去之物，寻找那先于一切现存之物的东西”<sup>①</sup>。

在索洛维约夫看来，道家的鼻祖老子更是把以保守主义为核心的中国思想发展到了极致。老子追求“绝对源头”<sup>②</sup>，寻找“所有事物存在之前的存在”。无论是作为家庭崇拜对象的祖先，还是作为国家崇拜对象的“天”或“百神”，都不是老子所追求的“绝对源头”，天和百神都是“相对的过去”<sup>③</sup>。而“真正明确存在的绝对源头”就是“不存在”。索洛维约夫认为，“无”的思想是老子学说的核心内容，他引用了“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sup>④</sup>，“无名，天地之始”<sup>⑤</sup>等《道德经》原文，认为“老子称这种对一切存在的否定为‘道’”<sup>⑥</sup>。

索洛维约夫认为，“无为”也是老子学说的重要思想。因为“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sup>⑦</sup>。所以在老子看来，“无为”是最高智慧。另一方面，“无为”也是“道”，他还引用老子的原话来论证这一点：“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sup>⑧</sup>不得不说，索洛维约夫对老子的理解是片面的，因为老子的无为并非真的无为，而是另一种积极有为的方式，无为只是达到目的的另一手段而已。也许正因为此，老子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被称为是“南方之强”。

索洛维约夫把老子思想的源头也视为祖先崇拜，他注意到老子“道法自

---

① Соловьев В.С. Собр. соч. 2-е изд. СПб, 1912. Т.5. С.102.

② Соловьев. Вл. «Китай и Европа», <http://www.rodon.org/svs/kie.htm>

③ Там же.

④ 《道德经·第四十章》

⑤ 《道德经·第一章》

⑥ Соловьев. Вл. «Китай и Европа», <http://www.rodon.org/svs/kie.htm>

⑦ 《道德经·第二章》

⑧ 《道德经·第五十六章》

然”的说法，批判“知者不博，博者不知”<sup>①</sup>以及“绝学，无忧”<sup>②</sup>的愚民思想，在他看来，“这种对于原始状态的简陋和纯朴的追求，与中国人所共有的对过去的崇拜相关，而这种崇拜正是老子原始虚无思想的基础。”<sup>③</sup>，“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sup>④</sup>这句话被索洛维约夫用来证明中国人对过去的崇拜：“将所有的权力都交付过去，中国思想包含着中国人对当下和未来的根本否定”<sup>⑤</sup>。

索洛维约夫对“中国理想”的形而上学的保守主义持批评态度，这是无疑的。他认为，儒家把古代（周）幻想为黄金时代，努力恢复并延续这个时代，而道家又拒绝创造的思想，主张清静无为，两种力量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中国保守主义的本质。另一方面，宗教和道德融入到某种对先人崇拜的仪式之中，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形成了对长者或者家长的盲目崇拜，这是中国等级制度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并通过各种礼仪体系不断地巩固下来。中国人普遍承认这种秩序并遵守相关礼仪，这是国家稳定的根基。

当然，索洛维约夫对整个中国文化历史类型的态度，则是复杂的。例如，他写道：“中国家庭本身把自己的重心转移到过去之物，转移到绝对事实领域，因此获得了不可动摇的事实般的牢固性，时间的流逝对这一事实也无能为力”<sup>⑥</sup>。并且，按照索洛维约夫的观点，依恋过去之物、侍奉祖先，“是中国世界观的真理”<sup>⑦</sup>。这样，在“中国理想”中也直接包含着真理。令索洛维约夫感到困扰的与其说是东方的局势，不如说是欧洲本身的状况。他认为，中国和欧洲两种文明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两种思想的矛盾，即中国的“秩序”思想和西方的“进步”思想之间的矛盾。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社会稳固，而西方则追求进步。他认为，“秩序”和“进步”是两个对立的观念，因为进步的前提必然是打破秩序。在索洛维约夫看来，进步的观念，是欧洲文化可以用来与中国文化相对抗的东西：“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这两

---

① 《道德经·第八十一章》

② 《道德经·第二十章》

③ Соловьев. Вл. «Китай и Европа», <http://www.rodon.org/svs/kie.htm>

④ 《道德经·第十四章》

⑤ Соловьев. Вл. «Китай и Европа», <http://www.rodon.org/svs/kie.htm>

⑥ Соловьев В.С. Собр. соч. Т.6. С.118.

⑦ Там же.С.107.

种文化的对立本质上归结为两种一般观念的对立：一方面是秩序，另一方面是进步。从秩序观点看，最重要的是社会关系的稳固性，进步观念则要求社会关系的理想化的完善……中国达到了稳定的秩序——这是毫无疑问的，欧洲的进步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的完善，则是个问题”<sup>①</sup>。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欧洲的进步以对过去和传统秩序的绝对否定为基础，因此它只是虚假的进步。尽管索洛维约夫热衷于进步观念，但他远不是绝对相信这一进步在现实上能够由欧洲文明来真正实现。这些怀疑是索洛维约夫关于中国的看法的重要特点。

显然，对远东文化传统的具体分析（这一年他还发表了一篇关于日本的文章），使索洛维约夫认识到了这一文化传统与欧洲文化传统的深刻差异。索洛维约夫承认人类的文化“断裂”是历史事实，承认各文化传统的相互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因而他也承认（虽然是间接地）丹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观具有一定现实性。但他的主要立场依旧没变：他拒绝把那种将彼此并无有机联系的文化更替视为历史进步的观点看做是表达人类历史一般意义的规律。索洛维约夫起初把这种历史观与对另一种社会发展规律——进步规律的诉求对立起来（带有一个补充说明，即关于对进步的“真正”理解和“虚假”理解的可能性，这种进步历史观体现在《中国与欧洲》一文中），但他同时也认为，欧洲的“进步”完全割裂了现在与过去的联系，完全抛弃了过去，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彻底替代和否定，这使得人类丧失了现实生活的本质基础，从而也丧失了未来的理想。

索洛维约夫的观点是，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如果欧洲的虚假进步占上风，就会形成毫无信仰、失去理想的自私主义的混乱局面。而如果中国式的理想占上风，可能会更糟。只有俄罗斯思想才是可以平衡东西方的第三种力量。俄罗斯既有对祖先的尊重，又有创造的渴望，如果在欧洲的基督教思想中注入中国式的精神吸引力，那么不需要依靠武力，便能“征服远东”<sup>②</sup>。这可能是索洛维约夫思考中国文化的初衷之一。

总之，在 19 世纪，俄国对中国的兴趣大增。这一方面是由于俄罗斯民

---

① Соловьев В.С. Собр. соч. Т.6. С.146.

② Соловьев. Вл. «Китай и Европа», <http://www.rodon.org/svs/kie.htm>

族意识高涨以及俄罗斯哲学思想在 19 世纪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俄国外交使团和传教士团的报告不断出版，向俄国展示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反驳了 18 世纪在欧洲流传很广的对中国的美化以及 19 世纪欧洲思想界对中国的普遍贬低。尽管如此，中国落后停滞的形象一直保留在俄罗斯大部分西方派人士的观念中。比如在别林斯基那里，中国形象被用来作为反面例证，说明俄国不能走本土道路。而赫尔岑则以中国“蚁穴式”的发展模式为例，阐释俄罗斯在欧洲乃至世界的使命之所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反对黄祸论，并不认为中国人是特殊的人种，认为中国在自己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展现了人类的某种共性。舍尔古诺夫则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看到反抗专制、向往自由的精神。斯拉夫派的代表霍米亚科夫首次抛开表象，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将中国文化放到世界历史的背景中审视，意识到并提出远东文化类型特点的问题，抽象出中国文化中的库希特原则和伊朗原则，肯定中国精神的积极作用。丹尼列夫斯基首次在学术上提出“中国文化历史类型”(китайский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тип) 的概念，指出描绘多种文化的世界图景的重要性，还提出文化类型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第一个有哲学体系的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对比中国与欧洲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和欧洲两种文明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两种思想的矛盾，即中国的“秩序”思想和西方的“进步”思想之间的矛盾。形成中国“秩序”的根源在于以父权制为根基的保守主义。中国之所以停滞不前，是由于表现为“祖先崇拜”的复古主义的束缚，人们不能也不敢违背祖制，中国的时间观是向后审视的，而非朝向前方和未来的，这使得“创新”与中国绝缘。另一方面他还指出，中国对于“礼”的尊崇是中国人虚伪性格的根源之一……尽管这些思想家离去已有一、二百年的时间，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冷静旁观，至今仍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徐凤林 译，译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及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翻译的内容为谢尔比年科写作的部分、翻译后的中文 6000 余字)

---

**【Abstrac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sup>th</sup> century, Russian philosophical thought thrived with the rising national awareness while China's image, mirrored by Russia thought, was generally lagging behind and stagnant. It is Khomiakov

who explored deeply into the interior of Chinese cultural spirits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 works entitled *Semiramis*. China belongs to omnibus culture, integrating both Cushitic and Iran principles into itself, leading to its universality. According to Khomiakov, this is the reason why China has kind of stability and capability to fight against the outside. In *China and Europe*, Solovyov analyzed Chinese classics such as *the Mencius* and *TaoTe Ching*, holding that Confucians respect the ancient while Taoists rate highly the principle of *letting things take their own course*. Both refuse creation, which interact and lead to the essence of China's conservatism. On the other hand, the hierarchy rooted on patriarchy has been consolidated and strengthened continuously through rituals, which lay the foundations of a country's stability. This conservatism, based on patriarchy, is a kind of *order* opposed to *progress* in Europe.

**【Key Words】** Russian Philosophy, China's Image, Iran Principle, Cushitic Principle, Patriarchy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вслед за росто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 процветала и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ская мысль, в то время в России Китай, как правило, представлялся отсталой страной, переживающей застой; Хомяков был первым, кто заглянул вглубь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Семирамиде» он высказал мнение о том, что кита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является синтетической, объединяющей в себе элементы обоих возможных типов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мировосприятия — кушитского и иранского, обладает некоторой гибкостью, которая является причи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 её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внешним воздействиям; Соловьёв в своей статье «Китай и Европа»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л «Мэн-цзы», «Дао Дэ Цзин» и дру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классические работы и высказал мнение о том, что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уважает принцип недеяния в даосизме, оба учения отрицают создание нов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двух этих сил и образовало сущность китайского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а.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иерархия, основанная на принципе

оте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ритуалов постоянно укреплялась и усиливалась, что являлось основ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стране. Этот вид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а, основанный на патриархате, является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ым европейскому «прогрессу» «порядком».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образ Китая, иранство, кушитство, принцип оте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

(责任编辑 黄翔)

## 从奥伊泽尔曼看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哲学

安启念\*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学术成果数量惊人，但在社会上却受到冷落甚至批评。原因是哲学家把自己封闭在书房之中，没有关注俄罗斯社会与苏联解体和全球化相关的各种现实问题。苏联/俄罗斯哲学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和叶利钦的全盘西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改革的失败，走西方国家道路的不成功，极大地打击了俄罗斯哲学家的理论自信。俄罗斯哲学界至今没有从苏联解体引发的精神地震中清醒过来，找到自己在当今现实生活中的地位。要解决这些问题，哲学家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在苏联时期的历史，深刻反思，总结经验教训。从苏联解体至今，锲而不舍地反思马克思主义并且成果累累的奥伊泽尔曼院士是俄罗斯哲学家的榜样。而延续至今的全球性问题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也是俄罗斯哲学的希望所在。

**【关键词】**俄罗斯哲学的困境 苏联哲学历史反思 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 B5(51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3)06-0130-(17)

著名俄罗斯哲学家 Т·И·奥伊泽尔曼院士，苏联时期曾在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担任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 21 年；在苏联哲学研究的中心，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担任哲学史研究部主任 18 年。他在苏联哲学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他的影响超出了俄罗斯国界，20 多本著作和 200 多篇文章被译成外文，中国几代哲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借助他的著作来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在今天看来，最有价值的不是他的哲学

\* 安启念，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思想或成就，而是他在苏联解体后所做的工作。这些工作提供了一种启示，让我们能够从一个角度对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哲学乃至整个俄罗斯社会，获得更为深入的认识。

—

苏联解体后，奥伊泽尔曼发表了大量著作，在俄罗斯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概括起来看，其中最受人们关注的是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哲学的反思。在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不少，但认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苏联哲学研究的人却很少。有些名字是人们熟悉的，例如B·M·梅茹耶夫、K·H·留布金、A·B·布兹加林，以及Д·B·赵哈泽、Ю·K·普列特尼科夫、B·H·别索诺夫等等，其中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是奥伊泽尔曼。更重要的是，苏联解体后，只有奥伊泽尔曼，二十几年如一日从学术的角度出发，结合哲学史以及当今的生活现实，对苏联哲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反思与分析。在他的著作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位学者对苏联哲学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严肃、认真、客观的态度，这在今天的俄罗斯哲学界是不多见的。

在当今世界，奥伊泽尔曼毫无疑问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最熟悉、相关知识最渊博的人，因而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思表现出很高的学术水准。他在《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一书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该书刚一问世，中国学者就对相关思想做了详细介绍，而且引起广泛重视。<sup>①</sup>他的《元哲学》已于2013年在中国翻译出版。他的《为修正主义辩护》一书出版后，不仅在俄罗斯组织了专门的圆桌会议进行讨论，中国学者也很快组织翻译此书，相信不久该书的中文版就会面世。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反思，集中批判了长期主宰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各种教条，提出了许多启发人思考的深刻意见。不过这些著作在为他带来声誉的

---

<sup>①</sup> 安启念在中国主要哲学刊物之一《哲学动态》上发表“奥伊泽尔曼论辩证唯物主义”、“奥伊泽尔曼论历史唯物主义”，见该刊2002年第4、5期及2003年第1、2期。

同时，在俄罗斯也引起不少人的指责与批评，有的还十分激烈、尖刻。<sup>①</sup>但这些批评也说明，他的思想是有新意和价值的。当然，奥伊泽尔曼的观点也有一些不足，从学术的角度看还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俄罗斯学者对他的批评很少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更多的是指责他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客观地说，这种指责是不符合事实的。奥伊泽尔曼没有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他坚信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坚决反对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他致力于从当今的现实出发，从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史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出发，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加以分析批判，努力创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更完善、更符合今天的现实生活，具有生命力。奥伊泽尔曼是一位严肃的学者，有原则但不僵化，学识渊博，勇于开拓，应当得到一切学者，不论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由衷的钦佩与尊重。在我看来，他的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恰恰是直到现在仍然不能彻底突破传统的被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例如，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批评基本上局限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之内，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马克思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哲学思想。世界上许多学者，包括许多俄罗斯学者，如今天活跃在哲学舞台上的梅茹耶夫、留布金等，早就突破了这种框架的限制。他们比奥伊泽尔曼视野更加开阔，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认识更加深入，即强调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人道主义本质和实践辩证法特点。话又说回来，尽管从学理的角度看，奥伊泽尔曼的工作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但是他的思想，特别是从哲学史的角度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批判，对修正主义思潮来龙去脉的梳理和对其现实意义的探讨，在当今世界上还很难有人超越。如果考虑到他是一位年已百岁的老人，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而且至今思想毫不保守，为追求真理勇于否定自己过去的观点，就更值得大家尊重和向他致敬了。

奥伊泽尔曼在苏联解体后所做的工作，对于俄罗斯哲学来说，主要价值

---

<sup>①</sup> 参见 Косолюпов Р.И. Спасибо-не надо! Марксизм: прошлое, настоящее, будущее. М., Макс пресс, 2003. С.157-166.

不在于提出了什么重要的新思想，而在于为整个俄罗斯哲学界树立了榜样，提供了一面镜子，开拓出了一条值得大家认真审视、评价的道路，有助于我们认识俄罗斯哲学的现状和思考其进一步的发展。

苏联的存在，广义地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实验，深刻地改变了俄罗斯的面貌，决定了它在 20 世纪的发展历史，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苏联国界，形成一场席卷全球的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改变了整个世界。有人把苏联与罗马帝国相比，其实，从对世界产生影响的范围来讲，特别是从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自觉地为实现解放全人类这样高尚的理想而发动的一场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社会实验的角度来讲，其意义可能比罗马帝国更重大，它的失败为我们提供的值得反思研究的经验教训自然也更多。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尘埃的落定，研究这场实验的必要性会逐步显现。十分遗憾的是，对苏联兴亡的研究至今没有得到俄罗斯学术界应有的重视，相关内容主要存在于各种回忆录中，令人惋惜。2005 年，现任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A·A·古谢伊诺夫院士曾经这样批评俄罗斯哲学界：

不久前我曾在一个网络出版物中这样责备我国的哲学界：俄罗斯正在经受巨大的民族屈辱，可我们的哲学家对此却无动于衷。话说得很刺耳，但是我认为这是公正的！实际上，什么样的哲学书信、什么样的尼采式的反叛或者存在主义、什么样的对人和世界的新见解，能够让我们对伟大的理想和伟大超级强国的垮塌作出回应？！……我们不能忘记哲学思想肩负的是对整个国家的责任，不能忘记对历史的“汉堡计算”（Ганбургский счёт）。<sup>①</sup>

这一批评非常中肯。俄罗斯哲学界确实很少有人研究苏联解体这一历史巨变，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的以上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历时 70 多年的社会

---

<sup>①</sup> Гусейнов А.А. Мы, философы России...// Вестник РФО. 2005. №1. С.30. “汉堡计算”是指撇开眼前情况和利益算计，从真正的价值体系出发对事物的评价。这一说法最早由苏联文艺学家维克多·施克洛夫斯基于 20 世纪 20 年代使用。

主义实验，对由十月革命引发的全世界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哲学界很少有人问津。要知道，无论是布尔什维克革命还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以及戈尔巴乔夫改革，哲学都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列宁本人写有哲学著作，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作家；斯大林著名的“四章二节”<sup>①</sup>实际上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曾经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模板；苏联哲学的代表人物И·Т·弗罗洛夫作为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改革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影响了20世纪世界哲学思想、至今在中国仍被视为主流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苏联哲学。列宁斯大林的哲学思想今天在俄罗斯已经很少有人提及，苏联哲学几乎被彻底否定，得到承认的只是苏联时期因背离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受到迫害的哲学家，或者是从事科学技术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学者。

然而历史是割不断的。不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不利于俄罗斯社会和俄罗斯哲学的发展。奥伊泽尔曼所做的工作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哲学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与缺少对苏联哲学的分析反思，有很大关系。

## 二

关于后苏联俄罗斯哲学的评价，值得重视的是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古谢伊诺夫院士的意见。古谢伊诺夫认为，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哲学家退回书房进行了十分紧张近乎疯狂的工作，在哲学领域取得了以四卷本《新哲学百科全书》为代表的一系列成果，为俄罗斯文化所作的贡献可以和“白银时代”相媲美。<sup>②</sup>不过也有负面现象：

人们看到的是一幅忙碌紧张的图景。从图书质量、品种以及选题的

---

① 即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编写于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这一节由斯大林撰写，阐述了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后以《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名出版单行本。该书在一个时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读本，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

② Гусейнов А.А. Философия---мысль и поступо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12. С.435-436.

准确性等方面看，与 20 年前相比，哲学生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点无需研究证明。但是也能感觉到来自社会的不满，能听到有人问：哲学家先生，你们在干些什么呢？在哲学家那里也能感受到这种不满。

……

现在我们的哲学显示出脱离实践、专业范围狭窄的倾向。哲学在俄罗斯能成为这样的吗？社会允许它成为这样的吗？在我看来，不会的。无论是哲学本身还是社会，都不会接受这种哲学。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哲学在作为某种整体化知识的功能中，倾向于同时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指示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景。一旦哲学拒绝这样的功能，东正教就会出来取代它。<sup>①</sup>

他还对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哲学提出批评：

近年来我们有很多收获，但面前仍有非常重要的挑战需要我们回应。我们谦恭地把俄罗斯的精神领域拱手让给了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神学家，自己则转而去过生产车间的那种生活。这样自己把自己排除在意识形态责任之外，可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是正确的、必要的，有利于伤口的愈合，但它作为一种战略方向未必是有成效的。<sup>②</sup>

他还说：

的确，俄罗斯总是以自己的创造天才和精神潜力著称于世。但在最近 15 年，必须承认，它不能为世界提供任何东西，任何东西都不能提供！问题不在于它没有涌现出新的世界级的哲学家（天才的出现没有规律，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为什么会有天才人物降世）。令人吃惊的不是这一点。在俄罗斯，不论什么样的重大历史事变都伴随着智力和精神

---

① Гусейнов А.А. Философия---мысль и поступо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12. С.760-761.

② Гусейнов А.А. Мы, философы России...// Вестник РФО. 2005. №.1. С.30.

上的突破。只要提一下赫鲁晓夫解冻时期诗歌、文学、电影、哲学的爆发式的繁荣就可以了。现在呢？生活制度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意识的高层次上没有任何反响。<sup>①</sup>

作为俄罗斯哲学研究所所长，古谢伊诺夫院士主要从宏观上批评俄罗斯哲学界没有关注苏联解体这一重大现实问题，没有承担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他的批评是准确的。2005年俄罗斯第四届哲学大会在莫斯科大学举行，普京总统在贺信中说：“今天俄罗斯人文领域最紧迫的研究方向之一，是思考俄罗斯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文化特色。我相信，借助于以往杰出人物的科学遗产和精神遗产，你们一定会为深刻全面地分析这些重要哲学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sup>②</sup>这实际上是向俄罗斯哲学界提出具体要求，要求哲学家们研究俄罗斯在全球化进程中应该扮演的角色，研究怎样才能保留俄罗斯的民族特色和文化特色，其背后暗含着对哲学界的批评。这届俄罗斯哲学大会的决议说：“俄罗斯哲学家确认，必须认真思考俄罗斯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同时，必须维护那些赋予俄罗斯文化以独特性、不可重复性，给予俄罗斯文学、哲学、音乐和科学以世界声誉的特点。……因此，继续民族哲学传统，创造性地发展那些伟大俄罗斯哲学家的遗产，有着重大意义。”<sup>③</sup>这表明，俄罗斯哲学界承认普京总统对自己的要求与批评是正确的，他们的确对俄罗斯的文化特点重视不够，而且没有着重研究现实问题。这也正是古谢伊诺夫的看法。

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И·А·戈巴佐夫这样评价2005年举行的第四届俄罗斯哲学大会：“我失望。任何思想上的进步都没有。话很多，却没有思想。……我主持了历史哲学分会的工作，许多与会者文理不通的发言让我吃惊。人们简直不再自我修养了。他们甚至不能清楚明白地表述自己的观点，

---

① Гусейнов А.А. Философия---мысль и поступо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12. С.450-451.

② Телеграмм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В.Путина// Вестник РФО. 2005. №.2. С.15.

③ Итоговая резолюция IV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конгресса// Вестник РФО. 2005. №.1. С.13.

信口开河。要是大学生考试这样说，我会让他们全都不及格。”<sup>①</sup>他严厉批评会议内容脱离实际。他的印象是：好像我们的哲学家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

这样的哲学不可能赢得社会的尊重。戈巴佐夫说：

在德国和法国，社会需要哲学。这种需要在德国具有理论的性质，在法国具有实践的性质。

至于俄罗斯，那么按照П·И·拉甫罗夫的意见，在我们这里，哲学既没有实践意义，也没有理论意义。社会不需要它。因此有各种各样西方哲学家的拥护者，但是没有自己的哲学学派和思潮。<sup>②</sup>

其结果是，第四届俄罗斯哲学大会有 2800 名哲学家出席，却没有一家新闻媒体到场。

为什么俄罗斯哲学领域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负面现象？如普京总统和古谢伊诺夫院士所说，原因在于哲学界没有结合俄罗斯文化的特点对生活制度以及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的重大变化作出反应。社会迫切需要哲学家就这些变化及其带来的问题提供自己的意见，然而哲学家们未能重视这种社会需求，退回书房搞学院式的研究，自然令人失望。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出问题：为什么俄罗斯哲学家们没有重视这种社会需求，没有紧紧抓住苏联解体这一社会巨变带来的各种紧迫问题？我认为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他们至今仍然生活在苏联解体的阴影中，没有摆脱这场社会“地震”的影响。

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不成功的改革中，人们看到的往往只是国家解体、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当然这些都是客观事实，然而只是现象，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内容。苏联这个强大国家因改革失败而解体，以及随后近 10 年的社会动荡，在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犹如发生了一场强大的地震，广大俄罗斯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失去了方向和目标，甚至失去了文化自信。许多

---

① Гобозов И.А. Субъективные заметки объективного наблюдателя// Вестник РФО. 2005. №.2. С.62-63.

② Там же. С.63.

学者指出，上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使俄罗斯一夜之间回到了 100 年前，“俄罗斯向何处去？”向东还是向西？又成为俄罗斯人的艰难选择。

与东西方世界的关系是俄罗斯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基本的问题。斯拉夫派和西欧派早就不存在了，但是他们争论的问题事实上一直存在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处乃至国家发展的实践之中。布尔什维克发动并实施的社会主义实验，实际上是民粹派运动的继续，核心思想是“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在具有明显东方色彩的落后的俄罗斯直接建设社会主义。苏联在上世纪 70 年代陷入停滞，在冷战中遭到失败，表明这条路走不下去了。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建设市场经济，苏联的社会思潮急剧转向西方。1990 年，32%的苏联人主张以美国为榜样，同样有 32%的人主张以日本为榜样，另外有 17%和 11%的人认为苏联的榜样应该是德国和瑞典。就是说，有 95%的人主张走西方的道路。<sup>①</sup>在当时，“回到欧洲大家庭”，“走人类文明共同的道路”，是非常流行的口号。苏联共产党的下台，标志着对抗西方道路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然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市场经济建设步履维艰，公民社会建设困难重重，民众生活日益艰难，国家地位一落千丈，表明走西方化的道路也未能获得预想的成功。到上世纪 90 年代末，俄罗斯陷入了深刻的困境。<sup>②</sup>

这给俄罗斯哲学界带来巨大的冲击，因为哲学家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 И·Т·弗罗洛夫的出色工作，从 70 年代起，全球性问题研究成为苏联哲学的中心课题。全人类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只有社会民主才能使人类避免陷入全球性灾难，这些思想被大多数哲学家所接受，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哲学基础。弗罗洛夫本人则从《共产党人》主编（1986 年）到戈尔巴乔夫的助手、《真理报》主编、苏共中央书记，1991 年又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哲学家在苏联改革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不仅如此，哲学家在苏联解体和叶利钦改革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哲学家 А·С·齐普科 1988 年底发表长文《斯大林主义的根源》，批评斯大林、列

---

① 《消息报》1995 年 10 月 13 日。当日《消息报》披露的材料还表明，到 1995 年，由于西方化改革的失败，认为西方模式适合俄罗斯的人总共不到人口的 25%。

② Чумаков А.Н. Культурно-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диалог как способ решения проблем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Вестник РФО. 2012. №3. С.37.

宁，矛头直指马克思。到 90 年代初，支持走西方民主化道路的人在哲学界占多数，他们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人充当了叶利钦改革的社会基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失败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在哲学家心灵深处造成强烈震撼，使他们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他们两次给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两次都失败了。

正如古谢伊诺夫所说，社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正是需要哲学家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应该从哲学上对 100 多年来俄罗斯的发展道路加以总结，对俄罗斯改革的得失作出分析，对苏联哲学作反思评价，对俄罗斯人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为社会贡献自己的智慧，同时明确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与任务。但是俄罗斯的哲学家们一直没有从国家解体引发的精神地震中清醒过来。哲学家积极参与并指导的改革的失败，给哲学的形象带来负面影响，使哲学家们心存自责，甚至失去自信，失去方向。退回书房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第二，它与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有关。我们知道，许多重要的俄罗斯思想家在剖析俄罗斯民族性格时都指出，好走极端是俄罗斯人的特点。1999 年去世的著名俄罗斯文化史专家 Д·С·利哈乔夫院士曾说：“在俄罗斯民众中善与恶之间的摆幅特别大。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极端性的，从一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端的民族，因此这是一个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sup>①</sup>俄罗斯哲学界对苏联的兴亡漠不关心以及对苏联哲学很少问津，与俄罗斯人的这种民族性格不无关系。由于这种民族性格，苏联、苏联哲学、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只是作为历史的一页被简单地翻了过去，再也引不起大家的兴趣。哲学家退回书房，努力工作，成果累累，但是对自己经历的这场重大历史巨变却视而不见，忽视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古谢伊诺夫说哲学逐渐“成为一件专业范围狭窄、脱离实际的事情”，是完全正确的。不关注生活现实的理论，

---

① Д·С·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第 19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哲学家 В·Г·格洛霍夫引用 1867 年 12 月 29 日新闻出版检查员 А·В·尼基坚科日记中的话说：“俄罗斯是个奇怪的国家。这是一个形形色色的试验——社会的、政治的、甚至道德的试验大行其道的国家。与此同时，什么东西都不可能在俄罗斯长久扎根……。它的命运总是在摇摆之中，总是在无意识中由一种生活方式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格洛霍夫说：“很遗憾，这些话在今天仍然没有失去意义。”（《俄罗斯哲学学会通报》2010 年第 12 期，第 3 页。）

生活现实也不会关注它。人们对今天的俄罗斯哲学提出的批评、它所受到的冷遇，都和它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有关。

今天由昨天发展而来，要关注生活现实，就必须对苏联、苏联哲学、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进行反思。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哲学恰恰没有从事这项工作。这是最令人遗憾的事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奥伊泽尔曼所做的工作显得十分难能可贵。

### 三

俄罗斯哲学因为没有关注现实生活中的迫切问题而招致社会不满，它要想有所创新发展，得到社会的肯定，必须对一些问题作出回答。那么，这些问题是什么？

毫无疑问，应当研究的问题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按照普京和古谢伊诺夫的说法，主要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问题。苏联解体是几百年来俄罗斯人伟大理想的失落，是他们创建的超级大国的垮塌，是在冷战中失败的标志。苏联这个伟大国家的解体使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奉行新帝国主义，试图称霸全球。俄罗斯曾作了许多努力想要“回到欧洲大家庭”，走“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道路”，一直尝试与西方国家对话，但是往往连平等的地位和起码的尊重都得不到。西方国家作为胜利者藐视一切，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唯一可能的选择，不仅西方的科学技术要走遍全球，西方文化也要征服世界。美国政治家放言：凡是不与我们站在一起的，都是我们的敌人！对俄罗斯而言，这是无法接受的巨大耻辱。哲学家 M·A·马斯林指出：

当苏联存在的时候，绝大多数关于俄罗斯宗教哲学的著作属于西方作者。对于俄罗斯的宗教思想，他们往往是抱着同情的态度来写作，因为他们把它视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俄罗斯方案”。但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对俄罗斯哲学中各种思想的评价顺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苏联学家的后继者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在对西方和西方价值观念的态度上，俄

罗斯宗教哲学比共产主义的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更具敌对性。……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反对资本主义，但它们是彻头彻尾的西方产物。说到底，马克思主义不是诞生在中国或者印度，而是欧洲哲学的最新话语。今天在西方可以看到，与苏联存在时相反，俄罗斯特有的哲学、政治传统中那些反西方的内容遭到激烈的批判。<sup>①</sup>

如普京所说，思考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文化特色，成为俄罗斯必须予以深刻关切的重大问题。这也是俄罗斯人的文化认同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贡献，是俄罗斯哲学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俄罗斯哲学走向繁荣并赢得社会关注与尊重的唯一途径。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通过历史反思我们会发现，在斯大林去世以后的苏联哲学中，有十分宝贵的、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思想资源。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哲学发展最基本的倾向是人道主义化。这一倾向最早出现在认识论领域，随后体现在苏联哲学的一切方面，最集中的体现是弗罗洛夫代表的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苏联哲学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开始于1972年，到80年代成为苏联哲学的热点，甚至是中心问题，代表性成果是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其基本思想是：当前有一系列生态、资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等全球性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为此需要再次明确人是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必须在肯定科学理性作用的同时，用道德观念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之伦理学化；必须认识到全人类共同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甚至民族利益；必须努力使社会生活民主化，实现对物质生产和全部社会生活的自觉管理。这种人道主义以及它所代表的苏联哲学，极大地影响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联的历史命运，离开了对它的反思认识，不可能深刻理解俄罗斯历史中的这场重大变化。

除此之外，它在理论上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是苏联哲学家对人类和人类哲学思想作出的重大贡献。1968年罗马俱乐部成立，率先开始了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此后这些问题引起了

---

<sup>①</sup> Маслин М.А.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как диалог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й//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3. №3. С.46.

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关注，提出了许多宝贵思想。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学者都是从技术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应对全球性问题以维护自己的物质利益，只有苏联哲学家从对人的本质的全面理解和对整个人类的命运的关注出发，把全球性问题与工业文明的价值目标联系起来，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反思生命的意义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关系，提出使科学技术伦理学化，用道德标准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运用，从而把对问题的认识引向了更深刻更重要的层次。也只有苏联哲学家在全球性问题的背景下提出新人道主义，把产生于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为人类文明转折指出新的方向。苏联哲学家在这个领域的工作领先于全世界。

其次，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普京总统要求哲学界“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文化特色”，提出“继续民族哲学传统，创造性地发展那些伟大俄罗斯哲学家的遗产，有着重大的意义”。第四届俄罗斯哲学大会的决议也说，“必须维护那些赋予俄罗斯文化以独特性、不可重复性，给予俄罗斯文学、哲学、音乐和科学以世界声誉的特点。……因此继续民族哲学传统，创造性地发展那些伟大俄罗斯哲学家的遗产，有着重大的意义。”早在 19 世纪 30 年代，俄国的斯拉夫派就对西方国家盛行的物质崇拜以及科学理性对人的支配和社会分裂、道德沦丧提出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索罗维约夫、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以及他们代表的俄罗斯传统哲学，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继续发扬斯拉夫派的基本精神，对重物轻人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加以批判。苏联哲学界对全球性问题的重视，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产生于俄罗斯文化在 20 世纪后半叶与导致全人类生存危机的西方文化的新冲突之中，它们正是俄罗斯传统文化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活生生的体现，是俄罗斯民族哲学传统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延续与创造性发展。

最后，弗罗洛夫等苏联哲学家当年研究的全球性问题在今天一个都没有解决，而且更为严重。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气候变暖更加严重，全球金融危机和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对人类的威胁远超以往。人类面临的生存威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苏联哲学家所做的工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这样的角度看，可以说时代在呼唤苏联哲学。

除此而外，由于适应了现实生活的需要，苏联哲学传统在后苏联时期并没有中断，它仍在延续。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В·С·斯焦宾院士所做的工作。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起，斯焦宾院士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技术文明”（Техногенн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理论，并且至今仍在对它加以深化、完善与宣传。在第四届俄罗斯哲学大会的报告中，他这样说：“今天可以肯定一点，现代文明正处在发展的转折阶段。一般来说，这不是什么新思想。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早就对它作过宣传。需要改变发展战略，因为各种全球性危机的日益严重对人类产生威胁，看起来这是很清楚的。”<sup>①</sup>产生威胁的根本原因，是文艺复兴以来逐步形成并在今天风行全球的技术文明，亦即把技术工艺的需要作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决定因素的文明，这是以技术工艺为“基因”的文明。威胁怎样才能被消除？唯一的途径是彻底改变技术文明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创建一种新的文明。关于这种新的文明，斯焦宾强调它将是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并强调俄罗斯文化和中国文化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对В·И·维尔纳茨基、Л·Н·托尔斯泰、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中国孔子、老子的思想作了介绍，给予高度评价。例如他说：在东方国家，“真理与道德是不可分割的，道德上的完善被认为是认识真理的条件与基础。”<sup>②</sup>科学精神应当与人道主义理想和价值结合，“这种结合是在对科学技术纲领、方案进行伦理学评价的过程中实现的，它将是获得真理性认识的条件”。<sup>③</sup>

显而易见，斯焦宾思想的基本精神与弗罗洛夫完全一致。甚至他也和弗罗洛夫一样，强调必须对科学技术实行伦理学调控。他的这些思想在形成时间上晚于弗罗洛夫，但是他结合遗传学、文化哲学的最新成果提出“技术文明”（准确地说是“以技术为基因的文明”）概念，并对克服人类面对的危机的途径作了新的、视野更广阔的分析探讨，把弗罗洛夫开始的工作推进到新的高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充分说明，苏联时期以弗罗洛夫为代表的

---

① Степин В.С. Философия и поиск новых ценносте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Вестник РФО. 2005. №.4. С.10.

② Человек Наука Цивилизация.К 70-летию академ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кмии Наук В.С.Степина. М., 2004. С.85.

③ Степин В.С. Философия и поиск новых ценносте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Вестник РФО. 2005. №.4. С.21.

苏联哲学家所做的工作，至今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且仍在继续。<sup>①</sup>更值得注意的是，斯焦宾这样理解哲学的未来：“哲学的未来取决于它对文明未来的预见能力。今天正是一个需要有新的世界观思想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哲学将成为一种实际的需要。”<sup>②</sup>按照这样的认识，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是俄罗斯哲学乃至全世界的哲学能不能为自己赢得未来的关键！

以弗罗洛夫和斯焦宾为代表的苏联时期和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哲学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意义极其重大。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的继续生存构成严重威胁，人类文明面临历史性转折，应该说这在今天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有无数的思想家在为克服这种威胁进行艰苦探索。但是我认为，如斯焦宾院士所说，出路只能是通过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结合为人类文明确立新的价值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对于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意义重大，但是俄罗斯哲学也至关重要。俄罗斯文化、俄罗斯哲学对人的灵魂作了深入剖析，从中发现，西方工业文明（亦即技术文明）盛行技术理性崇拜，是造成物对人的奴役的真正原因。我曾经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二二得四就是死亡的开始”，意义超过 20 世纪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的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不能说只有俄罗斯哲学能够拯救人类，但是在改变技术文明的价值目标从而消除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方面，俄罗斯哲学可以作出独特的、重要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俄罗斯文化有深刻的宗教性。在当今世界人人都在关心自己，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哲学则关心全人类。从改造人的灵魂重新确立人类文明价值取向这一角度看，它是人类未来文明的希望所在。我们希望看到俄罗斯哲学界投入更大的力量继续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对弗罗洛夫、斯焦宾所做的工作予以更多的关注。批判技术文明解决全球性问题，进而为人类确立新的价值目标，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需要。谁能抓住这种需要，谁就能把握时代精神，就会有光辉灿烂的未来。俄罗斯哲学最有可能、最有能力承担这样的历史使命。

但是，俄罗斯哲学要继续和发展弗罗洛夫、斯焦宾的工作，在人类文明

---

① 这里顺便指出，今天的俄罗斯有许多学者与斯焦宾观点一致。参见 Садовнич В.А. Знание и мудрость в глобализирующемся мире// Вестник РФО. 2005. №.4. С.34-49.

② Человек Наука Цивилизация.К 70-летию академ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кмии Наук В.С.Степина. М., 2004. С.86.

转折中发挥积极作用，首先必须对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哲学加以反思，总结其经验教训和理论得失。正是在这里，奥伊泽尔曼院士在苏联解体后所做的工作，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

---

**【Abstract】**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re appeared surprisingly enormous academic works in Russian philosophy, nevertheless, it has been neglected or even criticized in the society. The reason lies in that philosophers close themselves in studies, paying no attention to various practical issues related to Russian society,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or the globalization. Soviet, Russian philosophy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Gorbachev's perestroika and Yeltsin's policy of full westernization, however, the failure of reforms and Westernization have greatly blown the theoretical self-confidence of Russian philosophers. So far, the Russian philosophy community has not recovered from the spiritual earthquake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failing to find its place in today's real life.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philosophers should have the courage to face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era, based on deep reflection and drawing lessons. Mr. Oye Zelman, Russian academician, has set a good example for Russian philosophers in his perseverance in reflecting on Marxism with great achievements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ongoing study on global issues has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hich is also the hope of Russian philosophy.

**【Key Words】** Dilemma of Russian Philosophy, History Reflection on Soviet Philosophy, Cultural Confidence

**【Аннотация】** Количество научных достижений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удивительно велико, однако в обществе ей не уделялось должн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она даже подвергалась критике. Причин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сами философы занималис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и, «заперев себя в своих кабинета», и не обращали внимания на различны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связанные с российским обществом, распадом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с глобализацией. Советская/росси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сыграла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горбачёвских реформах и вестернизации Ельцина, но провал реформ и неудачные попытки встать на путь 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 нанесли большой удар по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самоувер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их философов.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до сих пор не оправилась от вызванного распадом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душевного потрясения, и не нашла своё место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еальной жизни. Для решения данных проблем философы должны смело взглянуть в лицо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глубоко поразмыслить над ней и извлеч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уроки. С момента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о 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дня настойчиво переосмысливающим марксизм и имеющим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и достижения примером российских философов является академик Ойзерман. Надежда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также лежит в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ом значении и наполненности по сей день продолжающегося изуч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Дилемма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и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культурная самоуверенность

---

(责任编辑 阎德学)

## 凡登布鲁克与“俄国神话”

洪亮\*

**【内容提要】**魏玛共和政体（1918-1933）虽短寿，但其思想界的活跃程度却非同寻常，在这个精神探索与意识形态冒进并存的动荡时段中，“德国道路”及其特殊性借时势之力一跃而成为左右知识界的核心问题，因为其不仅关涉国家的公共政治，也触及德国国民被一战所损伤的自尊。在此意义上，对德国“特质”的追究已不再是澄明辨究的“学术”（Wissenschaft），而是生死攸关的“斗争”（Kampf），这种强烈的实践导向引发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大量看似激进、实则保守的民族主义暗流。德意志民族自我意识的塑造一方面离不开对英法的妖魔化，另一方面则又有赖于将其“理想的自我”抬高为“神话”，并以此来区分敌友。神秘的俄罗斯正是在此意义上成为德国“神话”的注脚，并得到魏玛共和国知识精英的热烈追捧。1906至1919年，由凡登布鲁克策划的德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问世，将德国的俄国热推至新的高潮，在德国知识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异军突起，被视为道破现代及其局限的先知。对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而言，这个接受史案例提供了管窥现代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思想切片。

**【关键词】**凡登布鲁克 青年保守主义 东方意识形态 陀思妥耶夫斯基

**【中图分类号】**D83/87(512.516)**【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3)06-0147-(20)

\* 洪亮，德国图宾根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 引言：谁是凡登布鲁克？

凡登布鲁克全名为艾图缪勒凡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 1876年4月23日出生于德国莱茵地区的索林根(Solingen)。1894年高中肄业;两年后辗转前往柏林,从事文学批评与政论写作<sup>①</sup>;1902年,凡登布鲁克前往巴黎,后游历欧洲;一战前夕,他返回德国,进入德国战时军方宣传部门;1919年创立著名的“六月俱乐部”(Juni-Klub)<sup>②</sup>,宣扬德意志民族价值,批判陷入危机的魏玛共和政体;1924年年底,凡登布鲁克在多年罹患神经官能症之后最终精神崩溃,于次年5月30日在柏林一里希特菲尔德神经科医院自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试图区分德国战前保守主义思潮与纳粹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革命”(Konservative Revolution)<sup>③</sup>讨论逐渐浮

---

① 凡登布鲁克著作名录参见 André Schlüther, Moeller van den Bruck. Leben und Werk (《缪勒凡登布鲁克:生平与著述》), Köln/Weimar/Wien 2010, S.405-416.

② 详见本文第一部分。

③ “保守主义革命”,这个被布奥耶(S.Breuer)称为“晚近意识形态史写作中最成功的创造之一”的概念,来源于瑞士政论作家、学者艾明穆勒(Armin Mohler)。1950年,穆勒在德国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保守主义革命在德国:1918-1931》(Die Konservativ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918-1931, Stuttgart 1950),由此引发欧洲学界关于“保守主义革命”的大讨论。该书后来多次再版并增订“保守主义革命”流派及核心人物名录表(最新版为2006年版)。1967年,穆勒在联邦德国获得康拉德—阿登纳奖。以下文献仅是凡登布鲁克与“保守主义革命”研究的冰山一角 K.v.Klemperer, Konservative Bewegungen zwischen Kaisereich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帝国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保守运动》), München 1957; H.-J. Schwierskott, 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 und der revolutionäre National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艾图缪勒凡登布鲁克与魏玛共和国的革命民族主义》), Göttingen 1962; F.Stern, Kulturpessimismus als politische Gefahr. Eine Analyse nationaler Ideologie in Deutschland (《作为政治危险的文化悲观主义:剖析德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Bern 1963; S.Breuer, Anatomie der konservativen Revolution (《保守主义革命的解剖学》), Darmstadt 1993; Chr. Gartska, 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 und die erste deutsch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Dostojewskis im Piper-Verlag 1906-1919 (《艾图缪勒凡登布鲁克与皮普出版社首部德语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1906至1919)》), Frankfurt 1998; B.Petzinna, Erziehung zum deutschen Lebensstil. Ursprung und Entwicklung des jungkonservativen „Ring“-Kreises (《通向德意志生活风格的教育:青年保守主义“社团”—圈子的起源与发展》), Berlin 2000; R. Woods, Nation ohne Selbstbewusstsein. Von der Konservativen Revolution zur Neuen Rechten (《没有自我意识的国家:从保守主义革命到新右翼》), übers. v. W.Sievers und H.Siefken, Baden-Baden 2001; G.A.Balistreri, Filosofia della konservative Revolution: 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 (《保守主义革命的哲学:艾图缪勒凡登布鲁克》), Milano, 2004.

出水面，凡登布鲁克重又受到关注，被视为魏玛共和国时期“青年保守主义”（Jungkonservatismus）<sup>①</sup>运动的核心。2010年以来，德国学界连续出版了三部涉及凡登布鲁克的专著，先后聚焦于他早年在柏林的文学活动、“六月俱乐部”的机关报《良知》（Das Gewissen）周报，以及他的“现代式的反现代”立场<sup>②</sup>，对于凡登布鲁克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期。本文的关注点是凡登布鲁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策划并陆续推出的德语世界首套《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F. M. Dostojewski: Sämtliche Werke）和他的“东方意识形态”（Ostideologie）的关系。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述凡登布鲁克的“青年保守主义”；第二部分澄清其“东方意识形态”的内涵；第三部分着重分析凡登布鲁克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撰写的七个前言；第四部分则对凡登布鲁克的“俄国神话”给出适当评价。

## 一、凡登布鲁克的“青年保守主义”

从字面意义来看，“青年保守主义”（Jungkonservativismus）这个词汇似乎自相矛盾，因为“青年”和“保守”显然代表两个不同的精神方向。但在“保守主义革命”大讨论的始作俑者艾明穆勒（Armin Mohler）看来，这种内在张力恰恰表明了其与旧保守主义的差异。<sup>③</sup>如果说法国大革命以降的旧保守主义对传统和权威的保存（conservatio）过于被动，那么“青年保守主义”则试图通过主动的抗争来保存。凡登布鲁克对此曾给过一个经典的定义：

---

① “Jungkonservativismus”一词也可译为“新保守主义”，但这种译法既体现不出“Jungkonservativismus”与七十年代以降左右美国内政外交的“新保守主义”（Neokonservatismus）的根本差异，也无法凸显该词在“Jung”（青年）和“Konservatismus”（保守主义）之间的内在张力。

② 这三部专著分别为 André Schlüther, Moeller van den Bruck. *Leben und Werk*（《凡登布鲁克：生平与著述》），Köln/Weimar/Wien 2010；C.Kemper, *Das >>Gewissen<< 1919-1925: Kommunikation und Vernetzung der Jungkonservativen*（《1919至1925年间的〈良知〉周报：论青年保守主义者的交流与联络》），München 2011；V. Weiß, *Moderne Antimoderne. 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 und der Wandel des Konservatismus*（《现代式的反现代：艾图缪勒凡登布鲁克与保守主义的转变》），Paderborn/München/Wien/Zürich 2012。

③ A.Mohler, *Die Konservativ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918-1931*（《保守主义革命在德国：1918-1931》），2 Aufl., Darmstadt 1972, S.138ff.

“德国的保守主义完全忘记了，要被保存的东西最初都是一个要经过抗争才能争取到的东西；它忘记了，只有一再通过抗争而获得的东西才能被保存下来；这样，它便逐渐从保守主义的进攻蜕化为保守主义的防守。”<sup>①</sup> 保守主义真正要保护的對象并非静态的历史既成事实，而是历史中的自由主体动态的抗争行为（Tat）。对保守主义来说，进攻才是最佳的防守。凡登布鲁克在此突出了保守主义内部的启蒙元素，并将其设置为保守主义的主导性原则<sup>②</sup>。然而，这里的自由主体并非启蒙意义上的理性个体，而是整个现代德意志民族及其政经现实。在此意义上，“青年保守主义”是一种相对激进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强调德意志民族自我意识在抗争中的发展、在发展中的保存。<sup>③</sup> “六月俱乐部”正是凡登布鲁克借以宣传这种民族主义的政治平台。

1919年春夏之交，凡登布鲁克在柏林创建了“六月俱乐部”。初创时期的核心成员虽只有13人，但均为当时文化界的活跃人物。这其中有德意志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文化版主编费希特（Paul Fechter）、后来成为“六月俱乐部”机关报的《良知》（*Das Gewissen*）周报创始人维茨（Werner Wirths）、哲学家迪特里希（Albert Dietrich）以及著名的政治评论家贝姆（Max Hildebert Boehm）等。<sup>④</sup>很快，“六月俱乐部”便吸引了大量知识界、出版界精英的关注，会员人数不断增加，经费来源日趋充裕。随着影响力的逐步提高，“六月俱乐部”于1920年底迁入位于柏林默茨大街（*Motzstraße*）22号的“德意志保护边界及外国德国人联盟”（*Deutscher Schutzbund für das Grenz- und Auslands-Deutschtum*）办事处，迎来了社团发展的高峰期。托马斯曼、特洛尔奇、斯宾格勒等名人，此时都是“六月俱乐部”的座上宾。“六月俱乐部”中的“六月”（JUNI）一词提纲挈领，代表四

---

① Moeller van den Bruck, *Das dritte Reich*（《第三帝国》），Berlin 1923, S.201.

② Weiß 2012, S.28f. 保守主义与启蒙思想的争辩迫使其必须采用理性论证的方式表达非理性的思想质料，这导致启蒙的思想质素成为保守主义的内在环节，也促成了保守主义试图保存的“前现代遗产”的现代转型。关于这一论点的经典表述参见 K.Mannheim, *Konservatismus. Ein Beitrag zur Soziologie des Wissens*（《保守主义：论知识社会学》），hrsg. v. D.Kettler, Frankfurt, 1984; M. Greiffenhagen, *Das Dilemma des Konservatismus in Deutschland*（《德国保守主义的两难》），Frankfurt, 1986.

③ 这种对民族自我意识的强调，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欧洲新右翼（*Neue Rechte*）重新认同凡登布鲁克的重要原因，参见 R. Woods 2001, S.173ff.

④ 参见 Schlüter 2010, S.293ff.

个拉丁词汇的首字母：“JUVENUM UNIO NOVUM IMPERIUM”，意为“青年新帝国联盟”<sup>①</sup>。此时，在凡登布鲁克及“六月俱乐部”成员心目中的“新帝国”，只是德意志民族自我意识的一个替代表达，尚无具体的制度内涵。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未来的德意志民族？在写于1919年的《青年民族的权利》（*Das Recht der jungen Völker*）一书中，凡登布鲁克回答了这个问题。

《青年民族的权利》一书形成于凡尔赛协议签订前后，其关注点自然是德国战败后的政经处境。然而凡登布鲁克并不满足于仅仅罗列德国的损失与政治诉求，他试图借助“青年民族”（*Das junge Volk*）和“老年民族”（*Das alte Volk*）这一区分，来重新理解德国与其他参战国的关系。在凡登布鲁克看来，“民族”（*Volk*）本身并无青年、老年之分，一个民族的“青年”时期即是其自我更新的时期。“一个民族以青年的方式产生影响，就会变得年轻，它跳出窠臼，在自己新创造的世界里发生影响。”<sup>②</sup>当一个民族在自身汇集了足够的创造意志并勇于付诸行动之时，它就是“青年民族”。“青年民族”的基本标志是其生命力和增长诉求：“在青年民族身上存在着一种自然的推动力，作为一种自然发展过程的历史总是一再需要青年民族，人们可以从这些民族身上剥夺走一切，但剥夺不了它们的未来。”<sup>③</sup>“青年民族”代表历史的可能性和对历史现实的“价值重估”（*Umwertung*）<sup>④</sup>，它们的任务是在“相似命运”（*Schicksalsverwandtschaft*）中塑造出各自的自我。与此相对，“老年民族”的特征则是“遗产、占有、满足和享受，袭传的名誉和声望”<sup>⑤</sup>，它们的生命力逐渐下降，缺乏斗争意志与勇气，代表着僵化的历史现实性本身。那么，哪些民族才是“青年民族”，哪些又是“老年民族”呢？凡登布鲁克认为，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国、美国、俄罗斯<sup>⑥</sup>和日本可称“青年民族”，而协约国的两大巨头英国和法国皆为“老年民族”。这一区分显然跨越了协

---

① A. a. o., S.294.

② M. v. d. Bruck, *Das Recht der jungen Völker*（《青年民族的权利》），München 1919, S.24.

③ A. a. o., S.25.

④ A. a. o., S.42.

⑤ A. a. o., S.24.

⑥ 凡登布鲁克对俄国的描述时常前后矛盾，他既称俄国为“青年种族”，又称其为“青年民族”。在他的理解中，种族（*Rasse*）从发展阶段上要低于民族（*Volk*）。

约国和同盟国的战争界限。在他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质是英法两个“老年民族”与“青年民族”德意志之间的战争;法国对德国的仇恨、英国对自己利益的关注,使得它们利用了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从而挑起战争。<sup>①</sup>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结局并非同盟国的战败,而是“青年民族”展示了自己的实力,“老年民族”暴露了自己的衰败。凡登布鲁克认为,作为“青年民族”的德国就是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国;普鲁士代表了德意志民族的“青年原则”(Das Prinzip der jungen)。<sup>②</sup>1806年,普鲁士参加第四次欧洲反法战争并惨败;在此之后,普鲁士励精图治,推行政治、社会、军事及教育改革,实力骤增;1814年,普鲁士战胜法国,并最终在1871年统一全德。凡登布鲁克认为,普鲁士在1806至1814年间的卧薪尝胆和由此锻造出的以节俭、自制与尚武为特征的“普鲁士风格”(Das preußische Stil)<sup>③</sup>,是德意志民族重生为“青年民族”的基础。<sup>④</sup>未来的德意志民族就是能够完美体现“普鲁士风格”的民族。

## 二、凡登布鲁克的“东方意识形态”(Ostideologie)

凡登布鲁克认为,英法两国不仅是具体意义上的西方国家,更是抽象意义上“西方”原则的化身。“哪里充斥着文化、工业、交通、人群以及大都市,哪里就是西方。”<sup>⑤</sup>“西方”意味着工业化、城市化和“毫无民族性的民主”<sup>⑥</sup>;与此相对,“哪里有农民,哪里就是东方。”<sup>⑦</sup>“青年民族”全都处于“东方”,远离西方,“东方是它们神圣的、正在形成中的、现实的国土。”<sup>⑧</sup>东方象征着“青年民族”反民主、反城市文明的精神取向。尽管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德国处于中欧,且深受西欧影响,但作为德国政治核心的普鲁

---

① Bruck 1919, S.18.

② A. a. o., S.27.

③ M. v. d. Bruck, Das preußische Stil (《普鲁士风格》), München 1916.

④ Bruck 1919, S.27.

⑤ A. a. o., S.101.

⑥ M. v. d. Bruck, Der Aufbruch nach Osten (〈启程前往东方〉), in: Der Tag (《时日》) (03.04.1918).

⑦ Ebd.

⑧ Ebd.

士偏重东方的政治取向<sup>①</sup>，决定了德国可以成为一个在欧洲大陆上沟通“东”“西”的权力中心。在凡登布鲁克看来，普鲁士体现了德国的东方“使命”（Sendung），它在十八世纪对波兰、立陶宛的殖民便是明证。<sup>②</sup>更重要的是，德国在威廉时代（Wilhelm II）背离普鲁士的“东方”取向，失去了俄罗斯这个最重要的政治盟友，最终招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德国必须重新反思其对俄政策，从“东方”获取政治重生的机会。凡登布鲁克对俄国的重视不乏领土竞争的内涵<sup>③</sup>，但他更看重的是俄国能够帮助德国形成新的自我理解。为了摆脱对“西方”的依赖，德国需要俄国，而恢复与“东方国家”俄国的联系，能够拓宽德国的政治视野，增强其精神的广博性与自主性。<sup>④</sup>

凡登布鲁克对俄国的认知始于他的巴黎漫游时期。1902年，凡登布鲁克离开柏林，前往巴黎，广泛接触法国艺术界。1905年，他结识了一对来自爱沙尼亚的德裔姐妹，姐姐露茜·凯瑞克（Lucy Kaerrick）主修音乐教育学，后来成为凡登布鲁克的第二任妻子。通过她们，凡登布鲁克认识了旅居巴黎的俄国文学批评家梅烈日科夫斯基（D. Mereschkowski）和他的妻子吉皮乌斯（S. Hippus）。在这两位俄国名流的引介下，凡登布鲁克接触到了一批流亡法国的俄国知识分子，眼界大开。<sup>⑤</sup>凡登布鲁克早在柏林时期就读过梅烈日科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作为人与艺术家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sup>⑥</sup>，由此得知俄国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梅烈日科夫斯基本人相识之后，凡登布鲁克对现代俄国文学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梅烈日科夫斯基在世纪之交构思出的“第三约”此时也开始对他产生影响。1901年，

---

① 比如普鲁士曾把如今归属于俄罗斯的柯尼斯堡（Königsberg，即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首府加里宁格勒）定为普鲁士的政治中心。参 Schwierskott, S.132f.

② A. a. o., S.26.

③ 例如他抵制俄国的扩张，坚信其波罗的海省应归属德国，参见 Schlüter, S.268f.

④ M. v. d. Bruck, Rechenschaft über Russland（《解说俄国》），hrsg. v. H. Schwarz, Berlin 1933, S.185f.

⑤ Gartska 1998, S.116f.

⑥ 该书写于1899至1901年，早在1903年就被译成德文，对当时的德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参见 D. Mereschkowski, Tolstoi und Dostojewski als Menschen und Künstler. Eine kritische Würdigung ihres Lebens und Schaffens（《作为人和艺术家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其生平与创作的批判性认可》），übers. v. C. v. Gütschow, Leipzig 1903.

梅烈日科夫斯基在彼得堡召集“宗教哲学集会”<sup>①</sup>，从神秘主义与象征主义角度探讨宗教问题。他认为，基督教推崇的灵性原则导致贬抑肉体的禁欲主义，而东正教的未来在于对肉体的重新评价。借助灵与肉的二元对立和古代教会的三一论，梅烈日科夫斯基提出了“三个约”的理论。“第一约”是基督教传统中的“旧约”，是“圣父”的国度，它不仅包含以色列民族，也涵盖了一切“异教”文化，这是一个“肉体”原则与“灵性”原则高度谐和的时代。“第二约”是与“旧约”相对的“新约”，是“圣子”的国度，灵与肉之间出现张力，基督的十字架即是此种张力达到极致的象征。“第三约”是“圣灵”的国度，它在基督的复活中肇始，并在基督再临（Parusie）时完全实现，灵与肉重新达成谐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梅烈日科夫斯基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终结“第二约”并预言了“第三约”的先知。由于梅烈日科夫斯基的影响，凡登布鲁克意识到“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这个概念<sup>②</sup>所包含的宗教性与终末性内涵。1923年他写出了《第三帝国》一书。<sup>③</sup>

在梅烈日科夫斯基这里，凡登布鲁克发现了自己的“东方意识形态”的完美代言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虽不是革命家，但却关注“一种内在的、精神性的灵魂革命”<sup>④</sup>，并构想了“一个理想的、神秘且充满灵性”<sup>⑤</sup>的俄罗斯民族。和奥古斯丁、但丁相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政治的伟大思考基于宗教，他“既是保守主义者，又是神秘主义者”<sup>⑥</sup>；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批判了彼得大帝在俄国造成的“西化”，以保守姿态抵制一切使俄罗斯民族分崩离析的西方革命思潮，另一方面又强调了足以凝聚俄国人心的东正教及其神秘主义。凡登布鲁克认为，俄罗斯民族的未

---

① 该集会 1903 年被俄国东正教会取缔。

② 魏斯（Weiß）认为，凡登布鲁克在易卜生的话剧《国王与加利利人》（1873）中发现并接受了“第三帝国”这一观念，参见 Weiß 2012, S. 176ff.

③ 一战前后，“第三帝国”这一概念的政治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实际的宪法意义，这个概念几乎是反对凡尔赛协议、高扬德意志民族权利与抵抗魏玛共和国的一个斗争口号。凡登布鲁克的《第三帝国》一书也正是在此语境中使用这个概念的。纳粹时期，该书被一些纳粹高官视作为其扩张侵略政策张目的思想先驱，一时臭名昭著，但后来因其亲俄的“东方意识形态”与纳粹的敌俄政策格格不入而遭抛弃。

④ Bruck 1933, S.43.

⑤ A. a. o., S.48.

⑥ A. a. o., S.71.

来在于返归君士坦丁堡，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已为此做好了准备。

### 三、凡登布鲁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凡登布鲁克与梅烈日科夫斯基的精心策划下，慕尼黑皮普出版社于1906年夏季开始出版德语世界的首套《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F. M. Dostojewski: Sämtliche Werke)，总计22卷，直至1919年出齐。此出版项目的实际执行人为皮普出版社社长、在业界有“先锋出版家”<sup>①</sup>之称的莱因哈特·皮普(Reinhard Piper)<sup>②</sup>。这套《全集》的问世，一举奠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魏玛共和国知识界中的文学霸主地位，而皮普对该项目的操盘也在业内被誉为“出版家的大手笔”(Verlegerische Großtat)<sup>③</sup>。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直至二十年代中后期，《全集》不断再版，印数一路飙升。伽达默尔对这套《全集》在当时的风靡程度描述得相当传神：“皮普出版社红色封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仿佛火焰燃烧在每一张书桌之上。”<sup>④</sup>

这套《全集》由两个子部组成，第一子部包含五部长篇小说，即《群魔》(1906年出版)、《罗亭拉斯科涅尼科夫(罪与罚)》(1908年出版)、《卡拉马佐夫兄弟》(1908年出版)、《白痴》(1909年出版)和《少年》(1915年出版)。第二子部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合集和自传性文字：

---

① Garstka 1998, S.57.

② 1879年10月31日，莱因哈特·皮普出生于德国麦克伦堡地区(Mecklenburg)的小城苯兹林(Penzlin)。莱因哈特·皮普幼年生活环境优越，其父奥托·皮普(Otto Piper)曾官至苯兹林市市长。小皮普少年时期便对出版活动产生浓厚兴趣，在柏林和巴黎的数年游学过程中，他结识了诸如阿诺·霍尔茨(Arno Holz)、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以及理查德·德默(Richard Dehmer)等一批青年作家，这为其日后自立门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04年春，年仅二十四岁的莱因哈特·皮普(Reinhard Piper)在慕尼黑创立皮普出版社(R. Piper & Co.)。1912年，三十出头的皮普联合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和弗兰茨·马克(Franz Marc)，策划推出了对现代艺术史影响深远的《蓝骑士年鉴》(Der Blaue Reiter，汉译亦称“青骑士”)，由此皮普在德国出版界声名大噪。皮普在创社初期就十分关注俄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梅烈日科夫斯基、亚历山大·伊利亚斯贝格(Alexander Eliasberg)以及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Leonid Andrejew)的部分著作1910年之前就已通过皮普出版社面世。参见 Garstka 1998, S.55ff.

③ A. a. o., S.73.

④ H.-G. Gadamer: Selbstdarstellung (<自述>), in: Gadamer-Lesebuch (《伽达默尔读本》), hrsg. v. J. Grondin, Tübingen 1997, S.4.

《政论》(1907年出版)、包含八部短篇小说的《来自大都会的黑暗处》(1907年出版)、《死屋手记》(1908年出版)、《斯杰潘契科沃庄园及其居民》(1909年出版)、《舅舅的梦与其他幽默小说》(1909年出版)、《穷人》(1910年出版)、《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1910年出版)、《赌徒—永远的丈夫》(1910年出版)、《白夜》(1911年出版)、《小英雄—儿童故事》(1912年出版)、《文论作品》(1913年出版)和《自传性作品》(1915年出版)。<sup>①</sup>该《全集》的译者为凡登布鲁克的妻妹伊丽莎白·丽丝·凯瑞克(Elisabeth „Less“ Kaerrick)。主修哲学与艺术史的伊丽莎白颇具语言天分,通晓多门欧洲语言。在参与凡登布鲁克的翻译计划之后,伊丽莎白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变,此后终身都在为皮普出版社校订完善这套翻译,直至1966年在慕尼黑去世。伊丽莎白在翻译过程中一直使用笔名阿辛(E. K. Rahsin),由于皮普出版社承诺保密,她的真名在去世之后才被公布。伊丽莎白性格敏感内向,翻译力求精准,但她的译稿必须要通过凡登布鲁克的审阅和修改,而后者并不懂俄语。凡登布鲁克按照自己的德语语感对伊丽莎白的译稿作了不少增删,以求译文畅达。这种“合作”令伊丽莎白不胜其烦,也使得她的翻译日后在德国斯拉夫学领域深受诟病。<sup>②</sup>

为了借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宣传自己的“东方意识形态”,凡登布鲁克为这套《全集》撰写了十五篇前言以及导论性文章:《〈群魔〉导言:论陀思妥耶夫斯基》(1906年)、《〈来自大都会的黑暗处〉导言:论作为大都会诗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07年)、《〈罗亭拉斯科涅尼科夫(罪与罚)〉导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前提》(1908年)、《〈卡拉马佐夫兄弟〉前言》(1908年)、《〈死屋手记〉导言:论西伯利亚的可能性》(1908年)、《〈斯杰潘契科沃庄园及其居民〉导言:论俄国式的幽默》(1909年)、《〈白痴〉导言:论俄国神秘主义》(1909年)、《〈政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诸观念的政治前提》(1917年)、《〈白夜〉:彼得堡与城市之美》(1917年)、《〈斯杰潘契科沃庄园及其居民〉导言:论俄国式的幽默(新版)》(1917年)、《〈群魔〉:虚无主义与俄国革命》(1919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作为感伤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该全集的部分著作包含两卷甚至三卷,二十二卷为总卷数。

② Garstka 1998, S.72ff.

(1920年)、《〈赌徒—永远的丈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西方》(1920年)、《〈穷人—双重人格〉：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社会的伦理命令》(1920年)以及《〈罗亭拉斯科涅尼科夫(罪与罚)〉：全集导言》(1922年)。凡登布鲁克行文偏爱大字眼大意象，喜作全景式勾勒和离题发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文学质地与小说情节往往并不关注。<sup>①</sup>在这十五篇重点各异的导言中，他塑造出了一个堪称俄国神秘主义现代化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以此在德国知识界掀起一股“陀思妥耶夫斯基旋风”。从内容上看，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七篇导言较为宽泛，主要关注的是俄国民族性及种族问题，战后的八篇文章较为关注具体的政经问题。<sup>②</sup>下文将着重介绍他写于战前的七篇前言。

皮普出版社于1906年首先推出小说《群魔》，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营销的考虑。1905年，俄国爆发反尼古拉二世的革命运动，引起德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此时出版涉及革命问题的《群魔》，可谓“抓住了时代的脉搏”。

《〈群魔〉导言：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开宗明义，认为俄罗斯是一个至今仍然非常年轻的民族，“俄国诗歌是一个青年民族的诗歌。”<sup>③</sup>青年民族的特点在于其原始性，它们“接近大地与混沌”<sup>④</sup>，因此拥有未来，俄国人的原始性与力量感正是其神秘性所在。与曾经创造了辉煌文明的日耳曼人相比，俄国人更专注于对信仰的宣讲。<sup>⑤</sup>斯拉夫族群的神秘性孕育了一种深刻的内在性宗教，而这种宗教的最佳体现形态就是俄国诗歌。“在俄国诗歌的中心屹立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说俄国诗歌是俄罗斯的最伟大之处，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最伟大的俄国人。他是俄国最重要的天才。”<sup>⑥</sup>凡登布鲁克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性在于，“他表达了俄国式的疯狂和俄罗斯的悲剧”<sup>⑦</sup>，赋予自己的祖国以一种“神话”(Mythologie)。什么是“神话”？

---

① 凡登布鲁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并不熟悉，除了阅读德国当时其他一些译本之外，他主要通过伊丽莎白的翻译来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

② 比较 Garstka 的分析，a. a. o., S.83ff.

③ F. M. Dostojewski, Die Dämonen(《群魔》), übers. v. E. K. Rahsin, München 1906, S.VII.

④ Ebd.

⑤ Ebd.

⑥ A. a. o., S.VIII.

⑦ A. a. o., S.IX.

“一个民族的神话是其源始本质通过其源始形象而得到的表达。”<sup>①</sup>凡登布鲁克认为，“神话”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民族从其“史前史”阶段进入了“历史”阶段，现代欧洲诸民族及其文学正是在“神话”的基础上形成了历史意识。俄国情况特殊，它长期受专制禁锢，缺乏斗争式的二元论思维，虽有历史编年，却无塑造历史意识的“神话”，这导致俄罗斯诗人的创作无根无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现代俄国一个“神话”，使俄罗斯现代民族文学的发展有了基础。<sup>②</sup>在凡登布鲁克看来，这个“神话”的核心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殊的时间意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传统已然消失，未来成为其创作的核心主题。他在俄罗斯“民族灵魂”<sup>③</sup>的每一个内在的当下，都引入了对俄罗斯未来的关注，对未来片段式的超验把握，他描绘了一种贯穿当下的未来意识。<sup>④</sup>借助这种时间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推动了现代俄国历史意识的形成。与此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握到了现代生活内在的魔鬼性质”<sup>⑤</sup>，超越了18、19世纪英法文学对现代生活机械性的外在描述。

在《〈来自大都会的黑暗处〉》导言：论作为大都会诗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中，凡登布鲁克阐发了现代生活与大都会的关系。“大都会是现代生活的战场，它是现代人的胜利场，也是其骷髅地。”<sup>⑥</sup>新的文化形态、艺术形态与风格都以大都会孕育的生活形式（Lebensform）为前提。<sup>⑦</sup>大都会与大都会诗人相互依存，只有当大都会拥有了自己的性格的时候，大都会诗人才会出现。在凡登布鲁克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典型的大都会诗人，他描绘了“全世界最抽象、最人为的城市”<sup>⑧</sup>彼得堡。他的出现，标志着彼得堡成为了真正的大都会。相比俄国的彼得堡，德国的柏林还称不上大都会，因为它还没有自己的大都会诗人，其原因不在诗人，而在于柏林的不成熟，尚

---

① A. a. o., S.IX.

② A. a. o., S.Xff.

③ A. a. o., S.XIII.

④ Ebd.比较凡登布鲁克对未来主义（Futurismus）的关注，参见 Weiß 2012, S.151f.

⑤ A. a. o., S.XIV.

⑥ F. M. Dostojewski, Aus dem Dunkel der Großstadt (《来自大都会的黑暗处》), übers. v. E. K. Rahsin, München 1907, S.VII.

⑦ A. a. o., S.VIII.

⑧ A. a. o., S.V.

未形成独立的都市性格。<sup>①</sup>

对凡登布鲁克而言，彼得堡的特征在于其幻想性。“彼得堡是一个化身为城市的观念。”<sup>②</sup>它代表了彼得大帝挤入现代欧洲政治格局、面向未来的权力构想和权力意志；与此相对，莫斯科代表俄国静态的与退守过往的政治结构。彼得堡与生俱来充满不确定性，因为它所代表的政治方向前景晦暗。“整个俄国都处于一个过渡阶段，而代表这个过渡阶段的城市就是彼得堡。”<sup>③</sup>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描绘了彼得堡这个大都会的神秘外观，更展现了彼得堡人的内心世界。与彼得堡的过渡性质相对应，彼得堡人是一种处于过渡阶段的人（Übergangsmenschen）<sup>④</sup>，充满危险与不确定性。凡登布鲁克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着这种彼得堡现代人的救赎问题。与托尔斯泰不同，他盼望的并非农民的基督，而是“发源于人的生活”<sup>⑤</sup>的、崭新的和大都会的现代基督。凡登布鲁克坚信，救赎的到来，以现代人痛苦的积累为前提，“终有一天，当灾难太大、无法忍受之时，一种新的救赎形态便会为我们而来。”<sup>⑥</sup>

《〈罗亭拉斯科涅尼科夫（罪与罚）〉导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前提》一文强调，俄国十九世纪政经流变及其现代文学的出现，标志着斯拉夫人自我意识的形成。凡登布鲁克认为，斯拉夫人是“雅利安种族（Arische Rasse）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到来的种族、最古老同时也最年轻的种族。”<sup>⑦</sup>和其他喜好运动征伐的雅利安种族（比如日耳曼人）相比，斯拉夫人往往显得消极无为、被动挨打，但他们的强大之处恰恰在于这种隐忍力。斯拉夫人是“欧洲的宗教性民族”<sup>⑧</sup>，在凡登布鲁克看来，其他雅利安种族的宗教类型，要么是审美式的，要么是形而上学式的，唯独斯拉夫人的宗教是神秘主义式的，整个斯拉夫就是一个关注内在性的神秘民族。从政治角度来看，斯拉夫种族

---

① A. a. o., S.XIII f.

② A. a. o., S.XIV.

③ A. a. o., S.XV.

④ A. a. o., S.XVII.

⑤ A. a. o., S.XVIII.

⑥ Ebd.

⑦ F. M. Dostojewski, Rodion Raskolnikoff (Schuld und Sühne) (《罗亭拉斯科涅尼科夫（罪与罚）》), übers. v. E. K. Rahsin, München 1908, S.V.

⑧ A. a. o., S.XV.

未来需要返归君士坦丁堡和印度，而不是向西伯利亚和东海地区扩张。但总体而言，斯拉夫种族的强项不在其政治影响力。“假如俄国和斯拉夫有未来的话，那么这个未来将会是一个精神性的未来。”<sup>①</sup>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这个未来已可预期。

《〈卡拉马佐夫兄弟〉前言》篇幅最短。凡登布鲁克强调了这部著作的史诗性质：“《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史诗展现了一切黑暗性的和具有推动性的内在力量”<sup>②</sup>，也呈现了“俄罗斯对前方道路的探索”<sup>③</sup>。在这部小说中，凡登布鲁克认为自己不仅看到了斯拉夫民族的生活全景，也体验到了充满宗教意味的“永恒”<sup>④</sup>。但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只实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写作计划的一部分，还未触及作家所处时代潜在的现实冲突。他在1881年的突然去世向所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没能完成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凡登布鲁克在此援引梅烈日科夫斯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去世并非偶然，因为他身处其中的现实尚未终结，《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残缺，意味着俄罗斯未来的开放。

《〈死屋手记〉导言：论西伯利亚的可能性》专注于俄国与西伯利亚地区的差异。凡登布鲁克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死屋手记》时的立场为泛斯拉夫主义，他想塑造的形象是地道的俄国人，而非未来的西伯利亚人，但这部著作实际上却构成了“第一部西伯利亚人人类学和心理学档案”<sup>⑤</sup>。凡登布鲁克认为，民族是一种能够创生文化的“灵魂的权力”<sup>⑥</sup>，西伯利亚人就是这样一个潜在的民族，它可以产生出独立的文化形态。尽管俄国给西伯利亚地区带去了斯拉夫文化，但却无法掩盖西伯利亚地区的独特性，它既不属于亚洲，也不属于欧洲，它是一个“自主的权力”<sup>⑦</sup>，能够汇集一切足以

---

① A. a. o., S.XVII.

② F. M. Dostojewski, Die Brüder Karamasoff (《卡拉马佐夫兄弟》), übers. v. E. K. Rahsin, München 1908, S.XIII.

③ Ebd.

④ Ebd.

⑤ F. M. Dostojewski, Aus einem Totenhaus. Aufzeichnungen (《死屋手记》), übers. v. E. K. Rahsin, München 1908, S.XIV.

⑥ A. a. o., S.VII.

⑦ A. a. o., S.XIII.

倾覆俄国的革命元素。<sup>①</sup>俄国对未来的贡献主要是内在性与宗教性的，而西伯利亚则可创造出充满生机的“生命、事业、劳作和一种可能十分重要的文化”<sup>②</sup>，俄国应为西伯利亚人的民族发展提供空间。

《〈斯杰潘契科沃庄园及其居民〉导言：论俄国式的幽默》一文区分了幽默与讽刺（Satire），讽刺侧重批判与攻击，幽默则意在和解（Versöhnung）。在凡登布鲁克看来，西欧诸民族的幽默更接近带有批判性的讽刺，而斯拉夫式的幽默反而更贴近幽默的本意。德国人通过“意识和斗争”<sup>③</sup>与世界和解，俄国人则选择通过幽默，即使在被迫进行讽刺之时，他们也会立即为自己的讽刺表示歉意，因为剑拔弩张不符合他们内在的善良意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幽默包含讽刺性元素，但就根本而言，他的幽默是和解式的，借助这种幽默，他经受住了彼得大帝的改革在俄国造成的巨大精神分裂。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不存在西化派还是斯拉夫派的抉择，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和解，以及现代俄国自我意识在这种和解中的形成与发展。

《〈白痴〉导言：论俄国神秘主义》一文首先界定了神秘主义（Mystik）一词的内涵。凡登布鲁克认为，神秘主义是初民认知万物本质的尝试，是人类的“始源思想”<sup>④</sup>（Urdenken）。在不同的文化—民族传统中，神秘主义经历了不同的转变。在佛教传统中，神秘主义演变为一种“内在性伦理”<sup>⑤</sup>（Innenethik）；在基督教传统中，它发展成一种“启示宗教”<sup>⑥</sup>（Offenbarungsreligion）；在希腊人那里，神秘主义成为“审美性哲学”<sup>⑦</sup>（Ästhetische Philosophie）；在日耳曼这里，它变为“一种真正的世界观、战斗精神与生命智慧”<sup>⑧</sup>；在俄罗斯传统中，神秘主义体现为“感官性”<sup>⑨</sup>

---

① Ebd.

② A. a. o., S.XIII.

③ F. M. Dostojewski, Das Gut Stepantschikowo und seine Bewohner (Aufzeichnungen eines Unbekannten). Humorischer Roman (《斯杰潘契科沃庄园及其居民（无名氏手记）：幽默小说》), übers. v. E. K. Rahsin, München 1909, S.VIII.

④ F. M. Dostojewski, Der Idiot (《白痴》), übers. v. E. K. Rahsin, München 1908, S.V.

⑤ A. a. o., S.VI.

⑥ Ebd.

⑦ Ebd.

⑧ Ebd.

⑨ Ebd.

(Sinnlichkeit)。在以上各类平行的神秘主义亚类中，真理“以最原初的方式被启示”<sup>①</sup>，“世界本性”(Weltnatur)得以去蔽。“俄国神秘主义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疾病和最高意义上的健康，它是俄罗斯本真的特性。”<sup>②</sup>俄国神秘主义的特质就是其“感官性”或“身体性”<sup>③</sup>(Leiblichkeit)。它虽尚不具备日耳曼民族神秘主义的“精神性”<sup>④</sup>(Geistlichkeit)，但也可在未来发展出符合自身民族特性的“内在性文化”<sup>⑤</sup>(Innenkultur)。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表达了这种俄国神秘主义，但前者的表达是无意识的，而在后者那里，神秘主义已接近“精神性”。<sup>⑥</sup>凡登布鲁克认为，在《白痴》的主要人物梅什金公爵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出了俄国神秘主义的真正代表。梅什金公爵是俄罗斯与基督教的融合，通过这个形象，基督教在俄罗斯传统中被“重新估价”<sup>⑦</sup>(Umwertung)，而这将为俄罗斯未来文化价值的形成奠定基础。以神秘主义为核心的俄罗斯传统包含两个侧面：一个侧面偏重受难，另一侧面偏重攻伐；前一侧面能够整合基督教传统，比如东正教，后一侧面具有“日耳曼—西伯利亚特征”<sup>⑧</sup>。凡登布鲁克看重后一侧面，强调作为雅利安种族一支的俄罗斯应重视自己的“日耳曼—西伯利亚特征”。

凡登布鲁克的这七篇小文，与其说是小说导言，不如说是其“青年民族”理论的即兴发挥。在他看来，俄罗斯这个“青年民族”的生命力体现为一种内在而神秘的宗教性。即便彼得大帝引入西方元素，建立彼得堡这样的现代大都会，也改变不了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性。受梅烈日科夫斯基的影响，凡登布鲁克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界定为一个都市作家，认为他以一种“和解”式的幽默揭示了现代俄国内部的“东西”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盲目排拒西方，抱残守旧，他关注的是俄国宗教性未来的发展和俄罗斯民族在此宗教性之中的自我更新。凡登布鲁克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以未来为导向的时间意识就是现代俄国的“神话”，它为俄罗斯现代民族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基

---

① A. a. o., S.VII.

② A. a. o., S.IX.

③ A. a. o., S.VII.

④ Ebd.

⑤ A. a. o., S.X.

⑥ A. a. o., S.XI.

⑦ A. a. o., S.XIV.

⑧ Ebd.

础，也给同为“青年民族”的德意志作出了榜样。然而，从种族角度来看，斯拉夫种族的静寂无为使它落后于喜好攻伐的日耳曼种族，是整个雅利安种族的后进生；凡登布鲁克一方面希望斯拉夫种族学习尚武精神，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地希望限制其在波罗的海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扩张，希望它返回君士坦丁堡和印度。凡登布鲁克这些导言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内在张力，来源于他对梅烈日科夫斯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诠释的民族主义改造，反映了他对俄国的复杂心态。

#### 四、结语：“俄国神话”的用途及其滥用

在德语世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史中，凡登布鲁克策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影响深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sup>①</sup>虽然在十九世纪末就陆续被译成德文，但知名度不及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德语文学批评界一般倾向于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界定为左拉（Émile Zola）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者，把他作品中的神秘主义维度理解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尚未开化的“俄国性”。

《全集》面世之后，批评界风向骤变。“心理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逐渐被淡忘，他的“神话”、“危机”与“宗教”转而成为魏玛共和国知识界关注的焦点<sup>②</sup>，而他本人也被视为几乎与画家蒙克（Edvard Munch）齐名的表现主义作家<sup>③</sup>，声望远超托尔斯泰。

与梅烈日科夫斯基不同，凡登布鲁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没有基督教背景。他虽然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出了“大都会的基督”，但关切的是这一基督形象如何适应现代人的审美需求。“终有一天，当灾难太大、无

---

① 比如《穷人》、《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少年》、《群魔》与《卡拉马佐夫兄弟》这几部小说在 1889 年之前就被译成德文。

② M. Schult, *Im Banne des Poeten. Die theologische Dostojewskij-Rezeption und ihr Literaturverständnis* (《在诗人的魔力之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学式接受与其文学理解》), Göttingen 2012, S.65ff.

③ 参见 Th. Kampmann, *Dostojewski in Deutschland*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德国》), Münster 1931.

法忍受之时，一种新的救赎形态便会为我们而来。”<sup>①</sup>对凡登布鲁克来说，现代人的灾难积累到一定阶段，就能逼迫救世主到来，但这个救世主绝非基督，而是能够塑造欧洲政经新秩序的政治领袖。借助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形象，凡登布鲁克炮制出了“俄国神话”，并以此来支撑自己反魏玛宪政的“东方意识形态”。与同时期的很多民族主义者相似，他认为魏玛共和国是以英法为代表的“外来统治的象征”（Symbol der Fremdherrschaft），而能与“共和国”（Republik）这一法政概念相抗衡的概念之一便是“民族”（Volk/Nation）。<sup>②</sup>通过“青年民族”和“老年民族”这一区分，凡登布鲁克避开了凡尔赛协议确定的战后权力格局，转而从“民族价值”（Werte der Völker）的角度贬抑英法，褒扬德俄。在他这里，德国的“东方”就是普鲁士，而“东方意识形态”的实质就是德国要重新穷兵黩武，与此同时，俄国不能进行政治扩张，因为这与德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利益相冲突。凡登布鲁克篡改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泛斯拉夫主义，只许诺给俄国一个非政治的“精神性”的未来，因为俄国与德国虽同属“青年民族”，但“俄国神话”最终只是“普鲁士风格”的一个注脚而已。凡登布鲁克的“俄国神话”既不能证实，亦不能证伪，它发端于“民族共同体”朦胧暧昧的“审美性”，终结于邪恶的殖民扩张。与纳粹三十年代后期炮制出的关于雅利安人起源的“西藏神话”相比，凡登布鲁克的气质更偏文艺的“俄国神话”虽缺乏明确的种族主义与伪生物学特征，但在极端夸大德意志民族的“生存权”方面却与“西藏神话”如出一辙。<sup>③</sup>

---

**【Abstract】** Although it lasted quite short for the the Weimar Republic ( 1918-1933 ), yet it was extraordinarily active intellectually. During this turbulent period with coexistence of spiritual exploration and aggressive

---

① F. M. Dostojewski, *Aus dem Dunkel der Großstadt* (《来自大都会的黑暗处》), übers. v. E. K. Rahsin, München 1907, S.XVIII.

② Breuer 1993, S.80ff.

③ 冷战过后，一些欧洲新右翼试图重拾凡登布鲁克的“东方意识形态”，宣扬极端民族主义，自误误人，参见 G. Rohmoser/A. Frenkin, *Neues konservatives Denken als Überlebensimperativ. Ein deutsch-russischer Dialog* (《新保守主义思想作为幸存的命令式：一次德俄对话》), Frankfurt 1996.

ideologies, «German way» and its particularity leaped into core issues of the intellectual circle, due to its relations with the country's public politics concerning with the self-esteem damaged by the WWI. In this sense, the studies on German «characteristics» is no longer «Wissenschaft» but «Kampf» related with life and death. This intense practice orientation sparked a large amount of seemingly radical, but in reality, conservative nationalist undercurrents during the Weimar Republic. The German national self-consciousness, on the one hand, could not have been shaped without the demonization of Britain and France,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depended on elevating its «ideal self» as a «myth»,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between friend and foe. It was just in this sense that the mysterious Russia became footnote to German «myth», and was heatedly pursued by intellectual elites during the Weimar Republic. From 1906 till 1919, the publication of German vers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Dostoevsky*, organized by Van Den Bruck, pushed German Russian craze to new heights. Within the German intelligentsia, Dostoevsky became popular, regarded as a prophet speaking out limitations and essence of modernity. For today, a century later, this case has offered a glimpse into the modern German nationalism.

**【Key Words】** Van den Bruck, Youth Conservatism, Oriental Ideology, Dostoevsky

**【 Аннотация 】** Веймар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1918-1933) хотя просуществовала недолго, однако активность её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крайне необычна, в этот бурный период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духовных поисков и продвижения идеологий, «немецкий путь» и его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тали одними из основ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интересующих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ую среду, т.к. это было связано не только с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но и с травмой, нанесённой войной по самоуважению граждан Германии.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изучен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Германии уже не является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наукой» (Wissenschaft)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а «борьбой» (Kampf) между жизнью и

смертью, такая практика привела к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ю в период Веймар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ольшого количества, казалось бы, радикальных, а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х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подводных течений.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 немецкого народа,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неотделимо от демонизации Англии и Франции,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опирается на возвышения «идеального Я» до «мифа», и на данной основе друзья отличаются от врагов. Загадочная Россия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стала «сноской» для немецкого «мифа», по горячим следам которой и пошла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элита Веймар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 1906-1919 гг. выход в свет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ого ван ден Бруком перевода «Пол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сочинений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на немецкий язык привёл к новому пику немецкой любви к России, в кругах немец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философия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пережила стремительный взлёт,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ся как разоблачитель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и её ограничений.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дня, спустя столетие, принятие данн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случая позволяет нам заглянуть в идеологию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немец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Артур Мёллер ван ден Брук, молодо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восточн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Достоевский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俄苏问题

## 西方苏联学的内核与外延

于滨\*

**【内容提要】**冷战时期西方的苏联研究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对于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方苏联学与政治学理论之间构成了双向互动、多元协同的复杂共生关系。但由于西方苏联学所运用的真正的“内核”理论实际上只有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极权主义模式，因此，在冷战时期苏联信息资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西方苏联学为了丰富自身内容，提高对于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只能积极借鉴和吸纳苏联学之外的多学科理论，不断扩大自己的“外延”。这倒使得苏联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脱离了最初的极端性理论，形成了更为丰富的内容。然而，这种理论先行研究方法，在很多时候会显得削足适履，而造成西方苏联学学者在面对不断变化的苏联现实时生搬硬套既有理论的负面效果。

**【关键词】**西方苏联学 内核 外延

**【中图分类号】**D73/7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3)06-0167-(31)

冷战时期，西方的苏联学是一个极为庞大的体系。<sup>①</sup>它对西方政治学及国际问题研究理论的影响和冲击，至今仍在持续。<sup>②</sup>本文所要描述的是，西

\* 于滨，美国文博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

① 见杨成：“中国俄苏研究的范式重构与智识革命——基于学术史回顾和比较研究的展望”，《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1期，第28-34页；David Engerman, *Know Your Enem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Soviet Exper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 于滨：“从X到Y：西方‘苏联学’的兴与衰”，《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1期，第71页。

方苏联学的发展及其与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关系不是一个单向的、线性的简单过程，而且是双向、互动以致共生 (symbiosis) 的复杂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以美国为主体的西方苏联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对美国以外的政治学理论借鉴、消化、美国化、甚至意识形态化的过程。然而，西方苏联学理论的匮乏和单一性（真正属于苏联学的西方政治学理论恐怕只有“极权理论”，即 totalitarianism），促使苏联学不断扩展其外延，与其他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亚”理论“接轨”，衍生出更多的理论分支。

## 一、“极权主义”理论模式

西方政治学中的“极权”理论模式最初应用于苏联研究，是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斯大林执政期间。此前，极权理论的起源和研究对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即二十世纪 20-30 年代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强权政治以及后来的德国法西斯政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也被列入极权主义范畴。这些国家的共同之处包括：取消反对党，打击特殊利益集团，强调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等。<sup>①</sup> 1939 年德国入侵波兰后，美国历史学家卡尔顿·海斯 (Carlton Hayes) 将极权模式界定为西方文明中颇有“新意” (novel) 的政体，其特点包括：

(1) 垄断社会的所有权力；(2) 全面动员民众支持；(3) 有效利用教育和宣传机制；(4) 强调国家力量和使用武力的重要性。<sup>②</sup>

二战期间的美苏同盟，使西方学者对苏联政权的批评有所收敛，然而冷战开始后，极权理论又成为苏联学的主要动力。其中代表作是德裔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1951 年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sup>③</sup> 书中阿伦特把极权主义描述为二十世纪特有的现象，认为极权主义的根源是反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帝国主义。阿伦特所代表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在相

---

<sup>①</sup> Abbott Gleason, "Totalitarianism in 1984", *Russian Review*, Vol.43, No.2, pp.145-60; Robert Orr, "Reflections on Totalitarianism, Leading to Reflections on Two Ways of Theorizing", *Political Studies*, Vol.21, No.4, December 1973, p.481.

<sup>②</sup> Carlton Hayes, "The Novelty of Totalitarianism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40.

<sup>③</sup>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1.

当程度上是在描述一个历史进化的事实，即西方的现代化（modernity）在达到一定程度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右思潮和势力，是产生极权主义的环境和政治文化的根源。五十年代初阿伦特的论点对西方苏联学界影响巨大，也是国际环境使然。1947年3月，标志冷战开始的杜鲁门主义应运而生。在对国会的演说中，杜鲁门把美苏之间的对峙描绘成“极权主义”与“自由人民”之间的势不两立之争，并以此来争取仍然对冷战将信将疑的美国国会通过对土耳其和希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极权主义的概念从此不胫而走，成为前苏联的代名词。<sup>①</sup>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1950年1月麦卡锡主义出笼，尤其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西方普遍认为是斯大林一手操控的。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理论因此促进了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政治和社会性质的讨论。

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定义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欧洲视角，且受到其个人经历——逃离大屠杀的德国犹太人——的影响。然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的主要受害者却不仅仅是俄国犹太人，而是前苏联党政军的各级领导人。在她以后的著作中，阿伦特也改变了她先前的观点，认为希特勒的反犹仅仅是借口和表象，纳粹的极权主义更主要的原因是主观意识中对权力和财富占有欲的极度膨胀（megalomania）。<sup>②</sup>阿伦特的极权理论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中所面临的最大的“水土不服”问题，恐怕是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滋生的极右思潮和势力的“过度”关注，而这不符合美国政治中日益高涨的反共反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倾向。极权主义因此必须“与时俱进”，聚焦西方所谓的“极左”即共产主义的政治体制。

1953年，哈佛大学教授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正式启动了“极权主义研究”项目。弗里德里希出生于德国，就学于海德堡大学，1930年获该校博士学位，纳粹执政后选择定居美国，1936年开始在哈佛任教，<sup>③</sup>其学生包括后来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曾担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的布

---

①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2008, p.60.

② 有关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不同解读，见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hannah\\_arendt](http://en.wikipedia.org/wiki/hannah_arendt)（2011年9月14日摘引）。

③ 有关弗里德里希的背景，见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carl\\_joachim\\_friedrich](http://en.wikipedia.org/wiki/carl_joachim_friedrich)（2011年9月13日摘取）。

热津斯基。与阿伦特直接引进欧洲法兰克福学派的做法不同，弗里德里希致力于极权主义理论的美国化。在一次有众多著名学者参加的研讨会上，弗里德里希从国家体制及其政策运作方面，提出了极权主义的五个特征：（1）官方的和单一的意识形态；（2）有大众支持的一党专制；（3）使用恐怖手段的警察力量；（4）对媒体的垄断性控制；（5）对武器的垄断性控制。然而弗里德里希提出的极权模式受到与会者的强烈质疑，其中包括美国两位最权威的俄国历史学家马克·卡波维奇(Michael Karpovich)和吉拉德·罗宾逊(Geroid Robinson)，他们认为“极权专政”的模式并不能准确地解读俄国的历史。刚刚卸任驻苏大使的乔治·凯南对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二人的观点也不以为然，认为即便是极权政治也是“动态的”(dynamic)，而不是一成不变的；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有可能摒弃一些极权的做法，极权统治有可能受侵蚀(erosion)<sup>①</sup>。对此，与会的“极权派”学者当然不肯相让，哈佛学者摩尔·芬萨德(Merle Fainsod)与凯南针锋相对，认为没有任何极权制度会从内部开始变化。他在《苏联是如何治理的？》一书的结尾写道：“极权体制绝对不会弱化其警察国家的色彩；其权力消失之日，便是其制度死亡之时。”<sup>②</sup>

对凯南来说，关于苏联政治和社会的性质的争论绝不仅仅是学术之争，而是牵扯到美国和西方正在不断强硬的的对苏政策。一段时间以来，这位在华盛顿最受尊重的苏联问题专家，与杜鲁门政府日益强硬的的对苏政策已渐行渐远，到1953年凯南从驻莫斯科大使职位上离任时，他的现实主义的对苏观点实际上已经在华盛顿被边缘化了。有多种原因促成了杜鲁门政府的强硬政策。此前数月中：1949年9月22日苏联原子弹试验获得成功；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国家均成为共产主义国家；1949年2月麦卡锡主义出笼，提出“谁丢失了中国？”的问题，矛头直指杜鲁门政府。面对内外挑战，杜鲁门政府于1950年4月颁布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国安会-68，NSC-68），这份由著名鹰派人士保罗·尼茨

---

① David Engerman, *Know Your Enem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Soviet Exper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208, 211.

② Merle Fainsod, *How Russia is Ruled*, Revised Edition,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499-500.

(Paul Nitze) 主笔的文件，以强烈的措辞，把苏联描绘成一个“奴隶社会”；美苏之争是水火不相容；苏联不同于以往的霸权，是建立在“极端的信仰 (fanatic faith)” 之上的，力图在世界范围内建立霸业，欲达此目的，其势必扩张，等等。文件最后提出，美国“必须领导自由世界建立成功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而缺乏这一体制令人日益难以忍受。”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力，甚至发动有限战争，以迫使对手接受符合美国利益的条件。为了进行有限战争，美国必须动员自身以及盟国的经济资源，以应对此类战争所需要的庞大的军事力量。为此，国安会-68 文件提出 7 点建议：<sup>①</sup>

- 1) 由于目前还不能够强迫苏联大幅改变政策，因此不要与苏联谈判；
- 2) 研制氢弹，以防备苏联在 1954 年时拥有一个有效的核武库；
- 3) 快速发展常规军力，以便在不动用核武的情况下保护美国的利益；
- 4) 大举增税，以支持这一极为昂贵的军事体系；
- 5) 动员美国社会，包括由政府主导而形成的美国人民的共识，即有必要作出牺牲和保持团结；
- 6) 由美国领导的联盟；
- 7) 从内部瓦解苏联，使苏联人民成为我们的盟友。<sup>②</sup>

作为国安会-68 号文件起草委员会中通晓俄国事务的成员，凯南和查尔斯·波汉 (Charles Bohlen) 坚决反对在文件中采用如此强硬的措辞，认为苏联并没有称霸世界的大战略；斯大林的所有精力都放在苏联所控制的范围之内；斯大林其实生性保守，担心苏联实力过度扩张；凯南甚至认为根本不需要起草国安会-68 号文件；它会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加僵硬、过于简单、过于军事化。甚至国防部长刘易斯·约翰逊也坚决反对国安会-68 号文件，

---

① 参见 “NSC 68: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14, 1950)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ume I, <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nsc-68/nsc68-1.htm> (2011 年 8 月 9 日摘取)。

② 参见 “NSC 68: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14, 1950)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ume I, <http://www.fas.org/irp/offdocs/nsc-hst/nsc-68-cr.htm>, (2011 年 9 月 1 日摘取)。

认为它会使美国破产，而国会中的民主、共和两党都要求减税。<sup>①</sup> 只是 1950 年 6 月 25 日爆发的朝鲜战争，为国安会-68 号文件打了一针强心剂。杜鲁门总统最终于当年 9 月 30 日签署了该文件。从 1950 年 1 月国安会-68 号文件形成初稿，到 9 月 30 日杜鲁门签字生效，美国不仅卷入了朝鲜战争，而且又军事介入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国安会-68 号文件签署的第二天（10 月 1 日），美军率领的所谓“联合国军”不顾中方警告，在朝鲜半岛越过 38 度线，力图以武力解决朝鲜问题。两周后，中国参战。几十年后俄方解密的文件表明，斯大林当时曾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充其量是指使其亚洲盟国择机行事；斯大林甚至在最后一刻决定不向中国入朝部队提供空中保护。斯大林的战略意图是：如果北朝鲜取胜，苏联多一个听命于莫斯科的亚洲共产党国家；如果进攻受挫，中共会出面收拾残局。各种迹象表明，斯大林极为保守的外交政策一直持续到其逝世（1953 年 3 月 5 日）。此后苏方迅速同意停战，表明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连续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弗里德里希 1953 年启动的极权主义研究项目，一开始就受到众多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到 1956 年卡尔·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合著的《极权专政》出版时，对于三年来自苏联学界内外的批评，弗、布二人坚持己见，不为所动。不仅如此，《极权专政》一书在 1953 年弗里德里希归纳的极权主义五个特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第六个特征：对经济的全面控制。弗、布二人的基本论点是，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毫无意义（meaningless）”，仅仅是“不厌其烦地重复其意识形态的陈腐观念，且前后矛盾，只是对那些弱智者有强烈的煽动性；宪法和政府机构的作用微不足道；极权政体中没有社会的地位，家庭是无所不在的极权政治中唯一的‘绿洲’。1917 年以后，苏俄的极权专制就已是势在必行，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极权体制一旦确立，它只能以更全面极权的方式发展。”<sup>②</sup>

《极权专政》问世的同时，第二作者布热津斯基本人的博士论文也成书

---

<sup>①</sup>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2008, p.105.

<sup>②</sup> 参见 Carl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3-18, 246-247, 295-300.

了，书名为《永远的清洗》（The Permanent Purge）。书中把前苏联的本质（essence）定义为清洗。清洗在一些学者看来是非理性的“冲动”行为（paroxysm of irrationality），而布热津斯基则认为是苏联制度为达到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在苏联政治中，清洗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一种需求，便于精英的轮换和晋升，因此不会消失。他还警告说，期待苏联政治制度从根本上变得宽松，是对极权制度的巨大误解，也严重低估了极权统治的不可遏制的逻辑，而这是十分危险的。<sup>①</sup>

然而弗、布二人极权主义理论，似出师不利。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中严厉批评斯大林，正式启动了非斯大林化进程。美国著名俄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达林（Alexander Dallin）认为该理论所描述的极权主义是静态的，属于历史上的特例，不具有普遍意义。耶鲁大学著名俄国问题学者弗里德里克·巴格霍尔（Frederick Barghoorn）则认为，极权主义理论忽略了苏联社会中健康和稳定的因素；弗、布二人笔下的苏联社会，更像是一个“狂人世界”（madhouse）而非是一个社会。<sup>②</sup>

苏联学界对极权模式的不满，促使人们不断寻求解读苏联体制的其他途径。艾伦·凯瑟夫（Allen Kassof）在其196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认为苏联社会是“管理型”的，是“没有恐怖的极权社会（totalitarianism without terror）”<sup>③</sup>；苏联是现代极权体制的变形，但基本上不需要动用几十年来一般极权社会所使用的极度非理性手段。凯瑟夫的观点其实只是在修补极权理论。而更多的学者则不满足于此，比如佛莱德里克·佛莱伦（Frederic Fleron, Jr.），本杰明·巴尔博（Benjamin Barber），杰罗米·艾斯瑞尔（Jeremy Azrael）和胡安·林茨（Juan Linz）等。他们认为极权理论的问题极多，概念太杂过于僵化，冷战的色彩太浓，无法解释苏联体制的变化，难以区别极权体制与

---

①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Permanent Purge: Politics in Soviet Totalitari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Mass., 1956, pp.8, 37, 89, 145, 165, 173.

② 参见 Alexander Dallin, *Russian Review*, Vol.17, No.2, April 1958, pp.143-44; Barghoor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72, No.4, December 1957, pp.613-614.

③ Allen Kassof, “The Administered Society: Totalitarianism without Terror”, *World Politics*, Vol.16, No.4, July 1965, p.559.

其他体制，等等。<sup>①</sup>即便是布热津斯基本人，在其 1960 年出版的《苏联集团：团结与争斗》一书中，也居然只字未提“极权主义”这一字眼。<sup>②</sup>

在对极权主义的“讨伐”声中，西方和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也加入其中。当时在华盛顿大学任教的著名中国问题学者詹姆斯·汤森（James Townsend）认为，弗、布二人的极权主义理论中的六个特征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的控制方式更多是通过说服和组织手段，而非恐怖。<sup>③</sup>在另一位中国问题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1975 年编辑出版的一部集子里，有学者甚至提出，在地区研究中（area studies）应该取缔一切模式，崇尚不加修饰的实证主义（barefooted empiricism），以返璞归真。<sup>④</sup>至此，西方/美国的共产主义研究由于“极权模式”所引发的争论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用过于简单以致天真的理论模式套用复杂的现实，以求证所谓终极和普世的理论范式；要么在无法获得此类终极理论框架时感到幻灭，从而摒弃所有理论。其结果是，西方在研究前苏联以及共产主义体制的过程中，理论研究 with 地区研究之间的距离不是缩小了而是渐行渐远。

## 二、美国苏联学中极权理论的国内背景

造成这种理论与现实严重脱节，不仅有意识形态的原因，如美苏关系的大气候，也有方法论方面的缺陷。冷战期间的美苏对立，不仅仅是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实力、利益之争，更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双方在理念上均无法接受对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视对方为洪水猛兽。在这一点上，美国对

---

① Frederic Fleron, Jr., “Soviet Area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Som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Communist Studies”, in Fleron, ed., *Communist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ssays In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5; Benjamin Barber,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Totalitarianism”, in C.J. Friedrich, ed., *Totalitarianism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Praeger, 1969; Jeremy Azrael, “Varieties of Destabilization”, in Chalmers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And Juan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Greenstein and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Reading Mass.: Addison Wesley, 1975, Vol.3.

②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Soviet Bloc: Unity and Conflict*,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③ James Townsend, *Politics in China*, Boston, Mass.: Little, Brown, 1974.

④ Lucian Pye, ed., *Political Science and Area Studies*,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德国法西斯极权制度的容忍度甚至超过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容忍度。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知识界的主流事实上是非常崇拜纳粹德国的。<sup>①</sup>可以说，如果不是德国在其盟友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对美宣战，美国何时加入二战，加入不加入二战，甚至加入哪一方，都是很难想象的。二战后美国迅速武装德、日两国，扶植两国的右翼势力，足以说明美国的价值取向。在某种意义上，同属于西方文明范畴的美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共戴天，与十七世纪历时三十年的宗教战争颇为相似，即为信仰而战。1950年初开始肆虐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事实上造成了在美国进行共产主义研究的人士人人自危。但由于种种原因，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和负责苏联事务的官员所受到的质疑和冲击，要远远低于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和从事中国事务的同行，比如麦卡锡寻找“替罪羊”的矛头所向，主要是负责中国事务的政府官员，而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多有进入政府高层服务的机会（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赖斯等）。可见，把苏联所代表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极端化、意识形态化和妖魔化，还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学术资源和从政的机会。布热津斯基最终出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与其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不无关系。

弗、布二人的极权主义理论“定型”于1956年，虽然与赫鲁晓夫的“解冻”进程不甚合拍，却搭上了美苏竞争关系中的另一趟“快车”，即最有冷战“特色”的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1957年8月，苏联成功地把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地球轨道，开创了人类空间技术的新高度，同时也表明苏联有能力建造洲际弹道导弹。对此，美国朝野极为震惊以致恐慌，尽管赫鲁晓夫在苏联卫星上天的同月宣布要与美国实现和平共处和进行和平竞赛。

已经在为1960年大选热身的民主党参议员的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都公开发出严重警告，认为美国正面临与苏联不断拉大的所谓“导弹差距”（missile gap），呼吁军方和政府增加军费，多造导弹，缩短与苏联的导弹差距。面对舆论的巨大压力，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7年末完成了一份关于“导弹差距”的美国军事态势的秘密报告，即以该项目主持人罗兰德·盖瑟（Rowland Gaither）的名字命名的“盖瑟报告”（Gaither

---

<sup>①</sup> 参见 Ido Oren, *Our Enemy And Us: 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Report), 而实际的主笔则是七年前撰写 NSC-68 号文件的鹰派人士保罗·尼茨。在某种意义上, 盖瑟报告就是 1950 年的 NSC-68 号文件的升级版。该报告认为, 除非美国在近期增加军费 50%, 否则苏联会在 1959 年初或 1960 年初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 在大规模采购武器的同时, 联邦政府至少应拨款 250 亿美元, 大量建造能够防核污染的民防工事; 此举造成的巨额军事开支对美国经济有利而无弊, 不仅能够维持生产, 还可增加就业。艾森豪威尔总统否决了盖瑟报告, 认为它有误导之嫌 (badly misguided), 并下令不得外传。然而盖瑟报告还是被鹰派人士捅了出来, 并立即成为民主党总统竞选人肯尼迪抨击共和党政府的有力武器。肯尼迪在 1960 年 2 月的公开演讲中, 把“导弹差距”问题设定为其大选的“关键问题” (critical issue), 同时攻击艾森豪威尔政府允许美国处于如此的战略劣势, 呼吁美国采取紧急措施, 以扭转战略不平衡。

对于民主党和鹰派的指控,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官员多次公开指出, 根据最新情报, 盖瑟报告所说的导弹差距并不存在; 赫鲁晓夫并未大规模增加苏联战略导弹的数量; 相反, 美国在 1958-1960 年间所拥有的核武器数量从 6,000 件陡增三倍, 达到 18,000 件, 美国无论在核武器或运载工具方面, 都远远超过其对手。然而美国政府和民间的鹰派, 以及致力于问鼎白宫的民主党人士, 都对此不屑一顾。肯尼迪甚至宣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情报有误, 必须相信无偏见的非政府的情报来源。面对上述种种压力, 艾森豪威尔政府无法与赫鲁晓夫政府就核军备控制问题进行谈判, 只能在离职前 (1961 年 1 月) 著名的“炉边谈话”中告诫公众, 美国的军工集团正在“扭曲” (distort) 美国经济。

新任总统肯尼迪 1961 年 2 月入主白宫后才发现, 所谓“导弹差距”其实毫无根据。与此同时, 新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公开表示, 不存在导弹差距。肯尼迪政府 1961 年公布的情报报告也持相同观点。不仅如此, 众多政府情报部门的分析都认为, 美国事实上对苏联具有相当的 (substantial)

核优势。<sup>①</sup>对于以年轻、有理想、有抱负、对苏强硬而高调入主白宫的肯尼迪政府来说，“导弹差距”问题事实上成为一个巨大的心理和诚信的包袱，肯尼迪本人极为担心这会影响到其1964年的竞选连任。如果说两个月以后的猪湾事件肯尼迪不过是“受害者”，<sup>②</sup>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为他挽回了一些声誉的话，那么导弹差距问题就是肯尼迪本人之过了。

肯尼迪在“导弹差距”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投机、天真加无知，也许不是偶然现象，这或许跟他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团队不无关系。这个团队不仅代表了美国东北部传统的政治、经济势力，也汇集了美国的学术精英，即美国著名作家戴维·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笔下的所谓“出类拔萃”之辈（best and brightest）。<sup>③</sup>其首要人物是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哈佛大学教务长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从学术方面，邦迪具有过人的天分甚至传奇的能力。1949年，刚届而立之年的邦迪加入了最负盛名的美国外交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所属的一个秘密的“马歇尔计划小组”，讨论如何向欧洲受援国分配资金，以及中情局如何利用部分资金资助欧洲的反共游击队的活动。该小组成员包括艾森豪威尔、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 1953-1961年任中情局长）以及乔治·凯南。1953年，年仅34岁的哈佛政治系教授邦迪出任哈佛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务长

---

① Robert Divine, *The Sputnik Challe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35-41; Kurt Campbell and James Steinberg, *Difficult Transitions: Foreign Policy Troubles at the Outset of Presidential Power*, New York: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p.55-57; David Hollowa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rms Race*,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38-40.

② 美军方在肯尼迪就职前就酝酿入侵古巴，而此时中情局也在秘密培训古巴流亡分子，并在肯尼迪上任后不久即呈报入侵方案。美官方后来解密的档案表明，肯尼迪对中情局的入侵方案犹豫不决，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姆尼泽将军对此加以评估。而莱姆尼泽明知中情局的入侵计划漏洞百出，风险极大，却予以放行，并在入侵行动遭遇意想不到的抵抗时拒绝提供空中支援，从而导致1961年“猪湾事件”的惨败，令就职不足百日的肯尼迪政府在国际社会面前尴尬万分。而军方的真正目的则是巴不得中情局的行动失败，军方即可“名正言顺”地大举入侵古巴。肯尼迪事后大有上当受骗之感，然而悔之晚矣。参见 Aleksande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One Hell of a Gamble: Khrushchev, Castro & Kennedy, 1958-1964*, New York: W.W. Norton, 1997, pp.84-85; Peter Kornbluh, ed., *Bay of Pigs Declassified: The Secret CIA Report on the Invasion of Cuba*,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③ 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Brighte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Dean)，而他居然只有本科学历。邦迪的才华和经历，是他被肯尼迪揽延入阁的主要原因。<sup>①</sup>而恰恰是这些智商极高的出类拔萃之辈，在以后数年中把美国一步步引向越战泥潭。而“导弹差距”问题，既是肯尼迪问鼎白宫的敲门砖，也是肯尼迪政府在外交和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第一个败笔。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邦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此之前，邦迪任哈佛大学教务长（1953-1961）兼国际政治学教授期间，恰是以卡尔·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等哈佛学者所建立和倡导的“极权主义”理论的鼎盛时期。美国苏联学和对苏政策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这一时期几乎是同步行进。尽管学界的讨论集中于苏联内政，政府的对苏政策主要是在外交方面，但二者都不同程度地误读、误判苏联的内政和外交；都极力夸大苏联政治权力的集中程度和军事/经济潜力；都把对手看作是一个“异类”而非和美国一样的“正常”国家；都认为苏联不可能发生根本变化而只会机械地走向其生命的尽头。在政策建议方面，“极权理论”和“导弹差距”都主张对苏实行强硬政策，任何犹豫与妥协都背离美国的价值观，损害美国的利益。

### 三、告别“极权主义”理论模式

极权主义理论的单一性和极端性，在方法论上其实是相当脆弱的。因为要高屋建瓴，即以一个变量解读大量复杂和长期的社会现象，便不可能面面俱到。理论的层次越高，对现实的描述就越粗糙。高屋建瓴，反而成了高处不胜寒。

在极权主义与反理论的地区研究两个极端之间，有些学者（如白鲁恂，Lucian Pye）认为，在学术领域采取“零和”方式并不妥当。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在苏联研究领域开创了三种模式并用的方式。他在1954年出版的《恐怖与进步-苏联》一书中，认为苏联的政治与经济生活中的很多现象，其实是源于类似主从关系（patron-client）、派系之争（factionalism）、小社团主义（cliquism）、甚至家庭行为（familistic behavior）等传统文化。此外，苏联工业化和技术发展也可以解释苏联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现

---

<sup>①</sup> 参见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McGeorge\\_Bundy](http://en.wikipedia.org/wiki/McGeorge_Bundy)

象。最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是因素之一。摩尔认为这三种变量在苏联政治中都有其作用，但在具体问题上哪种模式更适用，要因时因事而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本身也会发生变化。<sup>①</sup>无独有偶，阿列克斯·英克莱斯（Alex Inkeles）多年以后也提出了极为类似的理论框架，认为苏联政治可以用极权政治、工业化以及发展主义的模式来概括。他认为苏联为了发展经济，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全国管理体系，而这对于苏联政治的运作有着相当的影响。<sup>②</sup>另一位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则列举了 10 种研究苏联政治的模式，其中包括社会文化、领袖人物个性、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化理论、非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化理论、极权理论、地缘政治理论等，强调苏联研究必须多元化。<sup>③</sup>

上述多元理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极权主义理论的单一性所造成的理论的贫困，使西方的苏联研究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得以实现某种程度的“软着陆”。但归根到底，它们只是从极权理论的内核向外延伸，或在极权理论的范式内修修补补，从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对极权理论并不质疑。此间美国和西方苏联学界出版的一系列具有“极权”基因的著作，一直是西方学界的“经典”教科书，其中包括佛莱德里克·佛莱伦（Frederic Fleron）的《共产主义研究与社会科学》，佛来德里克·巴格霍尔（Frederick Barghoorn）的《苏联政治》，佛来德里克·巴格霍尔与托马斯·莱明顿（Thomas Remington）合著的《苏联政治》，杰里·休（Jerry Hough）和摩尔·芬萨德（Merle Fainsod）合著的《苏联是如何治理的？》等。<sup>④</sup>

不仅如此，苏联学的发展还难以摆脱政治大气候，尤其是美苏关系的总体。历时 10 年的美苏“缓和”（detente），在 1975 年的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合

---

① Barrington Moore, *Terror and Progress: Some Sources of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viet Dictatorship*,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② Alex Inkeles, “Models and issues in the Analysis of Soviet Society”, *Survey*, Vol.60, July 1968, pp.3-17.

③ Daniel Bell, “Ten Theories in Search of Reality: The Prediction of Soviet Behavior in the Social Sciences”, *World Politics*, Vol.10, No.3, April 1958, pp.327-365.

④ Frederic Fleron, ed., *Communist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ssays on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 New York: Rand McNally, 1969; Frederick Barghoorn, *Politics in The USSR*,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Frederick Barghoorn and Thomas Remington, *Politics in The USSR*, Boston: Little, Brown, 1986; Jerry Hough and Merle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作会议上达到了顶峰，此后开始走下坡路。<sup>①</sup>1979年底苏军入侵阿富汗，西方国家集体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1980年，具有强烈反共意识的里根执政，并在1983年宣布苏联是“邪恶帝国”(evil empire)，美苏再陷新冷战。此时此刻，被边缘化20余年的极权理论又受到了青睐。<sup>②</sup>

学界对于某一理论有争议是正常现象。苏联学界围绕极权主义理论的争论，不仅促使学者从“体制内”对极权理论加以改良，苏联学本身也开始与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其他专业进行交叉和互补，其中包括结构—功能主义、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理论、多元模式、官僚政治理论等。

**结构—功能主义** 二战后在苏联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著作，基本上是以历史和描述性的方式，对苏联政治和国家体制进行相对刻板的描述。其主要代表者摩尔·芬萨德(Merle Fainsod)甚至极力反对苏联研究的理论化，认为直观的、基于一手材料的研究方式，要远胜于抽象的理论。<sup>③</sup>五十年代后期，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些主要理论开始影响西方的苏联学研究，其中包括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1953年的系统理论代表作《政治系统论》，拉斯韦尔(Lasswell)1956年完成的《决策过程》，以及阿尔蒙德(Almond)1956年的《比较政治体制》。<sup>④</sup>上述三本著作在战后西方政治学中开创了“系统/结构—功能”理论的范式，力图在政治学范畴中寻求政治运作的普遍规律和理论(general theory)。如果说伊斯顿的系统论(system theory)使理论的建构更加精炼(parsimonious)，超越时空，超越价值观，因此更具普遍意义，那么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模式对政治制度的描述、分析和比较，则更

---

① 有史学家把“缓和”定为1966—1976年(也是中国文革十年)，见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2008, 特别是第11章：“A New Containment: The Rise and Fall of Detente (1966-1976)”, pp.267-298.

② Ernest Menze, ed., *Totalitarianism Reconsidered*, Port Washington, NY: Kennikat Press, 1981; Stephen Whitfield, *Into the Dark: Hannah Arendt And Totalitarianism*,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③ 这些著作包括Merle Fainsod, *How Russia is Ruled*, Revised Edition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Barrington Moore, *Soviet Politics: The Dilemma of Power*,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Barrington Moore, *Terror And Progress, USSR*,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④ David Easton, *The Political Syst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H.D. Lasswell, *The Decision Process: Seven Categories of Functional Analysis*, Maryl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Press, 1956; and Gabriel Almo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18, No.3, August 1956, pp.391-409.

具“动感”，而非枯燥的累积。不仅如此，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模式也有极大的可操作性，尤其是运用在西方以外的政治体制的比较方面。相比之下，拉斯韦尔的决策论首次把决策过程划分为七个相对独立却又相互联系的功能（情报、建议、实施、评估、终止等）。<sup>①</sup>

巴格霍尔：1966年版《苏联政治》	阿尔蒙德：1966年版《比较政治学》 <sup>②</sup>
第二章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	第二章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
第三章 社会结构和政治亚文化 （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Subculture）	第三章 政治结构（Political Structure）
第四章 政治成长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第四章 政治成长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第五章 传播与公共舆论（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第六章 政治传播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第六章 政治参与和精英录取（Participation and Elite Recruitment）	第五章 政治录取 （Political Recruitment）
第七章 利益表述、利益聚合和政策制定 （Interest Articulation, Interest Aggregation and Policymaking）	第七章 利益表述 （Interest Articulation） 第八章 利益聚合 （Interest Aggregation） 第九章 政策制定 （Policy making）
第八章 政策施行 （Policy Implementation）	第十章 政府结构和功能 （Governmental Structures and Their Functions）
第十章 政治表现 （Political Performance）	第十一章 政治制度的表现 （The Performance of Political Systems）

佛来德里克·巴格霍尔（Frederick Barghoorn）1966年出版的《苏联政治》一书，首次尝试把阿尔蒙德的功能理论应用于苏联政治的研究。巴格霍尔的基本论点是，由于工业化的进程和技术的发展，苏联的体制和政治运作

① 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模式包括以下若干核心概念：任何形式的政治都具有自身的结构，任何政治结构都执行某种功能；相同的政治结构可以执行不同的功能，不相同的政治结构可以提供相同的政治功能。引自阿尔蒙德讲授的比较政治学讨论课，1985年秋季，斯坦福大学政治系；另见 Gabriel Almond, Bingham Powell, Jr., Russell Dalton & Kaare Strom, *Comparative Politics Today: A World View*, Updated 9th ed., New York: Pearson/Longman, 2010, pp.33, 35, 37-38.

② Gabriel Almond and Bingham Powell, Jr., *Comparative Politics: 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66, 1978.

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不可抗拒地”(irresistibly)导向实际和理性化。在这部最终成为美国苏联学的经典教科书中,巴格霍尔几乎全面引进了阿尔蒙德开创的比较政治学中的一系列理论框架,其结果是,苏联学作为一个地区研究,似已完全融入政治学的主流。二者比较如上表。

此外,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论”(political development)、“技术理性论”(technical rationality)、“政治/经济发展趋同论”(convergence)等典型的比较政治学的亚理论,在巴格霍尔的论述中也比比皆是。在巴格霍尔笔下,尽管苏共仍在执政,但意识形态和“非理性”成分下降;技术官僚统治下的苏联政治和社会,与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已经日益趋同。<sup>①</sup>

巴格霍尔得出上述结论,既受西方政治学“普世理论”(general theories)的影响,也反映了苏联政治的现实走向,即苏联政治中技术官僚背景的一代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崛起,最终取代了早期革命和战争年代出身、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挂帅的一代领导。有意思的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此时(六十年代初)也得出了极为相同的结论,即苏联新领导人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所不同的是,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件坏事,而巴格霍尔等人则为之喝彩,不过双方都认为苏联的确发生了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早在1954年出版的《恐怖与进步》一书中就曾预言,苏联工业化和技术发展会逐步削弱意识形态在苏联政治中的作用:“技术官僚的统治(technocracy)……从本义上(by definition)意味着极权者权力的极大削弱(heavy reduction)。”<sup>②</sup>摩尔的《恐怖与进步》一书的中心思想,在该书的标题中体现得再清楚不过了:斯大林的统治的确是恐怖和极权,但这只能在苏联发展的某一阶段加以实施,对苏联后来的发展不一定适用;在一定意义上,苏联的极权主义政治也是苏联“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而不具有普遍性;苏联社会在未来将走出极权主义,走向“进步”。

---

① Barghoorn to Cyril Black, 25 January 1965, Frederick Barghoorn Pap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2:7; Frederick Barghoorn, *Politics in the USSR*,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② Barrington Moore, *Terror and Progress: Some Sources of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viet Dictatorship*,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231.

巴格霍尔以后，苏联学界的很多其他学者也程度不同地受到“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在他们的研究中借鉴“普世理论”的要素，其中主要著作有杰里·休（Jerry Hough）1979年修订的摩尔·芬萨德（Merle Fainsod）的《苏联是如何治理的？》。休在该书的后半部分加入了对苏联政治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policy-process）的研究。其中包括公民参政、政治投入（political inputs）、政治议题的设定（agenda setting）、派系争斗、多元趋向、决策机构、政策辩论等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概念。对此，休本人认为，对西方政治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以及政治制度的应变力度（responsiveness），对苏联的研究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方式。<sup>①</sup>玛丽·麦克奥里（Mary McAuley）在1977年出版的《政治与苏联》一书中，对苏联的政策形成过程的研究采用了案例分析（case studies）的方式，其中大量采用了美国政治学泰斗罗伯特·道尔（Robert Dahl）和阿尔蒙德等人的政治理论路径。<sup>②</sup>戴维·兰恩（David Lane）在1978年出版的《苏联的政治与社会》和1985年出版的《苏联的国家与政治》中，都采用了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理论模式。其结论之一是，苏联政治是基于“群体”（group basis）的。<sup>③</sup>类似的研究还有史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的《共产主义政治制度》（1982）、<sup>④</sup>乔治·布兰诺（George Brunner）的《苏联的政治体制》（1977）、<sup>⑤</sup>丹尼尔·塔奇斯（Daniel Tarchys）的《苏联的政治议题：问题与优先选择》（1979）、<sup>⑥</sup>以及偌格比（T.H.Rigby）的《苏共的党员制度：1917—1967》（1968）。<sup>⑦</sup>在此期间，研究苏联外交的学者也大量借鉴“结构—功能主义”的模式，其中主要著作包括阿诺德·霍若里克（Arnold Horelick）等人1975年出版的《苏

---

① Jerry Hough and Merle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② Mary McAuley, *Politics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enguin, 1977.

③ David Lane, *Politics and the Soviet Union*,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8; *State and Politics in the USSR*,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④ Stephen White et al.,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

⑤ Stephen Georg Brunner, *Politische Soziologie Der USSR*, Wiesbaden, Akademische Gesellschaft, 1977.

⑥ Daniel Tarschys, *the Soviet Political Agenda: Problems and Priorities*, London: M.E. Sharpe, 1979.

⑦ T.H. Rig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in the USSR: 1917-196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联外交研究：与决策理论有关的路径》、<sup>①</sup>威廉·波特（William Potter）的《苏联外交变化的根源：来自决策科学的观察》（1985）、<sup>②</sup>以及佛依·阿斯帕托瑞（Vernon Aspaturian）的“《苏联的决策者：决策的地点、过程和人物》（1985）等。<sup>③</sup>

西方政治学的理论与地区研究的关系绝不是单向的。苏联研究学者利用政治学的“普世理论”，使西方的苏联学在六十年代实现了“非极权主义化”，理论界反过来又借助苏联学的“进展”推动理论研究。哈佛学者亨廷顿 1958 年出版的《变动中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一书（*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就是一例。该书一反西方的反共主流，把世界一分为二：即有能力维护秩序、进行自我管理的国家（主要是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和无力管理自己、无秩序的广大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亨廷顿无意为前苏联歌功颂德，然而却注意到西方民主国家与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共性，即拥有强有力的治理能力。作为现实主义者，亨廷顿用苏联的例子验证了一个常理，即人可以忍受有秩序而无自由的生活，但却无法在有自由而无秩序的环境中生存；权力（authority）必须确立在先，而后加以分散。亨廷顿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应该是致力于提升这些国家的执政能力，而美国所信仰并在海外推广的民主制度，恰恰会削弱这些国家的执政能力。<sup>④</sup>亨廷顿的这一理念在冷战期间几乎成了美国政府的座右铭。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在世界各地毫不犹豫地支持众多的独裁政权：从菲律宾的马科斯，到伊朗的巴列维国王、智利的皮诺切特军人政权、韩国的军政权、蒋介石的一党专政、新加坡的家族统治，以及日本事实上的一党执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针对苏联政治的极权主义理论所衍生的美国政治学理论，在转换成政策的结果时，却极大地加强了美国盟国的极

---

① Arnold Horelick, Russ Johnson and John Steinbruner, *The Study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Theory Related Approach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5.

② William Potter, “Sources of Foreign Policy Change: Insights From the Policy Sciences”, Conference on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UCLA Project on Politics and War, 10-11 October, 1985.

③ William Vernon Aspaturian, “The Soviet Decision-Makers: Where, How, and by whom Decisions are Made”, UCLA Project on Politics and War, 10-11 October, 1985.

④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1-8.

权倾向。理论和政策的价值取向南辕北辙，美国的双重标准，源于理论的多多样性和政策的灵活性。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 阿尔蒙德作为战后西方的“比较政治学之父”，于1956年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其定义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是一国之民众对该国政治目标所具有的特定的取向”。他认为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需要一种与之相配的政治文化；民主的结构如果没有民主的文化将一事无成。在1963年与西德尼·沃巴（Sidney Verba）合著的《市民文化》（Civic Culture）一书中，通过对五个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的比较，进一步扩展了上述论点。<sup>①</sup>《市民文化》一书是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界首次进行的大规模的跨国比较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也建立了阿尔蒙德在西方政治学界未来数十年中稳固的领导地位。<sup>②</sup>苏联学界的众多学者为之折服，并在苏联研究中广为应用，也是必然的。其中比较突出的有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1973年在《政治学季刊》中发表的“文化、政治文化和共产主义社会”一文；史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1979年出版的《苏联政治中的政治文化》一书，阿奇·布朗（Archie Brown）1985编辑的《政治文化与共产主义研究》一书，等等。<sup>③</sup>而巴格霍尔（Barghoorn）1966年出版的《苏联政治》，又是苏联研究领域率先引进政治文化概念的先驱。在该书第二章，作者便宣称，政治文化概念不仅可以移植到苏联问题研究，而且还会大有作为，对苏联政治文化的研究其实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困难。在一个精英统治的社会，精英们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其实都非常明确，尽管

---

① 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② 尽管如此，政治文化模式本身并非万能。阿尔蒙德本人在八十年代也意识到这一点，尤其是在解释一些历史和现实中的难解之“迷”时，政治文化很难提供令人信服的解说。比如，纳粹为何在魏玛共和国时脱颖而出？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德国又何以成为民主国家市民文化的典范？同时美国和英国的市民文化为何走下坡路？为什么西方尤其是美国在非西方世界中（包括在那些美国的盟友）推行新法民主困难重重？显然，政治文化的变量本身并不构成充分条件。——引自阿尔蒙德讲授的比较政治学讨论课，1985年秋季，斯坦福大学政治系。

③ Robert Tucker, “Culture, Political Culture, and Communist Socie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88, No.2, June 1973, pp.173-90; Stephen White, *Political Culture In Soviet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79; Archie Brown, “Conclusion”, in Archie Brown, ed. *Political Culture And Communist Studies*, London: M.E. Sharpe, 1985.

其中不乏宣传成分。<sup>①</sup>

在政治文化的范式内，苏联社会中的公民参政问题一直是西方研究苏联问题学者中争议较大的议题。极权理论完全排除公民有任何实质性参政的可能。而巴格霍尔和弗瑞德格特（Friedgut）则把苏联公民的参政定义为“动员型”（mobilize）和“从属性参与”（subject-participatory）。<sup>②</sup>此后，迪弗朗西斯科（Di Franceisco）与吉特尔曼（Gitelman）在采访了相当数量的移居海外的前苏联公民后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民众对政策的参与主要是在政策执行阶段；然而这一过程不仅仅是被动的服从和走过场，同时也包括大量的下属和民众为自身利益而主动与党政机构和官员的个人交流。<sup>③</sup>上述研究表明，苏联社会的政治参与实际上是双向的；权力阶层与平民百姓之间也有某种利益分配的互动，尽管这一互动是不对等的。应该指出，西方苏联学界对于苏联社会的政治参与的描述，是在典型的苏联制度的环境下，即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苏联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表象。通过引进西方政治学主流的政治文化理论，在理论上排除了极权主义的绝对性，更注重实地调研和分析，因此更接近现实。

与此同时，西方学者也开始尝试以政治文化的范式对不同的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国别的比较，不仅要摆脱极权主义理论的影响，也要扩展苏联学中针对个别领袖人物的过量研究。然而“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起步并不顺利。在六十年代不仅经费没有保障，在方法论上也没有可操作的理论框架。而政治学主流中的比较政治文化的范式，正好可用来激活相对单调的苏联学界。此时此刻，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论在政治学主流中已过了巅峰期。阿尔蒙德本人更热衷于在非主流和地区研究领域里扩展，与苏联学学者的索求相辅相

---

① 见 Frederick Barghoorn, *Politics in The USSR*,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其中尤其是应注意第二章《政治文化》，第33-60页。

② Frederick Barghoorn, *Politics in the USSR*,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Theodore Friedgu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SS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③ Frederick Weyne, Di Franceisco and Zvi Gitelman, "Soviet Political Culture and 'Covert Participation'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8, No.3, September, 1984, pp.603-21; Sidney Verba and Norman Nie,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成。比较共产主义研究于是也借船出海，<sup>①</sup>到七十年代初，已有了可观的成就。其中布朗和格雷（Brown and Gray）1977年主编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与变化》集子，第一次对世界主要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进行了横向比较，国别包括苏联、中国、古巴和五个东欧国家（南、波、匈、捷、罗）。此前，西方的共产主义国家研究一般聚焦于共产主义大国，对中小国家基本忽略。而布朗和格雷的集子不仅弥补了这一缺漏，而且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其中对若干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的梳理尤有独到之处。书中布朗和格雷把政治文化定义为“这些国家和族群特定的历史经历所具有的对历史和政治的主观意识、基本的信念和价值观、自我定位和忠诚的中心，以及对政治的认知和预期”。布朗和格雷强调历史对政治文化形成的重要性，部分原因是难以对这些共产主义国家进行西方式的民意测验，以把握现实政治文化的分布和规律。强调历史不过是下策，但仍不失为可行的方法。布朗和格雷要求参与该项目的所有学者，对所分担的国家的政治文化进行纵向的描述和分析，在该书的结论一章，编者以此对八个共产主义国家进行横向比较。通过纵向的描述和横向的比较，布朗和格雷发现，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具有异常的持久力（extraordinary staying power）；而它们的民族传统和宗教信仰，也足以抵御官方的政治渗透和同化的努力。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国，都以各自的方式，与正统的“社会主义文化”达成某种妥协，从而保留了自身文化和传统的特性。而南斯拉夫的例子已经表明，一旦苏联的直接控制不再，东欧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会回归自我。<sup>②</sup>在相当程度上，布朗和格雷对东欧政治文化的研究比较客观地描述了东欧的现状以及可能的未来走向。整个八十年代，东欧政局从动荡到剧变，其中纵然有外部因素（如美苏对东欧的政策），也是东欧自身历史和文化的韧性和惯性使然。1989年戈尔巴乔夫一旦对东欧“无为而治”，东欧的离心倾向便一发而不可收。

政治文化作为西方政治学的主流概念和研究方法，不仅在西方苏联学界

---

① David Engerman, *Know Your Enem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Soviet Exper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28.

② Archie Brown and Jack Gray,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ommunist States*, London: Macmillan, 1977.

日趋流行，甚至也为很多苏联学者所采用。而苏联学者对政治文化的定义，与西方的定义也相差无几，并以此在苏联进行社会调研。不仅如此，苏联学者还注意到，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沉积，对该国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不仅是潜移默化，更是持久的和无处不在的，而不管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如何。<sup>①</sup>

**发展理论**（Developmental Model） 发展研究是西方社会科学界在二战以后繁衍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它涵盖了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sup>②</sup>依存理论（dependency theory）、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以及托洛茨基在二十世纪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平衡发展理论（uneven developmental theory）。其中现代化理论构成了西方发展理论的主流和正统，而后三者则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

战后初期西方的发展论者多为“发展阶段论者”，即认为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大众传播发展在先，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化随后，共产主义国家当然也要经历这样的阶段。<sup>③</sup>发展论的学者在西方的苏联研究中认定一个基本的观念，即苏联的经济、技术发展对苏联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起到某种“软化”作用，从长远来说，苏联的体制不可能永远处于高压和高度动员状态。早在五十年代初，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在他1954年出版的《恐怖与进步-苏联》一书中，就认为苏联的工业化不可避免地会对政治运作产生影响。<sup>④</sup>到六十年代中期，阿列克斯·英克莱斯（Alex Inkeles）

---

① Archie Brown, “Soviet Political Culture through Soviet Eyes”, in Archie Brown and Jack Gray,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ommunist States*, London: Macmillan, 1977, pp.100-114.

② 主要的学者有 Walt Rostow, A.F.K. Organski 以及 Samuel Huntington.

③ 见 Karl Deutsch,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5, No.3, September, 1961, pp.493-514; 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3, No.1, January 1959, pp. 69-105; James Coleman, “Conclusion: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in Gabriel Almond and James Coleman, eds.,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And Alex Inkeles and David Smith, *Becoming Modern*,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④ Barrington Moore, *Terror and Progress: Some Sources of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viet Dictatorship*,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对苏联社会的发展也作出了类似的推断。<sup>①</sup>与此同时，亨廷顿和布热津斯基在他们《美苏的政治权力比较》一书中，也认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对美苏两国有着共同的影响，两国的政治发展甚至有殊途同归的趋向，尽管两国不同的历史和意识形态使它们不可能完全一致。<sup>②</sup>亨廷顿对“列宁式的”党政体制的“动员”能力（mobilizing capability）甚至情有独钟，认为该体制在工业化、城市化、普及教育等方面具有强大的能力。<sup>③</sup>理查德·洛文索（Richard Lowenthal）在七十年代中期就预言，苏共的执政方式在未来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profound alteration），即偏离早期的穿透型的（penetrative）、动员式的和致力于变革的职责。他认为，即便是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会保留下来，但政权本身与社会的互动方式和内容都会有所不同：以前执政者是自上而下操控社会，而现在则必须关注来自社会的诉求。骆文索预见共产主义制度必须经过一个政治变化阶段，这包括通过管理体制的理性治国方式来使政权合法化。<sup>④</sup>到七十年代东欧共产主义研究兴起后，斯坦福学者简·楚斯卡（Jan Triska）也将类似的发展理论应用于对东欧国家的研究。<sup>⑤</sup>

也许是完全偶然的原因，伯克利大学政治学学者肯尼斯·乔维特（Kenneth Jowitt）在1978年就断定，现代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西方自由化的路径，然而这一路径是世界历史特定环境的产物，后人不可能复制；另一条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制性的（forced）现代化路径。二者之间不存在第三条道路；通过改革和渐进的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sup>⑥</sup>乔维特的论断在多大程度上预测了八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启动的仅仅在激进和无效中徘徊的改革，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作为

---

① Alex Inkeles, “Models and Issues in Analysis of Soviet Society” *Survey*, No.60, 1966, pp.3-17.

②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Power, USA/USSR*, New York: Viking, 1965.

③ Samuel Huntington,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s”, in Samuel Huntington and Clement Moore,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pp.3-47.

④ Richard Lowenthal, “Development Vs. Utopia In Communist Policy”, in Chalmers Johnson, ed., *Changes In Communist Syste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⑤ Jan Triska and Paul Cocks, ed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Praeger, 1977.

⑥ Kenneth Jowitt, *the Leninist Response to National Dependency*,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78.

一位著名的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乔维特的政治视野和专业嗅觉显然过于局限于西方的范畴。因为就在乔维特发表该言论的同一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历史性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和开放，无论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与后来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大相径庭。即便是在西方范畴之内，乔维特的论断也欠妥。俄国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激进的私有化过程，即所谓“休克疗法”，显然是过于天真和武断。在发展的路径和战略方面，任何一步到位的方式不仅难以成功，而且社会必须为之付出极大的代价。

无论是在方法论或价值取向方面，发展论都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论点以及“历史/文化决定论”相去甚远。而后两者均排除了共产主义制度有可能在自身范围内变革的可能，其中历史/文化决定论更有宿命论之嫌。而二者在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开始后便日趋式微。相比之下，发展论则可“与时俱进”。

**多元主义理论 (pluralism)** 在西方政治学中，有关多元主义的讨论始于 20 世纪初，<sup>①</sup>一般的定义是指独立于政治权力结构以外的团体，如教会、工会、行会组织、社区等。有学者甚至认为，政府也是“多元”的一分子，与其他社会团体平起平坐。到二十世纪 30 至 70 年代，美国的政治学学者出产了大批有关论著，<sup>②</sup>并“输出”到欧洲和拉美学界。<sup>③</sup>然而多元主义理论

---

① See Otto Gierke, *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00; John Neville Figgis, *The Churches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1913; Harold Laski, *Studies in The Problem of Sovereignty*,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7; Arthur Bentley, *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8; And Mary Parker Follitt, *The New State, Group Organization and the Solution of Popular Government*,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18.

② See Charles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Robert Dahl, *Dilemmas of Democratic Pluralism*,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endleton Herr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New York: Mcgraw Hill, 1936;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of Congress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New York: Farrar And Rhinehart, 1940; David Truman,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1.

③ Henry Ehrmann, “Interest Group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XII,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pp.241; Gabriel Almond, “Corporatism, Pluralism, and Professional Memory”, *World Politics*, Vol.35, No.2, January 1983, pp.245-60; Alfred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hilippe Schmitter, *Interest Conflict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Brazi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最大的“突破”也许是在研究苏联问题方面。1966年，戈登·斯吉林（Gordon Skilling）首次将多元主义理论应用于对共产主义国家的研究。他认为，利益集团不仅在共产主义国家存在，而且常常为各自的利益相互竞争，苏联领导层对这些利益的表述不能置之不理，它们对决策的过程和结果总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sup>①</sup>斯吉林的“移花接木”并非一帆风顺，甚至成为众矢之的，被认为是过于牵强，甚至有误导之嫌。<sup>②</sup>尽管如此，多元主义模式还是在苏联研究中生根发芽，尽管“枝叶”并不茂盛。相当数量的研究主要采取“个案”研究（case studies），比如对苏联工业教育领域的研究，对苏联抑制犯罪的政策以及苏联土地和水利政策的研究等。<sup>③</sup>

西方多元主义研究的另一支，是对所谓“社团主义”的研究。社团主义研究起源于西方对欧洲和拉美问题的研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利益集团的活动方式与美国式的公开的和无序的竞争不同。利益集团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方式和过程相对有序，更为平和。通常，政府部门只与少数的行业领军公司就工资、价格、投资等问题进行磋商和谈判。此类社团主义通常都致力于更稳健、更有持久力、低通货膨胀、高福利的经济发展目标，尤其是在北欧国

---

① 见 Gordon Skilling, “Interest Groups And Communist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18, No.3, April 1966, pp.435-51; Gordon Skilling and Franklyn Griffiths, eds., *Interest Groups in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② Hough And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William Odom, “A Dissenting View on the Group Approach to Soviet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28, No.4, July 1976, pp.542-67; David Powell, “In Pursuit of Interest Groups in The USSR”, *Soviet Union/Union Sovietique* 6, Part 1, 1979, pp.99-124; Andrew Janos,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Structure of Power: Critiques And Comparison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12, No.1, Spring 1979, pp.6-20; And Andrew Janos, “Group Politics in Communist Society: A Second Look at the Pluralistic Model”, in Samuel Huntington and Clement Moore,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pp.437-50; Joseph La Palombara, “Monoliths or Plural Systems: Through Conceptual Lenses Darkly”, *Studies of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8, No.3, Autumn, 1975, pp.305-332.

③ Jeol Schwartz And William Keech, “Group Influence and The Policy Process in The Soviet Un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2, No.3, September 1968, pp.840-51; Philip Steward, “Soviet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Policy Process: The Repeal of Production Education”, *World Politics*, Vol.22, No.1, October 1969, pp.29-51; Peter Solomon, *Soviet Criminologists and Criminal Policy: Specialists in Policy Making*,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Thane Gustafson, *Reform in Soviet Politics: Lessons of Recent Policies on Land And Wa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家，这与美国的更具竞争性的利益集团政治非常不同。<sup>①</sup>美国和欧洲两种类型的社团主义也因此可以分为美式的“社会主导型”的社团主义（societal corporatism）和欧式的“国家主导型”的（state corporatism）社团主义，<sup>②</sup>而后者便是社团主义进入苏联研究领域的路径。

在一些苏联问题学者看来，“国家主导型”的社团主义的概念甚至比多元主义概念更适用于解读苏联政治的运作，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尽管勃氏身居高位，但他也必须与各路党魁、政府要员、企业高管、科技界等保持良好和微妙的关系。如果说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注重与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沟通，致力于提高生产力和增加群众福利的话，勃氏后期苏联在东欧面临种种压力，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以及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勃列日涅夫在政策上更向军界和重工业倾斜。根据同一逻辑，国际局势的缓和会使苏联的政策向非军事和非军工企业的利益集团倾斜。<sup>③</sup>

**官僚政治模式**（Bureaucratic Politics）在质疑极权模式的众多理论中，官僚政治模式似乎最具“杀伤力”。官僚政治模式的起源可以追溯至韦伯的关于政治权威的三个“理想的模式”（ideal types），其中之一便是“理性—法制权威”（rational-legal authority），即官僚政治模式。<sup>④</sup>早在五十年代初，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在苏联研究领域创建的三种模式中，就包括苏联工业化和技术发展所导致的官僚政治因素。<sup>⑤</sup>作为极权主义象征的

---

① Phillippe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in Phillippe Schmitter and Gerhard Lehbruch, *Trends Toward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74; David Cameron, “Social Democracy, Corporatism, Labor Quiescence,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Economic Interest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in David Goldthorpe, ed., *Order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84; Robert Kvavik, *Interest Groups in Norwegian Politics*, Oslo: University of Forlaget, 1976.

② Phillippe Schmitter and Gerhard Lehbruch, *Trends toward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74.

③ Valerie Bunce and John Echols, “Soviet Politics In The Brezhnev Era: Pluralism or Corporatism”, In Donald Kelley, *Soviet Politics In The Brezhnev Era*, New York: Viking, 1980; Valerie Bun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Brezhnev Er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3, No.2, April 1983, pp.13, 157.

④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 Guenther Roth & Claus Wittich, eds.,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1968, pp.212-216.

⑤ Barrington Moore, *Terror and Progress: Some Sources of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viet Dictatorship*,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斯大林逝世后，新一代的技术官僚崛起。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整个苏联就好比一部巨型的官僚机器，其组成部分包括大企业、军队、政府部门等；整个苏联就是一个“被管理的社会”（administered society），一个被垄断性的强力官僚体系所计划、协调和统治的社会。<sup>①</sup>对此，杰里·休（Jerry Hough）也认同，但他同时认为，不能把苏联的官僚体制看做是千篇一律、整齐划一的。在苏联官僚体制的表象下面，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和碰撞肯定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sup>②</sup>与此同时，官僚体制模型还被广泛地应用于对苏联外交尤其是外交和军事决策的研究，<sup>③</sup>其中最热衷于此道的包括美国军方。<sup>④</sup>

#### 四、结语：在魔鬼与天使之间？

作为冷战期间最大的地区研究领域，西方苏联学与各学科之间的交流、借鉴和互动相当广泛，有些也非常深入。本文对苏联研究的内核与外延的描述仅仅局限于政治学的范畴，由于篇幅和时间的限制，不可能面面俱到。然而有一点却十分清楚，即在 44 年的冷战期间（1947-1991），真正属于苏联学的基本“内核”的“理论”，只有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极权模式（totalitarianism）。在相当程度上，这也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liberalism）对于西方共产主义研究者眼中具有极端品性的斯大林主义的在理论上的极端反应。如果“物极必反”的常识对包括苏联在内的一切社会形态和事务都

---

① Alfred Meyer, *the Soviet Political System: A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5; Allen Kassof, “The Administered Society: Totalitarianism without Terror”, *World Politics*, Vol.16, No.4, July, 1964, pp.558-575.

② Jerry Hough, *The Soviet Union and Social Science Theory*,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③ Jiri Valenta, “Soviet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Czechoslovak Crisis of 1968”,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8, No.1, 2, Spring-Summer 1975, pp.147-173; William Potter, “Sources of Foreign Policy Change: Insights from the Policy Sciences”, Conference on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UCLA Project on Politics and War, October 11, 1985; Gail Lapidus, “The Making of Russia’s China Policy: Domestic/Foreign Policy Linkages in Sino-Soviet Relations”, UCLA Project on Politics and War, October 11, 1985; David Hollowa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rms Race*,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④ Arnold Horelick, Ross Johnson and John Steinbruner, *The Study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Theory Related Approache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75.

适用的话，一个力图解释现实世界的理论范式要避免凋落和枯竭，也必须与时俱进，适时更新。西方苏联学在冷战期间不断扩展其外延，不断借鉴和吸纳苏联学以外的理论和概念，也在常理之中。反过来说，西方苏联学如此大量地和持久地依赖其他理论而求自身生存的现象，也说明苏联学本身的局限性。西方苏联学不断借鉴、不断扩展的过程，也是西方学者们在面对不断变化的苏联现实时，逐步脱离极端性的过程。已经发生的和成为历史的事物是难以改变的（篡改和伪造历史除外），但对历史的解读却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所谓鲜活的历史和灰色的理论之说，其实是理论存在与发展的正常现象。所谓普世理论，至少在西方苏联学中并不存在。

然而非苏联学理论进入苏联学本身，并不能说明或保证这些理论在不同范式中的可用性。对于西方苏联学界大量引进的各种理论，多数似有削足适履之嫌，英语称为“Model-fitting”。原因很简单，像政治文化理论、多元主义理论、社团主义理论等，都是西方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移植到完全不同的政治、社会环境中，总有水土不服甚至张冠李戴的问题。用现成的理论框架去套用千变万化的现实世界，本身就成问题。在政策层面，邓小平的没有框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与叶利钦生搬硬套的西式“休克疗法”相比，显然更为成功，代价更小。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建造真理的基石。

其实，西方苏联学学者的“拿来主义”，是在无法获得苏联的第一手资料或难以对苏联进行近距离观察的情况下，不得已而求其次的结果。与极权主义理论相比，更少极端性，更非意识形态化，与苏联的现实可能更为接近。然而如果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这些理论比极权主义理论更“好”，也是不恰当的。充其量，它们只是与极权理论不同，而没有好坏之分，二者都有盲点和缺失。极权论者对苏联妖魔化并使之固定化，其实多多少少反映了他们自身的极端意识形态化的价值取向。其反对者则心照不宣地把苏联“正常化”，是否也矫枉过正，把苏联过于理想化？其实，真正的苏联，恐怕既不像极权主义理论所说的那样邪恶，亦非“正常论者”所云那般正常。无论如何，西方苏联学的内核与外延、对苏联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对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后期的剧变均无感觉。马丁·马利亚（Martin Malia）对苏联解体

的预测，似乎更出于信念。<sup>①</sup>

如今，苏联已经“作古”，苏联学也不再是“显学”。留给后人的，除了浩瀚的书海、俄罗斯破碎的河山、还有抹不去的记忆。笔者当年在美求学，专攻国际关系和苏联军事/外交政策，有幸求教和结识了众多知名苏联学学者，其中包括我的博士生导师、斯坦福大学苏联军事问题专家戴维·霍莱维（David Holloway）、斯坦福大学苏联历史教授亚历山大·达林（Alexander Dallin）、伯克利大学苏联历史学家马丁·马利亚（Martin Malia）、斯坦福大学政治系苏联外交专家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Condi Rice）、斯坦福东欧事务专家简·楚斯卡（Jan Triska），夏威夷大学俄国远东历史学家约翰·斯戴夫（John Stephan），斯坦福政治系社团问题研究学者菲利普·施密特（Phillippe Schmitter）等。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西方的比较政治学之父、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尤其是，他在晚年仍致力于将其政治文化理论、市民社会力量、结构—功能模式等曾主导战后西方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理论范式向苏联学界推广，尽管这些理论在比较政治学的主流已成强弩之末。也许正因为如此，阿尔蒙德才不遗余力地将这些理论在政治学主流以外的领域扩展。笔者进入斯坦福大学的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在以后数年激进的西化改革中，戈氏两次到访斯坦福大学。苏联政局和社会的走向，似乎也愈发接近西方学界的预期。这期间，笔者有幸聆听了阿尔蒙德退休前讲授的最后一课。老人在期末向我们这些他最后一班的学生散发了多年积存的书籍，只身前往令其兴奋和着迷的苏联讲学和研究。对阿尔蒙德来说，苏联的“春天”已经到来。然而他肯定不会想到，苏联最后的冬天亦不再遥远。

---

**【Abstract】**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Soviet studies in the West have constituted a huge and complex system, leaving profound impa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ies. There is two-way interaction and complex symbiosi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

<sup>①</sup> 参见于滨：“从 X 到 Y：西方‘苏联学’的兴与衰”，《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1期，第80页。

factors, between Western Sovietology and political theories. Nevertheless, because the true “core” theory of Western Sovietology, as a matter of fact, was just limited to highly ideological totalitarianism, western Sovietology had to continuously expand its extension in order to enrich its own content and improve capabilities to interpret practical issues through actively referring to and taking in multidisciplinary theories other than Sovietolog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old War, with extremely scarc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Soviet Union. This enables the Sovietology gradually breaking away from the initial extreme theories with more rich content. However, these theory-first research methods also caused negative effects when Soviet scholars were encountering ever changing Soviet realities.

**【Key Words】** Western Sovietology, Essence, Extension

**【Аннотация】** В период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овет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 Западе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 огромную и сложную систему, а также оказали серьёз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развитие запад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и те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советским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и на Запад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ей образовалось двусторонне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а также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е и сложные синергические симбио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Однако в связи с тем, что истинная «суть» теории совет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а Западе заключалась лишь только в модели крайне идеологизированного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а,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в условиях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когда информация и данные о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были скудны, совет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 Западе для обогащения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содержания и улучшения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их вопросов активно использовал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е теории, выходявшие за рамки совет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остоянно расширяя свой «диапазон». Это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о тому, что совет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процессе сво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постепенно отдалялись от начальных экстремальных теорий, и их содержание становилось всё более богатым. Однако эта прецессия теорий и

буквальные метод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часто приводили к тому, что учёные-советологи перед лицом меняющихся реалий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ействовали механически, что являлось отрицательным эффектом теор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овет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 Западе, суть, диапазон

---

(责任编辑 封 帅)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3 年第 6 期**

(总第 184 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排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ISSN 1009-721X



· 公开发行 ·

定价：20.00 元